铁托与南斯拉夫

〔西德〕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



商 务 印 书 馆

铁托与南斯拉夫

〔西德〕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

林崇远　王昭仁等译

洪善楠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Carl Gustaf Ströhm

OHNE TITO

Kann Jugoslawien
überleben?

1976 Verlag Styria Graz Wien Köln

内部发行

铁托与南斯拉夫

〔西德〕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

林荣远、王昭仁等译

洪鉴楠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10 3/4印张　221千字
1979年1月初版　1979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统一书号：3017·229　定价：0.84元

出版说明

《铁托与南斯拉夫》(德文原名"没有铁托南斯拉夫能幸存吗?")是一本研究南斯拉夫的综合性著作。作者叫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1930年出生于爱沙尼亚。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他曾在图宾根大学研究东欧历史,1972年以来任西德《世界报》驻东欧记者。他写的这本书,对南斯拉夫的内政外交(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民族)作了概括的介绍;主要内容是:铁托的经历和"铁托主义"体系,着重地谈到"自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南斯拉夫国内各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矛盾;铁托以后的南斯拉夫前景。作者对铁托,对南斯拉夫人民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不结盟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给以肯定的评价;希望将来的南斯拉夫有一条"没有铁托的铁托主义"路线,抵制苏修向巴尔干和亚得里亚海的扩张,成为保持西欧局势稳定的因素之一。这本书的资料比较丰富,对我们了解南斯拉夫的情况和研究国际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是个西方资产阶级记者,根本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而且有些观点(例如对斯大林同志以及某些事件等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

本书的前言及一、二、三章是林荣远翻译的;四、五章是洪善楠翻译的;六、七、八章是王昭仁翻译的;九章是程秋珍翻译的;十至十二章是申文林翻译的。全书由洪善楠校订。

目　次

前　言

没有铁托的南斯拉夫，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这个命题某种程度上正在酝酿之中。在南斯拉夫，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和西方世界，不仅政治家们和政论家们，而且还有大街上的人，正在提出这个忧心忡忡的问题：倘若这位杰出的人物有朝一日不再执政，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巴尔干”可能会有所变化，而且是在不利意义上的变化，这个潜在的担忧笼罩着很多谈话和讨论。1976 年美国竞选总统时，甚至谈论了这样的问题：假如这个国家有一天遭受苏联突然袭击，美国是否应该派兵到南斯拉夫？在这个有时令人难堪的谈论中，最有趣的是：美国人也好，南斯拉夫人也好，没有任何人完全排除这样一种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此外，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存在的某种民族上的紧张关系，也是街谈巷议的话题。那么，可能危及南斯拉夫稳定的外部的和内部的势力究竟有多大？

本书试图概括一下铁托时代，同时指出南斯拉夫及其各族人民发展的未来前景。作者意识到，由于这样写法，他将陷入各种火力的夹击之中，因为这个题目具有高度的爆炸性。等待着这个“某一天”的人太多了。一些人希望它的到来，另一些人则害怕它的到来。当一位伟人走下舞台时，不会没有震动的——从最近几年和上几个月的例子中，我们了解到这

一点。

然而，正因如此，必须对有朝一日铁托将遗留给他的接班人的这个南斯拉夫的现状，它的历史先决条件，它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形势，作一个尽可能不受外来影响的分析。作者力求使他的描述尽量摆脱思想偏见。这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铁托主义”的书，因为作者信仰议会民主，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也不是一部“反铁托主义”的书，因为作者感到有义务遵循客观的原则。他知道，没有人能做到完全客观。然而，他试图按照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莱奥波尔德·封·兰克的格言，按其固有的前提和问题，直接展示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和铁托本人的历史和现在。

自从作者在 1954 年——当时是一个骑着小摩托车的好奇的大学生——从的里雅斯特首次跨进铁托国家的边界，去见识这个处于同共产党大国苏联争端中的奇特的共产党国家以来，南斯拉夫这个题目一直萦绕于作者的脑际。在当时和随后的多次旅行中，作者亲眼目睹了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南斯拉夫，学习了这个国家的语言，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马其顿人讨论过，领略了好客之情和友谊，有时也遇到过不信任和拒绝。他感受了风光的妩媚，这个地区地处东西方之间的边界，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边界，并非始于昨日，而是一千年来就是如此，而且今日东西方国家的人，依然以此为界。作者也未忽略这种边界上的历史的和人类的命运悲剧。他在历史文物里，在要塞的废墟上，在马其顿寂寞的群山中，也在经常不得不遭受艰难命运的普通人身上，发现了这种悲剧。欧洲东南部比我们西部艰难——当人们判

断这个地区的状况和人物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说，本书是怀着对南斯拉夫各弱小民族的某种偏爱写成的，那么，作者却竭力不对任何事物加以理想化和美化，也不抹煞罪愆和苦难。

本书不是南斯拉夫的自我描述，它不是用塞尔维亚人的、克罗地亚人的或者甚至是共产党的观点写成的书，而是用一个西欧人和德国人的看法写成的书。它应当对操德语的读者，首先是联邦共和国和奥地利的读者，说明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它应该既不号召为了铁托而斗争，也不号召反对铁托而斗争。无庸赘言，今天不乏战斗文字。作者不敢沽名钓誉，去丰富这类诽谤书籍的数目。

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将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在这里虽然找到了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的描述和说明，却找不到为之辩护的东西。铁托政权的对手们将会断言，我没有偏袒这个或那个反抗运动，诸如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或大塞尔维亚的君主政体分子。然而，作者认为，这样一种“偏袒”不可能是一位致力于独立自主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的任务。不久前，我在贝尔格莱德的党报《战斗报》上读到这样的句子，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是一个“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顽固敌人”。几乎与此同时，一家激进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流亡报纸写道，施特勒姆在“为南斯拉夫的宣传效犬马之劳”，而且还很可能接受铁托的贿赂。

好吧，作者既不是“敌人”，也不是宣传员——至于贿赂云云，那是某些南部斯拉夫人显然从土耳其战争时代保留下来的讲述童话的本领——而且也正好保留在几个政治亡命者的

身上。此外，作者坚持那个出自中世纪意大利的见解："谁要是被教皇派人咒骂为保皇派人，而被保皇派人咒骂为教皇派人，那他就最接近真理。"

但是，围绕着南斯拉夫这个命题所传开的这样一些事件和普遍的神经紧张，清楚地表明："某些东西正在酝酿之中"。因而更加必要，在分析中不要迷失方向：唯有对内在联系的认识能使我们继续向前。

任何对共产党政治的批评，对铁托的共产主义体系的批评也一样，首先总是必须提出二者择一的问题。如果有朝一日南斯拉夫铁托的共产党人不再在南斯拉夫执政，而可能让苏联人及其帮手们来统治，这能符合西方的利益吗？也能符合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利益吗？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摧毁南斯拉夫国家，西方能支持他们吗？作者对克罗地亚人民怀着巨大的同情——但是，如果昔日可怖的争端重演，甚至强大的苏联可能作为"维护秩序的力量"出现，它能象这些饱经风霜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吗？

每一个从政治上进行思考的人，都必须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当他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某些实践持怀疑态度时，恰恰更需如此。欧洲东南部出现的问题太严重了，以至不能掉以轻心地视而不见。一位德国政治家——微妙的是，他不在波恩当权，而是在巴伐利亚执政——最近说道：他感到遗憾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片面地面向西北，因而欧洲东南部为我们所忽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让南斯拉夫听任命运的摆布。说这句话的是巴伐利亚总理阿尔方斯·科佩尔——可惜说得太千真万确了。因此，本书不仅想对提供资料

和切实讨论有所贡献，而且也应当致力于再次更强有力地唤起对东南部的醒悟。

我要感谢我的出版人汉斯·扎斯曼博士，他一直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关心这部著作的产生。我为拙作在奥地利印刷出版感到欣喜，因为奥地利过去和现在都同这个东南地区保持过很多的联系，今日依然如此。尽管日常政治变化多端，把欧洲的东南部和西部互相联结起来，今后也仍将是奥地利的任务。

我要感谢无数南斯拉夫的谈话伙伴，我同他们进行了有助于我了解某些事物的讨论。最后，我要感谢慕尼黑的兹登科·安蒂奇，他帮助我寻求资料来源和校阅手稿。

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

一个人和他的时代

在当前的国家首脑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党的首脑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由于他执政时间之长，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铁托这个名字产生于地下工作和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他是还在任职掌权的最后一位希特勒的对手。从1976年9月8日晚(中欧时间)中国党的首脑毛泽东逝世以来，他也是最后的一位还健在的约瑟夫·斯大林的伙伴和对手。虽然思想意识有着千差万别，另一种不可低估的共同性把南斯拉夫党的首脑同毛联结在一起：毛泽东和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那些使共产主义在他们国家掌权的革命的领袖。尽管两人的禀性和情操是如此迥异——比如，看不出铁托有任何在他的中国伙伴身上的那种苦行癖好——，这一事实却突出地显示了同今日统治苏联的那些第三代和第四代子孙们的天壤之别。今天，几乎没有一个莫斯科的领导人，能够说他见过列宁，并在俄国革命中起过那怕是昙花一现的作用。铁托在南斯拉夫，犹如毛对于中国和列宁对于俄国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他，就无法想象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和它取得政权的道路。

由此，不仅产生了这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首脑的大部分权威，对他个人的崇拜式的尊敬，也属于这幅图象。这里，再次同毛相似，尽管在南斯拉夫对铁托尊敬的形式没有超越政

治和社会的范围。在贝尔格莱德，没有人会说，他借助铁托的教导，作出了医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南斯拉夫舆论对铁托的尊敬，是建立在这个人绝对不受任何批评的事实之上的。不存在有铁托会做错的事情——而且在他的国家里，没有什么政治或社会事件不是铁托可以最后一言定夺的。铁托的话是金科玉律：几个偏离铁托道路的战友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并在沉沦中消声匿迹。

这意味着铁托是一位独裁者吗？铁托是一位经由战争和内战取得政权的人，他的游击队员也不矜持。奇怪得很，虽然有时他也用强硬的手腕统治南斯拉夫复杂的国家机构，但是，他绝不是象斯大林或他的后继者那样，使人们在他面前发抖。铁托的生活作风，至少对一个比较小的而且为严重经济问题所拖累的国家来说，是十分铺张浪费的。的里雅斯特海岸附近的布里俄尼群岛专供他享用，在斯洛文尼亚和伏伊伏丁那，他有游猎行宫多处，还有数辆梅尔切德斯牌600型（即奔驰牌——译注）汽车。但是这一切似乎为南斯拉夫人民所接受，把它当作理应属于这个人的。不仅如此，在南斯拉夫，对拥有昂贵的汽车或漂亮的别墅的较低的干部，一再进行正式的（党的机构方面的）和非正式的（居民中的）批评，铁托却是例外。甚至连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激烈的对手，对铁托的极度豪华和施尽权势，迄今几乎没有提出过严肃的批评。相反，共产党人也好，非共产党人（肯定也有很多反共分子）也好，都祝愿高高在上的“老头子”长寿——这是出于对他百年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潜在担忧。

谁想评判铁托的政治风格和个人作风，绝不应该用西方

的或者甚至用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清教徒尺度。南斯拉夫不是一个西方的国家。这里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多元民主传统。即使在你观察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斯洛文尼亚或克罗地亚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一些地区——的时候，也别让巴罗克教堂或威尼斯风格的建筑物，诱使你戴着西欧的眼镜，去看待社会和政治状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铁托在这里扮演了一个从前的君主所担当的角色。这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首脑，经常被西方观察家称为“最后一位哈布斯堡人”。这种说法只是很有限地切中问题的核心，因为哈布斯堡家族不是“意识形态”的权威，而只是世俗的、君主政体的权威。然而铁托——1892年5月25日生于库姆罗韦茨，父亲克罗地亚人，母亲斯洛文尼亚人——至少在他的血统和个人生活经验中，肩负着奥匈多民族国家的种种问题。

克罗地亚作家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札是铁托个人的朋友，并且象铁托一样，在古老的奥地利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在一篇政论里指出，苏特拉小河，几千年来一直是处在奥地利（即昔日的施台尔马尔克）和匈牙利之间的边界上，——也就是处在西方和东方的潘诺尼亚广大地区之间的边界上。铁托的出生地库姆罗韦茨就座落在这条河畔。也就是说，铁托出生在一个历史上烽火连绵的地方。他是一个边境上的人。他本人多次引证克罗地亚农民领袖马蒂亚·古贝茨的话语。十六世纪，古贝茨在铁托后来的家乡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山区（萨哥尔热）领导过农民起义，反抗封建领主和当时萨格勒布的主教尤拉伊·德拉什科维奇伯爵。古贝茨在萨格勒布主教所在地卡普托尔被戴上灼热的铁冠，四马分尸。

然而，铁托仅仅由于个人的勇气，他的随从的勇敢无畏和忠诚，才逃脱类似的命运——即作为一个叛逆者被斯大林干掉的命运。在1948年同莫斯科冲突后的最初几周的决定性时刻，他自己就与他那不幸的亲密同乡、农民领袖相提并论，后者由于敌众我寡而失败。当“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邀请南斯拉夫党的首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一次他将不得不在苏联代表及其追随者面前辩护或屈从的会议时，他拒绝出席。他预感到，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逮捕、绑架、甚至可能是死亡。他熟知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方法——他到底作为流亡者和共产国际的干部，在莫斯科“卢克斯”旅馆里，亲身经历了外国共产党领袖是如何在半夜三更被逮捕和绑架的。

然而，把铁托描绘为“叛逆者”，犹如企图称他为“最后一位哈布斯堡人”一样，仅仅切中这位多方面闪烁着光辉的人物的一部分。作为叛逆者，他可能失败了，作为“共产主义的哈布斯堡人”，他也许很快地就在内政和外交问题的漩涡中失去了控制。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不能不赞许这位人物，不管人们对他的政策和思想意识持何态度：他的行动和反应总是有节制的。西方观察家，首先是当他们既非共产主义者又非社会主义者时，如果要把他描绘成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有非凡策略的机敏的人，是并不需要美化他的。

不过，我们再来谈谈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这位“边境上”的人：在他身上，巴尔干的刚强不阿和无所顾忌，同奥地利的随机应变结合在一起，造反精神和策略上小心谨慎结合在一起。因此，铁托没有在三十年代的莫斯科造斯大林的反，虽

然他当时(如同他本人后来所说的)就基本上知道有人在搞什么名堂。在他取名"铁托"之前,开始时化名"瓦尔特·弗里德里希"。这位比较起来毫无权力的共产国际干部知道,揭竿反抗斯大林和苏联秘密警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那样做,他将成为千百万牺牲者中的又一个。因此,他没有二话地从苏联人手中,接过领导南斯拉夫党的责任——虽然他知道,或者因为他知道,他的前任米兰·戈基奇消失在古拉格② 的深渊里。但是,铁托采取防范自身遭此命运的措施之一是,把当时还处于地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从莫斯科迁移到南斯拉夫。也就是说,他宁愿冒着让南斯拉夫王室警察逮捕的危险,也不愿让苏联保安局逮捕。

铁托如何成功地把一个小小的地下党组织,变成一个群众运动,使他终于经过战争和内战而夺取政权,迄今这仍属于最令人惊讶的命运的转折。在战前和战争期间,铁托是一个政党和运动的首领,这个政党和运动盲目忠于苏联和斯大林。他如何使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解脱这种忠诚,这是属于当代历史的戏剧性篇章。很多事实说明,铁托确实任何时候都没有满怀热情地看待过苏联或苏联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许多下属和同事迥然不同,也有别于米洛凡·德热拉斯。这位门的内哥罗的烈性汉子后来背离了铁托。

在铁托的远远近近的同乡中,看来都广泛地具备着这样一种特色:温情脉脉。如果铁托不是完全不具备这种特色,他的道路是不可想象的。只有行动冷静的人,才能历尽如此之多的沉浮变化,数十年如一日地一直稳坐高位。他周围的伙

① 古拉格,苏联的劳动教养所。——译注

伴，以及他面对的敌人，却更迭不已。如果说铁托曾经表示过忠贞不渝的话，那么，首先是忠于他自己和忠于由他体现的并打上他的烙印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那么，铁托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位国际的革命家吗？——或者象人们有时看待他的那样，是一位英明的、成熟的"国父"吗？在这里，回答也不简单。人们目睹铁托是一位国际的革命家，而且有足够的他亲口说出的言论正好证明这一点。他迫害、监禁和杀害过很多他的对手，特别是在战争和战后时代。但是同时，他又根据某种"不干涉"的原则来治理他的国家。今日南斯拉夫社会有很多弱点和问题。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社会，但也不是绝对"极权"的。谁观察今天的南斯拉夫的现实，都能为他提出的几乎每一个论断找到证据。如果说，南斯拉夫是一个警察国家，那是对的。但是，它也是一个警察有时不发挥作用的国家，正如人们所说的，警察有时会不加深究。如果说，南斯拉夫的党控制着整个生活，那也是正确的。然而，这丝毫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如同在大洋里的火山岛一样，在这个社会里，一再会冒出来"自由的"领域，在那里人们能够听到或读到显然是非正统的意见。

喜欢把政治因素"人格化"的西方世界，称南斯拉夫为铁托的国家。这也是既正确又错误的。所以正确，是这位总统和元帅给这个国家的道路打下了烙印。不过，也可以提出相反的问题：铁托是一党和一国的首脑，在这里，如此多的相互矛盾的倾向和形形色色的王国、民族、文化和宗教的遗产兼容并蓄，难道铁托的道路不是以此为标志吗？有时，人们不禁要问，如果铁托不是克罗地亚人和南斯拉夫人，而是美国人，俄

国人或德国人，他将成为怎么样的人呢？他的生活一开始，似乎就决定献身于“超民族”的个人前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约瑟普·布罗兹到过奥地利，也到过德国，做着今天称之为“客籍工人”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奥匈帝国军队的卫队长(即下级军官)，在喀尔巴阡山被俄国俘虏。众所周知，卫队长布罗兹由于特别勇敢，预定授予他“银质勇敢奖章”——当时皇家和王国军队里的官兵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许多年之后，当铁托作为国宾来到奥地利首都的时候，他很乐意地回忆起这种未曾变成事实的、国王给他的荣誉。他当时没有运气得到“银质奖章”：这个勇敢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卫队长在1915年受了重伤，落到了俄国人的手里。

约瑟普·布罗兹，这个来自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边界的农民的儿子，又进入了一个大的帝国——沙皇俄国的范围之中。要是这两个王国没有在1917年和1918年灭亡的话，谁知道他的生涯会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对布罗兹来说，随着皇帝和沙皇的垮台也就开始了革命。他作为奥地利的战俘，置身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范围之中。布罗兹在西伯利亚、彼得堡、接着又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俄罗斯纷乱的年月。他象当时在俄国的许多别的战俘一样，加入了“红军”。这是他第一次同共产主义接触。在他渡过战俘和参加革命的几年岁月后，当他在1920年离开俄国回到他的南斯拉夫故乡的时候，照一切迹象看来，他是一个俄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一个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服务过和同白军作过战的好汉。但令人注意的是：他的正式的和半官方的传记，在处理布罗兹生涯中第一次“在俄国的时期”时，显得含糊不清。奥地利战俘约瑟普·布

罗兹在俄国是如何成为共产党人、成为列宁的信徒和布尔什维克的，这在细节上直到今天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俄国革命爆发了——而布罗兹身陷其中，因为1917年一位波兰工程师帮他逃往彼得格勒(今列宁格勒)——而这位工程师是布尔什维克的信徒。逃跑的战俘布罗兹成为列宁的同情者，可能是因为布尔什维克要求结束战争；可能对于他这样处境的人，极端的俄国革命者必然会成为同盟者和资助者——不管怎样，结果是约瑟普·布罗兹不断接近布尔什维克。昔日从库姆罗韦茨这个穷乡僻壤来的农民子弟，胸怀大干一场的凌云壮志，以克服他出身的微贱状况和窘迫；对他来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纲领，不仅从事业上看，而且从他的个人处境看，都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它为他提供有所作为的可能。因此，共产主义就成为这个人生活中的伟大的冒险事业——不过，这不是知识分子的教条主义的、书本上的共产主义。

各国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人，不得不炫耀自己既是政治领袖，又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者，他们正忍受着这个自己套上的枷锁。因此，在对铁托青年时期的传记性描述中，也不乏指出他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这部和那部作品。

但是，布罗兹不是通过理论，而是经过实践和生活的学校成为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布罗兹不同于他后来的许多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甘共苦命运的战友，他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知识分子。他是作为青年工人开始活动的——然而是小农出身的工人。这种同农村的联系（而这同样也能在毛泽东身上找到，是两人之间的又一个共同特点），帮助布罗兹永远脚踏实地。迄今铁托仍然保留着农民的不信任和多疑的特性——

特别是边境上的农民，处于两个民族之间、两种文化和两个政权中心之间的农民的不信任和多疑心理。此外，还有对于自己达到的成就，尤其是不顾一切逆境"创造"的成就的欣喜和骄傲。由此又产生出一种正好堪称为保守的保全自己事业的愿望。在这里，布罗兹—铁托身上的保守主义(即保存既得成就的愿望)和革命(即继续变革和尽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社会变革的愿望)，直接地、有时是矛盾地相互并存着。

但这位农民出身的青年金属工人，同时也打上了属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弱小民族命运的烙印。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以自己的方式，承受着边陲地区的命运。这里是防范伊斯兰教的"基督世界的大门"。它们是两个斯拉夫和天主教的小民族，属于欧洲，但从未被欧洲人正确地承认过。古老的奥匈帝国虽然给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提供了一个生存和开始自我实践的形式，但同时又拒绝承认这些民族。因此，这些民族对奥匈帝国的感情是爱恨交加的。在这方面，约瑟普·布罗兹个人的早期命运具有象征意义：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他在奥匈帝国四处奔波，但这个国家和社会，未能给这个人的聪明才智提供适当的用武之地。战争期间，人们才认可他扮演一种有些出头露面的、纵然是低微的领导角色：他成了下级军官。因此，这样一个人必定要由于一系列的个人动机而成为革命者：由于小农生存艰辛的经历，由于弱小民族的生存状况，由于他当青年工人时在旧王国——从波希米亚到亚得里亚海和从斯洛文尼亚到新维也纳城——的车间和工厂里取得的经验。

因此，虽然这个人的生活道路显得恰好绝不适于用来把

古老的奥地利描绘为田园牧歌，但乍看起来一定会惊讶不已，铁托是多么强烈地打上属于这个帝国和王国的烙印。在这里，这位后来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许多特点和特性，可以追溯到他的生活的最早期，某种程度上还是"革命前"的时代。首先，对当时席卷克罗地亚的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政治运动，年轻的约瑟普·布罗兹似乎保持着远远的距离。他既没有成为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者，也没有成为"南斯拉夫一体化"的追随者。他走别的道路的原因是可以猜想的：克罗地亚作为民族生存的内容对他来说太小了，甚至南斯拉夫统一——他后来成为这种统一的象征和体现者——的理想，对这个奋发上进的青年人也只有微乎其微的吸引力。使他醉心倾倒的看来是大的帝国——首先，是以德国为背景的奥匈帝国，其次是广袤无垠的俄罗斯。战乱曾使他漂泊到俄国多年，这个国家给他的个人和政治前途留下了印记。

然而稀奇得很：那两个政治大空间成为对约瑟普·布罗兹的挑战和致命危险。他同这两个国家联结最紧密，他学会流利地掌握它们的语言——俄语和德语。在反抗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斗争中，约瑟普·布罗兹成为一个世界历史的人物，成为以某种方式激荡本世纪的人物之一。铁托1941年至1945年反抗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人，1948年至1953年反抗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人（而且确实可以说直到现在）。也许他所以能够战胜两个同他对峙的大国和民族，因为他从内部熟谙这两个庞然大物的特点、思维方式、长处和短处：一个大人物能反抗两个大帝国进行自卫，因为他本人曾为这些帝国效劳过。但是同时，这些帝国——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以及俄罗斯帝

国——决定了他对历史范畴的直觉。时至今日，这还在起作用。于是，产生这样的印象，即铁托有时苦于他的国家的内在矛盾和弱小(以及由此派生的自卑感)。

还是回到开头的话题——俄国革命时代。布罗兹携带他的俄国妻子——他一共结婚四次——回到他的克罗地亚故乡，它属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来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他来到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这里的社会问题——也是战争的后果——一发不可收拾，已有大祸将至之感，二十年后君主政体的南斯拉夫因此覆灭：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严重龃龉。他们是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两个最重要的民族，而这个多民族国家又是从另一个已经灭亡了的多民族国家的遗产中诞生的。新建立的共产党在议会(立宪会议)选举中取得非凡的成就——它赢得百分之十二选票，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三大党。在当时，1920年，就已经显示出，它的追随者大部分是农民，尤其在马其顿和门的内哥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门的内哥罗爆发过特别猛烈的共产党暴动。)但是，布罗兹当时仅沾点儿共产党工作的边：他成为党员，然而他绝不是特别的积极分子，或者甚至是"职业革命家"。共产党为贝尔格莱德政权的决议所取缔并被迫转入地下这件事，也没有使他特别积极起来。很多年以后，他才通过在"独立工会"的活动，靠拢这时已处于地下的共产党。他成为党的干部，在他工作的企业里——1925年在克拉列维察的一家造船厂，1926年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一家铸造厂——用共产主义思想进行鼓动。然而，他在党内青云直上的真正开始，是在被任命为萨格勒布金属工人联盟书记和萨格勒布党

委会委员的时候。

1927年，布罗兹首次由于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出庭受审，他被判处监禁七个月。审判布罗兹是在克罗地亚小城奥古林进行的。小城的地区法官邀请罪犯到自己家里，在那里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这件事值得注意，由此可见当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南斯拉夫”这个名字1929年才正式启用）国家状况之一斑。这位地区法官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成了铁托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

但是，大的考验还将到来：1928年，布罗兹被警察逮捕。此时他已跃升为萨格勒布的共产党书记。抄家时，发现他的住宅里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外，还有几个手榴弹，一把手枪和一些弹药。在法庭上，布罗兹公开宣布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他给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留下的印象是，出类拔萃和聪敏多智。他大声疾呼，他不承认资产阶级法庭的宣判，并且补充说：“我只对我自己的党和共产国际负责！”约瑟普·布罗兹被判处五年监禁。

萨格勒布审判的一些观众后来回忆时，还记得被告布罗兹的“冷酷的蓝眼睛”。1934年他离开监狱时，世界变了：在弑杀克罗地亚农民领袖施契潘·拉狄奇之后，亚历山大国王在南斯拉夫建立了独裁政权。拉狄奇在贝尔格莱德议会上被一个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的议员开枪击毙。但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冲突只是暂时被掩盖起来，并未解决。在德国，希特勒夺取了政权。在苏联，约瑟夫·斯大林开始飞黄腾达。

不过，布罗兹在这些岁月里自己也变化了：在关押期间，他同莫萨·彼雅杰相遇——一位犹太出身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有造诣的和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位知识分子和这个实干家相辅相成，因此，监狱对铁托来说就成为大学。（而且，这一经验是为什么拒绝给1976年的南斯拉夫罪犯米哈洛·米哈洛夫以他所要求的“政治犯”地位的原因之一：有些党的领导人亲身上过“监狱大学”，他们不愿意有这类方向相反的“大学”）。此外，当然必须补充说明：南斯拉夫的拘留所在王国时代也不是休养所。但是，正如在那时的另一位共产党犯人米洛凡·德热拉斯的著作里所看到的，无论如何，监狱里有一定的秩序，监狱首先保护罪犯不受警察的粗暴虐待，而警察的粗暴行为在当时的巴尔干成了风气，这也是土耳其传统的表现，可惜有些地方今天依然如故。

从现在起，我们所遇到的布罗兹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职业革命家”。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布罗兹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走上这条道路呢？有人可能认为，他对是否带着老婆、孩子过着劳动者的生活，犹豫不决。从俄国回来后的那几年，他看来也是这样蹉跎岁月的，他只在业余时间里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俄国的经历肯定深深地影响了他。布罗兹显然不是生来就为着过小康生活的。它同这个人的政治敏感和清醒冷静的谋略也不相适应——他后来作出各种决定时，仍然保留这种不使感情冲动、贸然从事的品质。他在1921年从俄国回来时，不仅南斯拉夫，而且连南斯拉夫共产党也混乱不堪。那时，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得还很糟糕；在以它被贝尔格莱德王国政府摧毁和取缔而告终的那个第一阶段，布罗兹没有竭尽全力参加

工作。事后看来，这不是他的狡猾的一步棋，就是命途佳运。共产党初期的这种混乱的后果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统一的南斯拉夫的拥护者和主张把这个“各民族的监狱”解散为各民族的若干部分的辩护士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派别斗争；“民族问题”上的深刻意见分歧也起作用。二十年代初期，几乎所有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干部都为这些派别斗争所折磨，被贝尔格莱德王国警察逮捕或立即杀害。其余的，如南共“右”翼领袖希马·马科维奇或布罗兹·铁托的前任米兰·戈基奇，都同共产国际（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发生冲突，被开除和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

所有这些人的命运必定给约瑟普·布罗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肯定有助于增强他后来对莫斯科和俄国人的怀疑。然而，这同一个在后来怀疑和破坏克里姆林宫与苏联党的权威的人，在1927年时，起先是在相反的道路上开始的。当时在萨格勒布（阿格拉姆）召集过一次地下的南共党代表会议，当党在会上再度明显地分裂为“左”和“右”两派时，作为金属工人代表出席会议的约瑟普·布罗兹，采取了非凡的举动：他拒绝党的书记的报告，既反对“右派”，也反对“左派”，而且要求萨格勒布的共产党组织，请求共产国际干预南斯拉夫党的事务。

代表会议结束时，约瑟普·布罗兹（当时化名：盖奥尔基耶维奇）当上萨格勒布共产党的书记。共产国际对他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反应；它公开尖锐批判南斯拉夫的派别分子，从而支持了布罗兹。此人的升迁同共产国际的干预之间的息息相关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致后来提出疑问，约瑟普·布罗兹在他

从俄国回来时，是否就已经秘密受命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机构，或者是它的亲信——是否他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内部斗争和混乱不堪的第一阶段保持远远的距离，正是为了后来更有效地步步高升。

无论如何，如果共产国际没有注意到这个人和他的杰出的政治和组织才能，那倒是令人惊奇的。而且，如果在莫斯科人们迄今对他一无所知，那么1927年萨格勒布党的代表会议后就能知道了。这样一来，约瑟普·布罗兹开始青云直上了——仅仅为1928—1934年的监禁所中断。

释放以后，布罗兹已经自称为"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仍处于地下，中央委员会设在邻近的维也纳。铁托1935年去莫斯科，在那里的共产国际中央工作。威廉·皮克和盖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是他的上司。布罗兹·铁托在共产国际里，也用化名"瓦尔特·弗里德里希"，或者干脆用"瓦尔特"。当时来自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流亡者，住在莫斯科的"卢克斯"旅馆。"卢克斯"旅馆的生活对铁托是决定性的经历；开始时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经历导致他对苏联保持距离。在这里，他经历了斯大林初期的清洗、人员的失踪和苏联秘密警察对外国共产党人的盯梢。铁托本人后来试图解释他在莫斯科的情况和态度。莫斯科时代过去很多年后，他说："我当时目睹这一切。但是对这一切的原因，我当时没有象今天这样清楚……然而那时，我的革命义务责成我不能进行批评，不能帮助外国宣传，因为那时苏联是唯一实现了革命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我认为，我不可以做反对这个国家的宣传……有人可能会责备我没勇气。不，我相信，没有任何

人会说我们没有勇气的。我和其他许多人当时为一种唯一的思想所左右：不要做出任何可能有损整个（共产主义的）国际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事情。”他把斯大林主义的无人道的清洗和表现形式看作是“暂时的现象”，苏联会克服这些现象的。

这里显示出，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布罗兹·铁托已经患了“意识形态腹疼症”；在崇拜斯大林的标志下，很多共产党人身罹此疾。只是这个疾病没有在他身上导致同共产主义决裂，当时甚至也没有导致同斯大林公开决裂。很多事实说明，在那些岁月里，布罗兹·铁托自己并不清楚，他在内心深处过着双重人格的生活——这是一个在极权国家的公民和极权党的干部身上并非罕见的现象。但是，他的小心谨慎和自觉遵守纪律，对他能在莫斯科幸存下来也是有好处的。同很多外国共产党人相反，“他不到处胡说八道”。在南斯拉夫的多年监禁之后，他习惯独处，在莫斯科也没有加入任何集团或小组。他在莫斯科“很少活动”，关于这一时期，他后来是这样报导的。铁托的原话是：“办公回来，我就到我在‘卢克斯’旅馆下榻的房间”。他读了很多书，钻研了经济和哲学著作，也研读过军事科学研究文章。“除了机关和住处外，我在莫斯科很少外出。一个例外是大剧院，我在那里看杰出的芭蕾舞，听优秀的歌剧……”

铁托这些话，读起来犹如为在莫斯科和在当时的苏联机构内图生存而制订的实用守则。然而不仅仅是幸运和谨慎对铁托有好处。他多年来就了解俄国人——而俄国人也了解他（或者至少认为了解他）。他发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总书记盖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是一位朋友。但在希特勒的

飞黄腾达日见明显的年代，在佛朗哥和共和党人之间的西班牙内战愈演愈烈的岁月里，共产国际和苏联人需要一位象铁托这样的人。他在巴黎为西班牙的国际旅筹措军需。此时，他已经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组织书记”，即党的第二号人物。

他的许多能干的游击队领袖出身于西班牙内战“学校”，他们是作为志愿军奔赴那里的。铁托同“西班牙战士”的联系，虽然对他后来游击战时期有所裨益，铁托却从未亲身在西班牙战斗过。这一点可能拯救他，使他免遭象积极的“西班牙人”那样受到斯大林的迫害。此外，从作为南斯拉夫党的二号人物的地位出发，铁托是当时党的首脑米兰·戈基奇的天然对手。既然后者在斯大林那儿失宠，并在清洗中“被消灭”，铁托自然而然地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有利的地位。的确，1938 年，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的头顶之上：当他从巴黎回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正进行严肃的考虑，是否应象以前对待地下的波兰共产党那样，由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流亡在莫斯科的无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已经被捕和消失在苏联的集中营里，或被杀害。铁托没有遭到这种灾难，显然要归功季米特洛夫的有决定意义的说项。不仅如此，1939 年，他成为南共总书记。米兰·戈基奇时代的党的领导人，铁托是唯一幸存者。①关于这一点，铁托后来说：“我们的很多人在那里（莫斯科）被捕，几乎没有人在外头了……我在莫斯科逗留到俄一芬战争爆发之前不久。然后我就回国。……我到萨格勒布……我幸运异常。因为在莫斯科一切都筹划成熟，以

---

① 什温科·什塔武布林盖尔：《铁托的历史，不是斯大林主义》，贝尔格莱德，1976 年，第 19 页。

致我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甚至战争都较为轻松，因为在战争中人们至少知道敌人在哪里。”

有些情况表明，铁托虽然从苏联人手里接受新的任务，但在内心深处已经同莫斯科保持着距离。在莫斯科中央公开插手统治外国共产党的时代，他采取两项决定性的步骤，以摆脱克里姆林宫的监护：他要求，处于地下的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应由国外迁回南斯拉夫。第二，他竭力主张，必须停止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迄今一直给南斯拉夫党的财政费用。

这两项建议的效果，有助于大大减少共产国际对南共及其新的首脑的影响。但是在莫斯科，人们没有理会到这一层，因为铁托善于把它们当作促进党的一体化的措施和南共更加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前提，说得有根有据，令人信服。铁托说过，没有任何东西能象从第三方面得到的金钱，那样腐蚀和败坏一个政治运动。可以补充一句：一个财政上依附莫斯科的共产党，也增加了它对苏联秘密警察的依赖性。从外国（在这种情况下指从莫斯科）得到财政援助，“只能毁掉干部，使他们依附给他们钱的人”。说得尖锐一些：铁托不想让苏联的秘密警察享有收罗他的人员的可能性。

人们又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约瑟普·布罗兹当时是否切确地意识到他的“干”与“不干”的全部后果？——这谁能知道哩。然而，他的政治直觉使他走上对他来说是正确的道路。因此，象他这样一位共产党的地下战士，从共产党的莫斯科到达萨格勒布，自称这是幸运的，这只是在初看起来才令人惊异。用共产党的尺度衡量，当时萨格勒布是一座“君主政体—法西斯专政”统治的城市，是绝非温和的王室

国家而是警察蠢蠢欲动的地方。也就是说，铁托把南斯拉夫王朝的警察专家，看得比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的危险性小一些。

然而最重要的是：随着回国，铁托甩掉了大多数可能的对手和告密者。这也是由于斯大林清洗机器的间接的和非自愿的帮助。但在南斯拉夫，他能够组织"铁托小组"。那是一个发誓效忠于他的领导班子，其核心直到前几年还在领导共产党的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人爱德华·卡德尔，塞尔维亚人亚力山大·兰科维奇（1966 年被罢黜），门的内哥罗人米洛凡·德热拉斯（1954 年被罢黜），斯洛文尼亚人鲍里斯·基德里奇（1954 年逝世），塞尔维亚犹太人莫萨·彼雅杰（1957 年逝世）和许多别的人。在两次巨大的灼热的考验——1941 年至1945 年反抗德国人的游击战和 1948 年同莫斯科的冲突——中，整个来说，证明这个小组是协调一致的，可靠忠诚的。没有它，铁托就不可能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

铁托和他的小组建立的党，数量上并不大。有人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南斯拉夫约有一万二千名共产党员，外加大约二万青年共产党人（"南共青"）①

因为党在地下活动，当然没有精确的党员统计数字。过去，一再有个别党员或整个小组由于偏离路线而被开除。但是，1941年，显然不仅存在着一个可靠的、组织良好的地下网，而且有广大阶层的同情分子——这些人虽然不能十分准确地想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却是准备参加行动的。的确，南斯拉夫王朝不是极权国家，同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比较，贝尔格莱德政权要温和得多。然而这个南斯拉夫无法对

① 全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付它的内部问题，无法克服广大地区尤其是国家的南部和东部地区的落后，无法消除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民族对立以及其他民族的不满。南斯拉夫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古老的巴尔干传统和现代生活的前兆相杂其间；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内，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思想以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它特别有诱惑力。这些思想要最终回答所有的问题。因此，在这个国家里，中间的资产阶级—农民的组织，从克罗地亚农民党到塞尔维亚的君主政体分子和民主派，在决定性时刻被一扫而光，或消耗殆尽和自行解体，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法西斯倾向或亲法西斯倾向的右翼极端运动为一方，共产党人为另一方，两军对垒。

不过，南斯拉夫的“右派”，就民族而言，是分崩离析的，他们互相争斗和剿灭，以及身上背着占领国的帮凶的污点（这既适用于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集团，也适用于塞尔维亚的各种集团，他们既是反共分子，又同德国人勾结）。而铁托的共产党人却作为民族独立的卫士屹立在那儿。铁托抛弃南共以前的反南斯拉夫的、旨在分离为若干个体小民族的政策，并采取了一条反法西斯—爱国主义的方针，这就再次证明幸运和直觉的结合；这样做，肯定不仅出自本意，而且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新的总路线。早在推翻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的亲德政府和1941年3月27日的反德游行时，已经可以看出，共产党附和贝尔格莱德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情调。诚然，在随后德国进攻时，旧的南斯拉夫，它的军队和领导阶层崩溃了。在反抗中，共产党人毫无作为。是的，1939年签订的德苏条约还存在着，如同受到其他外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欢

迎和捍卫一样，它也受到铁托和南共的欢迎和捍卫。（当时，一个对路线忠诚的共产党人，反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不可想象的——铁托自己说过，他那时是一个忠于路线的共产党人。）因此，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德国占领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季度里，共产党组织，铁托和他的领导班子，在等待中消磨时光。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时，他们才从他们的谨慎和“中立”中走脱出来。当时，住在德国占领军眼皮底下的一所贝尔格莱德别墅里的铁托，发出抗战的信号。1941年6月22日处在地下的南共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显示了当时党依附莫斯科的程度：它要求南斯拉夫人，“不能让英雄的苏联人民的宝贵鲜血白流，岂能不帮助他们！”德国开始向俄国进军的五天之后，铁托主持下的南共政治局决定成立“民族解放游击队总部”。据说，那时首次应用“游击队”一词——借用在西班牙和在俄国后方起义反抗拿破仑的义勇军的名字。南共领导同莫斯科保持着直接的无线电联系。7月1日得到莫斯科指示，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必须“公开反抗入侵者”，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1年7月4日，南共在一份号召书里要求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起来反抗“入侵者及其雇佣军”。这个日子是今天在整个南斯拉夫隆重庆祝的“战士纪念日”。号召书说，应该“用恐怖来回答”恐怖。

然而，起义最初只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爆发——在这两个地区，德国和意大利占领当局感到特别困难，此外，这里有起义和反抗的老传统（还在土耳其统治时代就如此）。在门的内哥罗，当地的共产党人搞得十分激进和残酷，以致铁托不得不煞住他们。米洛凡·德热拉斯是那里起义的领导人之

一。那时，门的内哥罗人已经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们看来是在完全步俄国人的后尘。塞尔维亚的游击队起义也显示了激进的倾向，起义以袭击本国的(塞尔维亚的)宪兵站开始，然后在 1941 年秋天建立"乌日采共和国"——当然是短命的。一开始，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斗争，就同反对非共产党的、农民一资产阶级势力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因为，共产党游击部队初期攻击的与其说是德国人，不如说是乡村地区的本地塞尔维亚警察。德国人根本没有占领那些地方。

1941 年 9 月中旬，铁托到森林里去。在此之前，他一直在报纸(《政治报》)出版人里布尼卡的贝尔格莱德别墅里，安置他的总部。象早年的地下工作常常干的那样，他化装为富商，搭乘火车到游击区的边界，然后接受军队的指挥权。从地下活动的战士，变为军事领袖，从无名的共产党干部，变为举世议论的元帅。这里也证明，这个人是一位军事和政治天才。

有利形势再次帮了布罗兹·铁托的忙。德国人摧毁南斯拉夫，使这个国家支离破碎，因而创造了一个他们自己和盟国以及卫星国都无法填满的真空。在南斯拉夫王国内，"体现国家的"民族塞尔维亚人，由于失败和屈辱而昏昏然。从昏昏然当中滋长出愤懑，随即就"到森林里去"。但是，森林里有共产党人。他们从中利用不满和反抗，把它纳入在方向上对他们合适的渠道上。

的确，在塞尔维亚，也正好有一个非共产党的、君主政体派的、保守的、民族主义的抵抗运动。所谓"切特尼克"成为这种抵抗的象征，他们的领袖是上校和后来的将军德拉扎·米哈洛维奇。但是，"切特尼克"组织得很糟糕，不灵活，过于拘

残守缺。他们大部分出身农民，因而缺乏灵活性。此外，他们只代表塞尔维亚人。他们的君主政体和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必然会排斥(本来就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最后，德拉扎·米哈洛维奇的运动还有一个使自己陷于灭顶之灾的弱点：米哈洛维奇想首先保存塞尔维亚人民的生物实体，其次才是抵抗德国人。他说，只有处在不会受到还击报复的地方，才应对占领者发动攻击。

在最初的破坏活动和杀害德国士兵之后，德国人就进行报复，尤其是采取枪杀人质的手段。枪杀人质达到顶峰时，按一比一百的比例进行，也就是说，每被杀一个德国士兵，要枪毙一百个平民。那些被挑来作人质的人，大多数是有名望的公民——律师，商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就这样，德国人在没有充分认识形势的情况下，清洗了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分子。疯狂枪杀人质在塞尔维亚小城克拉古耶瓦茨到了登峰造极。由于游击队袭击城市附近的一支德国部队，二千三百名居民被德国占领当局枪杀，其中有很多学龄儿童。

但是，德国占领军的盲目复仇欲和神经质地四处狂杀滥毙，不仅有益共产党的宣传，还给铁托的部队送去很多新战士：畏惧德国人报复逃到森林里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主义者铁托信守列宁的早已闻名的口号：越糟越好！同时，游击队员得心应手地掌握了挑衅的战术：有本领准确地驱使敌人做出那些使他们自己威信扫地、声名狼藉的反应。

切特尼克领导人当时就怪罪铁托，说他不吝惜小小的塞尔维亚人民的鲜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抵抗运动的这种犹豫不决、等着瞧的态度，说明这些人身上没有革命思想。他们想

保留旧的结构、传统和生活方式——铁托和共产党人要改变，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诉诸暴力。德拉扎·米哈洛维奇的等着瞧的态度，最终使得他自己和切特尼克分子在西方盟国中失信；它们想看看反抗德国人的行动，而不甚关心塞尔维亚民族的实体。这实际上把塞尔维亚君主政体派——他们的国王流亡在伦敦——和德国占领当局纠合在一块。米哈洛维奇和德国军队之间协同反对铁托和共产党人是他们合作的顶峰。米哈洛维奇把铁托看得比希特勒还危险。从他的立场上看，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知道，铁托前进在胜利的道路上，而希特勒却迈步在失败的道路上。然而这样一来，米哈洛维奇就自掘坟墓了：一个在策略上同德国人搭挡的运动，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尤其是在西方同盟国，不能希冀赢得同情。首批抵抗德国人的战士之一米哈洛维奇，以在共产党的军事法庭上受审告终。1946 年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作为对手，他是对付不了铁托的。

切特尼克运动未能取得成就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局限性，这个运动限在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之中开展。这必然在南斯拉夫的所有非塞尔维亚民族中引起抗拒的反应。此外，切特尼克分子对待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的态度，对待被俘的共产党人的态度，是毫不手软的。他们的部队以所谓塞尔维亚理想的名义，在民族混居地区的居民中，举行清剿和屠杀，例如在波斯尼亚，或在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边界地区。

铁托的第二个国内对手是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起义者)。这是一个民族革命的组织，其组织结构和方法颇似十九

世纪的烧炭党人和其他意大利的秘密社团。在这些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身上，我们也发现，他们每一项政治的和人类的憧憬都局限在为自己本民族的范围内。"乌斯塔沙"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手中得到自己的国家——在他们的"领袖"安特·帕维里奇领导下的独立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锡尔米亚的广大地区和大量的塞尔维亚居民区都属于这个独立的克罗地亚。于是，乌斯塔沙国家开始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它在自己的境内，对塞尔维亚居民进行了恐怖讨伐，使数万生命为之牺牲。这个毫无意义的讨伐使克罗地亚国家威信扫地，把数十万塞尔维亚人(和不少克罗地亚人)推到对立面，因而也就把他们推入铁托和游击队的怀抱。1941 年以后，在乌斯塔沙国家内，不巩固的民族杂居地区(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的扎古拉，利卡)成了铁托最重要的作战基地，这不是偶然的。这里生活着一种刚强和坚忍不拔的人，他们有打仗传统，这是从几世纪前在帝国和王国的军事疆界上反抗土耳其人的斗争中继承下来的。思想狭隘的乌斯塔沙领导人，盲目蛮干，没有理会到，他们是如何正好把胜利奉送给了共产党人。

德国人一定是很快就认识到，这位铁托(他们以十万金马克悬赏他的人头)并不象人们开始时喜欢说的那样，是个巴尔干的土匪头子。这位游击队领袖，不止一次地表现出似乎就要完蛋的样子。然而他总是逃脱德国人的包围。幸运和远见卓识，出色地掌握小规模战争的本领，还有战争和政治的结合，帮助他功遂名就：1943 年 11 月 29 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即这个共产党国家和政府的核心，在亚伊采(波斯尼亚) 召开。意大利的投降使铁托得到从意大利人手中缴

获的武器，并为他在南斯拉夫的前意大利占领区——亚得里亚海的后方——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德国人的军队受到打击，力不从心，未能控制这一地区。失败的危险和死神再次威胁着铁托：1944年5月25日，德国人企图通过伞兵在斯洛文尼亚的德尔瓦尔着陆，捣毁他的总部。然而在这里，幸运也忠于他。游击队员们为了他，在战壕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战争的最后一年，铁托已经成为一支正规军的领袖，再也没有人嘲笑他的元帅军衔了。现在，清除了他的君主政体派对手米哈洛维奇之后，他成了丘吉尔和英国人的会谈伙伴。他们对他这位激进的共产党人产生着一种乍看起来很稀奇的信赖。看来几乎是这样，仿佛共产党人铁托与其说是苏联人这一边的人，毋宁说是英国人这一边的人；他的游击队员却高呼着“苏联万岁！”而投入抗击德国人的斗争。苏联第一个军事使团到达铁托那里以前很久，英国和美国军官就已经在游击队总部立足。后来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指责说，铁托和他的最亲密的同事是“英国和美国的间谍”，其根源也许就在1943年和1944年。那时铁托似乎对英国人比对俄国人还亲近一些。事后看来令人注目，铁托已经在战争期间就同苏联人保持较远的距离。德国人要捣毁他在德尔瓦尔的总部时的最危险时刻，他逃到英国人和美国人那儿。然后到亚得里亚海的维斯岛，这个岛同样是在英美军队活动范围内。关于在铁托总部的苏联军事使团的成员，英国军官报告说，俄国人把他们的南斯拉夫同志看成二等斯拉夫人。铁托长期得不到莫斯科的援助，得到的只是坚决的拒绝。铁托不愿意同在伦敦的国王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合作，在1943年斯大林就对此表

示不悦。共产国际的首脑季米特洛夫电告游击队的首领，说"家长"对他的我行我素，暴跳如雷。苏联人不愿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而同西方列强发生冲突。铁托当时主观上也许还相信，自己作为共产党人是按照苏联的精神行动的。但他开始认识到，苏联人关心的不是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而是他们自己的大国利益。

随着抗德斗争取得成就，随着推动共产主义革命取得成就，铁托的自觉意识也在增长。现在，他不再是按照高高在上的莫斯科的命令执行任务的共产国际的小干部，而是一位具有自身份量的政治和军事领袖。1942 年初，在铁托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已经可以觉察到一种不耐烦和大肆非难的不寻常的腔调。在一次德一意向游击队发动一场最危险的进攻时，铁托于 1943 年 1 月 31 日打电报给莫斯科："我不得不再次问你们：难道你们根本不可能给我们任何援助吗？饥饿和死亡威胁着数十万难民。经过二十个月英勇的、几乎是超人的战斗之后，难道不能找到一种援助我们的形式吗？"当莫斯科要求他，在东西方作战同盟的旗帜下，尊重彼得国王，铁托怒不可遏地回电："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们任何援助，那么至少别打扰我们！"

脱离斯大林，脱离苏联党及其统治作用，在铁托心理上和政治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这进程的范围和后果，也许这位南斯拉夫党的首脑和游击队的领袖本人是长期不清楚的。相反：越是濒临决裂，南共似乎越是加紧靠拢莫斯科和斯大林。但是，当这位游击队的元帅同苏联的大元帅和党的首脑于 1944 年 9 月在莫斯科会晤时，铁托已经敢于公开顶撞斯大

林。斯大林叱责说，资产阶级在塞尔维亚是强大的。铁托回答说:“斯大林同志，我不同意您的看法。资产阶级在塞尔维亚是很软弱的。”当斯大林要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应该把彼得国王重新扶上王座时，铁托斩钉截铁地说:“这不可能。”斯大林接着说:“你们不必永远把他请回来，只是暂时的，以后你们可以从背后给他一刀。”

铁托肯定不是一位温情脉脉的人。他所领导的革命熟谙恐怖和报复。政治对手和军事对手——也有一些被认为是这类对手的人——被游击队干净利落地干掉。对南斯拉夫内部的敌人——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分子，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分子和地方民团，斯洛文尼亚的“多莫布兰齐”分子和其他反共小组，内战的残酷法则特别适用：不要饶恕“阶级敌人”和“叛徒”。这句话的细节怎样理解都可以。

但是，森林里和山地里的战斗给游击队员的队伍带来激情和同志友谊，使他们感到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成就。因此，斯大林建议把彼得国王从伦敦流亡中请回来“亮相”，然后再“从背后给他一刀”，铁托一定会感到这是不道德的和不足取的无理要求。共产党游击队当时正在寻找公开的交锋。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密室里，策划和炮制的种种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诡计，他们是想不到的。因此，当1944年9月斯大林提出，如果英国人在达尔马提亚登陆怎么办的问题时，铁托对答如流地说:“我们将坚决抵抗。”

不管铁托对作为武器供应者的英国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他确切地知道，英国的登陆必将动员起南斯拉夫的整个反共力量，使共产党人的唾手可得的胜利化为乌有。

1944年10月攻打贝尔格莱德时，斯大林提供一个坦克兵团。苏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同时进逼这座德国人几乎不设防的城市。然而，"俄国兄弟"在南斯拉夫的国土上出现，给用美化苏联的精神教育出来的游击队员带来的是新的、令人心酸的失望。苏联士兵不惜掠夺和奸淫。总之，他们对待解放了的兄弟的南斯拉夫，同对待其他东欧国家毫无二致。与此相比，南斯拉夫游击队，就整体而言，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不容许自发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果要没收财产，需按政治指示进行，这被看作是一项"革命的"措施。例如，还在1941年秋在塞尔维亚"乌日采共和国"发生的那种目无法纪事件，后来就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不过，这里也是泾渭分明的：游击队的行为是严厉的，枪杀政治对手和没收财产并非罕事。但是，象伟大的苏联的军队那样酗酒闹事，在铁托的人当中是没有的。相反，甚至派到游击队参谋部的英国军官，对这种纪律严明也留有深刻的印象。今天，可以补充说：铁托的军队如果只是一伙土匪，而铁托本人是巴尔干的一个土匪头子，那么他们很难卓有成效地坚持四年的斗争。当游击队遇上苏联士兵，看到他们的行径时，震动就更大了。1947年和1948年，莫斯科指控南斯拉夫对苏联专家和军人怀有"敌意"，根子也许就在这里。恰恰是由于对苏联和苏联人的过分的、理想化的热爱，接踵而来的是更加明显的失望。铁托当时的副手和意识形态专家米洛凡·德热拉斯指出，英国军官的道德高于苏联军官的道德。这正是这种经验的总结。德热拉斯的所谓"诽谤"红军，对后来引起1948年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冲突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斯大林在1944年秋天，还用共产国际时代的化名，称呼到莫斯科作客的南斯拉夫元帅说："瓦尔特，请您注意……"或"请您告诉我，瓦尔特……"然而这里已经包含着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因为，当革命的差役为苏联效劳、听任莫斯科指挥和调遣的三十年代的"瓦尔特"——这样的"瓦尔特"不复存在了。

此时同斯大林分庭抗礼的这个人，从来没有患过卑躬屈膝的变态心理的病症。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他感到自己被一股赞许和忠诚的浪潮，推上了一次革命和革命运动的顶峰。他当时的朋友（后来的对手）德热拉斯在莫斯科注意到的情况，也没有逃脱他的视界：斯大林和苏联政治局对小国的蔑视以及俄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还在战争期间的1943年，铁托对要告知苏联人的关于他的计划和措施，就已经开始有所选择。铁托想立即为他的军事行动，他的游击部队，创造一个政治基础——即未来共产党政府和管理机构的核心。西方列强却在斯大林和苏联的支持下（当时，莫斯科不想由于南斯拉夫而失去同西方的接触），1943年秋胁迫游击队同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和解。铁托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爱德华·卡德尔，后来在谈到南共政治局当时的一次会议时说："铁托和我们所有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的人都意识到，我们这个决心（即建立一种游击队的政府和国家政权以及不期待同流亡政府和解的决心），可能在大国的政府中引起不满和消极的反应，特别是会导致苏联和西方大国之间的某些政治麻烦。因此，铁托命令，我们的这一决定尚未切实实施之前，也不应告诉苏联政府……这是人民解放起义的利益以及

各族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前途，同列强共同合作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抵触的时刻。”

1944年10月，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关于东西方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英国首相在一张小纸条上建议：

罗马尼亚：俄国占百分之九十，其余的百分之十；

希腊：英国（和美国）占百分之九十，俄国百分之十；

南斯拉夫：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

匈牙利：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

保加利亚：俄国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余的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那个值得纪念的“五十对五十”的公式的由来。迄今在许多关于南斯拉夫的政治考虑的幕后还出现这个公式。铁托当时对这项交易毫无所知。然而无论如何，他感觉到，斯大林想煞住他的革命热情。比如，第三帝国投降和战争胜利结束之后，这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首脑独立地采取行动：铁托的军队挺进的里雅斯特，同西方大国发生首批冲突。奥地利—南斯拉夫边境上的形势同样也是令人不快的。游击队为英国人所迫，撤出克恩滕。当南斯拉夫人在的里雅斯特附近甚至击落两架美国飞机时，莫洛托夫用拥抱来报偿当时的南斯拉夫外长爱德华·卡德尔——但是，苏联人同时看到，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不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事情：不是克里姆林宫，而是一个名叫铁托的人，想决定革命和同西方帝国主义清算的速度。

南斯拉夫的这一激进的革命的态度，是由于铁托在南斯拉夫迅速地取得对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和右翼势力的胜利。斯大林把游击习气看作是危险的，从他的立场上看，他是对的。

这里隐藏着一出“不断革命”的戏——在1948年3月给南斯拉夫人的第一封信中，苏联党的领导就已经用这样一句话，警告南斯拉夫，“托洛茨基的命运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绝非偶然。托洛茨基也主张对西方采取革命的政策，他也低估苏维埃国家的作用。他四处搬弄“不断革命”这个概念——他先是被斯大林推翻，继而被放逐，最后被杀害。

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取得了同德国人、他的内政上的对手以及西方大国斗争的经验。他也了解俄国人——只是在那个时候，在他所处的地位上，他连做梦也不敢想成为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平起平坐的伙伴。此时，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元帅在艰难的生活学校里迅速学到的东西是：大国和小国之间没有平等，在共产主义体系里也是如此，恰恰是在共产主义体系里是如此。1945年同他为兄弟情谊干杯的同一个斯大林，根本不想把铁托哪怕是作为小伙伴而加以接受。

现在，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来说，反面的经验纷至沓来：在分配德国战利品和赔偿时，苏联人企图欺骗南斯拉夫人。在两国联合公司——诸如多瑙河航运公司和航空公司——问题上，苏联人想把南斯拉夫的经济控制在自己手中。各种苏联顾问和军官在这个国家的行径激起愤懑。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苏联情报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今日的克格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开始在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中，肆无忌惮地建立自己的情报网。“解放以后，苏联情报局招募人员的规模更大”，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弗拉基米尔·德基耶尔写道，“苏联秘密警察象黄蜂一样，在军队里，在经济领域里，在中央机关里，向着他们认为是主要的点上袭击而来。

甚至中央委员会的首席密码员，他们都想拉入自己的情报网去。"①

铁托注意到，苏联人在外交方面离弃了他，反对他，比如，在的里雅斯特，在克恩滕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问题上，在他争取建立巴尔干联邦的努力中，也是如此。莫斯科想要一个言听计从的南斯拉夫，而不愿意让贝尔格莱德成为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可能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苏联的竞争者。

1947年9月，在现在的波兰疗养地施赖伯豪（今什克拉斯卡—波雷巴）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所谓"共产党情报局"。它应成为在战争期间斯大林解散了的"共产国际"的后继组织。同共产国际相反，这个联合体不是包括所有的共产党，而是仅仅包括欧洲的共产党，即苏联卫星国的各个党，意大利党和法国党，但不包括德国共产党人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南斯拉夫派爱德华·卡德尔和米洛凡·德热拉斯作代表，出席成立大会；这两人猛烈批判意大利和法国同志的机会主义的、不甚革命的态度。

当时，看起来好象是苏联在利用"百分之百革命"的南斯拉夫人，想在意大利和法国煽起一场共产党的革命。然而，斯大林实际上并不想在西欧发动革命。他甚至厌恶南斯拉夫人，因为他们擅自支持希腊共产党人。这样，苏联的独裁者利用他当时的南斯拉夫追随者，作为棋盘上的小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不和，根据"分而治之"的格言，用这种方式更好地控制运动的发展。如果说，1948年公开冲突爆发之后，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兴高采烈地抨击据说是背叛了的

① 《约·维·斯大林没打赢的一仗》，萨拉热窝，1969年，第144页。

南斯拉夫同志，那么，这也是对卡德尔和德热拉斯昔日在施赖伯豪叱责他们的那种趾高气扬的回答。

只有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尚未得到明确的回答：铁托和斯大林之间的所谓情报局冲突，是否也是苏联内部权力之争的后果呢？铁托是否在斯大林统治的后期，不知不觉地陷入当时苏联第二号人物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政治阴谋之中呢？日丹诺夫在施赖伯豪宣布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的命题：美国领导下的帝国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他要求西方的共产党加强革命行动——在这里，德热拉斯和卡德尔正好同他不谋而合。显然，日丹诺夫想通过一系列西方共产党插手搞的行动，来阻止美国和西方巩固它们的地位。然而在这里，他失败了：美国对共产主义采取的“遏制政策”开始发挥作用，西欧慢慢地开始经济复兴的进程，马歇尔计划开始结出首批政治果实，在德国，共产党人也仅仅到达苏联和西方的分界线。然而斯大林一向小心谨慎，他想首先消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因此不想在欧洲发动一场使一切都重新成为问题的攻势。

铁托和斯大林冲突爆发时，安德列·日丹诺夫这颗星辰正好开始暗淡无光。1948 年 8 月日丹诺夫死的时候，“共产党情报局”还成立不到一年——然而，这期间世界业已发生变化。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国家集团，而这个本来应该用来协调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机构，变成了反对铁托的宣传工具。

虽然铁托采取不屈不挠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对待这一冲突，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他来说，同苏联人的决裂

是一生中最严重的决定。南斯拉夫党的首脑回首往事时，告诉贝尔格莱德杂志《政治画报》说，当他抗拒苏联人时，他"感受到心灵上的可怕的压力"。他继续说："不言而喻，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当他所信仰的和他所赖以支持的一切，在内心崩溃的时候，也许是一生之中最艰难的时刻……我不得不说，我想了很多。我感到难以作出决定。但是，在我的内心取得了突破……特别是考虑到对我们党和领导的这些指控是多么傲慢专横……又是在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和为了苏联做出了一切我们认为是神圣的事业之后。因为我们的人呼唤着斯大林的名字献身就义。您知道，这不仅是一次震惊，而是有很多深刻的含义的。我考虑过，这将引向何方，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我第一次说：这里有些东西值得我们为之生存和奋斗，而人们又不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人们依旧是共产党人，依旧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间为权利和平等而奋斗的战士。"

对苏联的失望使铁托成为"铁托主义者"：他接受挑战。1951年，一位外国记者问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有朝一日是否会再次依靠苏联，他回答："我们在我们从前的政策中犯了错误，我们完全依赖苏联，而不是从一开始即战争一结束，就实行一项较为独立自主的政策。这使我们深受其害……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同样犯错误，因为我们抄袭苏联的方法。我们跟着苏联的榜样，亦步亦趋，这是荒谬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清楚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位共产国际的干部成为战绩赫赫的军队统帅。他的传记作者和朋友德基耶尔曾经写道，他

保留了“扎戈里亚农民”应付危险和各种情况的“直觉”。在同莫斯科的对峙中，铁托成为高超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策略家。他不仅战胜强大的斯大林，而且凭借西方的援助，在同苏联的共产主义体系抗争中，保住了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体系。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既未被斯大林所吞噬，也未被西方民主所吸收。

尽管如此，这个体系和铁托，在自从那时以来的岁月里，经历了一种转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发现了“工人自治”。当他们——至少在理论上——宣布消灭国家时，他们联系了过去的思想，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是工团主义的。铁托在寻找同盟者时，发现了不结盟的“第三世界”，而且在国家领导人中，找到了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他们虽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然而也不是共产党人：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甚至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海尔·塞拉西，都成了贝尔格莱德的常客。而铁托本人在无数次的旅行中发现了世界。即使在1976年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他还屡屡出访，常在旅途中，而且看来丝毫未显旅途劳顿。

今天，他是他的国家和党的不可废黜的终身政治领袖。他的党与东方集团的各共产党同样是泾渭分明的，1952年以来就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他不惜用强硬的话语，有时也用强硬的措施，干预他的国家的政治。但他不是使一切人都感到战战兢兢的独裁者。在战争和内战的血腥清算过去之后——当时肯定有过一些根本不应美化的事件——总的来说，他是让人生活的。如果用西欧的尺度来衡量铁托的执政时代，将不全都是正面的东西。如果用目前在欧洲东南部占主

导地位的规则来衡量它，并把南斯拉夫同它的大多数邻国比较（奥地利除外，也许还有意大利，有时希腊也除外），那么在铁托的国家里，比起所有毗邻的共产党国家，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和个人迁徙自由，也比很多地中海沿岸的非共产党国家有更多的自由。

米洛凡·德热拉斯是铁托昔日的战友和后来的叛逆者，他肯定不会神化南斯拉夫总统。1976年3月，他在贝尔格莱德告诉我："如果没有铁托，我们在南斯拉夫这里，都会被淹死在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汪洋大海里。防范了这一点，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他的历史功绩。"有些事实说明，这实际上将为未来数代人永志不忘——纵然他的事业和他的执政时代的某些特色是由于人性，或地地道道的人性所致，事情也终将如此。

让我们回忆一下他的克罗地亚同乡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札关于苏特拉河谷地，关于扎戈里亚地区和关于铁托的出生地库姆罗韦茨的谈话："阿尔卑斯山在这里消失，巴尔干在这里开始……多瑙河平原在这里展开，苏特拉河是诺利克和伊利里亚之间的边界，东阿尔卑斯山地段和潘诺尼亚之间的边界。自从罗马人、法兰克帝国和拜占庭时代以来，苏特拉河是欧洲所有边界中唯一长存不变的边界。后来的东马尔克到苏特拉河终止，然而在它的左岸，开始了无信仰的、野蛮的马尼教地区……此外不应忘记：它还作为改信宗教的卡兰塔尼亚人和萨尔茨堡主教们的奥地利封建领地势力范围，同克罗地亚一匈牙利各王国之间的历史边界，几千年来，它就把两个世界分开。这个差别今天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之

一。”①

关于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出生地区，克尔莱札就写这么多。当人们总结铁托的政治生涯时，喜欢把这个人划入共产党的领袖，抵抗战士，或者也归入第三世界的国务活动家之列。但是，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形象——尽管戴上当代共产主义的装饰——里，难道我们不是看到了这个区域的居民争取独立自主和自卫的愿望吗？东方与西方，西方国家与拜占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过去和现在都在今日的南斯拉夫国土上相会。在某种意义上，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斯大林建议的“五十对五十”的公式，曾一直在这里占主导地位。在这里，西罗马同东罗马，维也纳同康士坦丁堡，西方同俄国，都进行过斗争。而这一地区也一再出现一些人物，他们想寻找一条途径，对向他们冲击而来的各种影响进行综合，并且以此争取行动自由和独立自主。

这里，出现过克罗地亚的主教格雷戈尔(格尔古尔)·封·尼恩(埃彼斯科普斯·克罗亚托罗姆)，他在十世纪曾为在教会里保存克罗地亚语言而斗争，并以教会和民族独立自主的名义反抗过教皇。这里，在十七世纪出现过耶稣教长老尤拉伊·克里扎尼奇。他的目标是，在教皇领导下所有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俄国在其中应起政治上的主导作用。克里扎尼奇遭受了“铁托主义”的命运：他到俄罗斯去，打算向沙皇和俄国的正教教会说项同天主教联合的必要性。然而沙皇视他为梵蒂冈的特务和间谍，把他放逐到西伯利亚。

① 米洛斯拉夫·克尔莱札：《九十九种传说》，贝尔格莱德，1972年，第254页。

在十九世纪，出现过约瑟普·尤拉伊·斯特罗斯迈尔(1815—1905年)。他是贾科沃的主教，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忏悔神甫。他争取所有斯拉夫人的政治上团结一致，因此严厉批判教皇"绝对正确"和玛丽亚"圣灵妊娠"的教条，因为这是一些妨碍正教和天主教联合的教条。斯特罗斯迈尔在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会议上反对教皇的讲话是很著名的。在这里，克罗地亚人斯特罗斯迈尔成了"德意志反对派"的头头：德意志的主教们由于相似的原因反对教皇，因为他们担心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分裂会加深。

最后，还出现过斯蒂芬·拉迪奇(1871—1928年)，他是克罗地亚农民的政治启蒙者，是一位意识形态专家，他选择农民的、文化的和民族的解放，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拉迪奇是一位伟大的农民领袖和克罗地亚农民党主席。他当议员时，在贝尔格莱德被一个塞尔维亚一门的内哥罗的议员开枪打倒，伤势过重，不久去世。

象铁托一样，这些人也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他们也是边境上的人。他们追求的目标也是在精神文化和政治军事大国之间进行自卫。其中有些人的结局是悲惨的，他们的梦想大多数没有实现——无论如何，没有象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实现。但是，今日南斯拉夫的国土一再造就好战的异教徒、"离经叛道者"的形象。无庸置疑，铁托应该归入这个行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最重要的游击队起义地区之一的波斯尼亚，今天还有神秘的墓碑，使人回忆起鲍古米尔教徒——那些基督教世界和波斯东方之间的巴塔伦教派和马尼教派，他们既不接受罗马也不接受拜占庭，既不接受伊斯兰教

也不接受规范化的基督教。他们受到各方面的残酷迫害。在中世纪鲍古米尔的异教中，也存在过“既不要这个也不要那个”的第三条道路。

铁托的形象所体现的这第三条道路，也有它的有问题的一些方面。其根源首先在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首脑的个人品格：我们已经论述过，在他身上缺乏脉脉的温情，这种缺乏产生出某种独断专权。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是不会变得更加灵活的，绝不会比从前更能容忍他人的意见。这也适用于铁托，因为他也象任何搞政治的人一样，是一个处在自身矛盾之中的人。

此外，他经历了列宁主义的艰苦学校。这意味着，我们所了解的自由的价值对他是陌生的。“自由主义”一词对铁托来说总是诟詈之语，他最喜欢把它和形容词“腐朽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连用。当前他实行的执政风格也不是以巨大想象力或灵活性见称。在他的时代的末期，从内战和无情的革命中起家的他，不得不又采取警察措施，以压制批评或反抗。

南斯拉夫将变成什么样？这个问题尚未回答，虽然铁托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伟人们有其解决问题的特性，然而另一方面，也有制造问题的特性。这位伟人留下一个空隙，它可能发展为一个真空，而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因此，今天铁托的问题就叫做——铁托。南斯拉夫今日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铁托之后不可能有一个“铁托”。只有在某时某刻，对铁托的党和铁托的国家的考验才会到来。

南斯拉夫和苏联

这个场面具有象征意义，然而，只有少数观察家注意到它所包含的深刻意义：1976 年 6 月 28 日，欧洲共产党会议在东柏林开幕。自从 1957 年以来，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第一次重新参加这类集会，也是第一次准备接受共同的最后文件。自从 1948 年冲突以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首次在苏联的、东欧的和西欧非执政的党的首脑圈子中出现。苏联共产党至少部分地达到它的目的了吗？——即不管以何种形式，把南斯拉夫重新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怀抱，或象以前的叫法，“社会主义阵营”的怀抱。

值得注意的是，东柏林会议几乎是在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当时的共产主义大家庭——“共产党情报局”——的二十八年之后的同一天举行的。1948 年 6 月 28 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发出驱逐铁托令，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但是，1976 年 6 月 29 日，昔日的罪魁祸首不仅在会议桌前同苏联人平起平坐，而且还和几个西欧共产党一起，首先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部分地也和法国人在一起；并且得到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的支持，迫使苏联人及其仆从作出重要的让步。6 月 30 日，铁托向欧洲共产党领导人发表演说。他在演说里使人毫不怀疑，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如何评价这次会晤的：

“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就共产党和工人党，为巩固和平与安全，为发展全面的合作和社会进步，在欧洲能够做些什么，交换意见……”也就是说，没有谈到服从、纪律和“团结”，从前这类会议是以谈论这些为其特征的。铁托的提纲挈领的话是：“开诚布公和自由交换意见”，此外，“一切进步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最广泛合作”以及“独立、平等和不干涉作为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合作的基础。”

自然，作为共产党人，铁托发表的是共产党的演说，他谈到资本主义爆发危机，社会主义正在突进。同时，南斯拉夫党的首脑又说，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劳永逸和包治百病的现成的解决办法”。铁托指出，不结盟运动即第三世界，必须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平等地位，这个“不结盟”对争取和平和进步终究比共产主义更有价值和更为重要，共产主义世界大部分过于“受集团约束”。共产党人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人听起来，这种论调是多么地离奇古怪。

因此，铁托在东柏林演说的很大篇幅，听起来颇似呼吁“受集团约束”的共产党人，要他们最终理解这一层，同时，也象是在批评苏联，要它最终为切实裁军与缓和多做点工作。铁托谴责“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也谴责否定各国人民独立和自主发展权利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在这两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总统在东柏林会议的讲坛上批评的是苏联，因为只有它才能够同美国一起，进行普遍的军备竞赛和推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并且确实这样干过。莫斯科一定会感到铁托下面的话是面对它说的。铁托指出：“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据独立、平等、自主和不干涉的原则，越来越强有力地捍

卫着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种不同的道路，捍卫着革命力量和最广泛的民主力量合作的新形式。这就表示，每一个革命运动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本国的无产阶级负责……”

正是在铁托所阐明的这个问题上，几个东方集团的党魁在柏林持完全不同的立场：保加利亚共产党头头托多尔·日夫科夫公开捍卫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领导作用，以此对抗铁托。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魁埃利希·昂纳克的讲话也如出一辙。铁托曾在会议期间同苏共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晤谈一次。甚至连勃列日涅夫也在承认“自己的道路”的问题上，使用了十分模棱两可的措词。他在共产党会议上说，每一个党“首先”对自己的工人阶级负责。那么，其次它应对谁负责呢？是不是应对苏联党魁曾否定其存在的一个“中心”负责？或者甚至是对苏联党，因而最终又是对莫斯科而不是对自己的国家负责呢？

铁托在东柏林也谈到，共产党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合乎规律”的，举行对话不应绕过这些差异。“不言而喻，创造性的讨论，必须排除任何扣帽子的做法和攻击，这种讨论是克服一切干扰工人运动开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译成明确的普通话，就是说：共产主义的统一还只能在它的多样化中实现。东柏林共产党会议，无论如何在南斯拉夫看来，除了把现存分歧编纂成法典，并在一个多边的法庭上予以认可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意义。这个目的铁托是达到了。在这个意义上，东柏林会晤对他来说是一次意识形态的胜利。当问题涉及捍卫他们“自己的道路”的权利时，南斯拉夫人从前只能依赖双边文件，例如1955

年的贝尔格莱德宣言和 1956 年的莫斯科宣言。现在有了东柏林会议的最后文件,他们相信,关于他们独立的权利已为文件所确认,业已胜券在手了。

诚然,东柏林会议几乎还未结束,关于文件解释的争吵就已开始。苏联人突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而东柏林会议文件没有任何地方包含这个概念。1976 年 7 月,亦即会议之后三个星期,莫斯科《真理报》和其他苏联报纸,已经一笔勾销勃列日涅夫在东柏林假惺惺作出的让步。南斯拉夫人再次谈到,不许“滥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概念,这个词被“玷辱”了。

南斯拉夫政论家米奥德拉格·马罗维奇在分析东柏林会议的结果时写道,新近被苏联人利用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扩大了的职责”的公式证明,关于独立问题,将来还会有论战,人们在实践中,也将继续遇到“陈旧的、虽然是改头换面的意图”。[①] 一位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干部,克罗地亚党委书记杜桑·德拉哥萨瓦茨说得更清楚一些:东柏林共产党会议虽然证明了从 1948 年以来南斯拉夫反抗共产党情报局的正确性,但是同时,会议使若干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残余”显得更清楚了。[②]

显然,南斯拉夫领导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严肃地预计到东柏林会议真正能够召开。近两年来,南斯拉夫人已经参加欧洲共产党会议的预备性谈判。苏联党魁列昂尼德·勃列日

---

① 米罗德拉格·马罗维奇:《不受限制的自主性》,《新闻周报》,1976 年 7 月 18 日。

② 《战斗报》,1976 年 7 月 24 日。

涅夫原先考虑把这次会晤当作欧洲安全会议的序幕和"伴奏乐曲"。在坚韧不拔的谈判中，南斯拉夫人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自治主义者"一道，反对苏联的原始方案。莫斯科本来希望，欧洲共产党会议某种程度上应是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准备，苏联人尤其坚持要批判中国。

预备性谈判最初在华沙举行，后来在东柏林举行。谈判中，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已经不再孤军作战，而是有许多有威望的大"兄弟党"一起，"同心协力"。这对他们来说，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象意共或法共这样一些西欧大党，在共产党情报局中发生冲突时，还毫不犹豫地追随苏联人，如今却为铁托撑腰。在民族独立的问题上，罗马尼亚共产党人也站到贝尔格莱德一边。

因此，南斯拉夫人就能够从牢靠的地位出发，向莫斯科及其同盟者提出要求：贝尔格莱德根本拒绝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欧洲共产党会议不许批评或批判任何其他共产党——也不许批判没有与会的党。（也就是说，苏联人所希望的把中国逐出教门不能实现。）会议不许援引以前任何一次共产党会议的文件。（因为那是一些批评和直接或间接批判南斯拉夫的会议。）最后，这次会议的决议必须一致同意才能通过，会议最后通过的文件在意识形态上没有"约束力"，会议必须完全公开地进行——也就是说，让新闻和电视记者到会采访。（苏联人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部分地满足南斯拉夫的最后一点要求：西方记者只能在一个新闻中心里，通过电视注视会议的进程，他们未能到真正的会场里去。）

1976 年 6 月初，苏联中央书记康斯坦丁·卡图谢夫出现

在南斯拉夫首都，突如其来地向南斯拉夫人表明，莫斯科接受这三个条件。因而铁托还能去参加会议；他也许根本不敢相信，他还能亲临这样的一次会议。

什么东西促使莫斯科改变它的态度呢？第一，会议召开与否，对勃列日涅夫和苏共政治局已成为一个威望问题。苏联党的首脑终于使“资本主义”的西方到赫尔辛基参加一次安全会议。但是，他要是不能把他的共产主义的志同道合的同志纠集到一张会议桌旁，此时世界将拭目以待。如若共产党会议未能举行，对莫斯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将是沉重的打击。这也将在苏联领导内部，增强那些对勃列日涅夫的西方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力量。此外，也存在着中国人可能成功地召开某种多边共产党会议的危险。总之，莫斯科必须行动。

苏联的行径荒谬绝伦。莫斯科准备赞同正式放弃苏联在欧洲共产主义中的领导作用，以此来挽救苏联的领导作用。勃列日涅夫可能相信，只要所有欧洲共产党都坐到一张会议桌旁来（只有阿尔巴尼亚躲得远远的），苏联作为一个绰绰有余的最强国，苏共作为最强大的党，自然而然地起着“同侪之首”的作用，而且仅仅就其世界大国和超级大国的份量就足矣。勃列日涅夫在东柏林，就已企图玩弄这种建筑在实际力量基础上的领导作用，作为苏共的头头，他的发言时间比其他代表团团长长一倍。

于是，苏联人企图得到欧洲各共产党赞同莫斯科对欧洲安全会议（欧安会）的态度，同时企图用“冷静的办法”悄悄地把这种赞同改变为接受莫斯科的领导作用。南斯拉夫人却反

其道而行之。他们同罗马尼亚人以及西欧最重要的共产党一起，试图利用安全会议和赫尔辛基来为他们的独立政策辩护。现在的关键是，两个集团中哪一个在东柏林取胜：以南斯拉夫为首的“自治主义”派，还是以苏联为首的“中央集权”集团？

铁托同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同盟者一起，赢得第一轮：意大利共产党首脑贝林格，西班牙共产党首脑卡利略，罗马尼亚党的首脑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尽管自治主义者之间在理论和实践的观念上如此千差万别——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建立在事实上的一党体制上，西班牙和意大利共产党则主张内政多元主义和接近议会民主，而罗马尼亚领导却用“罗马尼亚”体系同苏联分庭抗礼——，莫斯科的对手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不再有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心”，那么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就可说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最高机关。就此而言，几十年来已经流行的叫法“民族共产主义”也就得到了承认，虽然南斯拉夫人——而且不仅是他们——强烈拒绝使用这个词。

与此相对立，苏联的政策必须作为“国际主义”的保护者出现，而且还得加上形容词“无产阶级的”。就这一政策而言，这是保持自己霸权地位的杠杆。过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用来为苏联的武装干涉辩解，例如，为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解。

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保加利亚共产党头头日夫科夫，重温了斯大林时代以来用过的陈旧公式。按照这个公式，每一个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必须用它对苏共和苏联的态度来衡量。他的讲话没有受到勃列日涅夫和东方集团的其他领导人的反

对。而这样一种立场只能被铁托理解为公开的挑战。在东柏林会议之前，南斯拉夫人已经多次记录了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对“修正主义”发动的攻击。[1]在东柏林会晤之后，在东方集团有关意识形态的论文中，谈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民族应该失去它从前的含义，并且产生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对铁托和南共领导人来说，“社会主义民族”这个公式，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上对独立的，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共产主义的致命一击，这是十分清楚的。[2]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斯大林与铁托之间发生冲突以来，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经历了很多阶段与转折。有些阶段，如尼基塔·赫鲁晓夫统治克里姆林宫时代（即至 1964 年）和苏联进军布拉格（1968 年 8 月）之前的六十年代，铁托和南斯拉夫似乎在向苏联靠拢，贝尔格莱德在世界政策中支持苏联的立场。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后半叶情况又有改变：在同莫斯科的关系中，南斯拉夫和铁托又到达似乎与 1948 年的立场和当时的意见分歧相去不远的地步。

形式上，肯定不能把当时的情况，不能把斯大林主义的所作所为同当前相比。苏联领导对南斯拉夫客气一些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正常运转，如今，没有人咒骂南斯拉夫领导人为“法西斯分子”或叛徒。相反，苏联熊用一种拥抱的策略，把它的情同手足的爪子伸向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领导对这种拥

---

① W.W.米泽夫：《修正主义……》，莫斯科，1976年版。

② 由于这个原因，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从未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第二个“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的提法。

抱逐渐开始感到不舒服。然而，谁知道，这种拥抱有朝一日会不会变成堪称为"不分阶段"地一次扼杀呢？今天，莫斯科承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后果是否会引起莫斯科也认为有权"拯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呢？

面对莫斯科，南共不是总处于令人羡慕的形势的：一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多年来一直为争取被苏联承认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现在，勃列日涅夫和苏共给予他们这种形式上的承认，南斯拉夫人反而感到不很舒服：因为现在他们必须谨防莫斯科和东方集团，不让它们从这个承认中引伸出什么"权利"来。因此，南斯拉夫的政治家和干部们，反复提到诸如"主权"和"不干涉"等概念。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使贝尔格莱德的许多幻想破灭。

然而，为了理解复杂的苏南关系，必须从一个基本事实出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南斯拉夫不能只是实用主义地从外交上调整它同苏联的关系，因为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一涉及关系，必须立即讨论的是意识形态的议题和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贝尔格莱德—莫斯科的关系时至今日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矛盾的，而且必定是矛盾的，其原因盖出于此。苏联共产党人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之间，一方面进行尖锐的和原则的思想论战，同时两国之间(有时两党之间)的"正常"关系继续运转，仿佛啥事也没有发生。西方观察家看到这种情况时，定会迷惑不解。以 1976 年为例：4 月，两家最重要的南斯拉夫报纸《战斗报》和《政治报》发出警报，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将军声称，原子战争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南斯拉夫人评论霍夫曼言论的方

式清楚表明，第一，贝尔格莱德想抢先给霍夫曼和他的苏联幕后策划者鸣枪警告，第二，提醒本国的人民，第三，告诫西方。然而，一个月之后，同一个霍夫曼将军却出现在贝尔格莱德，他在进行一次友好访问。

这是南斯拉夫的两面手法或露骨的机会主义吗？也许既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论战与对话交替使用的方法，是南斯拉夫的"第三条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政治家们在处理南斯拉夫问题时，也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同时，这种对待东方的冷—热法，还由在共产党关系领域内的拉拢与排斥交替使用作补充。几十年来，莫斯科—贝尔格莱德的关系就是以此为其特点的。因为这种方法是不合习惯的，因为南斯拉夫人实际上是在对西方的理解力，常常也是在对西方的耐心与宽容，进行严峻的考验，所以容易产生两个错误的解释：一旦南斯拉夫批评西方，就说它追随苏联——一旦它批评东方，就说它接近西方。经验显示，前一种解释不对，后一种解释也不对。南斯拉夫处在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复杂的均势状况之中。某些经济和外交因素（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较为开放的边界），把它同西方联结在一起；而政治——思想因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把它同东方联结在一起。也就在这里，随即出现一个奇怪的情况：通向东方的意识形态的"脐带"，虽然在理论上证明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在实践中显示，南斯拉夫事实上同西方的关系，远比同东方的关系密切。

但是，为了理解这种复杂的中间地位（这种地位，甚至某些南斯拉夫的政治家都感到稀奇），必须回顾历史——直至1948年苏联共产党人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之间的第一次冲

突爆发。

首先，这个冲突有其实力政策的（应读作：秘密警察的）原因。1945年以后，南斯拉夫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指铁托和他最亲密的伙伴——不允许苏联人在某种程度上越过南共领导，在他们的国家里建立一个莫斯科自己的情报和间谍网。铁托本人曾有一次报告过，1947年他第一次清楚地感到，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有些事情不对劲儿。铁托联系了莫斯科的责难，即苏联"专家"在南斯拉夫受到不友好的对待。南共领导人不仅对支付苏联专家的薪俸三倍于南斯拉夫的同级专家一事，怏怏不乐，而且一再抱怨俄国人的老爷作风——直至米洛凡·德热拉斯断言，英国军官比苏联军官的道德水准高（斯大林永远不会饶恕南斯拉夫人的这种说法）。铁托在谈到苏联顾问时说道，南斯拉夫需要的是做工作的人，不需要发号施令的人。因为："发号施令，我们自己会干。"

看到苏联人也肆无忌惮地把他们实力政策的立场应用到经济领域去，这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感到震惊。南斯拉夫计划经济的头头鲍里斯·基德里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去莫斯科谈判，返回时他已认识到："斯大林不是把我们当作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而是象任何其他领域一样，让我国落入他们（苏联人）所认为的利益范围里，即在他们的霸权控制之下。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经济上的剥削。"①

此时，南共领导人必然取得一个经验：任何执政的共产党，只要是在苏联实力范围内，或是其他任何依赖莫斯科而当

① 德基耶尔：《约·维·斯大林没打赢的一仗》，萨拉热窝，1969年，第97页。

权的，都不免要取得这个经验。基德里奇和他的同事们是这样说的，苏联的目的是，保留南斯拉夫“作为农业和生产原料的附庸，因此，他们反对(贝尔格莱德)通过建立原料工业而取得独立”。

1945年和1946年，苏联人对待南斯拉夫人的态度，同后来对待毛泽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态度相似：他们称南斯拉夫工业化的愿望为“发疯”，企图通过所谓“混合公司”——一半在苏联手中、另一半在南斯拉夫手中的工业和经济企业——操纵这个国家的经济。

同苏联进行经济谈判的南斯拉夫谈判人员弗拉基米尔·韦莱比特说，当他为同苏联人会谈作准备，通读莫斯科与罗马尼亚以及同匈牙利签订的经济条约时，他感到“十分惊讶”：这里出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毫不掩饰的不平等，如他所述，一种“俄国人的粗暴的霸权”。稍后，韦莱比特不得不指出，苏联人向南斯拉夫政府正好也提出相同的条件，若干苏联人规定的要求甚至“还要严厉些”。虽然南斯拉夫是苏联的同盟者而不是战争对手，虽然当时——同另外两个东欧国家相反——在这里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这样干。

很快就显示出，“混合公司”无非是个“狮子公司”，一方即苏联，肆无忌惮地攫取一切利润，而南斯拉夫方面却空空如也。苏联人用这个方式，对民用航空和南斯拉夫的多瑙河船队进行全面的控制。这些苏—南混合公司的总经理都是苏联公民，他们的工作和决定实际上享有治外法权——即不隶属南斯拉夫法律和当局管辖。当苏南多瑙河航运公司的几位南

斯拉夫职员抱怨南斯拉夫的利益受到忽视的时候，苏联人就声称，这是“资产阶级分子、反动派和外国间谍”的反抗。

南斯拉夫谈判人是韦莱比特，在同莫斯科谈判时，竭力维护本国利益。苏联方面是不能宽恕他的。当时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列别德杰夫，在南共领导人中被问及，为什么关于混合公司的谈判停滞不前，他回答：“因为他们(南斯拉夫方面)由一个英国间谍所率领。”

这是在1946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的时候。一年半之后，苏联人指责铁托的首批罪过之一是，他把“英国间谍”韦莱比特继续留在外交部的领导岗位上任职，虽然苏联人曾要求罢免这个人。

苏联人告知南斯拉夫人，叫他们应该放弃“发疯的”重工业，与此相似，他们也企图抹煞南斯拉夫军队的必要性。1948年初，在谈判苏联向南斯拉夫军队提供武器援助时，莫斯科提出的论点是：“你们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干什么，有我们在哩！”(铁托在1948年3月1日南共中央委员会上是这样报告的。)

1948年2月10日，南斯拉夫人和苏联之间首次公开对峙。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克里姆林宫，由于他们搞“巴尔干邦联”的计划，他对两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洗脑筋。有趣的是，铁托表示抱歉，只委派他的战友爱德华·卡德尔、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博士和米洛凡·德热拉斯前往莫斯科。显然，他当时就预感到事情不妙。他必定感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捣乱分子，看作能够挫败苏联在巴尔干的计划的人。

保加利亚方面出席的有盖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华西尔·

科拉罗夫和后来被当作"铁托分子"处死的特拉伊乔·科斯托夫。斯大林就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策划的巴尔干邦联问题斥责两个代表团，特别指责南斯拉夫人我行我素地支持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部队。苏联独裁者不想要什么邦联，那可能使自觉意识太强烈的铁托成为整个巴尔干的主人。而且，他也不想触怒英国人和美国人。英美两国当时由于的里雅斯特问题和希腊问题不好同铁托交谈。为了阻止南斯拉夫人继续擅自妄为，爱德华·卡德尔应召拜会莫洛托夫。苏联外长拿给他一份已经写好了的苏南协商条约，卡德尔必须签署此项条约。斯大林也许相信，这样一来，就能捆住贝尔格莱德的游击队员的手脚。

稍后，苏联人告知贝尔格莱德政府，关于两国间的一项新的贸易条约，虽然谈判日期届临，但必须"推迟"。这就是说，实际上取消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贸易联系，因为这是两个由国家经营商业的国家，那里不存在私人的主动性。1948年2月13日，南斯拉夫通讯社——这是一个保密机构，它为南斯拉夫党和政府搜集情报，重新发布国外的新闻报道——南通社的"红色公报"收到巴黎《费加罗》报的一条报道：根据这条消息，罗马尼亚共产党已经下令在罗马尼亚摘下所有铁托的画像。《费加罗》写道，在布加勒斯特，传闻越来越多，说铁托已失去莫斯科的信任。

因此，当铁托3月1日向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报告同苏联关系的困难和莫斯科开始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施加压力时，他们不是毫无准备的。随后卡德尔发言，报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斯大林用这样一种腔调跟我们说话，

仿佛我们是共青团员似的。”当时南斯拉夫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也就是最高政治委员）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补充说：“他们有一条清楚的方针——他们想让我们完全依附他们。”铁托利用这个公式：在这里根本的问题是南斯拉夫的独立。

现在，苏联人根据一项显然是精心预谋的和齐头并进的模式行事。同时，这显示出他们对南斯拉夫人的脾气毫无预感：继在克里姆林宫的侮辱性“叱责”之后，紧接着就以停止贸易相威胁。后来在1948年3月18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使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向当时的南斯拉夫总参谋长科查·波波维奇声明，他接到立即撤回苏联军事专家的指示。原因是南斯拉夫人对苏联军人采取了不友好态度。一天之后，苏联临时代办阿尔姆雅尼诺夫出现在铁托那里，向他宣告，也要撤回苏联的文职顾问。

1948年3月20日，铁托以总理的资格，即以国家一级的规格，写信给苏联外交部长。信中第一次清楚地谈到了日见明显的冲突的核心问题。铁托给莫洛托夫写道：“基德里奇部长的助理斯尔增蒂奇，向您们的贸易代表列别德杰夫声明，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①]政府的决议，他无权提供任何重要的经济情报，苏联人想得到情报，应该找上面要去，也就是说，找南共中央去要。这种说法是对的……早就告诉您们的人，苏联政府的正式代表，可以从我国的领导直接得到一切重要的和必要的情报。我们方面的这样一种决定，是根据

① 这期间通过新宪法，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下述情况作出的，即我们各部的每一个官员，曾经直接向任何希望得到情报的人，提供必要的和非必要的情报，也就是说，泄露了各种国家和经济秘密……”。

这里，铁托明白无误地告诉苏联人，他感到至关重要的是，他不许可在他的国家里建立一个不为南斯拉夫党所控制的莫斯科的情报和间谍网。如果恩格斯（应是弗·培根——译注）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铁托由于拒绝给苏联人知识——关于内部动态的知识，而拒绝给他们以力量。相反，他给苏联人指出，要通过“正常的”国家间的道路：他们应当向南斯拉夫政府或党的领导询问情况。

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和干部，读到这些话时，一定恼羞成怒。苏联人是东欧的新主子。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竞相满足莫斯科的愿望。柏林和维也纳的绝大部分，还有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都在苏联手中。即使在西欧，人们对苏联可能的入侵也不寒而慄——此时，竟然有一个巴尔干的普通的游击队指挥员，一个当年的共产国际的小干部，尚且还是那些可疑的斯拉夫民族——莫斯科历来就习惯于把他们看作“堕落的俄罗斯人”——的一员，大胆地冒犯，顶撞伟大的斯大林和伟大的苏联，竟然敢提条件?!

苏联大使拉弗伦特杰夫，用一种人们在下战书或递交最后通牒时惯用的形式，向铁托递交莫斯科的复函：1948年3月27日，大使拉弗伦特杰夫和临时代办阿尔姆雅尼诺夫走进萨格勒布的“白色别墅”。铁托当时住在那儿。他们递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封信。铁托没有叫两个俄国人坐下。气氛

是冷冰冰的。"我们何时能得到答复?"大使问道。"我们将作研究,然后答复,再也无可奉告的了",铁托说。两个苏联外交官转身离开房间。谈话持续三分钟。

1948 年 3 月 27 日苏联的信件,又是以蔑视和讥诮的口吻,又是用公开威胁的腔调。信上说,苏联人为了每一项经济情报都得向南斯拉夫中央或政府请教,想起这一点,"实在忍俊不禁"。重要的是完全另一回事,即"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代表要置于南斯拉夫国家保安机关的控制之下"。然后怨气冲天地继续写道:"提醒注意下述事实该不是多余的吧,我们只能在资产阶级国家中,遇到监视苏联代表的类似情况,而且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如此。"

也就是说,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代表,比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所受到的对待还要严厉!

这还不够。苏共在信中继续声称:"同样地,人们不得不指出,南斯拉夫保安机关不仅监视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且也监视共产党情报局机构里的苏共代表尤金同志。"①

此外,还归咎南共领导人发表"反苏声明"——诸如,"苏共已经变质","大国沙文主义统治着苏联","苏联想在经济上控制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把其他党置于苏共统治之下的工具"。而且据说南斯拉夫领导人还表示过,"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不再是革命的了"。苏共信件称米洛凡·德热拉斯、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鲍里斯·基德里奇和亚历山

① 关于苏联在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和当时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情报局机关刊物《为了持久和平——为了人民民主》主编保尔·尤金,南斯拉夫作家马尔科·里斯蒂奇说道:"他是哲学家中最优秀的秘密警察和秘密警察中最优秀的哲学家。"

大·兰科维奇为“令人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好选择这四个人是很有意思的，由此可窥见苏联未来意图之一斑。这四个人当时都是铁托特别亲密的同事：后来同共产主义分道扬镳的德热拉斯，当时是党的意识形态首脑，伏克曼诺维奇是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基德里奇是计划经济的领导人，1966年被解除一切职务的兰科维奇，当时是保安机关的头头。斯大林当时恐怕是这样考虑的，如果铁托同他的政权的这四大支柱分离，那将是他的政策的终结，也许也是他（铁托）的垮台的开始。从三十年代苏联的清洗中，斯大林知道，对付一个危险人物，首先要搞掉他周围的人，搞掉他的战友，然后彻底干掉他，这是很有效的办法。

斯大林和苏联人，当时就已经仔细地考虑到这种“干掉”的办法，这一点在莫斯科的信中，同样是一目了然的。信上说，托洛茨基也向苏共“宣战”，他也指控苏联党“变质”和“大国沙文主义”。他也用“世界革命的左的空话”来掩盖这一切。接着是一句决定性的话：“我们相信，托洛茨基的政治野心是足以使人受教益的。”

这是明目张胆地用谋杀相威胁，因为托洛茨基的“政治野心”，1940年在墨西哥的流亡中完结。一个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务，显然是受命于斯大林，打碎了他的天灵盖。

此外，苏联信件声称，南共违反“党内民主”的原则。党的干部处在国家公安部长的监督下，这是不许可的。在南共党内，没有阶级斗争精神，党越来越成为人民阵线——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在农村，人们感到“资本主义因素”在增长。

信件也谈到南斯拉夫外交官弗拉基米尔·韦莱比特，他

曾经同莫斯科谈判关于混合公司问题。信上断言，韦莱比特是众所周知的"英国间谍"，只要他留在贝尔格莱德外交部里，莫斯科就不能再同南斯拉夫政府公开交换信件。一个国家指控另一国的外交官为第三国的间谍，这是极不寻常的事件。

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莫斯科的如下措词："不言而喻，我们不能把共产党的这种组织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

1948 年 4 月 12 日，铁托在南共中央委员会上，就答复苏联一事作出决议。铁托和南共领导的核心人物——兰科维奇、德热拉斯、基德里奇——已经草拟好这一复信。回信的主导腔调是辩护，仿佛南斯拉夫人感到重要的是纠正错误的责罪，并使苏联信服，他们确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尽管如此，南斯拉夫的文件指责俄国人，苏联专家的薪水是南斯拉夫军队司令官的四倍，联邦部长的三倍。苏联大使无权获得关于南斯拉夫党的任何情报，因为他的任务是国家间的(不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接着，信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苏联情报机构在我们这个正在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征募我们的公民从事秘密活动，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把这看成别的，只能理解为一件违背我国利益的事……叫我们宣布同意让苏联的情报局在南斯拉夫建立自己的情报网，这是不可能的。"

往往有人说，铁托同莫斯科起初的争吵正好局限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情报机构在南斯拉夫的活动。这首先是对的，然而也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事关情报机构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和党的政策的独立问题。的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往往在这一方面显得天真烂漫；相反，铁托却确切地知道，苏联情报机关的活动意味着什么。是的，他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里，亲眼目睹了这个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正如他在作为地下斗争的战士和后来作为南斯拉夫游击队员时，试图摆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今日的克格勃）的影响一样，他现在也这样做。

在给莫斯科的第一封复信中，已经包含着南共的“信仰”，这表现在这句话上：“无论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热爱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绝不许因此稍稍不爱自己的、同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具体地说，热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数十万最进步的人类为了它而牺牲自己。”这一立场，离下述看法只有一步之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必须更甚于热爱苏联，遇到冲突时，甚至必须决定反对苏联而保护自己的人民。1976 年铁托在东柏林欧洲共产党会议上应用的公式：每一个党对他本国的工人阶级负责，是这一立场发展的结果。这样一来，不管他是否总是意识到，铁托就成了一切偏离莫斯科的共产党人的榜样——从中国到阿尔巴尼亚，从捷克斯洛伐克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到意大利人恩里科·贝林格。

当时，大辩论之初，铁托已经确切了解此中奥妙。1948 年 4 月 13 日，他对正在开会的中央委员们说：“同志们，请想一想，这不是什么理论性的讨论，不是什么南共的错误和我们的所谓意识形态偏离。我们不允许让人把我们推入这种讨论中去……首先，这是事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感到，他们（苏联人）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向我们，向我们的国家施加压力

……问题就在这里，同志们……这封信是可怕的诽谤和错误的情报的后果……我请求冷静地进行讨论……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必须在这里发言……如果苏共中央的同志们要求看记录的话，我们会送一份给他们的……。”

只有一个与会者表态赞成斯大林，反对铁托：政治局委员、塞尔维亚人和财政部长斯雷滕·茹约维奇。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当即同他对质，向他提出一个问题，问他“昨天在苏联大使馆”干了些什么勾当——这就证明，铁托当时已下令南斯拉夫秘密警察（国家保安局）监视苏联在贝尔格莱德的外交代表机构。茹约维奇企图争辩，他想帮助苏联大使购买一辆新汽车。他被捕了。他是一连串“情报局分子”的头一个。这类分子当时往往被监禁好几年。但是，除了安德里雅·赫布朗和阿尔索·约凡诺维奇外，茹约维奇是唯一想站在莫斯科一边的“高品位的”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赫布朗是克罗地亚的老共产党员，1950 年死在一个南斯拉夫的监狱里。约凡诺维奇上将是当时的总参谋长，1948 年 4 月 13 日中央会议之后的几星期，企图越过绿色边界，逃往罗马尼亚，被击毙。当然，有几千名中小军官、干部和外交官，当时向着莫斯科方向上跳去：其中之一是南斯拉夫军队上校弗拉多·达普切维奇，他同约凡诺维奇上将一起逃亡的尝试失败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长年监禁。1957 年，他经由阿尔巴尼亚逃往莫斯科，1968 年从苏联到比利时，和一位比利时女子结婚，成为比利时公民。1975 年，他持比利时护照，前往布加勒斯特。在那里，他又重新落入他的南斯拉夫死对头的手中——也许不无罗马尼亚的保安警察献的殷勤。1976 年，他在贝尔格莱德被判处死

刑，后“宽赦”为二十年监禁。他的兄弟佩科·达普切维奇依然是铁托的亲信之一，贝尔格莱德议会的副议长。统观这人的命运，人们看到在巴尔干昨天和今天由于政治原因可能产生的个人悲剧。在游击战争中，家庭内部也营垒森严。最杰出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之一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在他的回忆录里无动于衷地报道，他的兄弟想同切特尼克分子往意大利方向撤退，在战争结束时被游击队枪杀——而这支游击队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和最高政委就是伏克曼诺维奇[1]！

铁托后来报告说，米洛凡·德热拉斯和“另外几个人”，删去南斯拉夫党的首脑草拟的第一封给莫斯科复信的一节。铁托在这节里阐述了苏南意见分歧的原则方面，并提出两项要求：“第一，绝对尊重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原则，就象列宁和斯大林在他们的著作中所阐明的那样，第二，绝对互相信赖，非此不可能有持久和牢固的关系。”到南斯拉夫来的苏联公民，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兄弟的独立的国家”。各人民民主小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也必须保持它们的完全独立，但是，通过相互之间的条约，联合在一起，并同苏联联合在一起……

当时删去南斯拉夫复信的这一部分——而且肯定不无铁托的赞同——可能是为了不太刺激苏联人。然而，斯大林读到贝尔格莱德的来信，显然是够他受的。“我只要动一动小手指，铁托就不复存在”，苏联大元帅和总书记当时对赫鲁晓夫说道。

---

① 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同铁托生活在一起》，慕尼黑——苏黎世，1972年版。

苏联下一封给“铁托、卡德尔同志暨南共中央”的信，日期是1948年5月4日。斯大林在信里驳斥了所有南斯拉夫的论据。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以及所谓虐待他们的问题，苏联方面使人毫无怀疑的是：对他们来说，一个苏联下级军官或外交官员的证词，比南共最高领导的全部声明更有份量。莫斯科在信中说，“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联共（布）中央应该更相信铁托和卡德尔同志的空口白话，而不相信苏联军事顾问的经常抱怨呢？”铁托和卡德尔关于苏联大使无权获得南斯拉夫党的工作情报的说法，被认为是“反苏的”。信中可以看出，苏联大使在南斯拉夫有特权，第一，因为他是共产党人，第二，因为他是把南斯拉夫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苏联的代表（这种论断的结果是，贬低和蔑视南斯拉夫游击队参加在南斯拉夫进行的战争的进程）。但是，南斯拉夫人对苏联大使权利的限制，缘由在于贝尔格莱德的外交政策。莫斯科的信件写道，贝尔格莱德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对英美的外交政策不加区分，认为“南斯拉夫对苏联必须同对帝国主义国家——大不列颠和美国——一样，采取相同的政策”。

苏联的记忆常存，没有忘却任何事情：这种认识在1948年5月4日的信中也得到证实。铁托1945年5月在卢布尔雅那发表的一次演说，也受到责难。他在演说中反对在战争结束后“划分势力范围”。这是一种“反苏的立场”。[①]德热拉斯关于苏联军官的恶劣表现和“道德水平低下”的说法——同样是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时说的——又被端了出来。如同在第

① 在1945年6月5日的一项照会中，苏联政府已经称铁托的这次讲话是“对苏联的敌意诋毁”。

一封信中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再次出现托洛茨基的名字，把他的"军事领导方法"同"南斯拉夫的宗派主义资产阶级体系"相提并论。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被指控为没有远见和固执己见地坚持他们的反苏立场。不过，同时也邀请南斯拉夫同志参加下一次共产党情报局会议。

南斯拉夫方面用5月17日铁托和卡德尔签署的一封短信简作答复：我们不想回避原则问题的批评，然而在一种"不平等"地位上，我们感到不能赞同在情报局会议上解决问题。但是，苏联人没有改变旨意：在1948年5月22日的另一封信里，他们告知南斯拉夫人，情报局会议将于6月下半个月举行，不管"南共中央的代表"出席与否。

早在1948年5月19日，当苏联党的干部麦舍托夫从莫斯科给铁托带来要求，让他出席即将召开的情报局会议时，铁托就回答："不，我不去。我们是被告，我们将被传讯到被告席上，而我们却不知所以然。"苏联密使对他在铁托的办公室的拜访作了有趣的描述：约瑟夫·斯大林的那幅不可少的画像已不复挂在工作室墙壁的钉子上了，而是仅仅靠在墙边。相反，列宁的画像却没有变动。在共产党的南斯拉夫，铁托是第一个敢于触犯斯大林"偶像"的人。

诚然，还需经年累月，南共才自觉地脱离斯大林，才能把"斯大林主义"当作不适用的、消极的概念引进他们的词汇。有时，铁托及他手下的领导人还推论，仿佛这一切都是令人遗憾的误解，而斯大林本人成了错误情报的牺牲品。

当然，在最小的领导圈子中，人们知道这不是误解。当铁托同莫萨·彼雅杰——在监狱里使铁托熟悉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人——讨论关于情报局"邀请"去布加勒斯特的问题时，彼雅杰向他提醒乌克兰政治局的悲惨命运。1937年，以当时乌克兰党的领袖科西奥尔为首的政治局，应邀到莫斯科去进行"同志式的讨论"，随后在卢布扬卡，被从后脖梗开枪干掉了。铁托的传记作者弗拉基米尔·德基耶尔影射铁托的亲密同乡、农民领袖马蒂雅·古贝茨的命运，说道："主教和都督尤拉伊·德拉什科维奇业已准备好灼热的铁冠。只是这回马蒂雅·古贝茨将不光临。"

许多年之后，铁托公开谈到，他曾预计到，如果他当时接受邀请前往布加勒斯特，他将被干掉。"我知道，这一旅行意味着什么"，1972年5月，他在同贝尔格莱德电视台台长谈话时说。"好吧，我对自己的生命早已付了款，倘若有利，我会到那里去捐躯殉职的。然而我知道，那是毫无益处的，而且随后将是悲剧的真正开始。"

铁托曾为英国左派工党议员科尼·齐利亚库斯准备了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十八世纪末，当时俄罗斯正教教会的最高机关神圣宗教会议，命令门的内哥罗的大公、正教主教（符拉迪卡）彼得一世，前往莫斯科。他应该在那里为指控他是英国间谍辩护。但是，这位诸侯主教召开各部落酋长会议。他们通宵达旦商议，清晨给予答复："如果彼得大公是一位坏大公，那么，他对我们来说是坏大公，不是对俄国人。因此，不必叫他去莫斯科……"就这样，门的内哥罗的诸侯主教，象铁托一样，仍然留在自己的国度里。

但是，纵令在这种令人不快的形势下，铁托依旧是一位优胜的策略家：外交方面，他以一个被误解的斯大林主义者行

事。1948年春夏，南斯拉夫的内政方针强化了——直到五十年代，在某些经济部门里，如在农业方面，还试图证明，象苏联人一样，南斯拉夫是苏维埃的和斯大林主义的。摆脱苏联的进程是有步骤地实现的，而且是被铁托自觉地有步骤地实现的。当他被问到，为什么在同斯大林冲突之中，在发表了同苏联人和共产党情报局来往的信件之后，在南共五大上，他还高呼"斯大林万岁！"时，他在极小的范围内回答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考虑到我们的群众。我们不得不非常小心谨慎。斯大林的权威是无可怀疑的。如果我们操之过急，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如果我们行动迟缓，俄国人就会超过我们。我们不能一味痛苦，自暴自弃。我们必须留有时间，让苏联通过自己的行径，最终使群众自己起来喊"打倒斯大林！"

1948年6月20日，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批判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迄今一直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情报局办事机构和它的报纸的编辑部，也迁到那里去。根据苏联代表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的倡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在这个作为"情报局第一个决议"载入史册的文件里，南共领导人被指控为，在外交和内政的根本问题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南共对苏联实行一项"敌视的政策"。南共已变成一个"富农党"，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在南斯拉夫党内，实行"官僚主义的统治"。决议继续说，南斯拉夫领导人，"走上了直接欺骗他们的党和人民的道路"，坚持资本主义方向。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方案"，只能导致"南斯拉夫蜕变为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最后，苏联人和情报局公然号召推

勰铁托:“南共健康的党员”的任务是，迫使今天的领导人，放弃他们迄今为止的态度，或者如若他们不同意，就罢免他们，并用“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南共领导取而代之”。

在莫斯科，人们显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很快就能搞掉铁托。斯大林当时还无法想象，会有一个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能逃脱他的权力。昔日谴责南斯拉夫的那些东欧共产党人，大多数结局悲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两位代表中，特拉伊乔·科斯托夫被当作“铁托分子”而处死，武尔科·契尔文科夫1956年被赫鲁晓夫当作“斯大林分子”，作为第一次苏南和解的牺牲品被罢黜。罗马尼亚共产党人中，只有乔治乌—德治作为在职的党的首脑，1965年逝世。瓦西列·卢卡被处死，安娜·波克被罢官。匈牙利党的代表中，拉科西，福尔考什和盖勒，没有一个能在职位上经历1957年：他们都在匈牙利革命前或革命过程中被清洗，并且由于罪恶昭著不得不在流亡中退隐，比如拉科西就死在苏联。苏联的代表中，只有米哈伊尔·苏斯洛夫饱经盛衰荣辱，依然留任官场。日丹诺夫在布加勒斯特会晤不久之后去逝，死因不明。马林科夫被赫鲁晓夫解除一切职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除了西罗基外，都成为清洗的牺牲品。斯兰斯基和盖明德1952年被处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死前不久的最后牺牲品。他们在布加勒斯特指控南斯拉夫人，自己又都是相同或相似罪名的牺牲品。

共产党情报局恰好在1948年6月28日发表反对南斯拉夫的决议，这一事实表明，苏联人是多么不了解南斯拉夫国内的心理状况，他们是如何地还为1945年的胜利所陶醉。6月

28日对贝尔格莱德是特殊的日子：1914年这一天，奥地利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开枪击毙。然而，6月28日绝不仅此而已：这是维多夫丹（宪法节），这一天塞尔维亚人缅怀他们的神话般的过去，追思在反对土耳其人战争中在阿姆泽尔菲尔特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如果说，苏联人正好选择这一天要侮辱克罗地亚出生的铁托，那么，他们正好因此同时侮辱了塞尔维亚民族。而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总是起着特殊的作用：首都贝尔格莱德终究是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这样一来，苏联人就使铁托能够利用人民中本来反对共产主义的那部分人的塞尔维亚爱国主义。1957年逝世的莫萨·彼雅杰是一位极为聪明的、犹太出身的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他立即就理解到这一层。当苏联人要求，审判两个南斯拉夫的莫斯科追随者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应该有苏联代表在场时，彼雅杰就提醒道，1914年奥匈帝国在给塞尔维亚王国的著名的最后通牒中，提出了何其相似的要求：即应该让奥地利官员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侦辑萨拉热窝的凶手。彼雅杰说，但是，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企图破坏一个小国的主权。

现在，恰恰在这个时代，在苏联共产主义的标志下，一些小国的主权依次受到破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当时就被“苏维埃化”。怎么会正好南斯拉夫人奋起反抗，而其他的却几乎毫无反抗地听天由命呢？乍看起来似乎奇怪：然而使南斯拉夫党能够起来进行反抗的正是共产党的激进主义。铁托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久，已经清除了他的国内对手。不存在威胁着他的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他不象东

欧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请看匈牙利),必须请求苏联人援助,以对付反对派。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干部团结一致,发誓效忠铁托。党学会了独立活动。既然现在形式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游击战争的产物,那么苏联的机构就很少有可能对它进行渗透。反抗希特勒和战胜本来远为优势的国内对手的感情,也给了起来反抗斯大林的力量。加上对苏联的失望的爱——众所周知,失望的爱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毅力和体力,它能够变为憎恨,蔑视和冒天下之大不韪。最后,还有南部斯拉夫人的禀性:喜欢首先说"不",进行抗拒,而且即使事情显得毫无希望,也是如此。小民族的反应往往不合情理——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时至今日还没有完全丧失这一特性。塞尔维亚人起义抗击土耳其人,萨拉热窝的暗杀,1941 年 3 月 27 日贝尔格莱德的反德群众游行——在明显不合理的格言的感召下:"宁要战争,不要三国条约,宁进坟墓,不愿受奴役!"——这一切如同反抗斯大林一样,不能单纯用理智来理解。1948 年,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这种反抗很难维持到三个星期以上。斯大林已经在他致铁托的一封信中威胁说,南斯拉夫不能期待苏联和东欧方面的任何援助和迁就。既然铁托同样地与他的西部邻国争吵不休,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是紧张的,情报局冲突引起的第一个后果是:完全孤立和东方集团的经济封锁。

然而,这一切加在一起——从苏联的政治威胁(不久也有军事威胁),及至认识到必须全凭单干——给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动员"内部后备力量"和重新焕发游击时代精神的能力。但是同时,铁托领导下的共产党人,在反抗德国人和希特勒的

斗争中，已经既提出民族的也提出“阶级斗争”的口号；此时，他们再次作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民族利益的保护者出现。这使他们赢得的同情、容忍和支持，远远超过他们的“正常的”和一般的追随者的范围。即使居民中的资产阶级的、保守的和信奉西方民主的那部分人，也视铁托反斯大林的斗争为积极的事态，准备予以支持。

这样，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元首就树立了权威，今天他仍然保持这种权威：他成为一位地地道道的“超党派”人物——肯定不是出自他的个人行为，而是由于许多南斯拉夫人对他的印象所使然。非共产党人，甚至反共分子，也开始接受他，因而也开始“承认”自己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苏联人用他们的威胁政策，正好巩固了南斯拉夫的独立。

当然，这仍不足以保障南斯拉夫走自己的道路：后来加上西方大国的援助和西方联盟的掩护、美国的经援和武器供应。没有这些，南斯拉夫和铁托就不能幸存。然而，这一事态的发展 1949 年末才开始，斯大林逝世前，即 1952 年和 1953 年，达到其高峰。没有前面提到的那些基础，援助就会建筑在沙堆之上。

的确，起初有一个相反方向的运动：1948 年 7 月 21 日至 29 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强化了内部的阶级斗争，仿佛党要通过激进的没收财产和强制农业集体化，使苏联人捞不到批评的把柄，尤其是驳斥关于南斯拉夫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的指责。铁托鼓励他的追随者，称他们是无辜的被告，不公正地受到怀疑，这进一步树立他的个人权威，所以能够用铁托的超凡魅力去对抗约瑟夫·斯大林的具有超

凡魅力的形象——这同样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实。"铁托同志、共产党人的领袖——南斯拉夫党象泪水一样纯洁"，代表们这样吟诵着。还有："谎言和诽谤愈多，我们对铁托同志就愈忠诚和热爱！"于是，铁托成为反对斯大林的对立形象。对铁托的信仰，可以抵销对斯大林的信仰，后者曾牢牢地统治过南斯拉夫的党。

铁托本人善于利用这一点：他向他的追随者注入——起初还是小剂量，然而已经可以清楚感觉到——一种信念，南斯拉夫共产党特殊，它不同于那些拜倒在斯大林脚下的其他党。关于情报局的"错误的责罪"，他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除了苏共以外，没有别的共产党能顶住这样的打击，而不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分崩离析……"

"除了苏共以外，没有别的党"，这就已经把自己同莫斯科相提并论。这就为铁托当时不愿再回到从前的状况提供一个理论根据，即使在苏联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苏联不会作出让步的。退路是没有的。

诚然，在南斯拉夫面前，前程莫测。苏联及其卫星国开始宣布废除一切贸易关系和贸易条约。在南斯拉夫的边境上，出现了挑衅和射击事件，苏联飞机飞越南斯拉夫领空。随后，停止同南斯拉夫的文化关系。根据南斯拉夫的资料，1948年后，东方集团国家单方面撕毁了五十多个政治、文化和其他的条约及协定。仅仅从1948年年中至1950年年中的两年内，一百四十五名南斯拉夫外交官被驱逐出东欧国家。苏联在南斯拉夫的间谍活动加强了。莫斯科曾希望，铁托将会使这种活动"合法化"，会容忍这种活动。武装的反铁托的破坏分子

甚至企图从东部边境渗入。

1949年初，冲突进入下一阶段。1949年4月，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人民民主　争取持久和平》宣布，南斯拉夫已经“转入帝国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领导已经“变为一支帝国主义的别动队”。1949年夏天，苏联政府在一项照会里，抗议南斯拉夫警察对苏联公民的迫害：这里指的大多数是过去的“白俄”流亡分子，1945年后，他们决定赞成苏联。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声称要用反措施来威胁南斯拉夫人：苏联政府将被迫采取“其他有效的手段”，保护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使无法无天的法西斯暴徒们规矩一些”。

当时，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德热拉斯，等待着苏联人的军事行动：重要设施和仓库，从伏伊伏丁那平原迁至内地。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被任命为即将重新建立的游击部队的头头。从那时起到斯大林逝世，这种潜在的威胁一再反复出现。南斯拉夫人从不确切知道，莫斯科是否有朝一日会用军事手段解决铁托问题。

其间，反对现在非正式称之为“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东欧国家发展为一场擒妖逐魔的运动。斗争以在布达佩斯逮捕匈牙利外长、老共产党员拉斯洛·拉伊克开始。1949年夏天，他被指控为英美间谍和铁托的特务。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个匈牙利共产党人被押上法庭。后来，在保加利亚，共产党情报局第一项决议的签署者之一的特拉伊乔·科斯托夫，在阿尔巴尼亚，科奇·佐治，最后，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书记鲁道尔夫·斯兰斯基，都因类似的罪名受审判和被处死。这个审判浪潮在计划和实施上，同1936年至1938

年莫斯科“大清洗”的法律程序相适应。被告彻底“坦白交待”。罗织罪状之相似令人惊愕不已：他们是老共产党人，没到莫斯科流亡，而在家乡进行地下斗争；他们被盖世太保招募当特务，后又为英美所接管。铁托本人是“盖世太保的侦探”，后来是“美国人的雇佣兵”，他煽动他们进行敌视苏联的活动。这样一来，把铁托定为间谍和“法西斯分子”的莫斯科路线，通过这个法律程序得到重申。此外，还有一切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战士和国际旅的成员，都被怀疑从事反苏活动。

宣判拉斯洛·拉伊克和若干他的同案犯死刑之后没几天，苏联政府递交给南斯拉夫政府一项照会。这个照会特别具有历史兴味，因为它由安德烈·葛罗米柯——现任苏联外长和缓和时代的西方谈判伙伴——签署。在1949年9月28日的这项照会里，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副外长葛罗米柯声称：

“今年9月24日，在布达佩斯城结束对叛国犯和间谍拉伊克及其同伙的审判。他们同时也是南斯拉夫政府的间谍。审判过程揭露，南斯拉夫政府早就对苏联极端仇视和进行颠复活动。……此外，这次审判中所揭发的事实表明，南斯拉夫政府完全依附外国帝国主义集团……这就导致葬送南斯拉夫共和国的自主和独立……”。苏联政府用这项照会，宣布废除1945年4月11日的苏南友好合作条约。

葛罗米柯在这里使用的语言，只是不久之后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情报局第三次会议上，党内正式使用的语言。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拉伊克案件作文章。现在，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二个文件已经是这样写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的手中。”“铁托集团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化

为法西斯主义”。这个“贝尔格莱德的被雇用的间谍和杀人犯集团”(此时,南斯拉夫政治局被扣上这顶帽子)是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的。“南斯拉夫的叛徒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反动的、民族的、教会的和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政治匪帮”,以便在这些国家“实现反革命的变革”,使这些国家同苏联分离,并使之隶属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南斯拉夫本身,“铁托——兰科维奇叛徒集团”取消了人民民主制度,“用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的国内政策和背叛的对外政策”,取而代之。因此,第二个情报局决议的措词已经采用法院诉状的风格:

“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德热拉斯、彼雅杰、戈什恩雅克、马斯拉里奇、贝布莱尔、姆拉佐维奇、伏克曼诺维奇、科查·波波维奇、基德里奇、奈斯科维奇、兹拉提奇、韦莱比特、科利舍夫斯基等等,是间谍集团,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敌人。”

于是,“铁托分子”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而这一切似乎暗示,斯大林有朝一日将用武力重新把南斯拉夫操纵在手。反铁托调门的尖锐同冷战的气氛遥相呼应,这种对西方的冷战气氛自从1948年——自布拉格二月政变和封锁柏林——以来,日趋明显。后期的斯大林主义想对外囿封他的势力范围。同时,它企图在似乎不必冒更大风险的一切地方,推行扩张政策:诸如对西柏林,那里应该通过封锁对外通道,变得“风起云涌,山雨欲来”,抑如在朝鲜,1950年夏天,共产党北方进攻南方①,美国在起初对南方的支持很不够。

① 这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译注

斯大林曾经攻击铁托和南斯拉夫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推行"冒险"的对抗政策，同一个斯大林，现在自己走在对抗的轨道上。这种现象属于苏维埃制度的表面矛盾。诚然，即使两人都这样做，情况却有所不同。斯大林想独自规定速度。铁托不能自己觉得合适就同西方大国争吵，而只有在斯大林和苏联人觉得合适时才行。

如果说，初期铁托至少在理论上、思想上承认苏联的权威，那么，苏联攻击的毫无节制，东方集团的军事威胁，以及东欧国家的公审（通过这些公审，想让南斯拉夫领导人先尝尝为他们设想的命运的滋味），也导致南斯拉夫对克里姆林宫使用尖锐的语言。今天已经几乎被人遗忘，1949年铁托和南斯拉夫领导人属于赞成德国重新统一的人。当时，贝尔格莱德是唯一同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没有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共产党国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1951年7月22日访问华沙时，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起来推翻他们的领导。铁托在回答莫洛托夫时，证明他是一个熟谙苏联内部问题的行家里手。

"莫洛托夫为什么到波兰人那儿去？"铁托当时在一次演说里问道。"不是给他们送去玫瑰花，而是去威胁他们，去告诉波兰人，如果他们敢于效法南斯拉夫的榜样，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他在那儿向我们发出的威胁，首先是针对波兰人民的。以我之见，他今天总该知道，我们是不怕威胁的。在道义上，他有什么权利，能归咎我们要剿灭人民？他是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那里，正在犯下史无前例的屠杀人民的罪行，在那里，整个民族在举世瞩目下被消灭。他有什么权利说

话呢？伏尔加德意志共和国哪儿去了？那儿曾生活着最能干的一个民族。它在西伯利亚的森林沼泽地里！克里米亚的鞑靼共和国哪儿去了？它已不复存在了，它在西伯利亚，消失在森林沼泽地和泥潭里！高加索的切禅人在哪里？没有了，他们已不复存在，他们被从山区赶走，在那里他们曾为自己的自由而奋斗几千年，他们消失在西伯利亚，巨大的西伯利亚森林沼泽地吞噬了他们，因为气候不适应，他们不得不在那里慢慢死去。成千上万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又在何方？他们走了，每天人们把他们送往西伯利亚，让他们在那里，在最艰难的境况下劳动，然后从地球上消失……”

一位执政的共产党的头头这样毁灭性地批评苏联，这还是第一次。很多年之后，中国领导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部分地还有罗马尼亚领导人，才以类似的形式，对苏联进行了原则的批评。当然，在斯大林逝世和同赫鲁晓夫和解之后，铁托从未再同苏联人进行这样形式的原则辩论。南斯拉夫党的首脑，不注重为原则而原则的全面对峙。他想让苏联人至少间接地承认自己的南斯拉夫道路。他想对苏联的进一步发展施加影响。铁托也知道，彻头彻尾地批评苏联，对一个共产党国家和一个共产党领袖来说，是危险的。同中国共产党人不同，在中国，他们的制度没有苏联也能生存。铁托知道，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小国，总会有些事情要依靠苏联，因为如果苏联彻底被破坏或打败，如果苏联共产主义被打败，南斯拉夫制度的存在也将成为问题。

这个制度在五十年代初期，在某些方面开始接近西方；甚至有一个美国军事使团出现在贝尔格莱德。铁托再次证明他

的迅速应变的雄才大略。不久前，他还支持马尔科斯将军的共产党暴动分子，反对希腊王国政府。现在他跟同这个政府谈判，并与雅典和安卡拉签订巴尔干条约。虽然铁托没有因此正式成为北约成员，然而北约成员希腊和土耳其在组织上同西方军事同盟联结着。在经济上，南斯拉夫是一个依仗西方经济和粮食援助生活的共产党国家。对那种认为不可能用资本主义的小麦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指责，铁托当时自觉地回答说：只有那些理解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谁要对此毫不理解（这里显然是指苏联人），即使用自己的小麦，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确，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反抗斯大林，不是为了现在伸开双手投入西方的怀抱。对西方的让步，正是这样精心安排的，它既是策略上的需要，又不给南斯拉夫的独立投下阴影。美国—南斯拉夫的关系为这种态度提供一个范例。1954年，南斯拉夫遭受旱灾，国家濒临着饥馑，铁托派他的同事和老战友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去美国——他以粗暴和憨厚闻名。当美国人用类似西方国家也接受的条件，答应向他提供一批小麦援助时，伏克曼诺维奇粗暴地拒绝了。美国人想用等价物——即南斯拉夫购买小麦的货币第纳尔款项，在这个国家投资几项工程，并对这些工程的实施进行监督。他的美国谈判伙伴罗伯特·墨菲问他："您们将来吃什么呢？"伏克曼诺维奇用一句经典的语言回答："我们将吃树叶——象在战时一样。"于是，南斯拉夫得到小麦，谁也不必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而去采集树叶吃。

但是，没有这种西方援助，南斯拉夫就不能幸存。如果说，南斯拉夫是对西方很多（请注意：绝不是一切）影响开放的

第一个共产党国家，它的领导人、外交官和干部，通过日常交往认识西方的力量和弱点，那么，这是苏联人的功劳。苏联人至今未能倒拨时钟，把共产党的南斯拉夫重新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怀抱，这种状况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时，他还没有把铁托消灭掉。相反，铁托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真正变成他的意识形态对手和竞争者。1950 年以来，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开始在工厂里实施"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原则。在"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下，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回头求助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也求助于工团主义者和十九世纪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1950 年 6 月 26 日公布关于工人代表委员会的法律，短短几个星期之后，就在所有南斯拉夫企业里选出了工人代表委员会。据说，应该产生一种生产者的民主，作为走向"国家消亡"的过渡形式，正如马克思主义预见历史最后阶段时那样。与苏联不同，生产资料不应属于国家，而应属于生产者。人们想创立一种行政机构不独揽全权的制度——在苏联，行政机构是大权独揽的。当时，铁托向克罗地亚共产党人宣布，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教育劳动人民"。工人应该被"教育成为自由的公民和历史的创造者"。

这样，铁托的南斯拉夫就走上"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在 1952 年党的六大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同苏联的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机构的差距，以这种方式用文件固定下来了。但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依然是列宁意义上的一个政党。权力垄断依旧保留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头头米洛凡·德热拉斯试图从工人自治和"联盟"的

思想引申出一种议会民主。1954 年——斯大林逝世后近一年，他的论点遭到铁托和党的领导的驳斥。德热拉斯从政治生活中消声匿迹了。他当了几年南斯拉夫监狱的囚徒之后，才又重新露面。谁知，倘若斯大林多活五、六年，南斯拉夫会如何进一步发展呢。然而斯大林 1953 年逝世了。稍后，很快就显示出，既包括铁托，也包括苏联新的领导人，尤其是尼基塔·赫鲁晓夫，都想重新接头，拉上关系。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

在贝尔格莱德机场——还是那个旧的、在此期间扩建的塞姆林（泽蒙）机场——上，斯大林逝世后几乎不到两年的1955年5月26日，发生了现代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一个事件：大国苏联的党魁走下飞机，问候他的东道主南斯拉夫党的首脑铁托，并且代表一个大国，开始就这个大国强加给一个小国的不公正，向这个小国的国务活动家赔礼道歉。

铁托无动于衷地站着。赫鲁晓夫照本宣科地读着他那事先准备了的讲话："……我们对发生过的事件表示诚挚的遗憾，并决心铲除前一时期所产生的一切淤积……"苏联党魁把同贝尔格莱德关系的不和归咎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这两人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斯大林逝世后被处死。他继续说道："我们彻底研究了那时严重责罪和侮辱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材料。事实是，这些材料是人民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可鄙代理人炮制的，他们通过欺骗，混进我们党的队伍……"

赫鲁晓夫就谈到这种程度。由于铁托作为东道主没有致欢迎词，这一事件就显得更不平凡。以赫鲁晓夫和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为首的代表团，以及南斯拉夫的东道主们，登上汽车，扬长而去……

随后几天举行的会谈，有时进行得犹如暴风骤雨。会谈结果产生"贝尔格莱德宣言"。这个文件连同一年后铁托在苏

联签署的“莫斯科宣言”一起，直到今天仍为南斯拉夫方面视为贝尔格莱德独立的一种大宪章；而苏联人却很不愿意提及它，想最好把它打入冷宫——这一点自从赫鲁晓夫时代以来毫无变化。

因为，贝尔格莱德宣言和后来的莫斯科宣言申明，南斯拉夫可以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承诺对赫鲁晓夫来说，是策略上的一步棋：首先，在苏联党魁的国内非斯大林化的方案中，南斯拉夫和铁托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错误而有害的，那么，这同赫鲁晓夫要求并实行剥夺所有那些苏联政治家的权利，是前后一致的——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到马林科夫，他们首先代表这一对待南斯拉夫的错误路线。非斯大林化和同铁托的和解，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这两件事上，他感到重要的是消灭他在莫斯科的内政对手。因此，在这场游戏中，铁托成了赫鲁晓夫最重要的同盟者和帮手。

尼基塔·赫鲁晓夫以他的农民的直觉，感到斯大林的方法必然导致苏联制度的呆板和僵化。为了使这个制度灵活，他不惜同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是最千奇百怪的同盟者合谋共事——请大家想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在赫鲁晓夫考虑中的作用吧。当时索尔仁尼琴还不出名，他的这篇集中营记叙发表在1962年。谁准备在实际上同索尔仁尼琴联合，他当然也能同铁托联合。

1955年5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南斯拉夫发表的纪要表明，赫鲁晓夫同当年的斯大林一样，千篇一律地因而也是

错误地判断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只是赫鲁晓夫的近期目标看来不同：当他进行卡诺萨之行[1]，去拜访铁托时，奥地利国家条约业已签署完毕，苏军已经撤出维也纳，同西方列强举行的会议和会谈就在眼前。强有力的共处政策应该取代莫斯科僵硬的教条主义。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不能同南斯拉夫人冲突。继续进行反对铁托主义的论战，将会使他的整个外交政策变得不可信。它将特别损害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形象；当时，莫斯科的人们已经开始认识第三世界的意义。

然而，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而且恰恰是他）也是按照苏联的大国实力范畴进行思维和行动的。当他到铁托那儿进行赔礼道歉之行时，他相信，南斯拉夫终将返回“社会主义阵营”，服从苏联的权威。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暗示，他是如何评价铁托同西方的关系的。他说：“我们相信，资本家给（南斯拉夫人）钱，不会不讨回代价的……”在另一个场合，赫鲁晓夫示意，他认为铁托坚持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只不过是一种诡计，贝尔格莱德想用这种计谋，引诱美国人腰包里的钱。当铁托保证他对西方将始终作为共产党人身份出现时，一个参加贝尔格莱德会谈的苏联代表团成员插话道：“在一个如此强大的共产党面前，现在您不能表示反共。”显然，赫鲁晓夫切实相信，铁托已为西方所“收买”，现在苏联必须把他“赎买回来”，纵使不用金钱，也必须用妥协来加以赎回。

---

① 1677年，皇帝亨利四世前往意大利的卡诺萨，向教皇格雷戈尔七世作三天忏悔，换取解除逐出教门令。卡诺萨之行意为低三下四的忏悔之行。——译注

后来，当1955年的和解已经开始迈出第一步时，赫鲁晓夫引用"士兵和连队"的关系，与铁托进行论战。赫鲁晓夫说，士兵必须同连队保持步调一致，而不是相反。根据这种说法，这个"南斯拉夫士兵"不能要求整个东方集团必须向它看齐，或顾及到它。1955年，赫鲁晓夫在贝尔格莱德还是谨慎小心的。但是，一年之后在莫斯科，他就公开要求南斯拉夫返回"阵营"："协调是必要的"，当时他对铁托说。"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之外，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行动是不可思议的……不能每个国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那样，将是工人阶级的巨大不幸……"

这里显示出，苏联党魁赫鲁晓夫，同他的后继者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前任斯大林一样，在外交和实力政策方面，绝没有用不同的范畴进行思考。仅仅是方法和他立论的主观情绪，有别于他的继任人和他的前任。一个苏联党的首脑，过去必须，现在也必须按照他的国家和他的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行事。匈牙利起义的灾难降临之前不久，铁托1956年到克里米亚进行闪电式访问时，赫鲁晓夫在一次祝酒时说："铁托同志，让我们为牢不可破的友谊，为阵营，干杯！"

铁托当即回答："阵营？我是这样想象的，它仿佛用铁蒺藜围着。呆在里头一定很不舒服……。"

如果说，这种方式使人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同铁托交往的目的何在，那么，依然存在着一个问题：铁托期望从赫鲁晓夫身上得到什么？铁托从前的战友和后来的批评者米洛凡·德热拉斯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国务活动家，象铁托那样了解俄国人。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首脑，一反他平素的习

惯，肯定也一反他切身的经验，信赖赫鲁晓夫，竭尽全力帮助苏联党的书记。当赫鲁晓夫多次批评南斯拉夫，或者甚至发表否定性的言论时，铁托对他也无恶感。尽管在作风、趣味和仪表上有着天渊之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关键所在是两人同约瑟夫·斯大林的关系。苏联党的书记和南斯拉夫党的书记，两人都把同约瑟夫·斯大林的遗产的辩论视为己任。在这个问题上，目的可能是不同的：赫鲁晓夫想保持和扩大苏联的实力。他也许是仍然在革命的意义上，信仰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然而，铁托也胸怀着革命的理想。对他来说，南斯拉夫太小了吗？正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想从根本上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斯大林和俄国人一样（并且因此陷入同斯大林的冲突），现在，斯大林死后，这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领袖看到一个机会，在非斯大林化和重新改造共产党的关系方面，他可以成为赫鲁晓夫的政治思想顾问。

因此，1955 年 5 月赫鲁晓夫访问贝尔格莱德和 1956 年 10 月匈牙利起义之间这段时间，是铁托在苏联党魁的合谋下，着手改变东方集团面貌的时期。犹如在共产党情报局冲突时一样，这次首先也以南苏秘密交换信件开始。但是现在，赫鲁晓夫在 1954 年 6 月 22 日致铁托的信件中承认，苏联方面对待南斯拉夫曾经犯过错误。铁托随后在 8 月 11 日答复，南斯拉夫方面想看看行动，空口白话是不够的。

短短几个月之后，铁托已经十拿九稳，苏联方面想作出让步。1954 年 11 月 26 日，在一次南斯拉夫中央会议上，他向

他的同志们解释："从今天在这里宣读的这些信件中，您们将看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当时，铁托已经认识到，这个胜利不仅涉及"国家的路线"，即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涉及意识形态："他们(苏联人)承认，我们可按照我们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然而同时，铁托也警告南斯拉夫领导，要注视现在南斯拉夫将要面临的问题：关键是在"每一方面"都保持"现在的地位"，我们为此曾付出如此之多的牺牲——保住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这个国家执行着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自己的国内政策。人们曾告诉过苏联人，他们既不想当西方的仆从，也不想作东方的卫星国。

饶有兴味的是，铁托从一开始，就窥见苏联人藉以把他和他的国家重新拉入东方集团的痕迹。在 1954 年 11 月的中央会议上，南斯拉夫党的首脑说过："我的立场是，我们平心静气地告诉他们(苏联人)：解散这个'公司'吧，因为它将一事无成……他们能够倾听我们的意见，但一定不会那样干。不过，我们将不进人这个公司。我们想在一切领域里平等地合作。然而，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再加入这个公司。它把我们撵了出来，连篇累牍地诽谤我们。因为它只想用这个党纪，这个共产党的纪律，重新束缚我们，让我们在国家一级上也不得不演奏第四或第五把提琴，也就是说，我们将丧失独立……"

当然，南斯拉夫党的首脑只有在小范围内才说得这样明确。在公开场合，他的言谈谨慎一些。因此，在西方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南斯拉夫正在大踏步向苏联移动。此时，铁托突然强调不存在民族共产主义和铁托主义，只有独一无二的一种共产主义。有时，他象一个在 1948 年大逆不道之后，现

在又屈服于苏联人的人。

当然，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来说，内心的考验是严峻的。尽管过去发生了种种事件，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它曾经是自己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境界，它曾经是自己寄托着希望的国家。它曾经是一个爱过之后又感到失望的国家——然而，失望里也还隐藏着某些以往的倾慕。铁托冷静地观察这一切。对他来说，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条件，实现同莫斯科的和解，必定是他一生政治业绩的胜利和顶峰。

然而，陶醉在政治胜利的欢乐之际，他保持了十分冷静的头脑：他让苏联人首先到贝尔格莱德来。苏联领导曾经侮辱了他，因此，它必须迈出和解的第一步。在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平起平坐的谈判代表团中，他吸收了两个特别尖刻的苏联的对手参加：米亚尔科·托多罗维奇和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这两人用忤逆的语言，反驳赫鲁晓夫，使之暴跳如雷。赫鲁晓夫同铁托的两位反苏战友唇枪舌战，争吵不休。伏克曼诺维奇质问苏联党魁，有什么可以保证，明天在莫斯科不再会有挑衅者毒化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此时，铁托却能够安然稳坐，扮演着国务活动家和调停者的角色，他绝无必要自身投入喧嚣吵闹之中。伏克曼诺维奇问“老头子”，是不是想把他撤出谈判代表团，因为不然的话，要激怒苏联人，铁托命令他继续留着。铁托是搞政治平衡的大师，他需要性情暴燥的伏克曼诺维奇。此人习惯于一会儿顶撞美国人，一会儿违拗苏联人。这也是一种特别的独立的示威。

但是，对铁托来说，接近莫斯科已经是决定了的事情。赫鲁晓夫访问贝尔格莱德之后，铁托对于自己的道路已经被承

认十拿九稳。苏联不再以领袖或导师自居的面目出现。南斯拉夫重新被吸收到共产党国家的圈子里去，而不必参加一个集团或阵营。苏联甚至签署一项谴责集团政策危害和平的文件。然而，1955 年 6 月 2 日的贝尔格莱德宣言，产生两个影响，这是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没有预见到和不愿有的。第一，它导致了增强东欧的独立意志，因而也导致了 1956 年 10 月匈牙利革命达到其顶点的事态发展。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以及它那种甚至为美国人和西方大国所容忍和支持的不结盟共产主义，成为东欧所有那些想摆脱苏联霸权统治的力量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榜样。为铁托恢复名誉，同时意味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政权赖以支撑的意识形态结构在内部的崩溃，因为这些政权必须为其反铁托主义的清洗审判和处决进行辩解。现在，一切都陷入动荡不定。因此，人们可以宽慰地说，贝尔格莱德宣言成为对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后果最严重的政治文件之一。

第二个因素涉及南斯拉夫和它的共产党：一方面，铁托拒绝加入苏联集团；另一方面，他争取自己被承认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这里产生一个矛盾，它使铁托和南斯拉夫很快就陷入困境。

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宣言签署两个月之后，曾对美国的来访者说过，南斯拉夫不能同西方的社会党保持关系，同时又拒绝同苏共谈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在南斯拉夫的公开宣传中，苏联也作为一个想要和平，并在很多方面已经改变了面貌的国家出现。铁托声称，苏联改变了它对南斯拉夫的态度，结果必然也改变莫斯科对其他国家的态度。

铁托言之有理。当然，不完全象他想象的那样。本来，南斯拉夫对苏联的信任，无非是铁托其人对赫鲁晓夫其人的信任。它是一张对未来承诺的空头支票，尚未兑现。

的确，起初一切都如愿以偿：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开幕，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和东欧，非斯大林化高涨起来了。1956 年 4 月 18 日，莫斯科《真理报》宣布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的名称已经变为反南斯拉夫运动的概念。在波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和马里扬·斯佩哈尔斯基这两个"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辩护士，几乎同时被释放出狱。在保加利亚，中央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声明，责罪南斯拉夫是没有道理的，并给已被处死的铁托分子特拉伊乔·科斯托夫恢复名誉。

此后不久，铁托偕夫人约婉卡和大批政治随员，前往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象当代英雄一样，他处处受到欢迎——或者象重归的游子一样，受到欢迎。苏联国家元首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元帅，为他曾按斯大林的指示，不得不发表反南斯拉夫的讲话，向铁托赔礼道歉。这位十月革命的老战士老泪纵横，他对铁托说："我是一个蠢坯。我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不得不说了些多么愚蠢的话。我羞愧不堪……请您原谅我！"

在赫鲁晓夫和铁托 6 月 20 日在克里姆林宫签署的莫斯科宣言里，一年前在贝尔格莱德确定的路线得到了详细叙述："双方认为，在不同的国家里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形式的丰富多彩有助于它自身的强大。双方的出发点是，在确定和形成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任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对这一方或另一方都

是格格不入的——一致认为，上述合作应该建立在完全自愿和平等之上，建立对在我们两党之间的争论问题采取友好的批评和同志式的交换意见之上。”

现在，已经比在贝尔格莱德前进一步：两党——不仅是两国——应该友好合作。这是一项完全新型的实验，因为，苏联承认另一个共产党的地位完全平等，是前所未有的事。现在，一切的关键取决于在实践中如何继续采取步骤。然而，不久就显示出，这个实践是由东欧各国日益增长的不安所决定的，尤其是在波兰，爆发了波森①工人示威游行，在匈牙利，一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组公开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首领拉科西的斗争。

不过，在苏联不仅有赫鲁晓夫，而且还有老斯大林分子，如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铁托从苏联回来时说：“事情有点儿难办，因为一些人向前拉，而另一些人往后扯。”然而，事态的发展开始越发加速了：在波兰，要求罢黜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他是由斯大林调任为波兰国防部长的。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上，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的老共产党员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被任命为党的首脑。

于是，9月19日，苏联党魁赫鲁晓夫出现在贝尔格莱德，进行一次新的访问。两个共产党领袖一起呆了十四天。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强大的苏共的头头好象在向南斯拉夫元帅讨教求援。在铁托的亚得里亚海官邸布里俄尼岛举行硕果累累的会谈之后，9月27日，赫鲁晓夫飞返苏联——不过，不是他光杆一人回去，而是铁托和夫人以及当时的南斯拉夫秘密警

① 即波兹南。——译注

察头子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起前往。据称，这是去克里米亚休假的私人访问。然而，实际上，赫鲁晓夫耿耿于怀的是，借铁托的帮助，控制住东欧越来越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在克里米亚，铁托会晤了被推翻了的马吉阿斯·拉科西的继任者、匈牙利党的新首领埃尔诺·盖勒。现在，拉科西正在向他从前的南斯拉夫死敌，乞求宽宏大量地收容他。

赫鲁晓夫显然已经受到党内教条主义一翼的压力。在布里俄尼岛，他就谈论着"纯洁"的和"不纯洁"的国家。"纯洁的"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不纯洁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然而，由于它的中间地位，南斯拉夫仅仅是"半纯洁的"。苏联党魁一再关切的是，劝说铁托返回"阵营"——不仅为了把南斯拉夫人拉进去，而且为了摆脱内部对他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日见增多的批评。在苏联方面，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莫斯科对南斯拉夫人作出了重大让步，而换来的只是东欧的骚乱。莫斯科要南斯拉夫对1956年夏天波森的骚乱负责——间接地要赫鲁晓夫负责，他使这些南斯拉夫人，有资格带着他们的民族独立、共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拒绝斯大林主义(因而也拒绝"秩序")的思想，在东欧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比如，铁托在克里米亚逗留时，从南共中央得知，苏共中央委员会给东欧各国的党写了一封密信。在这封密信里声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不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更多地是效法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因此，苏联同南斯拉夫缔结的协议，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南斯拉夫是一种"特殊情况"，而铁托不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

但是，企图使人怀疑南斯拉夫的模式和减缓铁托主义的

锐气，对东欧来说，已经为时太晚。为南斯拉夫恢复名誉已经蔓延到西欧共产主义：卢伊季·隆哥以意共的名义声明，南斯拉夫一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当埃尔诺·盖勒率领下的匈牙利党的代表团在南斯拉夫逗留的时候，斯大林主义的腐朽支架在匈牙利彻底瘫塌了。这是命运的有意嘲弄。盖勒请求铁托，通过布达佩斯电台，向匈牙利人民发表演说。他也许期望，作为昔日反斯大林和拉科西的战士，在匈牙利甚孚众望的南斯拉夫党的首脑，将对稳定局势有所贡献。实际上，在铁托面前，匈牙利领导不得不掩饰自己缺乏权威这一事实，意味着对布达佩斯当权派的任何信赖和尊重的终结。在这之前几天，10 月 6 日，出动大批人马，为恢复了名誉的公审的牺牲者拉斯洛·拉伊克及其难友送葬。然而，那些对死难者负有罪责的人，就在送殡的客人之中。刽子手们行进在牺牲者的后头，为他们举哀！

对匈牙利的富有爆炸性的局势，南斯拉夫人也没有预计到。他们想清算匈牙利的斯大林分子。铁托无所不用其极地帮助推翻拉科西和他的卫队。然而，当 1956 年 10 月 22 日匈牙利爆发示威游行和罢工的时候，当盖勒匆忙收拾行装，从贝尔格莱德返回布达佩斯，迫不及待地呼吁红军来对付游行者的时候，当匈牙利发生巷战，几天之内共产党政权彻底崩溃和垮台的时候，南斯拉夫也显得束手无策。

铁托想象的是另一幅景象："有条不紊"的、法定的非斯大林化应该使更新了的共产主义，在东欧，也可能在苏联，执掌政权。

南斯拉夫人固然可以满意地指出，匈牙利的工人阶级，此

外还有几天前就开始闹风潮的波兰人，把"工人代表委员会"的思想付诸实践。但是，匈牙利的革命委员会和工人代表委员会，很快就证明完全不同于南斯拉夫原来的样板。追捕秘密警察，实际上解散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国家，废除一党执政，新任命的共产党总理伊姆雷·纳吉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存在，以及匈牙利政府已变为一个所有政党都参加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人在其中绝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切不可能符合贝尔格莱德的口味。

于是，产生了一种离奇古怪的状况：南斯拉夫人谴责党的首领埃尔诺·盖勒的行为。10月23日之后，盖勒要求俄国人走出兵营去进行干预，以镇压示威游行。也就是说，他们谴责第一次干涉，对盖勒怒不可遏。但是，他们同样声明，不同意在这之后爆发的自发行动和革命。在伊姆雷·纳吉身上，他们看到了反革命和"法西斯分子"正在蠢蠢欲动，因为，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反面的、变质的、然而还是共产党的政权，是否会变为多元民主制度。

在一个世界政治的决定性阶段，铁托和赫鲁晓夫又开始合作共事。10月30日，《真理报》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宣言，声称苏联政府将"尊重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主权"。仿佛匈牙利人赢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俄国军队开始撤出布达佩斯。但是，随即传来消息说，伊姆雷·纳吉总理宣告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和他的国家中立。

在这一事态的发展中，1956年11月2日晚，尼基塔·赫鲁晓夫再次抵达南斯拉夫。这次旅行严格保密。他的随员中有马林科夫——这是一位斯大林手下反对铁托主义特别出类

拔萃的人物，是赫鲁晓夫的敌人和竞争者。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在苏联权力阶梯的地位已遭削弱。无论如何，莫斯科集体领导的束手无策是显而易见的，在苏维埃帝国的严重危机时刻，他们来向铁托讨教乞援了。

当时，铁托和赫鲁晓夫已经达成协议，认为匈牙利发生的是一场"反革命"的事件。事后铁托说，他当时向赫鲁晓夫建议，在新的共产党首脑卡达尔领导下，组织一个"工农政府"，以工人代表委员会为基础，采取"武装行动"，镇压"反革命分子"。然而，苏联人不想再等下去。赫鲁晓夫认为，这样一种行动，对"工人阶级"为时已晚。两位苏联客人再次离开铁托之后一天，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匈牙利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开演了——铁托推荐和苏联人任用的亚诺什·卡达尔别无他法，可以说，只能在红军的大军压阵下巩固地位。前总理伊姆雷·纳吉逃到南斯拉夫使馆。苏联人伪造借口，把他从避难中引诱出来。不象许诺的那样，让他回家，而是逮捕了他。纳吉和传奇式的上校保尔·毛莱特尔一起被处死。毛莱特尔曾保卫基利安什兵营不受苏联人进犯，后来在同红军"谈判"时，被克格勃逮捕。处刑于1958年6月17日公布，这也是给为纳吉提供避难所的南斯拉夫人当头一棒。

对铁托来说，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涉，意味着结束了同非斯大林化了的苏联的蜜月。1956年11月11日，他在普拉讲话时，为南斯拉夫模棱两可的态度辩解。几天前，南斯拉夫外交官米伦科·米洛瓦诺夫在匈牙利首都的战斗中遇难。

铁托声称："我们曾经说过，并将永远这样说，我们反对干涉，反对利用外国军事力量。然而现在，到底什么是比较小的

坏事呢？是混乱，内战，反革命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还是驻扎在那里的苏军的干涉？第一个是灾难，第二个是坏事。如果这将拯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可以说，虽然我们反对干涉，但苏联的干预是必要的……”

南斯拉夫党的首脑以此示意，他想对苏联采取策略的态度。铁托知道，苏军在匈牙利“拯救社会主义”，只有在不违背南斯拉夫利益的意义上才能进行。但是，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在这里，他得心应手的政治游戏已告收场，一个大国已经开始诉诸军事暴力。他不能为了匈牙利，而置南斯拉夫于险境而不顾——何况匈牙利起义者的多元民主的要求，引起了这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极为深切的疑虑。考虑到象南斯拉夫这样一个较小的国家的地位，铁托对大国苏联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必须说明，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如同在十二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事件中一样，西方民主国家的态度也不是十分果敢和明朗的。尽管如此，“如果干涉拯救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它是值得为之辩护的”，铁托的这种说法，是这位一向谨慎小心的人的一次最危险的言语失慎。因为，如果“拯救社会主义”是军事干涉的辩护词，那么，明天不知何人会想起，必须用类似的方式，“拯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

铁托在那些日子的态度，显示了民族共产主义或不依赖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自身的固有矛盾。然而，这里也许也表现了铁托深刻的个人危机。他的战胜斯大林的伟大方案，在布达佩斯的废墟上彻底破产了。因此，他后来也指责苏联领导人，他们把斯大林主义只作为“个人崇拜问题”对待，而不是

作为产生这种崇拜的苏联制度的那些方法和实践的问题来对待。但是，苏联领导人现在正好最不乐意对他们的制度作批判性的检查。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方案业已束之高阁。苏联党的书记为教条主义者们，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将军们所逼迫，突然又自称是斯大林主义者。

1957年8月，当铁托再次秘密会晤赫鲁晓夫时，他问苏联党的书记，为什么一再公开攻击南斯拉夫。赫鲁晓夫以"策略上"的考虑为由，表示歉意。苏联领导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南斯拉夫，以铲除1956年四处蔓延的病灶。现在的口号是：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主要的危险——而南斯拉夫是这个修正主义的旗手。

1957年十月革命节，苏联人邀请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南斯拉夫人派遣一个由铁托的副手爱德华·卡德尔率领的代表团。苏联人邀请"执政"的共产党参加一次特别会议，紧接着，所有共产党，包括执政的和非执政的，应该通过一项"和平宣言"。相反，各执政党应发表一个特别的宣言，批判"修正主义"，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

南斯拉夫人从一开始就决心不参加"执政"党的会议，不签署那个宣言。相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签署了相对来说没有约束力的六十四党的宣言。

卡德尔向苏联人解释，南斯拉夫人为什么不能参加十二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北越，东德，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会议：第一，宣言包含关于军事集团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观点，它们是违背贝尔

格莱德的立场的；第二，南共联盟对苏联作用的看法，不同于宣言所阐明的观点；第三，宣言谈到反对修正主义——而这是对南斯拉夫的"间接批评"。

赫鲁晓夫表示对南斯拉夫的这一立场不能理解。他对卡德尔说："如果你们公开承认，为了捞取援助，你们推行一种谄媚美国人的政策，那么，事情就妥贴了，我们就能一致……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这里牵涉到原则性的原因——牵涉到贯彻某种独立自主的政策——，那么，对待我们的态度就不可避免地要更加严厉。"随后，赫鲁晓夫说了那句关键性的话："我们承认独立，然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政策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个连队终究是一个连队，一支军队终究是一支军队。"南斯拉夫人为了显示他们的独立，摆脱"谄媚"美国人的指责，宣布废弃美国的援助。几乎在同时，他们在德国政策上也迁就苏联人。在这之前，南斯拉夫是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持外交关系，而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关系的唯一的共产党国家。现在，贝尔格莱德同东柏林建立关系。当然，起初建立一个公使馆，而不是大使馆。结果同波恩断绝外交关系。波恩当时是按照哈尔斯坦主义①的规则行事的。也就是说，铁托出自思想政治原因，忍痛割爱，不得不严重恶化同一个最重要的西欧国家的关系。他牺牲通向波恩的政治热线，以求得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讨论时，能够喘口气。纵令如此，这一步骤也未能阻止同苏联和东方阵营的意识形态

① 1955年，瓦尔特·哈尔斯坦提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一切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断绝外交关系，这个方针叫哈尔斯坦主义。1973年，两个德国签订基础条约并加入联合国，哈尔斯坦主义被彻底放弃。——译注

关系的急剧恶化。象1948年一样，苏联又没有恪守信贷诺言。当然，这次铁托试图不让在国家关系一级发生冲突，把它局限在"意识形态的讨论"上。

1958年4月22日至26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卢布尔雅那举行。这是共产党情报局冲突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南斯拉夫党代会。会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通过了他们的新党纲。第二次同莫斯科闹翻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大使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南斯拉夫党首次把工人代表委员会和"社会主义的自治"，以法律形式，写进新的纲领，同时对苏联进行批评。纲领写道，虽然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里，为其他党树立了"自己行动的榜样"，它也给了南斯拉夫革命的工人运动以强大的推动。但是，俄国的国情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家机器的手里，而这又产生了官僚主义、错误和变质。现在，南斯拉夫人倒打一耙，责罪莫斯科"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挺身顶住这样一种压力，为他们的国家的独立而奋斗，他们不仅赢得了自由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权利，而且也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和在发展同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对防止官僚主义，防止僵化和蜕化变质作出贡献。"共产主义者联盟是这样总结同斯大林的纷争的。很清楚，南斯拉夫人不仅坚持他们的立场，不仅是不知忏悔的罪人，而且还傲慢自负地对苏联品头评足，进行叱责。

随着1958年夏天处决匈牙利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伊姆雷·纳吉，苏联人发出开展一个反南运动的信号。这个运动

似乎又破坏了 1955 年会晤以来铁托和赫鲁晓夫所实现的一切。

尼基塔·赫鲁晓夫利用 1958 年的保共“七大”，对铁托进行清算；而不久前，他还向这位铁托赔礼道歉，并向他讨教过。保加利亚人是铁托的宿敌，他们正好又开始几乎不加掩饰地提出对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领土要求。保加利亚党的干部是按斯大林主义的精神受过严格教育的。在他们的笑声中，赫鲁晓夫指责南斯拉夫人得到美援，说他们过去接受，现在也仍然在接受美援。但是，既然帝国主义者们不会为了任何一个人的“美丽的眼睛”而给他钱，总得有报偿的——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给“帝国主义”的报偿不是别的，正是葬送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赫鲁晓夫对保加利亚人说：“当代修正主义(作者按：指南斯拉夫党及其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洛伊木马。修正主义者企图从内部瓦解革命的政党，破坏团结，搅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1956 年，赫鲁晓夫为了铁托的缘故，解散共产党情报局，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不公正的罪名罗织。现在，1958 年 6 月，同一个赫鲁晓夫又给这个机构恢复名誉：在“一定时期内”，共产党情报局起着积极的作用，1948 年夏天情报局第一个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此外，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在“反革命叛乱”期间，成为那些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力量的一个中心。

现在，赫鲁晓夫这样绘声绘色，仿佛南斯拉夫人为伊姆雷·纳吉提供暂时的避难，就能证明南斯拉夫实际上积极参加布达佩斯的“反革命暴动”。纳吉是当时合法的匈牙利总

理，而且在骚乱期间得到苏联人的赞同才任用的。赫鲁晓夫只字不提 1956 年 11 月 2 日他对铁托的访问。铁托早已在政治上抛弃不幸的伊姆雷·纳吉，并和苏联人一致同意任命卡达尔。对此，赫鲁晓夫也缄默不语。现在，这一切都不堪入画。匈牙利事件和波兰的十月，使民族共产主义高涨起来，使它的拥护者们想入非非。在进军清算民族共产主义之梦时，苏联党魁不得不指责南斯拉夫，说它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追随南斯拉夫的道路。而南斯拉夫的道路，除了工人代表委员会和内政方面其他可疑的"修正主义"因素外，首先是从苏联霸权下解放出来的道路。

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南斯拉夫的潮流，汹涌澎湃。在战火纷飞的东欧，整个老的斯大林卫队开始摩拳擦掌。政治局候补委员代斯泽·奈迈什在匈牙利党的刊物《社会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其中引用约瑟夫·斯大林的话。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头头瓦尔特·乌布利希问罪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专家、铁托的副手卡德尔，说他不是把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劳动人民的民主利益和"官僚主义独裁"之间的所谓矛盾，看作主要的矛盾。①

这一切对南斯拉夫人是一个痛苦的教训。但是，对赫鲁晓夫则是一个策略大游戏。他不得不打击南斯拉夫人，以保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束缚住中国共产党人。

当时，中国人开始揣测，拒绝给他们分享苏联原子弹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共处政策的范围内，一心只想搞同美国人的大

① 引自《修正主义——主要危险》文集，莫斯科，1958 年版。

协作。北京尽管谈论战事和世界革命，它首先想防止美苏联合，这种联合必然针对中国。既然赫鲁晓夫的共处政策是美苏和解的基础，就必须反对，必须把它描绘成在意识形态上是格格不入的。北京必须迫使苏联人同美国对峙，使任何美苏合谋成为不可能。按照这样看法，苏联人必须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巍然屹立，而不应该同腐朽的帝国主义作任何妥协。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同西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谈论"积极共处"的必要性。中国人感到，共产党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妥协者。它可能用这条相同的路线，认可了苏联人的做法：这是一条只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危害的路线。

现在，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态度，就同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久，南斯拉夫人对待苏联人的态度一样：中国人想给苏联人规定世界政治的速度和方向。

然而，赫鲁晓夫不是斯大林。如果说，后者都未能制服南斯拉夫，那么，他的继任者怎能对付得了巨大的中国呢？于是，苏联党魁采取机会主义的解决办法：他牺牲南斯拉夫人、牺牲铁托，以便同中国人和毛泽东达成一致。

但是，很奇怪，苏联人和赫鲁晓夫本人并不感到南斯拉夫人特别坏。似乎贝尔格莱德已经理解，铁托的老对手由于中国人而陷入巨大的困难之中。南斯拉夫人似乎相信，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定能追随他们的共处方案，开始同西方对话。然而，在中国人看来，事情是这样的："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

世界问题。”①

在这里，“意识形态辩论”的指桑骂槐功用特别明显。北京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争吵，意在苏中关系。1960年4月，列宁九十诞辰之际，苏联和中国的观点首次公开冲突：苏联人把列宁作为“和平共处”的发明人来庆祝，中国人则把他看作暴力革命的拥护者。1960年6月，在一次南斯拉夫没有参加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布加勒斯特协商会议上，赫鲁晓夫严厉攻击中国共产党人，称他们为“渴望发动一次战争的疯子”，“托洛茨基分子”和“民族主义者”。赫鲁晓夫用他那特有的形象而粗鲁的语言，对中国提出了指控。其他东方集团的发言者，当时称中国人为“左倾冒险主义者”，“比南斯拉夫还坏”。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莫斯科的同盟者中国突然变为死敌——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个死敌虽然尚未成为朋友，却变成较小的祸害。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再次召开共产党会议（这次南斯拉夫根本没有参加）。这是苏联人和中国人还在同一张桌子旁相对而坐的最后一次这类会议。中国人拒绝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和非暴力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从外表看来，分歧再次被艰难地掩饰起来，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声明再次抨击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然而，当中国共产党引用南斯拉夫的论据时，争端的真正性质水落石出了。人们突然从“国际主义”的、激进的北京口里，听到了民族共产主义的论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北京的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这样写道，“任何一个兄弟党，不论它的地位多么重要，它的作

①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第21页。——译注

用多么大，它的决议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只能对它自己一个党具有约束力。按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准则，不能容许把一个党的纲领、决议、方针、政策，强加于其他兄弟党……要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1]

因此，“民族共产主义”进入一个辩证的时期。“南斯拉夫”路线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了。在六十年代早期，特别是在莫斯科的第二十二次党代会上掀起第二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之后，南斯拉夫人和铁托适应莫斯科实力政策的利益。这时，中国和小小的阿尔巴尼亚，不久还有共产党的罗马尼亚，开始奋起反抗莫斯科的霸权政策。

这肯定不意味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服从于苏联的政策。这也不是说，苏南之间缺少大大小小的宣传战。然而，总的说来，现在开始了一个贝尔格莱德支持苏联政策和猛烈批评西方的时期——从德国问题到近东问题，统统如此。西方国家还生活在赫鲁晓夫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和这位生性活泼、不可忖度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其他强烈攻击的阴影下，这时候，南斯拉夫在世界政治中是作为莫斯科的代言人出现的。1961年9月，不结盟国家在贝尔格莱德集会。在这个第三世界的讲坛上，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首脑虽然谴责了戴高乐和法国人的原子政策，但是，一天前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一次巨大的核武器试验，因而废除迄今一直有效的美苏关于原子试验协定，却得到铁托的谅解，甚至连温和的责备都没有。

在这里，南斯拉夫党的首脑也再次采取策略的态度；现

①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第15页。——译注

在，也再次显示出他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特殊关系"。1955年以来，铁托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国家元首纳赛尔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元首苏加诺，一起组织这个不结盟的亚非国家的第三世界。然而，首先证明，作为共产党人，铁托同样也长年怀着想对共产主义世界发挥影响的密而不宣的愿望。在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深处两种思想不只一次地"同室操戈"。不过，西方往往设想，铁托采取这种态度，是为了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怀抱，这种设想是错的。铁托不愿意对莫斯科俯首贴耳。他的目标远为雄心勃勃：他想让莫斯科按照他的意见行事。

1961年9月1日至6日，二十五个国家的"不结盟"的国务活动家参加贝尔格莱德会议。不过，"不结盟"的方案，应该为铁托争取独立自主、摆脱两个超级大国的监护效力。因此，他在会上声明，这个合作必须使大国认识到，"世界的命运不许可只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那时，这个命运却为苏联原子爆炸的阴影所笼罩，赫鲁晓夫某种程度上把这次爆炸作为会议开幕的献礼。然而，苏联报界和宣传表明，克里姆林宫的人们是如何评价不结盟的：他们竭力否定这次会议。

几星期之后，随着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在莫斯科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第二个浪潮。此时，斯大林的遗体被从红场上的陵墓里搬走；在这之前，他一直同列宁一起，躺在另一个水晶棺里。现在，莫斯科同中国人及其阿尔巴尼亚朋友之间的冲突公开爆发了。虽然苏联党魁再次张牙舞爪，谴责南斯拉夫人，铁托却忍辱负重，镇静自若。在贝尔格莱德，人们知道：如果莫斯科反对斯大林，不可能同时反对南斯拉夫人。

铁托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下一次会晤于1962年12月举行。铁托又前往苏联"休假"。这次他遇到的是一个已经为国内权力之争所拖累和为古巴的失败而受煎熬的赫鲁晓夫。苏联人不得不从古巴撤出他们的火箭。赫鲁晓夫似乎要引退，而且变得聪明了。南斯拉夫的目击者们为我们留下他同铁托之间的下述对话：

"尼基塔同志，您想从这个见鬼的阵营得到什么？"（铁托指的是"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坚持它的统一，而南斯拉夫不想加入它。）

接着，赫鲁晓夫摇一摇手，说道："阵营是不必要的。"

"他终于明白了"，铁托想道，然后对赫鲁晓夫说："为什么我们的相互关系必须贴上阵营的标签呢？我们是共产党人，您们也是共产党人，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共同行动，因为我们的利益是相同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世界和平。在这里，我们不需要阵营，因为这只能有害于您们和我们。"

赫鲁晓夫说："同意……我们必须把这放在另一个基础之上……"①

确实，"阵营"变化了：中国业已退出。同北京的冲突，就象压在赫鲁晓夫心灵上的一场恶梦。苏联党魁已经开始考虑，他能如何向西方争取活动余地。这导致尼基塔·赫鲁晓夫考虑改善同波恩的关系；他垮台前不久，还在操劳着如何在同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上打开新的篇章，并打算亲自实现波恩之行。他已打发他的女婿阿朱别依作先遣。此公在科隆大教

---

① 什塔武布林盖尔：《铁托的历史，不是斯大林主义》，贝尔格莱德，1976年，第237页。

堂前，侃侃而谈保卫西方国家，防范蒙古游牧民族。很清楚，这里指的是中国。

不过，让我们再次回到前面的议题：赫鲁晓夫和铁托之间的互访外交重新高涨，如同在1955年和1956年一样。1963年夏，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又在南斯拉夫出现。这一次，这个俄国人甚至喜欢工人代表委员会。在他第一次访问贝尔格莱德时，毋宁说工人代表委员会还激怒了他。

"我喜欢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形式，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南斯拉夫的自治经验令人感兴趣，对苏联可能有用处……"①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样滔滔不绝，而在苏联机构里，他的对手们就这样凝神谛听着。苏联的教条主义者，"牛皮大王"们和其他旧方针的追随者们，简直就怀疑赫鲁晓夫想把南斯拉夫的某些习俗引进苏联的政治。经济权力下放给区域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哈尔科夫经济学讲师利别尔曼计划的一种社会主义市场机械论的辩论，此外，还有它那越过"机构"直接同人民交往的极不平常的和使干部们忧心忡忡的方法，这一切，在赫鲁晓夫的批评者和竞争者看来，仿佛是拿着等级制度开玩笑。而且，还有苏联的将军们和元帅们，他们为赫鲁晓夫的普遍裁军和取消军队的宣传所激怒。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以自己的方式，分别成为共产主义世界和世界共产主义的最不平凡的领袖之一。两人还在列宁格勒最后会晤一次。这次，铁托是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时顺道走访的。那是1964年

① 什塔武布林盖尔：《铁托的历史，不是斯大林主义》，贝尔格莱德，1976年，第237页。

6月8日。这次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任何保留了。这位南斯拉夫人声称，在所有的问题上，他同赫鲁晓夫都达成一致。现在没有意见分歧，将来也不会有。

铁托的这种提法是完全正确的：诚然，同他曾经想象的不一样。因为几个月之后，这个名字叫做赫鲁晓夫的苏联党魁不复存在了。当三位宇宙航行员还乘坐《日出》号宇宙飞船，绕着地球遨翔太空时，当中国人在新疆进行他们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时，这位捣毁斯大林塑像的斯大林继承人，"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而被废黜退休了。这样一来，铁托失去了他在莫斯科的伙伴。虽然起初外表上毫无变化，虽然党的新首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政府的新首脑阿列克赛·柯西金，向南斯拉夫人，向共产主义世界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所有国家保证，将一如既往，一切不变，但是，正好在有关莫斯科同贝尔格莱德的关系问题上，很多方面却迥然不同。

铁托非常谨慎小心，以免使人清楚地察觉，他对他的共产主义的"同一乳母的兄弟"在莫斯科垮台感到失望。南斯拉夫无法挑选它的克里姆林宫伙伴。然而，在同当时去贝尔格莱德访问的比利时外长保尔·亨利·斯帕克谈话时，铁托透露了他的某些怀疑。铁托反对苏联正式说明的撤换赫鲁晓夫的理由。赫鲁晓夫既没有病也不太老。赫鲁晓夫比他铁托本人年轻。在1964年12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铁托再次谈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虽然在最后几年有过一些失败和错误，但是，在他担任党和政府首脑期间，在非斯大林化和公民言论自由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为保卫世界和平建树了伟大的功绩……利用这个机会，我不得不强调，他为

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和改善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不言而喻，这不是他一个人做的，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对此也赞同，但是，不论苏联政府还是苏联人民，对他在这些问题上建树的功勋，是没有争议的……"

这是明白无误地提醒赫鲁晓夫的继任者，要他们继承赫鲁晓夫的精神——至少在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上应该如此。后来，铁托对他的亲密的同事说，在斯大林死后，唯独赫鲁晓夫有勇气到南斯拉夫来，承认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似乎随着赫鲁晓夫的垮台，铁托的世界共产主义之梦也做完了。也许，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指出，对南斯拉夫和铁托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三个决定性的转折点：1948 年同斯大林冲突的爆发，1955 年同赫鲁晓夫的和解和 1964 年赫鲁晓夫时代的结束。纳赛尔时代开罗最有影响的政论家之一，埃及新闻记者哈桑宁·海卡尔报道说，埃及国家元首纳赛尔有一天问赫鲁晓夫，为什么苏联人能容忍埃及的"不结盟"，而不想接受铁托的"不结盟"。赫鲁晓夫回答："因为如果铁托有成就，将击中我们的集团。但是，如果您有成就，您将因此击中另一个集团。"

因此，对赫鲁晓夫来说，象南斯拉夫推行的那种不结盟，是瓦解或削弱西方的手段。与此相反，对南斯拉夫来说，这种不结盟是在东西方之间图生存的药方。在 1964 年以后的岁月里，这一点有时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在初期，同苏联相处，世界似乎也相安无事，甚至比相安无事还好一些。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代，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意识形态论战停止了。苏联人现在把南斯拉夫看作在思想上、政治上反对中国的同盟者。南斯拉夫以一种在西方引起沮丧、

疏远和忧虑的方式，实行与莫斯科同化的政策。昔日由美国人供应武器的南斯拉夫军队，改建为依靠苏联的武器和器械。南斯拉夫成为经互会的观察员。1967年，南斯拉夫的军人首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华沙条约集团的演习。同年，以色列人发动反阿拉伯人的六天战争，使铁托以戏剧性的方式靠拢东方集团。以一阿开战之后，铁托立即飞往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商议。苏联空军在飞往埃及途中，有权飞越南斯拉夫领空，甚至有权作中途停靠。铁托第一次重新参加一次东欧党和政府首脑的多边会晤，会议以许诺"在反抗以色列侵略的战斗中"支持阿拉伯国家而告终。

然而，不论铁托如何迁就苏联人，这也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游子回头，而是一位不结盟的国务活动家，试图挽救另一个不结盟的国务活动家，使他免遭政治和个人的灾难。他同纳赛尔的个人关系密切(纳赛尔终究是他多年的政治搭档)。铁托是一位非常善于冷静思考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知道，阿拉伯人绝不能抵御以色列的军队。他也知道，以色列一旦摧毁埃及，将会给"不结盟"世界以致命的打击。如果以色列人进军开罗，铁托所主张的第三世界的第三条道路，将致命地陷于困境而大伤体面。在这个意义上，铁托的下述说法肯定是对的。当这位南斯拉夫元帅后来在为他的举动辩护时说，帝国主义势力想借助向西奈进军这类"局部战争"，扩大其统治范围，南斯拉夫也因此受到威胁。实际上，南斯拉夫是受到威胁的：以色列人不知不觉地，并非出自本意地，接连不断地暴露不结盟世界实力政治的基本弱点。但是，铁托此时试图施展他的天才手腕：他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苏联人能有所帮

助。由于他迁就苏联人，向他们开放南斯拉夫领空，推动勃列日涅夫提供强有力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援助，南斯拉夫党的首脑帮助在中途重新恢复近东的均势，保全埃及免于陷入无法挽回的丢脸地步。就1976年的前景看，甚至可以补充说：由于他求助于勃列日涅夫，铁托为埃及纳赛尔的接班人安瓦尔·萨达特的亲美转变创造了前提。这个转变不是别的，也是重建均势和挣脱过紧的搂抱的一种尝试。

诚然，铁托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无论如何，在1967年，他并不想使莫斯科成为近东的主人。相反，他的意图是，纵使不能使莫斯科和美国人离开地中海，也应使他们在那里保持一种均势。但是，正是铁托的这一步棋，没有得到他的几个下属的理解。在共产主义者联盟最高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里，“老头子”挨了批评，因为他自作主张前往莫斯科，事先未同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商量。法国人和犹太人血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时的外交部长马尔科·尼凯集奇，感到铁托的亲阿拉伯态度太片面。尼凯集奇认为，南斯拉夫的固有利益应在欧洲寻求；亚洲和非洲的不结盟政策最多只能作一个补充保证，永远不能成为贝尔格莱德政策的主题；作为一个穷国，南斯拉夫不能从第三世界更穷的国家里期待任何东西。此外，尼凯集奇看到铁托的冒险的平衡政策，有使南斯拉夫过于贴近苏联集团，因而深受莫斯科影响的危险。

在1967年近东战争的日子里，那个五年后铁托称为“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业已形成，经过激烈的斗争，铁托剥夺了这个派别的权力：这就是多年领导南斯拉夫外交部的三个人：马尔科·尼凯集奇首当其冲，由于在近东问题上

同铁托意见相左，他被解除外长职务，调任塞尔维亚共和国党组织的书记；此外，尼凯集奇在外交部的继任人米尔科·特帕瓦兹；以及这两人的前任科查·波波维奇，他是一位老游击队司令员，在这两人垮台后，自愿退出公众生活。

1967年夏天，铁托的亲阿拉伯的近东政策和不得已而为之的亲苏的近东政策，引起争论，这在两件事上表现出来。以色列—阿拉伯战争打响之后不久，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群众性组织——"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在一次领导班子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声称这个组织的八百万会员，对南斯拉夫舆论工具在近东战争期间，习惯于"用一边倒的极端态度来解释国际事件，越来越不满意"。南斯拉夫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之后不久，南斯拉夫前驻特拉维夫大使约热·泽姆尔亚克，写信给贝尔格莱德的党报《战斗报》，抗议该报发表题为《人们如何成为侵略者》的连载文章。泽姆尔亚克怪罪报纸，说它勾勒出一幅十分片面的和错误的以色列形象。接着他作如下声明：

"在以色列执行使命的四年期间，我得出结论，近东的犹太人成功地组织一个具有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现代化国家。我认为，正是现在说出这一点是重要的。任何想对未来关系作分析或预言的人，都必须从这些事实出发。如果他想把推测建立在自己幻想和愿望的基础上，那则另当别论。"

这封同南斯拉夫官方路线明显对立的信，在《战斗报》上发表。① 因为共产党的报纸绝不能象在西方那样，读者来信可

① 《战斗报》，1967年8月17日。泽姆尔亚克批评的《战斗报》的连载文章，副标题为《以色列如何利用历史和圣经传统发展其帝国主义精神的》

以自由发表观点，这就证明：在外交机构任职的泽姆尔亚克（而且同尼凯集奇并不疏远），有一些有影响的朋友，他们不是掩护他，就是派他打头阵。（此外，参看下一章关于南斯拉夫内政的发展。）

谁观察勃列日涅夫时代头几年铁托和南斯拉夫的"亲苏阶段"，当然必须考虑到下面这一点：贝尔格莱德在世界政治问题上靠拢苏联的同时，这个国家的内政和经济政策开始一个新的发展，它把南斯拉夫的制度引向完全不同于苏联和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方向。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垮台，导致一切改革的终结，苏联的一切经济改革计划、经济权力下放计划（也包括哈尔科夫经济学讲师利别尔曼），消声匿迹了；而1965年，在南斯拉夫则开始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伟大改革——迄今为止在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前所未有的实验。这一经济改革导致国家的邦联化，导致各共和国影响的增强，甚至几乎导致一种"社会主义的多元主义"。1966年夏，邦联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势力成功地推翻了最高领导层的铁腕人物、秘密警察的头子亚历山大·兰科维奇。接着，广泛剥夺了国家保安机构的权力——即开始了南斯拉夫内政的自由主义阶段。这个阶段持续到1971年12月，铁托迫使克罗地亚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下野为止。

因此，这又是一项铁托主义的平衡行动：外交上接近莫斯科，内政上自由化和摒弃苏联的样板。也许，此时已不年轻的铁托，正是想凭借这种结合，争得他所需要的活动自由，以稳定变化迅速的、因而也是危机四伏的南斯拉夫社会。这位党的首脑肯定在冥思苦想，在铁托之后和没有铁托的时代，南斯

拉夫将何去何从。战时和战后的许多伟大的梦想业已烟消云散。也许，铁托希望，苏联新领导在苏联内政和调整同西方的关系上，将会应接不暇，莫斯科会让南斯拉夫安然无事的。铁托和苏联新领导虽有很多共同点，但显然未能象与赫鲁晓夫那样亲密无间，那样用个人的同情和特殊形式的友谊互相联系着。

但是，事实表明，东方集团事态的发展再次使铁托的计划成为泡影：在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提尼政权崩溃；迄今为止，那里的教条主义的党的领导，一直企图避免莫斯科非斯大林化的后果。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尤其是席卷了共产党。率领捷共代表团出席贝尔格莱德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杜布切克还是一个完全不出名的青年人。现在，他成为布拉格党的首脑。他宣传的"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立即赢得南斯拉夫人的巨大同情。在布拉格，共产主义制度的形式，似乎终于出现了松动和变化。这是符合贝尔格莱德的口味和期望的。南斯拉夫同罗马尼亚领导的某些民族共产主义的共同利益日见明朗，但在内政方面，与其说罗马尼亚追随南斯拉夫的榜样，毋宁说它效法苏联的范例。正因如此，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比罗马尼亚更加命定地成为贝尔格莱德在东方集团中的理想伙伴：因为，在不讨人喜欢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后，这个国家是欧洲第二个发达的共产党国家，它所具有的工业传统，训练有素的工人队伍和社会结构，在南斯拉夫，只有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北部的最先进的地区，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此外，它是一个斯拉夫国家，曾经同南斯拉夫的若干民族，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奥地利国家联盟之中。对南斯拉夫

来说，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是绝无仅有的天赐良机，因为，布拉格罢黜诺沃提尼教条主义集团和这位新人物的走马上任，不是在南斯拉夫同苏联对峙的时候，而是在似乎关系良好的标志下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模式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似乎也为贝尔格莱德开辟了新的前景。起初，甚至好象杜布切克是一个得到勃列日涅夫信任的人。也许匈牙利事件对铁托也是个教训。他在1956年陷入两头落空的危险之境，因为，他时而欢迎匈牙利的变革，时而把它作为反革命事件加以谴责，在苏联干涉的问题上，他也采取前后不一的评判（谴责俄国军队对布达佩斯的第一次干涉，赞同第二次干涉为“较小的坏事”）。

无论如何，铁托报告说，他在1968年这一次曾经告诫苏联领导，切勿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采取任何武力和军事的解决办法。他从远东旅行归来时，在莫斯科逗留，在这里会晤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政治局的其他成员。1968年8月23日，铁托在中央委员会上报告说，他当时告诉苏联的领导人：“请您们不要试图通过武力达到某种目的，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局面，这是不好的。”铁托补充说，从那时以来，经常把南斯拉夫的立场告知苏联人——这种立场根本没有改变过。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努力，给南斯拉夫同东方集团和苏联的关系带来新的转折。既然南斯拉夫的政策有助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它势必同拒绝这种改革的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发生冲突。苏捷在切尔纳（施瓦尔茨瑙）举行谈判之后，铁托告知苏联党魁勃列日涅夫，捷共的新的改革方针，“在客观上是必要的”。依铁托之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

义共和国的事态发展，为在世界上传播社会主义，又迈出一步。这样，铁托就采取了同莫斯科共产党的领导十分不同的态度。东方集团领导人同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的最高层领导在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会晤之后，1968年8月初，铁托采取了示威性的步骤，以便帮助杜布切克和他的小组，1968年8月10日，他前往布拉格。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欢呼声中，他向杜布切克保证，南斯拉夫将作为改革的后盾。诚然，在密谈时，他告诫捷共领导人，不要走得太远，考虑到苏联的情况要放弃若干计划中的改革。铁托详细阐明莫斯科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它的所谓"演习部队"，依然未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撤出。

尽管如此，倘若铁托知道，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之春"的挽歌，苏军入侵就在眼前，杜布切克很快就被捕，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很快就被绑架到莫斯科，那么，他将不会访问布拉格，不会拿自己的威望作赌注。铁托访问之后不久，罗马尼亚党的首脑齐奥塞斯库也出现在伏尔塔瓦河畔。实际上，他是访问尚未被占领的(或尚未被公开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后一位国宾。

铁托，杜布切克和齐奥塞斯库，现在在世界共产党的国家范围内，组成一个类似"民族共产主义的小同盟"。而且，他们三人从前曾经在同一地点邂逅：赫鲁晓夫垮台之后不久，在1964年贝尔格莱德参加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时还不出名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率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当时同样还不突出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率领了罗马尼亚代表团。也许这一情况已经足以使苏联人嗅到一个

修正主义的阴谋。

在对布拉格进行闪电式访问期间，铁托声明，任何干涉其他国家事务都于社会主义有害。这是对华沙条约集团五个国家（不包括罗马尼亚）的一种斥责，这五个国家在给布拉格领导的信件和经常的宣传运动中，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们表示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对铁托来说，它就是"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试验。况且，1968年似乎不能与1948年同日而语。当时南斯拉夫孑然一身，孤军作战。这一回，在东方集团里，至少有罗马尼亚与贝尔格莱德提出相似的论调。齐奥塞斯库说，谁也无权垄断绝对的真理——这个"谁"正是指苏联。

但是，莫斯科及其仆从国8月21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南斯拉夫领导感到突如其来，虽然贝尔格莱德在此之前对和平也不完全相信。铁托谈到"严重的忧虑"，谈到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践踏。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和执委会的措词更为尖锐：苏联人侵不仅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进攻，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是在入侵的当天说的。南斯拉夫政府（联邦执行委员会）在一天之后发表声明，指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的，尤其是没有任何人威胁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也没有感到自身受威胁"。

关于苏联干涉布拉格的严重后果，整个南斯拉夫领导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很清楚，8月21日使那些早就一直对莫斯科持特别严峻的态度的上层领导干部占上风。这里甚至可以看到，在八月的那些时日里，铁托和他的几个下属之间的某些

分歧。比如，在干涉的消息公布之后没有几个小时，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首脑在他的第一次表态时说，南斯拉夫人民应该保持"沉着与冷静"。因此，也不允许示威游行，示威游行可能"变为形形色色的挑衅"。铁托显然担心，抗议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国内可能发展为自发的反苏浪潮，因而存在着变为"反社会主义"的危险。作为老派的列宁主义者，他始终对任何形式的"自发行为"都怀有深刻的疑虑——即反对那些党无法控制的运动和示威。仅在几个月之前，同"布拉格之春"一唱一和，在贝尔格莱德大学里也发生过极左派的骚乱。贝尔格莱德的大学生，以西欧和美国的大学生的抗议为后盾，高举着红旗，有的扛着新马克思主义的煽动性的标语口号，有的也扛着毛泽东主义的煽动性的标语口号，举行集会，反对铁托主义的消费社会。贝尔格莱德差一点酿成流血事件。于是，铁托从中干预，他声明，大学生的要求是正当的。他用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平息这次风潮。因此，铁托厌恶游行和游行者，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显然是其他领导成员说服了他；不让举行反对布拉格事件的游行是不可能的。何况在举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游行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曾经是听任"人民的愤怒"——当然，这种愤怒事件本身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自由表露的：在 1960 年的刚果事件时，"愤怒的公民"竟捣毁了比利时大使馆。

的确，人们不敢进攻苏联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然而在南斯拉夫的首都，总还举行过一次声援大会。会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杰出的"反苏分子"之一，执行委员会书记

米亚尔科·托多罗维奇讲了话。托多罗维奇用激烈的言词抨击苏联。他说，这次入侵"玷污和亵渎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崇高红旗"，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处在危险之中。"人人皆知，外国军队不是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保卫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托多罗维奇说道，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受到任何人威胁，它也没有感到受威胁。"显而易见，这是企图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运动的再生，阻止发展民主的方针的实施。根据工人阶级的意志和要求，捷共今年 1 月开始推行这一方针。"

铁托本人在捷克问题上，毋宁说是采取克制的态度。这是值得注意的。这一点有别于他的罗马尼亚同事齐奥塞斯库，后者亲自出席布加勒斯特的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热情洋溢，慷慨陈词，充满爱国主义，强烈抗议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当然，铁托捍卫了走"自己道路"的权利，他给予杜布切克以道义上的支持，他甚至在苏联入侵之后，接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总理和经济改革家奥塔·希克。然而，在一种普遍抗议的气氛中，铁托再三强调，必须"冷静"地判断事物。比如，他虽然接受米亚尔科·托多罗维奇关于"无产阶级的红旗被玷污"的比喻，但他同时在 8 月 23 日的中央会议上暗示，人们能把红旗再洗干净，虽然这比 1948 年以后发生的事件还要困难。他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反正是丢失了：布拉格不能期待西方的援助，中国相距太遥远而且太弱，东南方的两个独立的共产党政权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不得不看看它们自身如何渡过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过分刺激苏联，铁托感到是不可取的。必须使苏联人明白，南斯拉夫人不是捷克人——这就是说，他们不会毫无战斗就垂手让人占领。南斯

拉夫不得不试图竭力为齐奥塞斯库撑腰，他可能是苏联干涉名单上的下一位候补者。此外，必须向苏联人试探，“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的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南斯拉夫是否也应该服从它。铁托不想关闭同莫斯科谈判的大门，因此，他支持杜布切克和他要求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只能是暂时提提而已。如果俄国人不想离开布拉格，南斯拉夫也不能改变分毫——不管怎么说，还得同苏联人继续生活下去。

确实，起初全国准备奋起反抗。华沙条约集团的军队入侵布拉格的消息几乎还没有公布，南斯拉夫的部队就已经向匈牙利边境运动。桥梁、战略设施和机场都采取安全措施——首先是避免象布拉格机场上发生的那种来自空中的突然袭击。军事防卫的布局表明，象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国家，多么容易成为它自己的政治原则的牺牲品：现在，必须从警戒“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意大利边境上，向东部和东南部调动大批的部队。

苏联人为入侵布拉格辩解而编造的“勃列日涅夫主义”①，是在戏剧性的布拉格事件之后几天，即1968年8月24日，由莫斯科的《真理报》阐明的。根据这个主义，象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拯救社会主义——甚至通过外部的干涉——优先于形式上的主权。保卫象莫斯科理解的那种共产党的社会制度，比民族的独立更为重要——据说，

---

①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提法是西方新闻界创造的一个简单公式。实际上，这个“主义”直到今天仍未被苏联领导所否定，它不是由那个党魁个人提出来的。

还有一种可能引向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制度”的独立。关于莫斯科有权保卫其他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的规则，本身并不新鲜。在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上，赫鲁晓夫早就这样论述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同苏联结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不容许触犯的。在匈牙利，共产党政权也以这种方式得到拯救和重建。在波兰，1956年10月的那些戏剧性日子里，这样一种可能性已近在眼前，只因哥穆尔卡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才得以排除。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例子的新鲜之处在于，莫斯科急不可耐，未能象1956年在匈牙利那样，等到一个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工农政府”在形式上请求援助。华沙条约集团干脆出动大军，逮捕一个在共产党意义上是合法的却不适合自己口味的执政党领导和政府。一位南斯拉夫政论家是这样阐述由此得出的结论的：“苏联是最大和最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给它权利，按照自己的观点，宣布自己的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和可能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的真正本质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服从苏联和它的利益。无论如何，这个政策并不新鲜，在斯大林时代，我们就很好地领教过它。它对国际关系、对自由和对较小国家的主权的危害性，是一目了然的。”①

现在，很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才明白，苏联和东欧集团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事，是一份危险的赠品。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的公式声称：铁托的政权不是社会主义

① 亚奈兹·斯坦尼奇：《不忠顺的捷克斯洛伐克》，卢布尔雅那，1969年，第128页。

的，不仅如此，南斯拉夫已经投奔敌对的反动派阵营，帝国主义的阵营，甚至投奔公开的法西斯阵营。不过，谁要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在他那里也就不再有社会主义可以"拯救"；"有限主权论"的标准就不适用于他。但是现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已争取到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承认为共产党人。自从1968年8月21日至今，苏联的这种态度正好模糊了阵线和界线。因为，假如象现在所说的，南斯拉夫人基本上是共产主义者，不过，他们在意识形态的某些细微末节上有各种不同的错误，那么，这正是一份邀请帮助消灭这些错误的请柬。因此，在"布拉格之春"以后的漫长冬季里，南斯拉夫人突然省悟到，原来，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承认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严格地说，并无多少补益，尤其是再也没有形式上的西方安全保障，美国人突然称铁托的国家为"灰色地区"——不知道原来是属于谁的地区。

无论如何，苏联的宣传又开足马力攻击南斯拉夫了。后来甚至谈到一个北京—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地拉那轴心，据说，它要埋葬社会主义大家庭。同匈牙利事件相似，人们企图给铁托加上布拉格反社会主义现象的"同案犯"的罪名。当然，保加利亚再次提出马其顿问题，索非亚至少使人看出，可能在拯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的进军中，也把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居民解放出来。

因此，南斯拉夫不得不再次试图谋求幸存。人们发明了"全民总体防御"，重新发现把游击战争作为威慑手段。任何入侵军队都必须预计到，它不仅要遇到正规军的抵抗，而且要遇到游击战争和总体抗战的新形式。这个前景应能防止苏联

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成为入侵者——实行冒险计划。

但是，除此以外，"布拉格事件"对南斯拉夫的国内气氛也发生了影响。它进一步加强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那些主张松动、自由和同东方集团保持距离的势力。1969年，在南斯拉夫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这一点是清晰可见的。当时，共产主义者联盟再次受到东方集团所有兄弟党——罗马尼亚除外——的抵制。到1968年末，对苏联可能向南斯拉夫发动"闪电式的进攻"的担心平息下来之后，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震动，使新的希望破土而出。按照新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精神，人们相信，已经看到历史规律性在发生作用，这种规律性最终将证明南斯拉夫立场的正确性："正如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变化不是偶然出现的一样，这些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将越发不可抗拒地要求一种进步的演变。同以往的历史一样，随着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日益成熟，实现这种必然性的社会力量也在日益成长。过去十五年的事件表明，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其他东欧国家，都存在着这种力量(苏联、匈牙利和波兰的苏共二十大路线的体现者，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主化的体现者)。他们还不够强大，未达优势，但是，未来不可阻挡地是属于他们的。"①

当时官方的、接近于党的立场看起来就是这样。官方的政策必然同日常的现实大相径庭，现实往往不允许作如此乐观的预言。首先，铁托虽然还是一国之首，但他已不同于1948年，不再是年富力强的了。1968年，铁托早已进入七十高龄。

---

① 萨瓦·日瓦诺夫：《东欧社会主义的艰难抉择》，载于《我们的论题》，1969年9—10月号(萨格勒布)第1507页。

尽管他还精力充沛，一位老人身为南斯拉夫首脑，这本身就必然会诱使国内外的朋友和敌人进行形形色色的投机。这至少部分地说明铁托的谨慎小心，铁托 1969 年又小心翼翼地争取同苏联改善关系。在这过程中，南斯拉夫至少放弃了他的若干的道义立场，以利于推行实用主义的方针，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和支持杜布切克的问题上，就是如此。在贝尔格莱德，对 8 月 21 日的愤懑声音已经哑然不语了——然而公正地说，在西欧和美国，声音也不很响了。西方国家竞相走访莫斯科，甚至以前一直坚持原则的波恩，在勃兰特和谢尔领导下，也发展“新的东方政策”。此时此刻，南斯拉夫无论如何不能袖手旁观。

尽管如此，必须指出，在 1968 年之后的时代里，南斯拉夫也在政治上加强同西欧的实际上早已很密切的关系。七十年代，铁托访问了一系列西欧国家的首都，也前来波恩。早在六十年代中叶，贝尔格莱德就同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建立关系，现在关系加深了。八十多万南斯拉夫的客籍工人在西欧国家，主要在联邦共和国（指西德——译注），同样是一个政治因素。1970 年 9 月——那时离水门丑闻还遥远——尼克松总统前来贝尔格莱德，他在这里和克罗地亚首府受到热烈欢迎。美国示意对一个独立的南斯拉夫感兴趣。

同时，1968 年以后，南斯拉夫同那些与苏联处于冲突状态中的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答应支持南斯拉夫人；以前，双方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和相互问罪，得到原谅，被忘却了——这又一次证明，意识形态的争吵可以是多么地相对而言。共同的利益把贝尔格莱德和

北京结合在一起。同样地，同罗马尼亚的友好关系也得到发展，这种关系只因两位党的首脑铁托和齐奥塞斯库的年龄差异而变得逊色。无论如何，对布加勒斯特来说，南斯拉夫是唯一不受莫斯科控制的通往西欧的陆上桥梁。甚至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也稍为有所缓和，虽然这边由于科索沃地区的强大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和那边由于潜在的大阿尔巴尼亚倾向，限制了两国的和解。1968 年，在科索沃地区爆发了骚乱，出动大批南斯拉夫警察和军队才控制住；骚乱使气氛重新恶化。但是，尽管地域相隔迢迢万里，尽管共产主义各自的活动方式千差万别，在 1968 年以后，不受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国家，证明了它们本身是减轻共产党的南斯拉夫负担的一个因素，是帮助——纵令是间接的帮助——南斯拉夫的一个因素。这里，首先出现了后来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演的状况：南斯拉夫不再单枪匹马地同苏联对峙。中国人、罗马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同莫斯科决裂的思想动机，与南斯拉夫人的思想动机截然对立，但在反抗苏联霸权上，他们却不谋而合。因此，产生了一种共产党的利益政策。

西方，西欧和美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南斯拉夫的防护掩体。然而，不论同这一地区的实际关系如何密切，贝尔格莱德在意识形态上，一再表示了它的保留。一位铁托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不久前说过，贝尔格莱德既不信赖东方，也不信赖西方。虽然这听起来是多么荒谬绝伦，但正是对东方的深刻疑虑，制约着同西方保持着一段示威性的距离，因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不愿染上资本主义制度仆从的臭名。苏联方面有时

公开提出这一指责，不过，更多的是把这个罪名攥在手中，引而不发。因此，在对待西方国家方面，出现了似乎十分矛盾的行为——南斯拉夫同西方有良好而密切的关系，进行经济交流，开放边界；可是，转瞬间，又开展反对西方的宣传运动，或含沙射影地归咎西方国家，要它们对极端的克罗地亚流亡分子的行动负责。在这方面，贝尔格莱德政策的适应能力是不小的：昨天的被攻击者是明天的朋友——反之亦然。比如，美国人由于越南战争受到攻击，然而同时，华盛顿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政治接触频繁，甚至举行了关于武器供应的谈判。贝尔格莱德曾把西德政策批评得体无完肤；可是，六十年代以来，在南斯拉夫眼里，联邦共和国已经变为一个积极和良好的伙伴。而且，这不单纯同德国政府的更迭有关：基督教民主同盟—基督教社会同盟也突然享受了贝尔格莱德的某种善意。1972年末，斯洛文尼亚政府首脑斯塔奈·卡弗契奇，被指控为他使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过于面向西方，同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反动的巴伐利亚"合作过于密切，被迫下野。现在，他的继任者——而且还有南斯拉夫的其他共和国的政府首脑们——正在同巴伐利亚继续进行那种合作。时代在改变。相反，社会党执政的奥地利坐在被告席上。由于克恩滕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问题，南斯拉夫人已经看到"新纳粹主义"在那里蠢蠢欲动。所谓"新纳粹主义"的克恩滕人，有一个红得发紫的政府，几乎有百分之六十的克恩滕人投票赞成社会党的联邦总理克赖斯基。南斯拉夫方面对这些似乎都不感兴趣。这一切曾经触动了一位美国外交官的灵感，使他妙语惊人，称南斯拉夫为"世界政治的最大的半强国"。

一当美国外交专家，基辛格国务卿的顾问，索南费尔德宣布了一个“主义”，这个“半强国”就怒发冲冠了。根据这个主义，东欧国家同苏联有着“有机”的联系，南斯拉夫不应对苏联采取如此“挑战”的态度。贝尔格莱德已经看到雅尔塔精神在作祟：划分世界的势力范围，并尽可能把南斯拉夫划归东方集团，也就是使莫斯科可以在巴尔干放手为所欲为。1976 年春，由于泄密，基辛格的顾问之宏论已为人知晓。当人们对这些言论进行热烈辩论的时候，一位南斯拉夫领导人指出，不但西方有一个索南费尔德，东方也有若干“索南费尔多维奇”。

不过，我们还是用这位美国人的形象语言：这个“半强国”所以如此行动，因为它是半强大的。要它对一切逆来顺受嘛，它太强大了；要它对事物听之任之，处之泰然嘛，它又不够强大。

但是，尽管经常看到南斯拉夫抨击西方或西方的个别国家，铁托的国家——极可能还有铁托接班人的国家——的固有问题一直是苏联，今后仍将是苏联，这是不能抹煞的。为了苏联之故，南斯拉夫同西方的关系必须是良好的——然而，为了苏联之故，这种关系又不许可太好。为了苏联之故，南斯拉夫不得不在第三世界以及非洲和亚洲的不结盟国家的运动中谋求支持——然而，在这个运动里面，南斯拉夫一再遇到苏联反对南斯拉夫的影响。例如，1976 年 8 月，在科伦坡举行的最近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印度——不无苏联的驱策——挫败了南斯拉夫关于把罗马尼亚接受为不结盟集团的正式成员或至少是观察员的计划。（罗马尼亚同菲律宾和葡萄牙一起，仅仅得到“来宾席位”。）原因是，苏联不愿意让一个华沙条

约集团的成员国几乎可以说从联盟的后门蹓走，逃到不结盟国家中去。即便是说，从根本上说不结盟是好的，即便是这种观点，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差异也是明显的。1976年6月底东柏林欧洲共产党会议期间，铁托总统把不结盟运动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提并论。在南斯拉夫人看来，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结盟运动（其成员大部分是非共产党国家，一部分甚至是道道地地的反共国家），还有其他“进步力量”，都是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中的平等伙伴。按照这种看法，共产党人也没有掌握“最后的真理”。与此相比，在苏联人看来，不结盟运动只不过是在“反帝斗争”中的一支辅助军队。同时，对莫斯科来说，不结盟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进步，因为，真正的进步是由社会主义大家庭和隶属于莫斯科的那一部分共产主义运动来体现的。因此，现在南斯拉夫就已经面临着苏联的潜在压力，这种压力部分是间接施加的：例如，通过苏联人向各种不同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暗中说项，认为南斯拉夫本来是“白色”的“欧洲”国家，因此不能真正代表有色世界的利益。

此外，不结盟的有色社会要求贝尔格莱德经常变换风向。南斯拉夫人不能公开反对苏联，因为不结盟世界有一部分深受亲苏的影响。那样做，贝尔格莱德可能被怀疑在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活动。因此，纷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暗地里进行的。

由此可见，苏联是，今后仍然是铁托和他的任何一位接班人的关键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后，铁托把他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在形式上安排得妥贴无事，有时双方甚至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友谊。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首脑在1972年

年中，在布拉格事件之后又第一次前往苏联正式访问。

1973年西奈战争期间，又重复了1967年的情况：铁托再次匆忙奔赴基辅，再次会晤勃列日涅夫，再次允许支援埃及人的苏联飞机飞越南斯拉夫领空。当然，这次对象不是纳赛尔，而是萨达特。当萨达特几年之后背离苏联时，他显然得到铁托的支持。南斯拉夫新闻界直捷了当地把1975年萨达特同俄国人的决裂，与1948年铁托对待苏联人的态度相提并论。

所以，苏南关系依旧是多重性的，暧昧的，也是有点儿难以逆料的。它取决于南斯拉夫内政的发展。1971年和1972年，由于克罗地亚爆发了"民族主义"，铁托的国家陷入一次相当困难的内政危机，南斯拉夫对付莫斯科的严峻局面又明显可见。1971年12月，克罗地亚危机处在高潮时，铁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自己的军队来维持秩序，总比外国的军队来维持好一些。"布拉格事件发生三年之后，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年之后的1972年秋天，当时的斯洛文尼亚政府首脑斯塔奈·卡弗契奇被推翻时，指责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大人物爱德华·卡德尔，说他由于推行亲西方的政策，惹起一种东欧国家无法容忍的局面。在一个严峻的时期，两位最重要的南斯拉夫政治家以此暗示，他们对于苏联可能的干预是多么忧心忡忡啊。

苏联党魁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冲突的严重时刻，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严重时刻，访问了南斯拉夫。这是在1971年9月。同赫鲁晓夫不一样，铁托与勃列日涅夫没有建立特别推心置腹的或私人的关系。勃列日涅夫当时似乎也同铁托交谈了南斯拉夫的内政问

题，不排斥他对克罗地亚的自由化，对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大学里新马克思主义"实践"小组的活动，对南斯拉夫其他对苏联人怀有疑虑的事态发展，表示了苏联的忧虑。众所周知，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精确地记录了南斯拉夫新闻界的"反苏"(即不符合莫斯科路线的)文章，经常提出抗议。当时，勃列日涅夫在南斯拉夫所作的对东道国充满友谊的讲话中，至少出现过几处对南斯拉夫形势有所保留、然而是清晰可辨的暗示。例如，苏联党的首脑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泽蒙(塞姆林)的一次工人集会上声称，苏联有一百多个民族，它们和平生活在一起。勃列日涅夫说这话的时候，南斯拉夫每日都在讨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关系，克罗地亚人——也包括当时克罗地亚党的领导——批评贝尔格莱德的中央集权，批评在联邦机构里、在军队里、在警察以及其他国家和党的政治机关里，塞尔维亚人占领先的地位。

在巴塔伊尼察的一次讲话中，勃列日涅夫谈到，人们有时说，苏南关系没有前途，因为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与苏联的方法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清楚知道，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定的共同规律，没有这些规律，就没有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的这一席话，南斯拉夫人一定会理解为要他们遵守这些"共同规律"的隐晦警告。然后，勃列日涅夫声称："对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我们两国属于同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这一事实，是原则利益所在，而且从长远来看，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一个被掩饰起来的暗示，它指出，属于"同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然后引伸出承认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一旦认为必要，可

以扩大为承认自己属于东方集团。

无论如何，苏联新闻界将1971年12月铁托把克罗地亚民族共产主义者清除出萨格勒布一事作为机缘，极为满意地报道，现在，党在南斯拉夫终于又巩固了它的统治。然而，同某些持怀疑态度的西方观察家一样，苏联人从贝尔格莱德的强硬的内政方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也许，在危机关头，南斯拉夫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和其他苏联高级干部隐隐约约地示意，使莫斯科产生了错误的希望。也许，南斯拉夫党的最高领导和铁托本人，有意识地做了这一切，以便从莫斯科方面赢得喘息的时间，使苏联人长时间地承担义务，直到危机被控制住和局势稳定时为止。

反之，苏联人感到，由于铁托年事日高，等待是很有意义的。也许，南斯拉夫将象一个成熟的果子掉到他们的怀里——尤其是有迹象表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形式并不是毫无磨擦地运转着的。1972年和1973年，莫斯科才放弃它的克制态度，开始支持南斯拉夫的所谓"情报局分子"——即亲苏的、反铁托主义的小组——的活动。目的是清楚的：有了这些亲苏的共产党人，他们手中就有一个组织，某时某日可以派去"拯救社会主义"，莫斯科正在等着那种必然会来的呼救之声。时至今日，苏联人并没有勒令反铁托的共产党人停止他们的活动，这些人从基辅、布拉格和东方集团的其他城市出发，从事反铁托的勾当。1975年，他们把几个最杰出的"情报局分子"——约沃维奇和佩罗维奇①——由基辅送到西欧。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不必正式对他们的行动负责。在南斯拉夫，

① 这两人分别于1977年11月和12月，在南斯拉夫被捕。——译注

对共产党情报局的追随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审判。甚至听说，在南斯拉夫被宣布为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同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相对立），却能作为宾客，悄悄地在莫斯科参加苏共的“二十五大”。在同一个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试图把铁托派遣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党的书记斯塔奈·多兰茨，通过平心静气的方法，纳入东方集团：当多兰茨接受苏联党魁的一次邀请时，他发现，参加这个约会的是整个东方集团党的领导人。这符合苏联新的“拥抱策略”，贝尔格莱德往往很难摔脱这种策略。

铁托时代的末期，南斯拉夫一再强调两个概念：“自治社会主义”和“不结盟”。但这两个应该防止苏联共产主义染指南斯拉夫的概念，直到今天仍未为莫斯科所承认。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条条道路，依然对莫斯科开放着——同铁托的接班人合作，或不同铁托的接班人合作；同铁托的接班人合作，或者甚而至于反对铁托的接班人。巨大的苏联是一位铁石心肠的不速之客，当铁托的遗产移交给接班人这一天到来之时，它将坐在桌旁；但肉眼却看不见它。莫斯科对铁托的遗产感兴趣，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为了补偿1948年铁托带给克里姆林宫的惨重失败。当时铁幕由1945年邱吉尔所说的吕贝克—的里雅斯特一线，变成为吕贝克—铁门—尼什—萨洛尼卡一线。在东南部，铁幕向东移动了几百公里。1945年之后，苏联在柏林遭受它的第一次失败，在贝尔格莱德遭受第二次失败，而且两次发生在同一时间，即1948—1949年。如果没有铁托反抗苏联人，欧洲和西欧的历史很可能迥然不同。如果苏联作为霸主，在柏林和贝尔格莱德再度立足，大陆的前途将

会发生急剧的变化。

第二，苏联一直梗梗于怀，要铲除可能作为意识形态破坏中心的南斯拉夫。从1956年的布达佩斯到1968年的布拉格以及其他一些事件中，莫斯科看到，南斯拉夫的影响正在破坏世界共产主义的团结一致。因此，如果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胡萨克政权，那是求之不得的。

第三，南斯拉夫对苏联在陆上和海上的军事实力，具有最大的战略利益。谁控制南斯拉夫，谁就占据了通往上意大利的大门，谁就从南面控制了奥地利，切断希腊同西欧的陆上联系，控制了亚得里亚海。如果苏联统治着南斯拉夫，将意味着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民族共产主义政策的终结，而且，也许也意味着同中国结盟的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的完蛋。也就是说，一旦铲除南斯拉夫，"民族共产主义"问题就得到广泛的解决。因此，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无论如何可能进行投机。

然而，生命的沙钟无情地流动着——而造就南斯拉夫成为今日模样的这位人物引退的时刻必将到来。于是就存在着这个问题，没有他，南斯拉夫能否象今日那样继续生存下去？但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摸清，这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和统治这个国家的各政治派别的内部问题究竟如何。

铁托主义的体系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内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体系，是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铁托和斯大林之间原则性冲突的产物。没有这种冲突，这种体系是不会存在的。一个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不采取防御、首先是不坚持抵抗的南斯拉夫，就会象其他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样，不知道工人委员会、自治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什么。1948 年以来同斯大林的争论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全部生活。但是，谁在今天研究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谁就会立即看到：南斯拉夫的内政同时也就是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因为和别的共产主义国家相反，这些国家固然同苏联有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但在制度上和措施上却同莫斯科没有差别，或者只有无足轻重的差别（例如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有一部分也是这样），铁托的南斯拉夫却建立了一个在一些基本方面和莫斯科的共产主义不同而和“经典的”共产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管理形式和经济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背道而驰绝不意味着南斯拉夫不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了。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喜欢犯这种错误和传播这种错误，它一定会一再地导致各种错误的估计。铁托主义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是一种缓和的共产主义，或者在西方多元论的意义上说，是一种掺了水分的共产主义；而是在于：它是一种**另外**的共产主义，也就

是这样一种共产主义，它是作为对一种比较强大的共产主义的对抗而被建立起来并付诸实现的。

正是这样，南斯拉夫的内政和由铁托创建的国家以及他的党的全部内在结构，都变成了一种和“老大哥”苏联长期的、潜在的冲突因素。这种潜在的冲突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所抱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南斯拉夫和它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独立的愿望引起的，这种独立的愿望拒绝了莫斯科的领导要求。如果南斯拉夫只在它的当前的对外政策中保持独立，那末它可以通过改变贝尔格莱德的对外政策，或者也许可以通过变动党的领导人员采取一种全面的和解，采取一种同莫斯科的路线唱一个调子或者屈从于这种路线的做法。但是，存在着铁托主义的体系这个事实，必定越来越成为对苏联的一种挑战。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两种可能可以设想：或者是莫斯科放弃它的领导权——从而也就放弃了莫斯科包括着这种领导权的体系——或者是南斯拉夫放弃它所走的道路的一切特点：放弃自治社会主义、工人自治、不结盟政策——总而言之，放弃人们在日常语言中概括为铁托主义的一切。

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对在1948年同斯大林发生的冲突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当时并没有一种特殊的南斯拉夫思想，没有特殊的南斯拉夫道路——尽管人们也许会把铁托和他的同事们强烈的固执精神看作这样一种“独特道路”的起点。相反地，年轻的、取得胜利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当时却在过分热心地模仿苏联。其他的共产党还由于所谓的机会主义的、太软弱的态度而受到南斯拉夫的攻

击——请大家想一想南斯拉夫代表团1947年出席第一次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时相当傲慢的情景。下列的说法听起来是这样的奇怪：同莫斯科冲突的爆发，首先是由于南斯拉夫人想比苏维埃人"更加苏维埃"而与苏维埃人不合引起的——这就是说，贝尔格莱德在它的内外政策上并不想考虑莫斯科在战术上和战略上的愿望。

首先，铁托和他的身边同事们企图通过一种特别积极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内政策来对待斯大林的指控。照苏联榜样贯彻的农业集体化是在五十年代初达到高潮的——就是说，在同莫斯科决裂后，农业集体化还进展了很长时间。受到斯大林迫害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从他们这方面来说，也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榜样迫害"富农"，而当国家处在一种严重的经济困难时还"消灭了"包括农村理发师在内的私人手工业的残余。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对我说，在这些年月里，我们是在"用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

只是在1949年这一年内，当事实表明：同莫斯科的"误会"要迅速消除已经不能想象时，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才考虑到：苏联在别的所有问题上都正确，只在南斯拉夫的问题上错了这个命题要是继续下去，不仅一定会很少有什么说服力，而且尤其严重的是：这种说法对于南斯拉夫的当事人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如果说苏联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苏联的榜样是唯一可效法的榜样，那末铁托就正好是一个叛逆者。因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必须为它同莫斯科的冲突找出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如果铁托和南斯拉夫人想从这种冲突中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就不仅必须反对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且必

须拒绝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因此，当斯大林说南斯拉夫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南斯拉夫党已经滚到敌人的阵营里去的时候，南斯拉夫就不仅必须怀疑并否定斯大林在政治上的权威，而且还必须怀疑并否定他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但是，为了能够否定斯大林的学说和苏联国内的政治制度，必须宣布一种新的学说。于是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就着手探索过去时代里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他们在马克思那里找了一些东西，在列宁那里找了一些东西，很多东西是在“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巴黎公社以及一部分他们不乐意提起的西方作家那里找到的。于是，他们把这些学说汇集起来，它们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过程中形成了“自治社会主义”的学说。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探索的第一个成果在1950年6月26日被提高成了法律：南斯拉夫的联邦议院决定把工厂交到工人手中。这在最初当然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但是这样一来，同苏联的“国家集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的分界线也就划出来了，固然，这是在修正主义的、工团主义的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论据的帮助下进行的。铁托曾对以前非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展开过批判，他当时曾表示：随着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工人运动的行动口号“工厂属于工人！”还没有实现，因为“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的口号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它是具有深刻含义的。它本身包含着生产中社会主义关系的全部纲领：关心社会的财产、劳动人民的权利和义务。铁托当时曾这样宣称，社会主义将以这种方式而“真正地”建立起来。

为"工人自治"奠定基石的时刻是很有意义的：对南斯拉夫来说，1950 年的夏天是一个不平静的时期。从通向匈牙利的边境传出了苏联军队结集的消息。在这种形势下，铁托也在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战线上接受了莫斯科的挑战。此后不久，在南斯拉夫第一批的工厂里选举了工人委员会。在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那里，过渡时期的国家权力的作用不断增长，国家的权力机关直接按照党的意志行事。针对这种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一种"自由生产者的社会"以及按照卡尔·马克思的意思提出"联合起来的个人"[①] 作为可以达到的最终目的。首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思想家把工人自治看作为马克思所要求的国家消亡的第一阶段——最终也就是党的消亡的第一阶段。

当然，这种消亡绝不是自发的和立即发生的。国家——以及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里也是必要的。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以这种方式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的工团主义者的界限，后者的追随者在西班牙的内战中曾经给共产党的干部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困难。在南斯拉夫，国家权力经常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多少世纪来受到了外部的压迫，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自然存在过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每一种自治形式或"委员会制度"最终会导致对现存制度的否定。

另一方面，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也是对象在苏联所实行的那种国家特权的明显的否定。因为即使国家并没有消亡——那末在过渡时期内国家的某些职能也已消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 79 页。——译注

了。铁托主义的理论宣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作为权力的工具在程度上将愈来越低，而作为自治的工具在程度上将愈来愈高，而这种自治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共同的物质利益和他们的生产组织的具体需求的认识基础上的。"①

使自己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有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尝试，在1952年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会上决定：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一名称不仅是回复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且还最终是——即使并没有承认——对列宁主义"干部党"的原则的一种疏远。当然，这样一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也就使自己成了有危险的新地带。铁托在五十年代初宣布的原则：共产主义者不是直接地领导一切和领导每一个人，而更多地应该是进行"教育"，此外，新宣布的整个自治一定会在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引起极大的不安，这种共产党的组织不仅是按照僵硬的斯大林主义的和集权主义的框框建立起来的，而且还要越出这个范围，以游击战争中军队的纪律性的各种形式建立起来。因为谁要是拒绝了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内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学说，谁就能很快地得出结论：不仅是被共产党人建立的国家必须"消亡"，而且"党"或"联盟"也必须消亡，或者至少是放弃它的垄断。

得出这样结论的第一批人当中，有一个是铁托周围政治上关系最紧密的大人物——米洛凡·德热拉斯，当时他是政治局委员和南斯拉夫党的宣传委员会的首脑。当德热拉斯1953年秋天在贝尔格莱德的党报《战斗报》上（部分是在理论

①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1958年，第143页。

刊物《新思想》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的时候,南斯拉夫和全世界都在洗耳恭听。一个经过战斗考验的游击队员,一个最坚定的和最铁面无情的共产党人在报上突然写道:"我们必须学习尊重别人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被我们认为是愚蠢的和保守的……。我们必须习惯于这样的思想:在我们对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处于少数地位的观点坚持下来……"① 德热拉斯对"党的路线"的必要性有过怀疑并声称:"加强阶级斗争并不是国家机器——主要是法庭、警察和民兵——的任务,国家机器的任务更多地是维护并执行法律。"铁托的代表还这样宣称:"这些机器必须摆脱党的影响。"②此外,德热拉斯还谈到了那些迟钝的、陈旧的和过分束缚人的官僚主义方法,这些方法使人想起苏联来。德热拉斯最后宣称:"党和国家的列宁主义的形式已经过时了(尤其是建立在党的基础上的专政)。只要革命的条件不再存在,民主主义开始活跃起来,这种形式就会到处变得愈来愈陈旧了……"③

但是过了不久表明,德热拉斯无论如何并没有受到铁托的庇护,更谈不上得到南斯拉夫党的干部的同意,这些干部尽管对自治有自己的认识,还是完完全全地坚持他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的,首先是不想放弃在党、国家和社会中的权力。于是,"德热拉斯主义"受到了谴责,德热拉斯本人在他拒绝进行"自我批评"以后,失去了他的一切职务。最后,这个人物在思想上也离开了共产主义的地盘,变成了社会民主

---

① 《战斗报》,1953年11月8日。
② 《战斗报》,1953年12月31日。
③ 《战斗报》,1954年1月4日。

党人，接着又成了议会民主主义的拥护者。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在他经过多年的政治监禁以后，他今天又回到了贝尔格莱德生活着。

但是，“德热拉斯主义”一直还是南斯拉夫社会中一种潜伏着的发展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正是由于德热拉斯，南斯拉夫的根本矛盾第一次地显得一清二楚了：也就是党的等级制的统治和反对等级制的、倾向于自治的自发性之间的矛盾。南斯拉夫当前的宪法和社会制度表面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自治机构，工人委员会和部分在生产者基础上通过代表制度——也就是直接选举制度——产生的公社的、县的和全国的议会都受“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样分成各种等级，它必须关注的是：在自治机构里，在工人委员会里，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共和国的其他各种团体里不要有“反社会主义的因素”出现。应当说明的还有：在一个象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里，迄今唯一起作用的反对派是表现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内——不是在联盟外——如在克罗地亚，那里党的领导或者至少是党的领导的一部分，1971 年前都在民族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反对贝尔格莱德中央，或者在塞尔维亚，那里在“自由主义”的口号下，也发生过一些类似的事情。从工人委员会里，迄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严厉的反对派——这部分也是因为在南斯拉夫迄今为止还从没有出现过象在东方集团中——如波兰——那种极其严重的经济上的缺点。

这就是“自治社会主义”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思想上和实践上的中心问题，今天，我们习惯于把这种政治思想和实践称作铁托主义。尽管人们在贝尔格莱德和在莫

斯科都同样地在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南斯拉夫也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出在统治结构上几乎跟东方集团国家毫无区别的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国家。今天在经济政策上，南斯拉夫的道路和苏联的道路已不再能相提并论了。这里产生了一个崭新的类型——当然是一个在它自身隐藏着各种各样纠葛的类型，关于它，某些南斯拉夫人表示：他自己也不完全知道它是什么。

正如这个国家里某些别的东西一样，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一些真实的或者表面的矛盾基础上的。从外表看，自治社会主义不只是对西方的一个挑战，而首先还是对苏联的一个挑战。但同时，这种使南斯拉夫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跟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制度，也使得这个国家变得奇特起来。今天，南斯拉夫是一个同西方经济同甘共苦、休戚相关的国家。它亲身感受到一切西方的危机（通货膨胀、失业）；但另一方面，自然也享受参加这个世界经济的一切好处。正因为这样，在铁托的国家里，没有发生象我们从别的东欧国家（有一部分是邻近南斯拉夫的国家）看到的那种物资匮乏的灾难。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供求法则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件事本身还是一件前所未有的试验。

尽管南斯拉夫体系包含着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但由于前后一致的领导，由于共产主义者联盟和铁托的个人权威，这个体系还是维持下来了。在经济的实践中，新发展的南斯拉夫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1952 年，南斯拉夫的企业有自行对它们的生产订出计划的权利，这对一切（包括生产裤子钮扣的数目在内）都由国家和政治领导集团来决定的苏联计划经

济来说，是一个闻所未闻的进展。几年以后，南斯拉夫的企业得到了这样的权限：自行决定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分配，并决定它们的投资。企业都变成了自治的企业了。

同时，生产计划的执行由区和企业一级来掌握。那种从苏联接受过来的计划制度逐步地松散了，代替它的是一种"情报性的"计划制度。对此，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勃兰科·霍尔瓦特写道："只要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个人的自由和自己管理自己的集体的自治，就可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国家和党的机构的政治垄断是和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的设想不一致的。第二，为了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工人集体必须对决定他们地位的经济因素进行全面的监督。"①

米洛凡·德热拉斯在以前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得到的一些东西，现在开始由于经济的规律性开始自行出现了：霍尔瓦特谈到了"共产党从一个阶级的党逐渐向一个由政治积极分子组成的团体的过渡"。这个过程从1952年起就开始了。

在六十年代中期，当贝尔格莱德政府通过法律条令开展所谓的"经济改革"时，这种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达到了它的高潮。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有好运气，在铁托周围有两个有资格的、在国民经济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有素养的人物：斯洛文尼亚人爱德华·卡德尔和克罗地亚人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博士。两个政治家都有这样的看法：经济上的旧制度已经过时了。象我们以后还会看到的那样，卡德尔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很不枯燥的、活跃的思想家，他抱着这样的主张：1974年南斯拉夫新宪法不仅仅是国家的根本法，而且是一个

① 勃兰科·霍尔瓦特：《经济制度》，第15页。

"社会大宪章",是"自治"和"直接的民主"的一种形式(人们一定要同时补充: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监督下)。

和卡德尔一样,巴卡里奇也攻击党的"国家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但是巴卡里奇较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来观察问题的。1963年他又开始重视价值法则。这种价值法则应该不再和经济计划相矛盾,而是必须更多地对经济计划起作用。巴卡里奇说过:价格必须按照价值法则来定——这样他就使自己成为市场经济的先驱者。早在五十年代初,巴卡里奇就已经置身于反对农业集体化的活动了。

在萨格勒布这个地方首府的一次共产党市党委会的会议上,巴卡里奇说出了他对关于国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态度鲜明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克罗地亚党的首脑在1964年9月解释说:"我们昨天的制度已经过时了……旧制度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以致没有任何人能够在现实中再容忍它。旧制度,首先是昨天的计划(和投资)制度引起过而且正在引起一系列经济上的不平衡、困难和一连串毫无出路的情景。"[①] 因此,巴卡里奇说,我们必须以新的社会关系创造一个"新的制度"。但是,巴卡里奇也谈到了那些想保留这种制度的人的反抗——而在1964年,事实上已经在南斯拉夫的领导中,以"改革者"和"联邦主义者"为一方,以"中央集权主义者"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对全国各民族都具有政治意义的斗争于1966年以推翻铁托的代理人和警察头子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而告终。但这样也就给继续深入进行经济改革开了绿灯——当然后果是:开始了过渡时期新的关键性的发展。

① 《信使报》,1964年9月21日。

但要回过头来谈谈巴卡里奇：这个克罗地亚党的首脑已经在那次萨格勒布的会议上把迄今为止的南斯拉夫经济跟西班牙在南美殖民主义时期的印第安的马亚人的经济制度相比。巴卡里奇认为，和马亚人一样，南斯拉夫的工人必须在“旧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中按照一比二的比例劳动——一个钟头为自己，二个钟头为剩余价值。① 巴卡里奇的这个结论象一颗炸弹那样爆炸了，并在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克罗地亚党的首脑谴责了一部分共产党人——至少是谴责了“旧”制度的拥护者——也象过去马亚国王那样剥削了工人。但是巴卡里奇带头的行为在后果上却是长时期拖延而不作澄清。1964 年 12 月，在贝尔格莱德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改革派的方案——由当时年轻的克罗地亚干部米科·特里帕罗宣读（这个人以后成了“克罗地亚之春”的领袖之一，随后就失宠了）——同以兰科维奇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主义者的方案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这一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外贸自由化和国内市场价格的自由化。同时，向那些想在外国工作和赚钱的南斯拉夫人开放了边界，于是掀起了一个去国外工作的工人浪潮。迄今为止的“政治投资”被一种跟市场密切相关的投资政策所代替。投资的权限逐步地由国家转到自治银行和企业身上。特别是那些银行和所谓的“进出口公司”拥有财政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引起了共和国和贝尔格莱德中央权力机关之间的严重的紧张状态。经济政策成了培养民族主义感情的基础。

改革派的目的在于，通过提高效率和利润将南斯拉夫的

① 《信使报》，1964年 9 月 21 日。

经济列入世界市场之中。和所有其他共产主义的国民经济一样，迄今为止这种经济都是在中央计划的玻璃罩内存在的，现在它被放到激烈竞争的气流中来了。

经济政策的自由化同时也导致了政治上的自由化。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因素相互起作用的征兆，是上面已经提及的兰科维奇在1966年夏天的撤职。但是，被兰科维奇批评的向市场经济的跃进（这种跃进在这位警察首脑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对自由主义送的秋波）在一开始就引起了显著的困难：它使失业人数跳跃式地上升，迅速地超过了五十万。今天，南斯拉夫的失业人数大约为六十万左右，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在西欧劳动的工人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西欧资本主义灭亡的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自治制度也就不再能够存在下去了。

南斯拉夫经济改革初期出现的"紧缩银根"的政策和强迫竞争，使得投资的灵活性中断而瘫痪了。各企业不再雇用任何人——后果之一是一大批工人群众继续向西欧外流。光到联邦共和国去的南斯拉夫人，就超过了五十万名。

著名的南斯拉夫经济专家勃兰科·霍尔瓦特当时曾经警告不要过分强调稳定，并警告不要忽视就业问题。在南斯拉夫，就业问题还是比在西欧各国显得更加迫切，因为这牵涉到南斯拉夫是一个处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阶段的地区。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向城市，这就迫使社会制度要持续地安排新的就业岗位。但在南斯拉夫，由于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失业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也成了一个民族问题——如在科索沃地区，那里住着一个不安分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

族(它在自己的居住范围内实际上处于多数的地位)。除此以外，南斯拉夫正苦于一种隐伏的缺乏投资的资本。

自治、工人委员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切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有一部分跟政治制度不可分解地混合在一起。在建立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党的等级制度和出现了自发的反等级制的工人委员会的自治之间，存在着已经提到的"掺进来"的矛盾。此外，也形成了一个经纪人和经济主管人员的阶层，虽然他们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却具有相当可观的权力。通过自由化，突然出现了一些银行和外贸公司，它们开始行使经济上的权力，但接着也就行施政治上的权力了——这种权力在国家宪法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章程里都没有规定。被铁托在这个时期推翻的，著名的克罗地亚党的干部米科·特里帕罗曾经报道说，有实力的贝尔格莱德的"投资银行"的一个代表，曾挖苦地对他说(他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党的主席团成员)，"你们克罗地亚人有什么呢？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你们半个中央委员会买下来！"

贝尔格莱德银行的这种权力——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牵涉到把财政手段转变为政治权力的奇特状况——在1969年到1970年的"克罗地亚危机"中表现出来了。当时，克罗地亚民族共产主义的领导，在它自己的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内部遇到了反抗，有实力的贝尔格莱德银行也很奇怪地向它提供了大量贷款：例如曾经给亚得里亚海边著名的旅游中心——杜布罗夫尼克提供过贷款。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实践"教授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曾经用这样的话来说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肯定，例如这样的事情竟是可能的：建立一个

社会主义的市场，积累社会主义的资本，而没有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危险。”

这里又得提到德热拉斯，即使是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垮台的共产党人曾经谈到过“新阶级”，当然在这方面牵涉到的问题同政治干部的关系不大，更多的是牵涉到经济人员。马克思主义的教授马尔科维奇认为，南斯拉夫已经建立了一个“红色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通过前所未有的掠夺和腐化而发了财，这一看法也受到了铁托的攻击，即使这种攻击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的。国家和党的首脑多年来严厉反对以牺牲社会为代价的个人“发财”。1972年秋天铁托在他给党员的著名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在铁托的后院，共产主义者联盟开展了有关“技术人员和经纪人”的辩论。这方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它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他们先是为产生这样一个阶层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种种原因，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

从七十年代初以来，南斯拉夫人曾经企图通过一个比较灵活的投资政策来改善就业状况。后果是快速的通货膨胀率在1975年初竟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看起来又象是：在贝尔格莱德，人们似乎是在用一种不景气来代替另一种不景气。如果说铁托1972年在他著名的致党员的公开信中还在谈论经济上的“支付困难”的话——当时为数众多的工厂不能一下把到期的工资和薪金发给全体职工——那末现在看来，通货膨胀的南斯拉夫好象要进入意大利和阿根廷的状况。到今天，通货膨胀已经减轻到可以容忍的程度，但它还一直以百分之

十二的比率在欧洲国家中占在头几名的行列中。

如果人们想到：南斯拉夫市场经济的建筑师们并没有任何范例可以依靠；如果人们考虑到：贝尔格莱德的政治领导干部在这方面基本上已经建立了一些对于他们来说缺乏先决条件的东西——无论如何在经验和训练方面是不足的——，那末迄今为止的各种成果却是相当令人吃惊的。正象波兰那样，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有一种私人比例占得很大的农业经济（在五十年代集体化倒退了，百分之四十的可耕面积落入了私人手中）——但与波兰相对照，供应还在继续进行。并不存在一种值得一提的缺点，在生活资料的铺子前排长蛇阵的现象多年来已成了稀有的事。但是这一切赋与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一个证据，对这种证据甚至连东方最机智的意识形态专家也不能和他们争论。在经济上铁托主义比其他的东方的制度稳定。经济上有罢工的权利，开放边界和市场经济，这一切显然都没有引起象在东欧那样一再出现的感情上的不满现象，这些不满现象在东欧引起了革命性的暴动。

这也许应该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状况：象在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和他们的概念世界中成长起来的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那样的人物，竟突然会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来。“马克思和市场”之间的矛盾自然也一直在南斯拉夫潜伏地存在着。但在巴尔干这里，好多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对生活本身是矛盾的这一点习惯了。即使南斯拉夫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六十却是跟西方打交道的。就这样，贝尔格莱德就同一切别的共产主义国家有所区别，这些共产主义国家首先是倾向东方集团的——中国例外。近些年来，经济

上同西方的联系越来越变得强烈和频繁了——首先是在技术和投资领域里。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现实性。

这固然绝不是说，人们可以等待南斯拉夫把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出售”。在东西方之间采取骑墙政策和不结盟，也表现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领域里。那些在西欧和美国作为不可容忍的矛盾的东西，在这里就可以按照旧的巴尔干的传统加以忍受。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东西，它以自己的方式具有令人吃惊的生命力——于是古老的宗法制的巴尔干突然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消费的社会和大城市的社会，连同它所有的令人兴奋的和不怎么令人兴奋的方面。谁要是想到五十年代的贝尔格莱德，当时在死气沉沉的主要大街“特拉兹热”，只是偶而有一辆外交官的汽车或者一辆出租汽车在徘徊——而现在，谁要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经历着繁忙的交通和混乱的现象，谁就几乎会不相信，这是发生在同一个城市和同一个国家里。尤其是当所有的本地人坐着南斯拉夫生产的菲亚特汽车、人民汽车，但是也坐着奥帕尔牌汽车和BMW汽车①，甚至坐着私人的梅尔切德斯牌汽车在拥挤的马路上很费劲地行驶过去的时候，人们就会更加产生怀疑，因为这些人本来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钱去买汽车和使用汽车的。现代的消费社会连同巴尔干和塞尔维亚的生活艺术已经在这里显现出来了——不管这种生活的艺术是通过黑市活动、小生意，或者人们在什么地方占有的少量土地，还是通过住在乡下的亲戚送来的生活资料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来说，事实上

① BMW汽车指西德巴伐利亚汽车厂出品的汽车。梅尔切德斯牌汽车即奔驰牌汽车。——译注

已经有了“自治”了。

但是，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开始建立他们的制度时，难道没有想到过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治”，也没有想到过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人委员会制度吗？这种制度的乌托邦在这一时期内并没有实现，人们可以恰当地说：不可能实现。南斯拉夫的生活水平，至少是在这个国家的发展地区和有发展能力地区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今天农村里有富裕的农民——在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里，已经有了中等阶层，这个阶层在生活方式上和物质要求上几乎和西欧的中等阶级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即使共产主义者联盟一再发动反对“不正当的发财致富”的运动，即使铁托个人作为凶神恶煞打进了热衷于生活和消费的经纪人、技术人员、商业代表和“社会主义的百万富翁”的行列——实际情况却很少改变。一个一党统治的国家党和一个显得权力无限的国家首脑，对于社会的和经济的规律不可能有多大作为，除非他象斯大林那样，用暴力和鲜血来淹没他自己的整个国家。但铁托从1945年以来恰恰避免了这样做。但谁要是允许市场发生效能；谁要是让价值规律和供求法则起作用；谁要是使他的货币可以兑换外汇并把他的公民送到资本主义的外国去工作——谁就不可能建立禁欲主义和“永远革命”的制度。

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在1972年描述过南斯拉夫制度的两重性。在这个哲学家和南斯拉夫其他“左的”批评者那里，充满了南斯拉夫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灰暗的日常生活的深刻的失望。马尔科维奇在现已

被禁止的哲学杂志《实践》中抱怨过:“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是如何从斯大林主义的风暴进入了市场经济泥沼的，最近几年在南斯拉夫社会中贯彻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通过有意识地牺牲某些社会主义的成就来保证一种更迅速的发展和更多的自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消除“贫困中的一致性”，人们允许有些人继续穷下去，另外一些人却可以在一夜之间发财。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边界的开放——这就是说倒向西方——在马尔科维奇那里也没有得到恩准:“小市民文化”的急流一涌进来，就会败坏年轻一代的水准和欣赏趣味。

“如果这是‘改革’的代价”，马尔科维奇这样抱怨说:“那末改革的成果是什么呢?难道它真的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吗?”它给我们带来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某些成就:更多的言论自由、宗教宣传的自由，旅游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外汇的自由，娱乐的自由以及黄色书籍的自由等”。但是，马尔科维奇当时这样作了结论，自从1963年以来，人们谈不上有一种“真正的民主化”。

在今天，1976年年底，马尔科维奇和他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的朋友是否对改革作了同样无情的判断，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在这中间他们已经丧失了过去被他们轻视的自由主义成就中的一项成就:他们的杂志《实践》被停刊了，而贝尔格莱德的“实践家们”——都是高等学校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不可以再讲课了。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对铁托主义的批评自然带有乌托邦的特征——例如受到指责的是:在南斯拉夫的议院和代表机关里干部越来越多而“真正的”工人却越来越少，或者是:从政治

的显要人物和有地位的人员那里产生的一个新的阶层已经得到了承认，这些人物在形式上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在实际上却掌握着生产资料的支配权。马尔科维奇充满着痛苦写道："置身于政治机关和工人组织的领导岗位上的少数人，常常对一些生产资料有支配权，这些生产资料并不比私人财产占有者掌握得少。这种支配权甚至还更加大、更加没有顾忌，因为它无需考虑到将来，也不受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标准的限制。"①

马尔科维奇接着警告说："党的高级领导的个别人员拥有一种特别巨大的权力，他们控制着物质的暴力机构，这种暴力不仅用来防御外来的敌人，而且也同样可以用来达到镇压的目的"。这里听得出对于在铁托以后可能出现的军队和警察独裁的恐惧。

马尔科维奇认为：在南斯拉夫和苏联这两种类型之间，在行使权力方面还存在着区别。南斯拉夫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是"相当灵活的"并以"比较自由的方式"进行统治。它避免使用"血腥的暴力"和意识形态上非教条的"最原始的形式"。它用一种极其高明的奖励和惩罚的方法来代替这些。因此产生了这种印象：这种官僚主义的臣仆们是自由的；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先验的指示而是必须在后天中加以证实。

这种对铁托主义的反对的批评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是从明确地反对斯大林主义这方面来的。这种批评也包含某些正确的观察，例如认为工人委员会和自治的其他机构根本不可能对党的领导人和经济方面的领导人持反对态度，因

① 《实践》，1972年第6期，814页。

为它们缺乏情报和实际知识。马尔科维奇这样的论断也确实触及了整个制度的一个要害之处。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具有多年经验的西方的职业政客也认为：要通过官僚主义的荆棘丛，去贯彻那种人们期望着的对行政权的监督，是越来越困难了，工人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按照“更迭”的原则他又要回到生产上去——是不可能在观察问题和决定问题上完成任何奇迹的。一个工人委员会的成员该如何判断：应该购置的高质量的机器哪些更好一些或者更差一些呢？他应该如何判断一个经纪人的质量呢？难道这就是“规定了的”形式：这个经纪人受到了党和领导的信任，因而就必定是好的吗？

象《实践》杂志或者1968年夏天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的骚动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南斯拉夫制度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处在这样的矛盾中：他们一方面批评“官僚主义和权力对自由的敌对性”并要求民主化——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求对自由迁徙和自由方面与他们不适合的某些现象采取措施。南斯拉夫党的领导相应的回答既是意识形态上的也是实用的：解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自治，这不是哲学教授们的事，而完全是党的领导的权利。

这种在自治方面的薄弱环节也在南斯拉夫党的干部中体现出来了。例如，贝尔格莱德“官方的”思想家杜尚·比朗特契奇，曾经对1965年把南斯拉夫银行从国家的范围下放到“自治”中去的决议看作严重的错误。这样一来，虽然把财政的支配权从国家官僚主义手中接了过来，但这样也就使银行有权去从事高利贷活动而不冒任何危险。因而在自治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个企业管理人通过另一个企业管理人进行剥削

的现象。比朗特契奇举出了一个处境艰难的制鞋工厂为例，这个工厂的劳动集体尽管很辛苦地劳动却只能勉强维持，而另一方面，一个同样的也是社会主义的、自治的银行连同它的劳动集体，却从这个制鞋工厂付出的代价中得到巨额的收益——如通过发放利息高昂的信贷。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事：只要有党的领导在一定的范围内提出南斯拉夫的自治问题，南斯拉夫的自治才能发生作用。特别是在政治上发生危机的时候就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党，但也包括秘密警察和军队（所有这三个集体是不可能实行自治的）就按照本身的愿望采取行动。

工人委员会的制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种制度。历史上的事例也只能在有限制的范围内起作用：例如，克隆斯泰特城水兵的委员会制度，或者 1956 年匈牙利革命中自发的工人委员会——这些虽然是按照南斯拉夫的榜样产生的，但随后却是发展为没有“共产党”的“工人委员会”。南斯拉夫的自治却只是一个被操纵的、受上面——就是说受党——控制的工具。如果党的控制取消了，那末后果就是不可预测的了——这就会真的出现苏联批评家们迄今为止用来毫无道理地谴责南斯拉夫人的东西：无政府主义。

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六十年代总结了他们自由主义以及民主化的经验。在铁托生前的时期内看不出在这方面采取了任何进一步的步骤。他现在必须维护现存的东西，以便使权力尽可能稳固地过渡到他们的继承者手中。继承者们——不管他们是谁——是处境艰难的：如果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自治和民主化的设想，那末在一个象南斯拉夫这样充满社会矛盾

和民族矛盾的国家里，它的公开的秩序就会瓦解，相反地，如果他们试图用铁腕去进行统治——那末他们就会制造一个死气沉沉的局面，这种局面同样必定会发出灼热的火花。一种按照中国式样的文化革命在南斯拉夫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国家是太小了，而觊觎他们的邻国又太多了，至少有一个大国在觊觎并想利用南斯拉夫。

因此，在铁托以后的时代里，对于南斯拉夫的领导来说，只有在容许和禁止之间、控制和自由之间贯彻一种一贯的骑墙的做法，只能这样实用主义地来对待这个混杂的制度，无论如何，这个制度目前正在发生作用，它适合南斯拉夫的外交利益，并且无论如何同西方的资本主义和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保持着距离。铁托去世后的内部发展，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是带来一个开明而谨慎的实用主义者的时代。这些实用主义者面对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社会运动是否能够固守得住，今天还不能预料。这个南斯拉夫制度将不会产生一种西欧那样的政治上的自由。但是，南斯拉夫目前的形式也提供了某些使它不再回到苏联那些状况中去的保证。如果铁托的继承人能够使这种"被把住关的和受控制的自治"越出范围，那末就会具备使南斯拉夫社会和平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样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不受束缚的民主也可能引入这个国家。但这是一种几乎近于幻想的猜测性远景。对这样一条道路缺乏一切先决条件——既缺乏从"下面"来的条件，又同样缺乏从"上面"领导方面来的条件。

因而就让我们这样认为：南斯拉夫的自治是执政的共产党人的一种辅助结构——而并不意味着它将会变为别的什么

东西。正象事情在今天所表明的那样，成问题的也还在于：这种自治的自我独立除了混乱不清以外，有无可能给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带来什么别的东西——而最终是苏维埃制度的复甦。南斯拉夫人一只手已经捉到了一只麻雀，他们还必须长久地等待屋顶上的白鸽。

但在今天，即使对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命运和未来远景作出最后的判断还为时过早，人们却已经可以看出一种双重的作用，这种作用即使在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光是“工人委员会”和“自治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就已经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所有批评者和反对者身上，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吸引力。在东方集团一再出现骚动、抗议和游行示威的地方，就有铁托主义的精神出现——即使人们在贝尔格莱德对此毫无所知和毫不愿意，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苏联和它的卫星国的教条主义的干部们因此而把南斯拉夫人看作长期骚动的煽动者，这当然是奇特的也是错误的。贝尔格莱德和铁托本人对于他自己的学说在东方集团中深远的影响，甚至常常感到不快。但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脱离了它的创始人而自行独立，随后1956年在匈牙利和波兰、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又在波兰都出现了骚动，后一次还导致了哥穆尔卡的垮台。1976年在拉多姆的暴动也有铁托主义的思想在起作用。关于工人掌握自己命运和工人能够担当企业领导的想法，比铁托主义更要早得多。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是原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人们只想到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工人委员会——而苏维埃也曾是摆脱了党的机构的影响而自由存在的。尤其是：南斯拉夫人有了一种经济的和

社会的制度，又有了政治代表机构，这些机构是建立在生产者民主和工人民主这种基础之上的。所有这一切都一定会朝着同莫斯科的模式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是对苏联来说，这样一种挑战终有一天甚至会成为一个比毛的学说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铁托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欧洲的产物，因而对于处在莫斯科和易比河之间的欧洲共产党人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但第二种可能的影响是对内部的。只要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被共产主义者联盟平稳地控制着，只要铁托和其他共产主义者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在这里起作用（铁托是不受法律规定"更迭"的约束的，更迭是指不允许担任跨越好几个选举时期的职务），就不会有各种大的摩擦发生。但是，如果有一天任何一种力量对自治的理论规律和委员会原则逐字地加以驳斥，取消党的控制并建立一个南斯拉夫的委员会的共和国，那末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铁托活着的时期这是不可能想象的——但是这样的设想并不是完全错误的：总有一天，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会对付不了他们自己创造的制度，如象童话中魔术师的学徒控制不了扫帚那样。到那时候，作为南斯拉夫稳定因素的制度就会突然变成一种极不稳定的因素了。

看来不一定会是这样。铁托的继承人至少有机会通过变革继续贯彻这个制度。但人们只需观察一下：这个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在它的道路上已经带来了一些什么样有趣的现象，这样就可以认识到：挑战不仅仅是针对西方的，也不只是对苏联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南斯拉夫本身的。因为思想常常会走上它自己独特的道路——当这些道路同"独特的道路"有所区别时，也会走下去。

克罗地亚问题

铁托时代的后期，共产主义南斯拉夫重新面临的问题，正是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震撼了贝尔格莱德王国的基础的问题，这就是南斯拉夫这个多民族国家中两个人口最多的民族——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共同生活问题；以及克罗地亚民族的自我谅解问题。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南斯拉夫王国在1941年在德国和意大利侵略者的打击下，几乎是毫无抵抗地崩溃的，因为绝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当时感受不到要跟这个南斯拉夫国家合并的任何倾向，他们是把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看作大塞尔维亚政策的一个产物。

铁托元帅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兄弟般友好和团结"的口号下，领导了1941年到1945年的游击战争，在这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的同时也是联邦制的南斯拉夫。旧的贝尔格莱德的中央集权主义和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曾经是战争期间南斯拉夫的特征，看起来这些现象与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都同样消失了。但是，克罗地亚问题真的就这样解决了——还是它只是被掩盖起来，或者是由于共产党掌权而在思想上受到压制了呢？在共产党统治二十年以后，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才开始又受到公众的注意，这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当时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开始了"自由化"；秘密警察由于强大的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的垮

台而在1966年后失去了权力；而共产主义者联盟则表示要实行联邦制。在克罗地亚，“自由化”和“克罗地亚化”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塞尔维亚，在斯洛文尼亚和在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中，也就是在马其顿，在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人那里，当时也象是开始了一种民族意识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新的民族的浪潮冲击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大部分人——首先是在克罗地亚，那里，国民经济女教授萨伏卡·达普切维奇-库采尔和以前的共产党青年领袖米科·特里帕罗，这两个执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部分自由主义方针的代表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1971年12月，这个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共产党人的领导被铁托撤掉了。克罗地亚的民族共产主义又从舞台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在六十年代晚期，民族主义的兴奋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是，在人们的头脑里发生了什么呢？克罗地亚的地下组织又是多么的强大呢？这种组织会在外地和本乡爆炸炸弹，劫持飞机，并且向贝尔格莱德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翻开历史看看。按照1971年的人口统计，克罗地亚约有四百五十万人口，是南斯拉夫各民族中第二个人口最多的民族，仅次于有八百二十万人口的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二千一百万总人口中，克罗地亚人占百分之二十一，塞尔维亚人占百分之四十。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在伦理上和语言上关系密切。它们的语言彼此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以致人们常常把这些语言叫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者“克罗地亚——塞尔维亚

语”。真正的塞尔维亚人当然总是这样说：他讲的是“塞尔维亚语”，而在克罗地亚，人们却强调地断言，他们所使用的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而是“克罗地亚语”。初看起来，这象是一种关于细微末节的争论——实际上，这种争论有它深刻的意义。因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尽管有这样相近和相似的地方，彼此还是有显著的区别。他们可以是兄弟，但是兄弟也不是互相一致的——而正是由于是兄弟也可能变为敌人。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在文学语言和口头语言方面，在历史渊源、思想方法、传统和宗教方面，也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人们常常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紧张状态同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之间、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之间的冲突相比较。但是前一种对立要尖锐多了，因为和德意志内部的对立不同，两个斯拉夫民族多少世纪以来都从属于不同的文化领域。克罗地亚人信奉天主教——除了生活在波斯尼亚的清真教徒以外，这些教徒在土耳其统治时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与此相反，塞尔维亚人属于东正教会。克罗地亚几个世纪来是西方的前哨；相反地，塞尔维亚生活在拜占庭的政治和宗教的传统中，并且直到十九世纪还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臣仆，奥斯曼帝国在阿姆萨尔(1389)战役后消灭了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帝国，并使整个巴尔干受它的武力统治。土耳其对塞尔维亚的这种统治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期。到1867年，土耳其最后的卫戍部队才从这时候独立的塞尔维亚公国撤退。

相反，克罗地亚在中世纪初期曾经建立过自己的王国，从十一世纪以来和匈牙利王族结成了私人联盟，一直是属于西

方世界的。当然，由于土耳其人的进攻，他们处于西方世界的最边缘地带。在中世纪，克罗地亚国家的很多部分曾受到过土耳其的统治。剩余部分，所谓的最后残余，自1527年后在哈布斯堡的统治下，部分是受威尼斯共和国的管辖，威尼斯首先控制了克罗地亚的亚得利亚海岸。

哈布斯堡的克罗地亚地区又分为所谓的"文明的克罗地亚"地区和边屯区，后者是沿着过去土耳其在波斯尼亚的边界的一条宽阔的地带，它由"边界守卫者"——一种由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的农民卫兵——守护着。正是由于这个边屯区的存在，不久，克罗地亚人就以出色的、但也是野蛮的士兵而闻名于全欧洲。但与此同时，这个在1881年——在波斯尼亚通过奥地利而投降以后——才取消的边屯区也成了直到今天还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也就是在克罗地亚的少数塞尔维亚人问题，在今天，他们的人数占克罗地亚共和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这个少数的塞尔维亚人问题又主要是土耳其战争的一种结果。成千上万信奉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在土耳其人逼近的时候，向北方逃亡或者离开被苏丹军队占领的土地，因为他们不想再在土耳其的统治下生活。他们被送到边屯区，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克罗地亚地区到今天还有塞尔维亚的居民生活着，他们首先从信奉正教而同其他的居民有所区别。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还更加复杂。这里有百分之二十的居民信仰天主教，他们是克罗地亚人，但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居民却是塞尔维亚人，信仰正教，此外，还有百分之四十的波斯尼亚的伊斯兰教徒。

由于历史情况的变化，克罗地亚民族一直拒绝接受塞尔维亚人甚至在灾难中也始终保留着的东西：一个共同的民族的命运。此外，克罗地亚人并没有象塞尔维亚人那样，曾由于敌人的优势而失去过他们的王国，而是由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将国王的荣誉转让给了外国的王朝——先是转让给匈牙利的阿尔巴登，接着是在十六世纪(1527年)转给了哈布斯堡家族。这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土耳其统治下，除了塞尔维亚的教堂以外，什么也没有给塞尔维亚人留下。经过几个世纪，这种教堂发展成了塞尔维亚思想的堡垒，成了曾经存在过的塞尔维亚国家的细胞，这个国家本应该消除科索沃的灾难并创造一个崭新的伟大的塞尔维亚族。在十九世纪，这种梦想曾经调动了塞尔维亚的农民知识阶层，赋与他们以力量，去建立一个塞尔维亚国家的核心。加弗里洛·普林西普和别的冒险家也曾经抱有这种幻想：他们于1914年6月28日在萨勒热窝枪杀了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从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这种大塞尔维亚的想象世界的某些东西，今天还可以在某些塞尔维亚的共产党人那里遇到。

与塞尔维亚追求一定目标的政治理想相比，几个世纪来克罗地亚人却呈现出一种更加散漫的景象。在文明的克罗地亚和边屯区之间、在具有威尼斯特色的、开化的、向世界开放的达尔马提亚和大陆的内地之间的地区性的分裂状态，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与匈牙利结盟的克罗地亚王国，直到王朝的末了(1918)还与作为附属国直接受维也纳管辖的达尔马提亚相分隔。

贯穿于克罗地亚历史中的各种不景气现象，在它们的实

际作用上还由于下列事实而产生了加倍的影响：在土耳其战争期间，克罗地亚民族成了"基督世界的大门"，成了基督教反对汹涌冲击过来的伊斯兰教的前哨阵地。萨格勒布（阿格拉姆）、卡尔洛瓦（卡尔什塔特）、瓦腊日丁——这些到一百年前还一直是西方的边缘城市，在这些城市的后面才算作东方。但是，克罗地亚是维也纳皇帝的"边界守卫者"和士兵，并不得不以这种身分去支付高额的关税。为了奥地利，克罗地亚士兵在欧洲的所有战场上打仗，而当1848年革命在维也纳和匈牙利爆发时，克罗地亚的总督（巴昂）耶拉契奇同他的军队拯救了哈布斯堡王朝，这件事导致卡尔·马克思把克罗地亚人斥之为"反革命的人民"。

克罗地亚人在拿破仑战争后曾经经历过第一次民族的觉醒，其标志是"伊利里亚理想"①。如果说他们曾等待过维也纳来酬答他们的话，那末他们却大大地失望了。奥地利既不准备保证克罗地亚人的独立，也不支持他们从匈牙利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这经验中表现出他们对奥地利的爱戴失望了。这是各民族人民民族觉醒的标志，也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标志。它把克罗地亚人和很多别的西部斯拉夫和南部斯拉夫人民引导到泛斯拉夫思想和政治上的南斯拉夫主义上来了。

早在上一世纪的中期，也已经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区别：小塞尔维亚人民受到自己的中心地带——贝尔格莱德以南"舒马迪亚"地区的迫害，而受到"那

---

① 拿破仑曾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亚得里亚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合并成为"伊利里亚行省"，而年青的克罗地亚知识分子曾错误地将过去的伊利里亚人当作他们民族的祖先。

边”的塞尔维亚人支持，也就是说，受到迁居到多瑙河彼岸在奥匈帝国势力范围内的塞尔维亚居民的支持——这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创建自己的国家并加强塞尔维亚本民族的一致性。所以，这个小塞尔维亚已经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成了一种“南斯拉夫的”皮埃蒙特。但是，塞尔维亚的领导阶层和塞尔维亚当时从农民的基础中开始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却把其他的南斯拉夫民族当作受到了障碍的塞尔维亚人，他们部分还沾有污点，也不是正教徒，而是信仰天主教的，更糟糕的是（如象波斯尼亚人的那种情况），他们是信仰穆罕默德的，也就是说是“土耳其的”。

但与此同时，当塞尔维亚的精华们都在共同为了一个目的而联络起来的时候，克罗地亚却进一步大大地分裂了。一个在克罗地亚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思想上是倾向于“马扎尔”的，也就是说，它支持联盟并且和匈牙利和解。克罗地亚—匈牙利的和解，是由于1867年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和解而产生的，这种和解调整了克罗地亚（不包括达尔马提亚和里耶卡）和匈牙利王国之间的关系。克罗地亚人的第二个集团，它的精神领袖长期来就是贾科沃的天主教的主教约瑟普·尤拉伊·斯特罗斯迈尔（1815—1905），却在寻求南斯拉夫的统一，并且还普遍地寻求所有斯拉夫人的统一。斯特罗斯迈尔与同他关系密切的弗兰约·拉奇基是“南斯拉夫主义”本来的创始人和宣传者。1860年，拉奇基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了所有“生活在亚得利亚和黑海之间、从伊索科直到马利泽的南斯拉夫人结成共同体的必要性”。[1] 但是组成这个共同体核心的应该是通

① 斯特罗斯迈尔—拉奇基：《政治文件》，萨格勒布，1971年，第43页。

过“语言和文字”彼此紧密相连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

对于当时来说，这是一个革命的建议：因为南斯拉夫的统一必须超出奥斯曼帝国和大多瑙河君主国的疆界。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削弱维也纳——于是，斯特罗斯迈尔主教在1876年送给俄罗斯政府一份备忘录，虽然他不仅是皇帝和国王的臣仆，而且有一段时期甚至还是维也纳宫廷的教父，备忘录含有几乎不加掩饰的建议，俄国沙皇和“光荣的俄罗斯人民”不应该忽视欧洲的情况，而是应该“解决旧大陆的这些重要问题，要象这既是神的天意的崇高目标也是斯拉夫人和全人类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去解决”①。换句话说：彼得堡应该帮助驱除“日耳曼的”影响，同时应该克服在斯拉夫主义的天主教和正教之间的对立，结束和教皇与梵蒂冈的协约。俄国的沙皇同梵蒂冈的接近，也很容易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时还是土耳其王国的一部分，但已经受到了起义的震动——归并到与俄国有同样宗教的塞尔维亚那里去。

斯特罗斯迈尔，这个南斯拉夫统一之“父”，不希望在君主政体联盟中看到这些波斯尼亚人（象在这以后两年所发生的那样），而是希望看到波斯尼亚作为塞尔维亚的组成部分。贾科沃的主教把崇拜斯拉夫的使徒吉列尔和梅托迪乌斯——东方教会和正教的鼻祖——放在他的宗教工作中心，这也是一种克罗地亚的自我否定。属于这种情景的还有：斯特罗斯迈尔已准备共同和塞尔维亚的侯爵米海伊洛·奥布廉诺维奇与俾斯麦合作，当时俾斯麦要把奥地利从德国的事务中排除出

① 同前页，第204页。

来，并因而同意大利的、匈牙利的和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于是，在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战争的前夕，从柏林到贾科沃主教，到克罗地亚的“人民党”，到塞尔维亚政府，以至直到在意大利的匈牙利流亡者，都有线索在贯穿着。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外交都在玩弄它们的手腕——但是1866年柯尼希格拉兹的迅速胜利使得普鲁士的总理和德意志帝国的首相放弃了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反对奥地利的强烈手段。相反地，俾斯麦一夜之间变成了奥地利的一个无条件的追随者和维护者。他永远不再愿意跟南斯拉夫的运动发生什么关系。当然，正象结果所表明的那样，没有普鲁士—德意志的帮助，这个运动也会顺利进展的。

政治上的思想对贾科沃主教的影响是多么的强烈，这也表现在第一次梵蒂冈的宗教大会上：斯特罗斯迈尔反对主教是绝对正确的这一教条，并成了“德国反对派”的发言人，德国反对派也是反对上面这个教条的。德国的主教和贾科沃的主教双方都有共同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德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中间都贯穿着一条信仰上的界线，而新的教条必定会加深这条界线。所以斯特罗斯迈尔的“中间立场”既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也是一个神学上的决定，他的其他的要求都是从这个决定中产生的：他反对教皇的绝对权威而主张主教有较大的权威，反对责难新教（因为由此一定会合乎逻辑地产生对正教的责难），他赞成要赋予教会“反对派”以权利，他还要求在天主教的教会中——按照特里顿第纳尔宗教大会的榜样——只作出所有主教都赞成的决议，而对有争论的则不作决定。最后，他主张在教会中使用人民的语言——他也努力争取把天

主教和南斯拉夫主义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在它们那里架上一条通向信奉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的桥梁。

对于斯特罗斯迈尔来说，南斯拉夫的统一和克罗地亚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平行发展的过程。这样一来，对他与他的追随者来说，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区别，在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贯穿着一条克罗地亚的思想路线，它从拿破仑后期的"伊利里亚理想"经过南斯拉夫理想和斯特罗斯迈尔主教，一直贯穿到那些"独立的"南斯拉夫人身上，而那些作为正当的克罗地亚人是拥护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这种思想的，有一部分人直到今天还在拥护着。斯特罗斯迈尔亲密的同事和朋友弗兰约·拉奇基在他的关于南斯拉夫理想的历史论文中，甚至主张斯洛文尼亚人应放弃他们的书面语言而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合并起来。这个宗教人士说过："我们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拉丁人，而是斯拉夫的兄弟。"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跑到协约国一边去的克罗地亚的政治家们，在那里建立了"南斯拉夫委员会"，宣传要解散多瑙君主国，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斯特罗斯迈尔的追随者。

贾科沃主教的对手是安特·斯塔尔切维奇（1823—1896），他是"克罗地亚权利党"的创始人。斯塔尔切维奇要求克罗地亚人归还所有在1527年哈布斯堡斐迪南第一在戴上克罗地亚皇冠时所占有的地区和权利。和斯特罗斯迈尔追随者的"奥地利式的""人民党"相反而和马扎尔的"联盟主义者""马扎尔人"不同，他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那里都看不到对克罗地亚人有什么好处，好处是建立在旧克罗地亚的国家法的基础上的自主、自立和独立。斯塔尔切维奇拒绝斯拉夫理

想、南斯拉夫理想和"泛斯拉夫"的主张。他把塞尔维亚人当作"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并提醒人们必须防备他们的"阴谋",因为他们想在那些他们明天将要屈从的人身上"抹黑"。①

从这些1868年的话里已经表达了很多克罗地亚人在晚些时候对塞尔维亚人的"拜占庭主义"的怨恨。此外,斯塔尔切维奇还是奥地利王国和德意志思想的一个强烈的反对者("只有愚蠢的、受压的和可怜的人民才采用南德意志士瓦本的野蛮行为")他嘲笑那些为斯洛文尼亚、斯拉沃尼亚、斯拉夫、南斯拉夫和泛斯拉夫而欢欣鼓舞的同胞。"如果克罗地亚只准备前进一个小时,如果只有五个克罗地亚人,那末这五个人就是自由和幸福的了。"安特·斯塔尔切维奇的口号是这样表示的。他的思想就是:克罗地亚国家必须是"独立的",不应该依靠于任何人的——也不依靠塞尔维亚人,更有理由不依靠同样是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人。斯塔尔切维奇这样说:克罗地亚王国"五百年来已经抵抗住了东方和西方各国",因此,它为什么不应该独立呢?1861年他在"沙布尔"——富有传统的克罗地亚议会的一次讲话中说道:"我们应该使克罗地亚人民不再相信奥地利和俄国灌输给他们的说法:克罗地亚人是如此衰弱,以致他们除了作为别人的奴隶而生活以外,别无出路。"人们必须对克罗地亚人说:"如果他们加入美利坚合众国,也会跟在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君主独裁中一样,对他们的自由的限制同样是会很大的"。他反对俄国——当时这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是"已经觉醒的斯拉夫人民中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也是很明显的,他几乎是以预言的方式向他的同胞们

① 安特·斯塔尔切维奇:《思想和观点》,萨格勒布1971年,第112页。

提过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们不想成为俄国的榜样、圣马力诺的可爱的公民吗”？①斯塔尔切维奇对这个小国在十九世纪时期绝非寻常的赞扬是有理由的，这种理由在今天听起来还比当时更具有说服力：所有的强国都曾经经历过战争和战役的失败——只有列支敦士登和圣马力诺没有经历过。

如果说斯特罗斯迈尔和他的政治继承人的“南斯拉夫主义”犯的错误是：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其他的南斯拉夫的语言上的一致性估计过高，而把其他领域，例如宗教的根本性的区别估计不足，那末在斯塔尔切维奇和他的“权利党”那里，却是已经对克罗地亚的自我孤立和某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一切特征作出了判断；正如人们在二十世纪在急进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那里能看到各种特征那样，可以一直观察到乌斯塔沙运动和今天的情况。对斯塔尔切维奇来说，“克罗地亚的国家权利”包括了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范围，按照他的话来说，克罗地亚应该从德国伸展到马其顿，其中包括：从多瑙河直到亚得利亚海、南斯坦尔马克、凯尔顿、克兰（今天的斯洛文尼亚）、格尔茨、伊斯的利亚、克罗地亚、斯拉文尼亚、边屯区、达尔马提亚、北阿尔巴尼亚、门的内哥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拉什（今天的西塞尔维亚）。这个“大克罗地亚”的统治者应该是“整个王国的国王”。

具有“南斯拉夫”思想的克罗地亚人和天主教的牧师拉奇基谴责斯塔尔切维奇及其“国家权利党人”，说他们是想用暴力把绝不可能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人的各族人民变成克罗地亚人，例如斯洛文尼亚人或塞尔维亚人。如果克罗地亚人又

① 安特·斯塔尔切维奇：《政治文件》，萨格勒布 1971 年第 33 页。

能同原属克罗地亚人的达尔马提亚联合起来，它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为此，克罗地亚理想需要被斯塔尔切维奇的政策赶回去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同情和协助。拉奇基反对斯塔尔切维奇的“包括一切的克罗地亚理想”，他引证说：喜爱克罗地亚的人，必须在他的同种族人那里——也就是在斯拉夫人那里——去寻找他的朋友。“如果克罗地亚理想只是为了本身而单独地存在，那末它存在的时代早已经被推翻了”①。自从1835年以来，克罗地亚民族只是由于依靠了斯拉夫的共同体才得以再生的。拉奇基责怪斯塔尔切维奇的党，说该党憎恨同克罗地亚人“最亲近”的塞尔维亚人民。他使斯塔尔切维奇本人对此作了这样的回答：“这种憎恨扩展到一切在历史发展中表现为塞尔维亚人民的历史特殊性，人们憎恨无辜的名称，虽然名称同斯拉夫其他的东西一样古老。人们憎恨东方的正教信仰……人们憎恨西里耳的文字，虽然在古代它也在克罗地亚人那里相当流行……”①

这是令人吃惊的，正如在这里的讨论中所表明的那样，在“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和“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人之间早在南斯拉夫国家成立前就已经出现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规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克罗地亚的政策，并导致了种种悲惨的结果。克罗地亚的非常深刻的分裂在这里已经显得很清楚了。早在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主题和动机就已经显示出来了，随后它们就得在二十世纪的戏剧的过程中竭尽全力迸发出来。拉奇基谴责斯塔尔切维奇的追随者是狂热主义。政治上的排斥异己是权利党最重要的本质特

① 斯特罗斯迈尔—拉奇基：《政治文件》，萨格勒布，1971年，第414页。

征之一。今天，当人们朗读拉奇基关于斯塔尔切维奇追随者的评论时，就会想到当前克罗地亚流亡者中急进的民族主义的派别："谁不属于这个党，谁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一个叛徒，一个被出卖了的灵魂……"等等。大学教授们被这个权利党看作为傻瓜。我们的学院由于有一个南斯拉夫的名称并在科学上总结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成就，就受到了散文和诗歌的攻击。克罗地亚人民的第一个慈善家，斯特罗斯迈尔主教，受到种种辱骂。我们最有成就的爱国者，如果他们不屈于这个党，就会被糟蹋得肮脏不堪……"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现象：斯塔尔切维奇党的党徒在人民的口头上被称为"stekliši"（疯狗）。这些党徒是铁面无情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把克罗地亚人吹嘘得天花乱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克罗地亚内部四分五裂：斯塔尔切维奇的追随者组成的集团支持"奥地利的解决办法"。其头目是约西帕·法朗克，以后，他是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和乌斯塔沙运动的精神领袖。但法朗克带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用希特勒时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半个犹太人。但正是这个人，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于 1914 年 6 月 28 日（塞尔维亚的宪法节）谋杀了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以后，在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组织了一连串对在当地定居的塞尔维亚商人的大屠杀。——这是对于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尝试。克罗地亚政治领导阶层中另外一部分人却逃往西方列强，并在那里组成了"南斯拉夫委员会"，致力于粉碎多瑙君主政体和建立一个由塞尔维亚人领导的南斯拉夫国家。当奥

① 同前页，第 426 页。

地利王国在1918年10月垮台的时候，这个“南斯拉夫委员会”的领导人物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是以后出现的一切现象，却与象特鲁姆比奇或者苏皮洛等人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当时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实行各民族权利平等的联邦制；而是由政府首脑尼古拉·帕西奇领导的，在塞尔维亚占主导地位的“急进党”，依靠卡拉乔治维奇的王室和官僚主义以及取得多次胜利的塞尔维亚王国军队，实行了一个逐渐集权到中央的国家方案，这种方案表现在1920年6月28日的维多夫丹宪法中。克罗地亚的政治家曾经希望实现克罗地亚的独立自主，并希望他们的国家从多瑙君主国的瓦解中政治上能继续进入新的南斯拉夫共同体，并以此而得到拯救，他们现在却必须确认：贝尔格莱德的大塞尔维亚设想排除了一切特别的愿望和一切联邦主义的美梦。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下，克罗地亚至少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区，经历过自己的、象克罗地亚地方议会(沙布尔)那样具有光荣传统的机构，并且还有克罗地亚的巴昂(总督)，而在新的贝尔格莱德的王国中，作为政治概念的克罗地亚却完全从地图中消失了。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的领导层充分利用要求独立的事实：塞尔维亚国家已经有了其他南斯拉夫民族所缺少的机构，——一个政府机关和行政机关——而特别是有了政治上的意志。在克罗地亚皇家和王国的军队实行普遍的民主化和显得松散的时候，常打胜仗的塞尔维亚军队不久就成了一支唯一有条不紊的力量——在新近合并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部分，情形也是如此，这个王国在十年后也应该正式地用“南斯拉夫”这个名字。

1917年，在希腊的考尔夫岛，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和伦敦的“南斯拉夫委员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的反奥地利的特别代表——签署了一个关于将要建立一个南斯拉夫未来的共同国家的声明。这个声明规定：这个国家的一切法律只有当它们得到这个新国家各个地区的大多数支持的时候才有效：只有得到塞尔维亚的多数，克罗地亚的多数和斯洛文尼亚的多数的同意才可以治理，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人数多的一种民族压倒。关于这方面的说法，在新国家建立后不到几个月就不再被人提起了。克罗地亚人不仅被人数上更多的塞尔维亚人压倒，而且也受到塞尔维亚的官僚主义者和军队的欺侮。

小的民族的反应常常是充满感情的和糊里糊涂的。现在在克罗地亚人那里也是这样，他们在新的贝尔格莱德王国中感觉到自己是战败者，是塞尔维亚的毫无顾忌的中央集权政权的对象。正是因为对南斯拉夫兄弟是如此强烈地加以信任，正是因为很多克罗地亚人对所有斯拉夫人的统一抱有一种过分夸大的想象，失望也就愈加厉害了。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人们可以把这种心理上的过程同有些奥地利人在“参加”后所经历到的那种失望相比较。人们曾经希望兄弟般的友好、谅解和团结，但经历到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权力的跋扈，在克罗地亚人的处境中，事情还要糟糕，因为多瑙君主国以前的斯拉夫的臣仆们感觉到在文明、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上要大大超过塞尔维亚人。受贝尔格莱德的统治——这意味着：人们必须让一个民族，一个朝代来领导，这个朝代在人们的感觉中是东方的，而不是欧洲的，因而是不适合来担任领导的。在

那些把自己当作西方一部分的克罗地亚人那里，“巴尔干的风俗习惯”保持着它们的地位。此外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克罗地亚的政治家对付不了他们塞尔维亚对手——一如一个名叫尼古拉·帕西奇的人，一个狡猾的总理——的聪明的棋艺。

这时候又一次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他能够消除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紧张状态，也能够消除克罗地亚的“联合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能把南斯拉夫领到一种综合的局面，他就是斯蒂芬·拉迪奇(1871—1928)，当地克罗地亚农民领袖，他远远超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作用，他是他的民族的一个启蒙者和导师。拉迪奇建立了“克罗地亚农民党”，在奥匈统治时期已经为普遍的选举权而斗争，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一个农民社会的理想。拉迪奇尽管为了政治目的具有巨大的奋斗精神和精力，他在自己身上却把克罗地亚民族性格中很多看来矛盾的方面统一起来了。他曾暂时主张奥地利的解决办法，但是在1918年的克罗地亚地方议会上，他喊出了“打倒哈布斯堡！”——为此他有六十次会议不能参加。他在政治上有些方面，他是农民利益的一个保守的代表——而克罗地亚人当时主要是一个农民的民族——但与此同时，他也参加了1924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的农民国际，这在当时是共产党情报局的一个辅助机构。他是一个革命的组织者，并没有摆脱煽动性。他反对塞尔维亚王国，赞成共和国——但同时，他也谈论值得维护的克罗地亚人上千年的历史和传统。作为对贝尔格莱德大塞尔维亚军事王国政权的对立面，斯蒂芬·拉迪奇(他在选举中能赢得克罗地

亚百分之八十的选票）声称要建立“克罗地亚中立的农民共和国”，同时，他邀请塞尔维亚的农民一起去建立这样的共和国。1923年，在他的农民党的一次集会上——当时鲁尔区有反对法国人的斗争，在慕尼黑有希特勒的骚动，德国和苏联正在开始进行合作（拉帕罗条约）——拉迪奇让他的克罗地亚农民，站在凡尔赛胜利者欧洲的反对者的行列里。他说道：克罗地亚农民会一直站在俄国一边，接着他为了一口气继续说下去：“德国人民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勤劳最诚实的人民——比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勤劳。德国人民在他的私生活中，是如此的诚实和充满价值，以致没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了。克罗地亚人民始终和这个伟大的德意志人民站在一起，从现在起直到最后一口气，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德意志人民将不会再一次地有疯狂的想法，去袭击一个弱小的民族。”

“现在我们要求德国，它作为第一个国家，也许是作为唯一的国家，向欧洲人说：这个萨格勒布是一个欧洲的首都。萨格勒布有它自己的文化。萨格勒布有一个象我们那样的大学。那里有现代化的工厂，有清洁的人行道，甚至有一个好的警察局，只要它不受贝尔格莱德管辖——但是如果这个警察局服从于贝尔格莱德，那末它就是世界上最坏的一个警察局。但也有一些比所有这一切更有价值的东西：人性，我们的共和主义的思想，我们的农民运动。这些是我们赖以吸取的三个源泉。”

“但是，世界并没有看到这个——因此这是我们的幸福，世界至少看到了我们的教堂。我们有我们能够铭记在心里的一些东西：世界看到了我们的学院，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科学，

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商业。看哪，这个萨格勒布的身份证给了我们的运动一张去欧洲的名片。现在欧洲看到了：这不是共产主义或者教权主义，而是一个民族的旧传统，这个民族在它的流传下来的文化基础上，正在寻找它的自由的新内容……”

在斯蒂芬·拉迪奇这些话里，隐藏着很多政治哲学和一个政治领导层的思想方法，这个领导层——我们可以说：可惜——在磨盘中被粉碎了，它的幻想就永远不能实现了。这里面隐藏着一种渴望，渴望属于欧洲，受到欧洲的严肃对待和理解（这是一种直到今天还在东南欧地区的大多数民族中存在着的渴望，而这些渴望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没有得到实现）。这里面隐藏着对于克罗地亚地方首府的骄傲，这个首府是在萨哥里亚和萨瓦低地农村的处女地上建立起来的，正如过去有人恰当地说过的那样，它是格拉茨、卢布尔雅那、的里雅斯特的一个姊妹，是维也纳的女儿，是布达佩斯的侄女儿，此外，这个城市经过各种变化直到今天在它古老的市区时，仍保存着一种独特的焕发的容光，在这里面，斯拉夫的、中欧的、克罗地亚的和奥地利的因素都互相联系起来了。与此同时，拉迪奇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不再希望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对它们他早已“谢绝了”）而是希望并呼吁依靠俄国人和德国人，把公道带给克罗地亚人民并承认克罗地亚人民。这里我们集中地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了以后克罗地亚的二律背反。因为在这次讲话后二十年，一部分克罗地亚人在卐字旗下站在德国人一边战斗，而另一部分人却是在铁托的游击队中，他们在红旗中高呼：“斯大林万岁，伟大的苏联万岁！”

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到在他政治方面和为人的态度上一

个关键性的因素，那末我们对待拉迪奇就几乎是不公正了。斯蒂芬·拉迪奇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试图通过演讲和教育把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因此，他的外表、人性、共和主义的思想以及农民运动，都是克罗地亚人民吸取的三个"源泉"。在他被谋杀以后，这些因素从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的政治中消失了。

但是，拉迪奇对1918年以后新的南斯拉夫国家中出现的塞尔维亚霸权主义深为失望，这表现在他同一个讲话的另一个地方："在我们的队伍中永远也不能找到任何人会说这样的话：我们和塞尔维亚人是一个民族。谋杀者和牺牲者并不是同一个人。他们想要的是：我们克罗地亚人要屈从于他们的意志；我们不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要成为王国的马前卒。他们想要的是：我们不再是一个克罗地亚民族，不再是一个克罗地亚的国家，而是他们的一个省，并有一个傀儡来带头。如果我们想接受这些，我们就是死尸，就是死的殉葬品。作为克罗地亚人，我们要求克罗地亚的主权。而贝尔格莱德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塞尔维亚君主国及聚集在它周围的领导层的历史性的大过错在于：他们用令人难以置信的骄横，抛弃了克罗地亚的民族感情和上千年的历史。1928年，在贝尔格莱德一次议会的会议上，斯蒂芬·拉迪奇被一个来自门的内哥罗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议员用手枪击毙而成为牺牲品。他的兄弟帕夫尔·拉迪奇和另外一个克罗地亚农民党的议员同他一起被谋杀。直到今天还没有弄清：这仅仅是牵涉到个别人的自发行为还是萨勒热窝式的一种阴谋——目的在于除掉一个可能对

大塞尔维亚政策有危险的人物，因为他在塞尔维亚的农民中也享有很大的威信。斯蒂芬·拉迪奇的去世，决定了王国的南斯拉夫的命运：克罗地亚人永远不能原谅塞尔维亚人对他们公认的农民领袖的谋害。但是，为拉迪奇复仇的人叫做帕维里奇。在这个伟大的克罗地亚农民领袖去世后几天，一个名叫安特·帕维里奇的年青人建立了乌斯塔沙运动（乌斯塔沙的意思是起义者）。这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在阴谋活动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它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倾向于墨索里尼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了。

在拉迪奇和帕维里奇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对立不可能更大了：这一边的拉迪奇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想用民主的手段不流血地来向他的克罗地亚的右派进行斗争，而那一个帕维里奇，他在任何犯罪行为面前毫不退缩，对他说来，一个人的生命什么也不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阴谋分子和恐怖分子，他们为了拥护克罗地亚和反对塞尔维亚，准备付出任何代价。帕维里奇在克罗地亚政治中掺杂了恐怖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比它的创始多存在十年。

但是，乌斯塔沙意识形态——克罗地亚全部的民族主义，它无条件地仇恨塞尔维亚人，仇恨对自己事业的“背叛者”——所赖以蔓延的地区，由于当时贝尔格莱德的政策而扩大了。这一点没有人比塞尔维亚的政治家斯维托查尔·帕里比采维奇认识得更清楚了——他是一个从前奥匈帝国南斯拉夫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开始时他是一个无条件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以后从中央集权主义的扫罗① 成了联邦主义的使徒保

① 扫罗和保罗都是圣经中人物，使徒保罗在感化前叫扫罗。——译注

罗，并成了斯蒂芬·拉迪奇和克罗地亚事业的一个朋友。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在三十年代初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事后来观察一下奥匈帝国，那末我们必须说：南斯拉夫人在们的君主国里是不自由的，他们始终感受到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所占的优势——但是：比起南斯拉夫王国来，甚至比起独裁前最自由的时期来，法律制度、安全、政治上的种种自由都在一种更大的程度上得到了保证。在奥地利时代的克罗地亚，选举作弊是不可想象的。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才出现了选举作弊的现象。在监狱里行施酷刑和拷打公民，这些在南斯拉夫王国都作为正当的审讯手段，而"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各地却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人们可以公开地说：在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所享受的自由，比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巴哈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奥地利的自由更少。[1]

1929 年以来存在的南斯拉夫王国，处在卡拉乔治维奇王室的所谓亚历山大"国王独裁"的统治下；而国王独裁的建立是由于对拉迪奇的谋杀行为引起的。1931 年，克罗地亚著名的阿尔巴尼亚问题专家米朗·苏弗莱也遭到谋杀，显然这是因为：他对阿尔巴尼亚的同情成了某些塞尔维亚极端分子的眼中钉。但不久就开始了报复性的恐怖活动：首先是乌斯塔沙分子杀害了同情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其中有一名是著名的新闻记者。这种在意大利、部分是在邻近的匈牙利开展的地下活动，于 1934 年采取了一项巨大的打击活动：它和

---

① 斯维托查尔·帕里比采维奇：《亚历山大亚国王独裁》，第 24 页。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共同谋杀了正在马赛访问的亚历山大国王，同这个南斯拉夫国王一起死去的，还有法国的外交部长巴尔杜——一个在南斯拉夫争端中，“由于疏忽而产生的牺牲品”。

但在马赛对国王的谋杀，墨索里尼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是参与的，而第三帝国却没有染指。这一谋杀固然是多年来乌斯塔沙分子最后一项大活动，而他们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保罗亲王的摄政统治下，南斯拉夫人采取了一种在西方民主主义者和轴心国之间谨慎的骑墙政策。希特勒的政策对摧毁南斯拉夫不感兴趣——第三帝国有其他的考虑和目标，此外，东南地区乃是一个人们不愿伤害的重要的原料基地。贝尔格莱德的系统也同意大利保持了和睦的关系，意大利把亚得里亚海看作“自己的海洋”，因此对获得南斯拉夫的沿海并不感兴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贝尔格莱德王国试图最后解决克罗地亚问题：将内克罗地亚和沿海地区——即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的一小部分——合并成为一个所谓的“克罗地亚巴昂辖国”。克罗地亚人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自行管理他们的内部事务。“克罗地亚巴昂辖国”的权力实际上是由克罗地亚农民党行使的，该党对克罗地亚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占压倒优势。虽然该党的主席、被谋害的拉迪奇的继承人伏拉塔柯·马契克是一个平淡无奇的、迟疑不决的人物。

这个克罗地亚的自治区本来可以挽救王国制的南斯拉夫——如果当时还有时间的话。但是灾难随即降临到了南斯拉夫人的头上：农民党参加的茨维科特维奇—马契克政府在德

国人的逼迫下于1941年参加了三国条约，虽然附有不必参加第三帝国战争的条件。随后在1941年3月27日，贝尔格莱德发生了一个拥护协约国的政变。保罗亲王的摄政和当时的政府都从舞台上消失了。年幼的王位继承者彼得成了国王，一批将军掌握了权力。但塞尔维亚的群众在贝尔格莱德大街上游行，高呼"宁要战争，不要条约，宁要坟墓，不要奴隶制！"几天以后，在1941年4月6日，第三帝国和意大利发动进攻。南斯拉夫王国的军队在短暂的抵抗后被击溃。国王和政府逃亡到英国。但在4月10日，在萨格勒布有人号召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南斯拉夫已经不再存在。在克罗地亚首府，德国军队受到大部分居民高兴的和友好的欢迎。

这是乌斯塔沙头目安特·帕维里奇的好机会，他被他的意大利主子迅速地送到了克罗地亚。这个"头目"几乎来得太晚了，乌斯塔沙的另外一派，即更多地倾向于第三帝国的亲德派，快要把权力交给别人了。当帕维里奇带着他的大约四十名乌斯塔沙分子在萨格勒布出现时，人们首先看出他是意大利人的一个亲信。只是在这以后，帕维里奇才毫不含糊地转到了希特勒那一边。

在南斯拉夫废墟上出现的克罗地亚新国家，有好些严重的先天性的缺陷，首先，帕维里奇必须让出达尔马提亚和意大利沿海的大部分岛屿。这样就把克罗地亚的中心地区献给了被克罗地亚多数人一直当作敌人看待的政权。其次，由于实行"大克罗地亚的解决办法"——这就是说，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舒马迪亚归入"克罗地亚独立国"——把很大一部分塞尔维亚信东正教的居民囊括进来了，再加上塞尔维亚

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原来就住在克罗地亚地区内。①

乌斯塔沙运动在新的"独立国"中，代替在人民中非常强有力地扎了根的克罗地亚农民党，掌握了政权。由于对塞尔维亚人的仇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乌斯塔沙的思想基础，因而在"独立的克罗地亚国"中，处于少数的塞尔维亚人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帕维里奇和他的下级头目想用一切手段使大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化"。这就是说：他们一定要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消除塞尔维亚的居民。乌斯塔沙分子的头目之一，米尔·布达克1941年在戈斯比奇的一次讲话中说道："我们将把一部分塞尔维亚人弄死，把另外一部分人迁走，并使第三部分人改信天主教，就这样地将他们变成克罗地亚人。"②

早在1941年初夏——乌斯塔沙政权几乎还没有站住脚的时候——就已经在克罗地亚国家的范围内发生了第一批灭绝塞尔维亚居民的行动：例如，1944年4月27日在古道弗奇村有一百八十四名塞尔维亚农民被枪杀；此后不久，在考尔顿——过去王国的军事边界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对大约五百名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一连串这种毫无意义的大流血事件到1945年"独立的克罗地亚"结束为止一直没有停止过。帕维里奇还按照第三帝国的榜样建立了集中营——其中最臭名

① 南斯拉夫在1941年被轴心国侵占后解体了，并被瓜分给它的各个邻国。第三帝国得到了斯洛文尼亚一部分——上克雷恩和下斯泰尔马克。意大利并吞了围绕卢布尔雅那、达尔马提亚和大部分亚得里亚岛屿的地区。匈牙利占据了多瑙河和台斯之间的姆尔区和巴契奇，保加利亚得到了马其顿和斯科普里，被意大利统治的阿尔巴尼亚并吞了科索沃地区（阿姆萨费尔特）。只有罗马尼亚没有参与瓜分的行列。除了克罗地亚以外，也出现了一个由德国军队占领的国家"塞尔维亚"，它局限在塞尔维亚过去的中心地区一带。

② 引自西姆·巴伦的《帕维里奇》，萨格勒布，1952年第116页。

昭著的是亚逊诺伐奇的集中营，那里有一万多人被杀害。帕维里奇和他的乌斯塔沙在掌权后不到几个月就把整个国家推向这样一种大流血的境地，以致任何人——甚至连由于军事原因对克罗地亚的内战气氛感到不快的德国国防军——都不能够结束这种勾当。

克罗地亚关于自己国家的梦想就是这样来实现的——但它是以一种如此可怕的方式来实现的，以致所有的幻想随后不久都不得不化为乌有。克罗地亚人民有一大部分曾经欢迎1941年的独立，况且对某些克罗地亚人来说，这正是实现斯蒂芬·拉迪奇关于"自由的农民共和国"的幻想的时刻。其余的人在新国家中看到了奥地利时代的继续——因此，克罗地亚的军队(不是乌斯塔沙的党派组织形式)采用皇家和王国军队旧的军衔等级的标记。克罗地亚人还没有总结他们追求全权政府的经验时，进驻的德国人就以文明的民族自居而开始统治了——请大家想一想拉迪奇在1923年曾经说过的话——而在萨格勒布的市民和农民的范围里首先觉得不可想象的是：一小撮恐怖分子居然能够篡夺并糟塌高贵的克罗地亚的国家思想。

天主教的教士也曾经欢迎这个新的克罗地亚国家。萨格勒布的斯蒂皮纳茨大主教，在1941年复活节的训诫词中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对和平的最大的威胁，也是对真理和正义的否定——而在教会的报纸(«天主教信息报»)中有人写道：克罗地亚教会感谢上帝把独立这一礼物赐给克罗地亚人民。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克罗地亚，天主教的教会在过去和现在都比欧洲的任何地方——也许只有波兰例外——更加是"人

民的教会"。在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实际上是国教，相反地，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在贝尔格莱德却没有什么影响，它在自己本身就感受到了克罗地亚人民加给它的种种歧视。

但是赞成克罗地亚国是一回事，乌斯塔沙政权又是另一回事。不久，斯蒂皮纳茨大主教就跟新的主管当局发生了冲突。教会看到，乌斯塔沙领导基本上是想在反对塞尔维亚的政治斗争中把天主教当作武器来使唤，于是，大主教对乌斯塔沙政府杀害并流放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行为提出了抗议，1943 年，他还在萨格勒布大教堂的一次传教时宣称:"我们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上帝面前，一切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就是: 一切民族和种族都毫无例外地来源于上帝。我们要说的第三件事就是: 今天在世界上存在的每一个民族和种族都有权过有人类尊严的生活……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手去扼杀或者用别的方式去损害另外一个种族或民族的成员。"①

这些话是在当时全国所处的血腥屠杀中间说出来的。为了反对乌斯塔沙的恐怖活动，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和在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中组织了切特尼克运动。在乌斯塔沙灭绝塞尔维亚农村的时候，忠于国王的塞尔维亚切特尼克分子在福加地区的穆斯林人当中发动了一场大屠杀。当时的情况好象是人们又回到几世纪前的土耳其战争和宗教冲突中去了。在 1941 年到 1943 年的过程中，敌对双方的互相杀害已经发

① 引文根据《信使报》,关于萨格勒布大主教的报道，1946 年第 2/3 期合刊。

展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乌斯塔沙始终采取这种办法。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当每个人都知道一切都完了的时候，乌斯塔沙分子把好几百名切特尼克的军官从门的内哥罗引诱到他们设置的圈套里并加以屠杀——当塞尔维亚人在一辆德国的运输车厢出现时（这些塞尔维亚人是一个和德国军队合作的志愿军兵团的成员），乌斯塔沙的部队在萨格勒布的中央火车站推翻了车厢，并在1944年12月7日枪杀了这些亲德国的塞尔维亚人，对此，连德国国防军也不能采取什么对策。[①]

在厌恶乌斯塔沙暴行时，如果把残酷只归罪于一方，那就完全错了。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那里，民族的憎恨同样是极为普遍地存在的，铁托报道过，他第一次同忠于国王的塞尔维亚切特尼克运动领导人是如何会面的，那是1941年8月在切特尼克控制的腊夫纳戈拉“解放区”，谈论的是民族问题，同时在涉及反对克罗地亚的仇恨时提到了米哈伊洛维奇："我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德拉扎·米哈洛维奇在当时和很久以后都认为我是一个俄国人”，铁托报道说：“他完全公开地谈论克罗地亚人和南斯拉夫所有别的民族。在我询问他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以后，他毫不掩饰地声称，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一切其余的人都应当加以最严厉的惩罚，而在受到某种报复以后必须完全向塞尔维亚人屈服。由于我对此表示异议，他就说道，他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所有克罗地亚人

---

① 见日夫科·托帕洛维奇：《人民抵抗运动和1941—1945年的南斯拉夫》，第156页；鲍斯科·恩·考斯蒂奇：《关于纳粹时代的历史》，1949年第186页。

都要对乌斯塔沙的罪行负责，他们全部都是把南斯拉夫交给德国人的乌斯塔沙分子和卖国贼。”①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双方的越轨行为和对群众的大屠杀引起的后果是：非共产党的、民族的或者民主的力量不是完全被扑灭——如象克罗地亚农民党，它的主席马契克被乌斯塔沙逮捕了——就是互相阻碍、斗争、杀害和抵销。这样一来，克罗地亚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塞尔维亚对手们——他们置身于德拉扎·米哈洛维奇的切特尼克运动之中——都同样为铁托领导下的共产党人和游击队的成就创造了条件。

在二十年代主张解决南斯拉夫问题和赞成克罗地亚独立的共产党人，从1936年以来采取了反对分裂主义的立场。固然，在三十年代初、在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和乌斯塔沙之间有过一定形式的合作——象米洛凡·德热拉斯在他的回忆录中报道的那样。② 在铁托的领导下，党提出了一个联邦制的纲领——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产生了一个克罗地亚共产党和一个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它们都是从属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但是克罗地亚人——除了几万名共产党人和同情分子以外——是在比较晚一些的时候才有比较大量的群众参加共产党的游击队运动。一个克罗地亚共产党的领导人，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今天是铁托的助手和可能的继承人中的一个）已经在1944年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农民党，它反映了绝大多数克罗地亚人民的政治观点。明显的是，巴卡里奇作为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游击队的一个领导人，在

① 铁托：《演说和文章》，第一卷第188页。

② 米洛凡·德热拉斯：《一个革命者的回忆》。

战争期间就认为关键在于“破除农民党的政治影响”。共产党游击队能够在克罗地亚站住脚的地方——如在沿海地区和达尔马提亚——农民党的力量就显得越来越弱。但正象巴卡里奇所说明的那样，在达尔马提亚，1942 年已经有铁托的游击队在开展起义活动，而原来的内克罗地亚人却到 1943 年的下半年才知道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在意大利已经投降而德国处于防御的时候①。

铁托的“兄弟般友好和团结”的口号以及共产党人宣布的一个新的、民主的——固然是在共产党的意义上——南斯拉夫联邦的纲领是一个新的选择，借以避免残杀的民族主义的战争。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团结的世界的景象，对将来有着明确的前景，并能克服把所有参与者引向死胡同去的民族主义。所以，在铁托的游击队中，民族革命战争、克服民族主义、阶级斗争和反对德国的外来统治的解放战争是互相混杂在一起的。塞尔维亚人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可以把他们从克罗地亚人的屠杀中拯救出来，但很多克罗地亚人又在铁托身上看到：他们会在切特尼克的大塞尔维亚的报复行为中受到保护。

但克罗地亚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政治地图上，依旧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犯有奇特罪行和畸形活动的乌斯塔沙—国家，同样是一个有自己军队和行政机关的国家。在克罗地亚的某些地区，这个国家拥有狂热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利卡地区和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人。著名的是西罗基·勃里热格修道院的历史。1944 年，这个修道院内克罗地亚的天主教方济

① 《新南斯拉夫》，1944 年第 2 期。

名会修道士，手握武器直到最后，都在反对共产党的游击队。在1944年和1945年，游击队对“乌斯塔沙地区”的占领部分是小心翼翼地活动的。当然，有一点人们得承认共产党人是好的：他们没有根据民族的差别而开始进行屠杀。任何人都没有被他们杀死，因为他是“克罗地亚人”（德国人和德国人民是一个例外，他们对希特勒的暴行要集体承担责任），但在1944年和1945年，游击队对谁是乌斯塔沙分子抱有怀疑，并很快掌握了情况。因而当时很多有民族意识的克罗地亚人，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都受到了报复性的惩处。

但是克罗地亚人的这出大型戏剧一直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当时“独立的克罗地亚国”把几十万人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奇怪现象：仇恨斯拉夫的阿道尔夫·希特勒的最后一个同盟者竟是一个斯拉夫国家——任何人都不再承认的安特·帕维里奇的国家。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那一天，克罗地亚的首府萨格勒布被铁托的游击队和平地占领了。安特·帕维里奇这个“头目”在前一天逃到奥地利去了，这时希特勒已经死了一个多星期。帕维里奇政府的其余成员刚好走上了向北去的路途，好让从意大利向前进军的英国人在克拉根富特逮捕他们。他们大概抱有这样的幻想：民主的西方列强也许会以某种方式来尊重一个“反共的”克罗地亚政府，甚至想把这个政府和这支一直不结盟的克罗地亚军队当作反对铁托和苏联的武器保留在手中。

安特·帕维里奇在逃跑前把在萨格勒布城的政府武力

机关交给了一个名叫库米契奇的高级行政参谋，并说出了这些重要的话:“高级行政参谋先生，我相信您能维护萨格勒布城的安定和秩序——而这正是在克罗地亚最后一批行政官员撤退和第一批军队进驻的时刻。”这支军队——铁托的人民军——二十四小时后就到来了。

德国国防军在萨格勒布的最后一个司令员盖格尔将军跟库米契奇——这个在两个世界之间只有二十四小时的稀有的掌权者——告别时声明说:“作为奥匈帝国的旧军官，我不希望萨格勒布的居民在记忆中把我当作杀人犯。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将不加战斗地撤退，而要是别人迫使我们射击的话，我们将会在城市的边缘战斗。”①

萨格勒布就这样从毁灭中得救了。但是，在向北方和西北方向的大街上正在上演大撤退的戏剧。除了德国E字军(在吕尔上校的指挥下，他以后在贝尔格莱德被处决)以外，有一批由好几个民族组成的杂七杂八人员在向着匈牙利的边界逃跑，这中间有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分子、门的内哥罗的自治主义者、为德国人服务的哥萨克人以及克罗地亚的军队。当5月8日吕尔上校向南斯拉夫人投降时——德国绝大部分的军队已经成了南斯拉夫的俘虏——德国克罗尼亚联盟也就完结。克罗地亚的军队已经不再听命于德国人的指挥。这支军队孤单地企图向西方进发。

① 请比较: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士兵们的末日》，载于德意志报/基督教徒和世界，1972年7月1日。南斯拉夫方面对这些事件的描写见米兰·巴斯塔:《希特勒纳粹的苦难和崩溃》，贝尔格莱德，1971年。反共产党的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方面的描写，见《克罗地亚人民永久性的悲剧》，慕尼黑 巴塞罗那 1976年。

军事的形势是混乱的，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已经占领了阜姆(里耶卡)和的里雅斯特。铁托的联军一直前进到胡尔村关口，并越过了西贝尔格到了南凯尔顿。三支南斯拉夫军队和保加利亚的联军，从马尔堡(马里博尔)出发到达了下德劳堡(德拉沃格拉特)从而封锁了通向克拉根富特的大道，克罗地亚人正是想要从这条大道上穿过去。

虽然如此，克罗地亚人还是企图越过被保加利亚人守卫的下德劳堡的桥梁。在这里，克罗地亚人同受苏联指挥的保加利亚部队发生了接触。这些保加利亚人甚至倾向于，让这些克罗地亚的队伍自由撤退。也许是保加利亚人对战争感到厌倦而不想在现在——当时是 1945 年 5 月 11 日——再流血了。

也许是过去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还在起作用——也许是莫斯科对获得胜利的铁托的不信任也已经在这里表露出来了。克罗地亚人的谈判对手是一个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员阿塔纳索夫将军，他是 1943 年从莫斯科被送到铁托的主力军里去的，显然，阿塔纳索夫关于南斯拉夫内部问题的看法，和铁托的看法根本不一致，他立即与南斯拉夫的游击队联系，后者要求他，停止在下德劳堡的桥上擅自同克罗地亚人举行的谈判。阿塔纳索夫表示反对，他认为让克罗地亚人撤到英国人那里去更好一点——并且还批评说，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对苏联是不友好的。

5 月 12 日，当保加利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还在继续进行谈判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强大的铁托游击队到达了下德劳堡。保加利亚人不再说什么意见了。一支克罗地亚先头部队的突

围尝试在游击队和保加利亚炮火下失败了。

克罗地亚的部队于是穿过米斯河谷向奥地利的边境小城勃雷堡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乌斯塔沙上校苏达尔作为调停人在铁托游击队里出现了。苏达尔向南斯拉夫的政治委员巴斯塔（他以后在英国参谋部就交出俘虏的谈判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解释说"我和我的部队曾为独立的克罗地亚战斗过"。在政治委员和乌斯塔沙上校之间接着就展开了下列的对话：

"您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克罗地亚人？"苏达尔问道。

"我是克罗地亚人或是塞尔维亚人这无关紧要。我是游击队员和南斯拉夫人。"巴斯塔回答说。

谈话以解除克罗地亚调停人的武装和把他禁闭起来而结束——这是对当时的形势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巴斯塔的解释：他是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这无关紧要，这一点也是说明问题的。

5月14日克罗地亚军队的先头部队在勃雷堡遇到了第一批英国人。克罗地亚的海林契奇和格列高里奇将军到了英国参谋部。人们见到的情况是："接待是非常亲切的，甚至是衷心的欢迎。"一个英国的上校要求克罗地亚人把部队就地安顿下来。重伤员可以送到克拉根福的野战医院里去。乌斯塔沙的军官丹尼尔·卡尔扬在他的日记本上写道："海林契奇将军要我沿着我们的纵队往后撤，并将新消息传播出去，以便略为提高一下人们的情绪，几个易于轻信的人表示，我们苦难的历程现在熬到头了。没有人想到：这只是我们崎岖的道路最困难部分的开端，是崩溃和死亡的开头……。"

第二天英国人的态度有了改变。克罗地亚的将军经过正在前进的英国坦克部队到了英国将军斯考特的司令部。这里，在勃雷堡的旧城里，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政治委员巴塔斯和游击队的军官们——巴斯塔立即向英国人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在没有取得南斯拉夫共产党盟军的谅解以前，就已经同乌斯塔沙分子进行了谈判。

英国的将军回答说，这里是不愿意向铁托的军队投降的三十万敌对的士兵。他们甚至准备要开展反对游击队的战斗。但是战争已经结束了，因此继续流血是毫无意义的事："他们〔克罗地亚人〕愿意向我们英国人投降。——而在这以后我们——英国人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盟军。"换句话说：缴出这些人员已经在英国人的方案里计划好了。英国人想尽可能迅速地摆脱这些克罗地亚人。

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并不是没有顾虑的：克罗地亚人可能从他们那里逃跑。斯洛文尼亚的游击队员当时也这样报道过：英国人已经在艾逊克帕尔把几万名德国俘虏和大量掠夺来的德国的战争物资干脆抢走了。在一个民众的集市场所，游击队要火烧一座木头桥梁，如果克罗地亚人打算在那里突围的话——但在这里，英国人也已经把灭火器准备好了。

南斯拉夫的政治委员巴斯塔，当时他几乎还不满二十四岁，他以最大的自我克制和带有某些挑战的倾向来对待英国人。对英国人来说，接受几十万俘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额外的问题，最后他们同意了南斯拉夫人的要求：克罗地亚人向游击队投降——而不是向英国人投降——以及把俘虏运送到南

斯拉夫去。

克罗地亚的海林契奇将军和乌斯塔沙官员克尔扬在英国将军斯考特面前接受了投降的条件。政治委员巴斯塔向他解释说:"以南斯拉夫第三军第五十一师的名义，我要求你们无条件投降。投降的期限为一个小时。投降的记号是挂白旗。巴斯塔还说，诚实的公民将来可以分配到他们的家乡去(这牵涉到好几万名流亡者)，士兵们到俘虏营里去并在那里按照各族人民的法律规定加以处理。将领们"直到最后"都可以保留他们手中的武器。

克尔扬试图责备英国的将军，这已经不起作用了。历史将不会原谅英国人，他们竟将三十万人交给了共产党人。克罗地亚一些将军要求，在举行投降仪式时应该有一个英国的委员会在场，这也被拒绝了。英国将军对克罗地亚人说:"你们在这里根本不应该提什么要求。"

克罗地亚的谈判人员可怜地屈着身子离开了英国人的大本营。克尔扬写道:"等在外面的军官梅蒂科斯和塞尔瓦兹从我们灰白的脸上看出了真相。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来准备向游击队投降，英国人推卸了他们的责任。我们脸色惨白，默默无言地走到车厢里去。"

几千人——大多数是积极活动的乌斯塔沙的军官或者帕维里奇运动的官员——跑进了森林地带，并沿着卡拉温肯地区到达了西方。另外一些人企图回到家乡去，并在那里隐居起来。但是群众好象都瘫痪了:他们留在那里，把自己交给命运去摆布。

在勃雷堡附近的一间花园房子里，一些重要的俘虏被带

到了巴斯塔面前。在他们当中有积极活动的乌斯塔沙人员，这些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过错和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物原来是由于一种悲剧性误会而陷入这个团体中去的。其中有来自奥地利军团的古斯托维奇和司达契尔两个将军。对他们这两个人来说，"独立的克罗地亚"有点象是旧的君主国的继续。他们不是乌斯塔沙分子，而是属于保卫家乡的士兵，也就是说是属于正规的克罗地亚军队，他们同乌斯塔沙集团的关系，就象德国国防军同党卫队的关系一样。

有些卫乡军的军官现在也还认为，和"政治性"的乌斯塔沙人员相反，对他们来说，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最多也就是存在着一种正常的战争中的俘虏而已。他们自己并不清楚：一场内战不是一场"正常的"战争，更何况这场战争是在意识形态的标记下开展的。随着而来的是胜利者的报复——对于四年战争的报复，在这些报复中，乌斯塔沙也已经认识到：同共产党人和游击队打交道是没有什么怜悯可言的。

"独立的克罗地亚"的国家首脑没有把命运交给他的背叛了的和被出卖的军队。他越过阿尔卑斯山逃跑了，在奥地利呆了一些时候——而说不清为什么又到了阿根廷。他于1960年死在马德里。在克拉根富特想跟英国人谈判的克罗地亚政府，被英国人成批地俘虏了，并被转送到了铁托元帅那里。1945年6月6日，他们最重要的成员在萨格勒布被判死刑。

在这里，各种人都在刑场上以极其特殊的命运结束了一生：其中有乌斯塔沙的思想家和作家米尔·布达克，他于1941年在哥斯比奇宣布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大清洗和大迁移，也有

过去皇家和王国的海军军官尼古拉·斯泰因弗尔，他只是由于倒霉，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被帕维里奇任命为国防部长。

1945年5月15日十二万克罗地亚军队的士兵，被游击队从勃雷堡押送到南斯拉夫。大约有十万至十五万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普通的流亡者——是在普莱弗里（普莱弗列）、温特希格拉兹（斯洛文尼格拉德克）和下德劳堡（德拉伏格拉特）这些地方投降的。

在俘虏中，首先是把积极活动的乌斯塔沙分子分开来。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他们也象卫乡军的大多数军官那样被枪杀了。对克罗地亚的将军们进行了审讯，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跟着而来的都是处以死刑。幸存下来的群众，大部分徒步走过了半个南斯拉夫，一直到了彼得华尔登和巴纳特地区，并被赶到了罗马尼亚的边界，不得不在那里接受强迫劳动。在人民的口头传说中，这一次行军直到今天还叫做"士兵们的苦难历程"。有些人活下来了——很多人结束了残生。就这样，这个"克罗地亚国家"经历了一个可怕的末日。

当然，不仅仅是帕维里奇的克罗地亚遭受了这样的命运。一万二千名斯洛文尼亚人的命运也同样是悲剧性的，他们曾以所谓"家乡保卫者"的身份同共产党游击队打过仗。这些人几乎都是斯洛文尼亚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他们都从这一信仰出发拿起武器来反对游击队。他们被英国人交给游击队以后，几乎一个不留地被枪杀了。对于一个在今天几乎不到一百八十万人口的小小斯洛文尼亚民族来说，按照以前发生过的所有情况看来，这意味着一次对年青人的可怕的血腥屠杀。

爱德华·柯奇比克，天主教的哲学家、政论家和从前的游击队员，曾经在1974年从内战的"另一方面"来回忆他的这些同乡的命运，并因此而受到了斯洛文尼亚人的尖锐的攻击[①]。在高特希的同样的森林里，斯洛文尼亚的"保卫家乡者"被枪杀了，其中还有大约三千名的塞尔维亚志愿兵也死亡了，他们曾站在德国人一边为反对游击队打过仗。

对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来说——德拉扎·米哈洛维奇将军的切特尼克分子——国内战争的结局很坏。在战争结束后，他们企图跑到波斯尼亚山区里去，但是，经过长期的几乎精疲力竭的行军活动以后，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交界处的"绿色山区"查伦哥拉，他们受到了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特别部队的围剿。这里大约有三万人在战斗中被消灭。德拉扎·米哈洛维奇在他被捕前同几个随从人员一起逃了出来，但随后不久就被送到法庭并作为卖国贼处决。而这也是内战中悲惨的奇特现象：以第一个作为反对德国侵略军开始活动的人，最后竟作为德国人的走狗而告终。虽然他不喜欢德国人，而是一个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当然——米哈洛维奇过去知道：德国人在几年内会自行走掉并在战争中失败。对于他来说，也许会永远在他国家里站住脚的共产主义，要比德国人的暂时占领具有更大的危险。前途和命运就是这样变化不定的。

但在南斯拉夫，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即使所有反共产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力量都得到一个相同或者相似的结果，克罗地亚人却依然只有一种选择，因为他们是唯一感到自

① 请同爱德华·柯奇比克著的《答复》比较。

已是在整个国家之外的。在新的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整个国家中，从克罗地亚所处的地位来说，很自然地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已经影响了掌权的克罗地亚共产党人。

当然，在形式上，克罗地亚的国家存在于南斯拉夫联邦中。战后不久，流亡在伦敦的国王被剥夺王位以及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成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六个共和国之一，但是共产主义的克罗地亚被缩小在内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范围内——不包括锡尔米亚，自然也不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这些克罗地亚以外的地方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克罗地亚人生活着。这些克罗地亚人在很多情况下感觉到了受排挤和歧视，特别是那些来自乌斯塔沙曾经有过很大影响的地区的克罗地亚人，感受更深。这种歧视又反过来引起了这样的后果：正是在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还依然存在着。帕维里奇狂热的追随者们所创建的同一个地区，也是六十年代晚期克罗地亚很多急进的民族主义学生领袖的故乡——也是很多克罗地亚急进的流亡者的故乡，他们以劫持飞机和在西方搞暗杀活动而成为人们谈话的题材。急进的克罗地亚主义起源很早，今天它还来自各个分散的地区，来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共同生活的地区，来自从前土耳其战争紧张地进行过的地区。克罗地亚人从来没有自己的国家，几千年来他们必须按照种族和复仇的惯例来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实现克罗地亚的理想只有通过消灭真正的或者所谓的敌人才有可能。敌人——这就是过去斯塔尔切维奇称之为斯拉夫塞尔维亚人，或者是卡拉乔治维奇王室

的君主主义的塞尔维亚人，或者是现在的“塞尔维亚共产党人”。

但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在流亡中和有时候在家乡散布这样的说法：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基本上是一个“大塞尔维亚的”国家，这是对的吗？首先人们必须想到：塞尔维亚作为南斯拉夫国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在游击运动中曾经有过某种优势。1944年铁托曾经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的组成是：塞尔维亚人占百分之四十四，克罗地亚人占百分之三十，斯洛文尼亚人占百分之十，穆斯林占百分之二点五，其他民族，包括加入共产党行列的意大利人在内，占百分之六。①

当然，这是很清楚的：与很多塞尔维亚人相比，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参加铁托的游击队比较要晚一些；塞尔维亚人为了生存下去的缘故不得不到“树林里去”（他们由于德国人的压迫或者由于乌斯塔沙的灭绝命令而逃亡）。伊凡·西伯尔，克罗地亚共产党一个老的领导人和游击队的领导人，在他的战争回忆录里相当大胆地、但也不无讽刺地描写了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帕维里奇军队的人员是如何转到铁托的游击队那里去的。如果这样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损害，那末人们就可以说：“船沉耗子散”。面对着他的在最后才改换门庭的克罗地亚同胞们，这个老游击队员说出了含有哲理的话。西伯尔在他的日记本里几乎是轻视地写道：“我认识很多被包围的民团的军官，他们从我们游击队这里，特别是从我这里受到了鼓舞，他们是温顺的，他们很好奇……说不定他们早就到我们这边来了，也许在1941年就过来了，但是情况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① 铁托：《演说和文章》，第一卷，174页。

有妻子、孩子和年老的双亲，又缺少可靠的的联系渠道等等……。”①

但是，同一个伊凡·西伯尔在战争结束时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又遇到了他的“克罗地亚的重大经历”：在占领萨格勒布时，不准绝大多数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萨格勒布军团带领游击队去占领克罗地亚的首府，而是由塞尔维亚人科查·波波维奇指挥的南斯拉夫第二军来占领。这在当时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克罗地亚的老共产党员伊凡·西伯尔：“我们感到我们受到了要弄和欺骗。”他在战争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应该首先进入〔萨格勒布〕，但是我们是最后进入这个和平的、自由的城市。人们干脆是把我们要弄了！”②

这“人们干脆是把我们要弄了”的说法应该成为那些克罗地亚共产党人的主导动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铁托的领导下突然获得这样的印象：克罗地亚人在南斯拉夫国家内部还同样是受到伤害的，尽管形式上保证有平等权利，尽管铁托至少有一半是克罗地亚人的血统。二十年后，我们在这克罗地亚游击队指挥官伊凡·西伯尔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失望情绪，他是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属于以特里帕罗和达普切维奇-库采尔为首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领导集团。1971 年 12 月，在铁托的干预下西伯尔和“克罗地亚之春”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一起被撤职了。

人们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要弄”了克罗地亚和克罗地亚人，这种抱怨在六十年代初首次在讨论中出现——先是在

① 伊凡·西伯尔：《战争日记》，萨格勒布，1960 年，第 380 页。

② 伊凡·西伯尔，同上，第 426 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最密切的领导范围内，接着在克罗地亚党的最高领导中出现，在后一范围内，新的一代年青的共产主义改革派是同“老的近卫军”并驾齐驱的。这样就产生了三个基本问题：

1. 克罗地亚语言和塞尔维亚语言的平等权利问题。

2. 克罗地亚人在政治上和行政上地位受到损害的问题。

3. 克罗地亚受到贝尔格莱德中央和南斯拉夫东部和南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上剥削”的问题。

1964年12月9日，在贝尔格莱德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个年青人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重视：从前的共产主义青年领袖、现在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市党委书记米科·特里帕罗以几乎毫不掩饰的讽刺来反对当时还强有力的人物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兰科维奇当时是南斯拉夫党的最高领导人员之一，作为秘密警察的头子和铁托的亲信有着重大的影响。针对兰科维奇本质上是中央集权主义的主张，特里帕罗宣扬反中央集权主义——首先是反对“积累手段”的中央集权，这就是说，财政要摆脱中央政府，而由工人组织也参加企业的经管。特里帕罗抱怨萨格勒布的工业所受到的损害，抱怨“旧的、行政上的路线”还一直在党内发生重大的影响。[1]

当时，特里帕罗受到了铁托周围最明智的人物之一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的支持和鼓励。作为克罗地亚人，巴卡里奇知道：要把重新变得强烈起来的克罗地亚民族感情溶合到铁托主义的制度里去，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但作为一个有

① 米科·特里帕罗：《不要妥协》，萨格勒布，1969年第16页。

素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巴卡里奇不仅试图解决克罗地亚人的"民族问题"，而且还试图"按照阶级的关系"解决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之间的全部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加强市场经济和"工人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一种适当的政策、经济上的理智和在背后的"启发性的"、好意的党的独裁，都有助于克服南斯拉夫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首先是缓和经济方面和民族方面的差别和矛盾，避免在这方面的形势一触即发。

巴卡里奇在1964年就已认识到：由于南斯拉夫第一次经济改革而活跃起来民族主义可能会给南斯拉夫的各个民族带来危险——这种危险用行政手段和警察手段几乎是对付不了的。因为民族主义现在已经冲进了共产主义的队伍里。"这已不再是一件反动的事情了，就是说已不是乌斯塔沙或者马切克追随者了"。巴卡里奇说道："这是'我们的'民族主义。"[1]巴卡里奇在这种民族主义中看到了一种对中央集权主义的反动，首先是对于"中央基金"的反动，也就是对积累手段集中在贝尔格莱德联邦政府和其他不同程度的国家机构手中的反动。1966年开始讨论南斯拉夫经济时，他已经区分出了三种民族主义的倾向：一种是来自贝尔格莱德中央(而大部分一定是来自设在首都的塞尔维亚的行政机构)的"联合主义的"民族主义。其次是各个民族的，也就是反对中央集权的各共和国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最后是反对"发达的"(这就是说反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不发达的"民族主义。巴卡里奇想通过

---

① 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现阶段革命的实际问题》，151页。

加强自治和通过"联邦的联合"来控制这些紧张的关系。[①]

在牵涉到钱和权力的地方，舒适亲热的情绪就会随着中断，这种认识对1966年兰科维奇倒台后的克罗地亚的局势来讲，也是适合的。秘密警察的头子是被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中的联邦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力量——但首先是被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集体合伙搞掉的。南斯拉夫的新闻界，当时曾打算以对共产主义国家说来很不平常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揭发，来对待秘密的窃听器问题，据说，兰科维奇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房间里，甚至在铁托的宿舍里装上了秘密的窃听器。在萨格勒布揭露出了这样的情况：南斯拉夫的秘密警察在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对一半的公民设有调查档案。由于警察机构的这种没落崩溃，在克罗地亚——但部分也在南斯拉夫的其他共和国——发展速度加快了。这种情况是谨慎的改革家巴卡里奇未曾预料到的，也使他的在分权自治范围内的好意的"教育独裁"的方案陷入了极大的危机。

在兰科维奇倒台后几乎不到一年，经济上的讨论转移到了语言、文化和文学的领域。只是在表面上讨论好象没有什么害处——这里可以引用一下米洛凡·德热拉斯的说法：在东南欧，只要一牵涉到语言的争论，就已经是在磨刀霍霍了。1967年，一批著名的克罗地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发表了"关于克罗地亚语言的声明"。声明公开谴责在语言上重视塞尔维亚语而歧视克罗地亚语，并谴责在公众生活中对克罗地亚语的排挤。声明发起人称这个声明为"关于克罗地亚语的标记和处境的声明"，并在1967年3月15日公开发表，声明把语

① 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现阶段革命的实际问题》，231页。

言问题和党所发动的经济改革联系在一起，它使人毫不怀疑地相信：语言应该当作政治的因素来理解。“民族主权和完全平等的原则也包括我们各族人民中每一个民族的权利——维护各个民族存在之标志的权利；不仅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而且也要最大限度地发展文化。”[①] 这些声明的发起人——有名望的克罗地亚文化联合会、作家协会、克罗地亚笔会中心、语言学家协会以及有威望的南斯拉夫科学院——不仅要求克罗地亚语在公众的和政治的生活中比塞尔维亚语起更强有力的作用，而且他们还从根本上否认“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一致性。这里所要求的不多不少，正是语言上分裂的主张——这样一来，也就首先使事态的发展具有戏剧性。

支持这个声明的不仅有克罗地亚民族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象过去的游击队将军法朗热·杜加曼、作家伏拉陀·戈多伐奇和议员马尔科·维赛利卡——这三个人是1971年前“民族的积极精神”的象征，他们当时还在起作用——而且也有铁托的老朋友、作家米洛斯拉夫·基尔莱查，在这一事件中他失去了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党的领导谴责这个声明，但这改变不了下列事实：在共产党克罗地亚的历史上，一个迫切的问题破天荒地不是由共产党人，而是摆脱了共产党甚至在违背党的意志的情况下，在公众当中进行了讨论。萨格勒布的气氛在这中间已经有了改变，以致对这个声明文件的发起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于是传统的克罗地亚文化协会“马蒂卡·哈尔弗茨卡”（逐字翻译的意思是：克罗地亚的蜂王）变成了一个克罗地亚民族的文化宣传中心。

---

① 1967年3月17日电报。

在1968年以来由“马蒂卡”出版(而在1971年底又被禁止)的《评论》杂志中,克罗地亚作家协会主席彼泰尔·谢杰汀声称:弱小民族存在的意义就在“它自己身上”。所以弱小民族不为任何别的目的效劳,也不要求更大的联合(因而克罗地亚也不会为更大的联合效劳)。当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德的科学院出版了一部科学著作《胡克和克罗地亚人》[1]的时候,克罗地亚民族的杂志《评论》就怒不可遏地表示:塞尔维亚科学院怎么可以出版这种不科学的、歪曲的、使人迷惑的和侮辱克罗地亚人的书籍呢?——这是一部和我们自治社会主义与联邦主义的一切原则相矛盾的著作[2]。

在这里已经表明了“克罗地亚之春”的一个有趣的方面:克罗地亚民族的知识分子在摆脱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开始展开了半政治性的辩论。他们首先是反对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和塞尔维亚的出版物。但过后不久,在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民族知识分子和邻近共和国的党的领导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自从1969年以来“克罗地亚蜂王”的出版物开始探讨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里克罗地亚人的命运问题。萨格勒布的《评论》杂志曾声称: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是克罗地亚人,对此,波斯尼亚党的首脑勃朗科·米库利奇(按照他的民族,他同样也是克罗地亚人)威胁地回答说:我们将让萨格勒布的“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知道我们的厉害,如果他们继续干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事务[3]。

---

① 胡克·卡拉达契奇(1787—1864),塞尔维亚书面语言的奠基人。

② 《评论》,1968年319页。

③ 《评论》,1970年543页。

但是更不平常的还在于：萨格勒布的杂志竟敢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向一个邻近共和国的党的首脑回答要展开一个长时间的辩论。这就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克罗地亚的党的领导是支持“蜂王”周围这些圈子里提出的民族主义的论点的。六十年代末，克罗地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权是在几个年青的干部手中，他们公开作出了决定，要在各个方面把“新鲜的风”吹到克罗地亚政治舞台上去。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的大人物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从第一线撤回来，准备搞点研究，更多地关心一些长期性的问题时，萨格勒布党的领导已由改革派的共产党人来担任，他们一方面是受了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一方面也是随着内部自由化的浪潮开始对贝尔格莱德采取越来越自主的方针。在1970年1月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改革派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突破：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民间的影响下谴责了“联合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并迫使米洛斯·森柯，一个最公开的“联合主义者”，退职。

克罗地亚党的首脑是女教授萨伏卡·达普切维奇-库采尔——一个年轻、精力饱满而具有吸引力的妇女，从外表上看来她同一个女干部的通常的形象毫无相似之处。除了她，米科·特里帕罗是克罗地亚党的一个政治明星——一个机智、功名心切的政治家，在共产党本来意义上看来又是一个非正统的政治家，他和巴卡里奇一起在南斯拉夫党的主席团里代表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的领导首先面临的是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中央集权主义在战后的时代。当时，南斯拉夫投资手段的分

配是不成比例的。克罗地亚领导对南斯拉夫不发达地区以牺牲发达地区为代价而受到促进的做法不满。萨格勒布曾认为：不发达地区是以牺牲克罗地亚共和国为代价而过日子的。其次贝尔格莱德大银行和进出口公司的垄断地位是克罗地亚共产党人的眼中钉。这些企业——它们有自己的中央，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同政治上的联合权力机构打交道——为了产生政治影响，不惜利用它们经济的和财政的权力手段。这种影响是对克罗地亚人起作用的。最后，外汇的分配也起了作用。通过旅游事业和工业而获得南斯拉夫外汇收入的绝大部分的克罗地亚，为了它自己的需要只分到很不充足的外国货币。

特里帕罗显然不仅受到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意大利占领军的眼皮底下在他家乡斯帕里特城升起过红旗的年轻的共产党人，现在声称："我们要的是一个没有强迫劳动的集中营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一个不是由警察领导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一个劳动人民成为政治的积极因素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劳动人民成为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主人并且不再属于不过问政治的没有远见的群众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各民族和人民团体享受平等权利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具有高度生活水平而不是空荡荡的消费品商店的社会主义。"[①]

克罗地亚共产党干部的思想并不是孤单单没有人支持的。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一个马其顿共产党领导人吉尔斯特·契尔文科夫斯基谈到了南斯拉夫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多

① 引自《评论》，1968年第8页。

元论"的必要性。为此他受到了铁托的责备。以后，当"克罗地亚之春"失败时，契尔文科夫斯基也从舞台上消失了。但这不只是萨格勒布共产党领导方面"自由的"基本态度，萨格勒布共产党的领导，在六十年代后期还在共产党周围和共产党以外建立了其他的政治组织和流派。显然，特里帕罗和党的主席萨·达-库采尔想利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种种倾向，以便能够对贝尔格莱德和他们在党内的对手施加更强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两个大人物跑到了前台——两个党员——他们开始控制了讨论，这就是贝尔格莱德联邦议院的议员马尔科·维赛利卡和经济学家西蒙·道丹。两人都持一种急进的亲克罗地亚的立场。道丹在数量可观的文章中提出这样的看法：克罗地亚受到了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的剥削，连剩余价值也被骗走了。对他说来，在铁托的共产党国家中，克罗地亚人的处境比过去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统治下还要糟糕："在旧南斯拉夫，我们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六是在克罗地亚以外的地方花费的，在奥匈时代花费在克罗地亚以外的占百分之五十五，而现在竟达百分之六十三！所以，对于克罗地亚人来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更大的剥削者、因此它比奥匈帝国或者旧南斯拉夫更加不可接受。"道丹还于1971年2月在《杜布罗夫尼克》杂志中是这样写的，随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不仅仅牵涉到经济上的奴役，而且也牵涉到政治上的屈从。"①

当然，维赛利卡-道丹集团在1968年才取得了突破，当时贝尔格莱德的大学在"新左派"的影响下发生了重大的学生

① 引自伊凡·佩里奇：《克罗地亚群众运动的思想》。

暴动。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的反抗差一点是以大屠杀告终的。为了阻止萨格勒布高等学校也发生类似的事件，党的领袖把这两个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送进了听讲的教室。在激烈的讨论中，维赛利卡让克罗地亚的大学生们明白：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的暴动是一个塞尔维亚事件，它和克罗地亚人毫无关系。因此和这个事件不可能有什么团结可言。这又是克罗地亚大学生联盟最高领导改变权力的煽动性的因素，这个联盟改变领导是在 1970 年底和 1971 年初进行的。在一次狂热地进行的会议上，旧的"南斯拉夫的"领导落选了。代替他们的新人是德拉岑·布蒂沙或者是被选为萨格勒布"大学生主席"的伊凡·泽伏尼米尔·奇泽克这样的年轻人，后者标榜自己为"天主教的铁托主义者"并鼓吹一种神秘的民族主义。新的大学生领导不久声称：对于克罗地亚大学生来说，不可能和全南斯拉夫大学生联合会再有任何共同性。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大学生的"政治化"已经被人有意识地推到了中心的地位。"克罗地亚大学生联盟"成了一种热情奔放的民族意识和民族骄傲的突击队——随后不久表明：克罗地亚民族的大学生领袖们，把他们自己的组织理解为战斗组织，而共产党的领导想迫使这些战斗组织继续走"克罗地亚化"的道路。

当然，萨格勒布新的大学生领袖是依靠铁托和自治社会主义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来，他们既抛弃了共产主义思想，也撇开了南斯拉夫联邦国家。有人在一次接见时问过"大学生的代理校长"奇泽克：他是否赞成天主教徒得到更大的自由，这个当时还不到二十三岁的青年自觉地回答说："我一生始终不是提倡天主教徒的自由，而是提倡所有人的自由。中央集

权主义，不管它是天主教的、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也不管人们给它加上一种什么样的修饰语，终究是中央集权主义。不存在左的、右的、社会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的自由。要末是有自由，要末是没有自由，事情就是这样。”①

大学生领袖们因而加入了为克罗地亚利益而进行的战斗——“外汇管理制度”和贝尔格莱德的银行不久就成了不自由和剥削克罗地亚的同义词。但是，大学生运动越是发动并加速开展起来，要求也就越加激进和显得越加刻不容缓了。对克罗地亚党的领导达普切维奇-特里帕罗的支持，在1971年这一年中也变得越来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生们企图压制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领导，迫使它采取急进的反对贝尔格莱德的行动。从克罗地亚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这一论点出发，大学生们在决议中要求在联合国中有克罗地亚自己的代表，并要有自己的克罗地亚军队（但至少是把南斯拉夫武装部队中所有克罗地亚士兵集中起来，由一个克罗地亚的将军指挥）。在为数众多的大学生的鼓掌欢迎下，布蒂沙在1971年11月17日一次斗争的高潮中，在萨格勒布的“尼娜·马拉哥维奇”的大学生之家中声称：克罗地亚必须加入联合国，因为甚至连很多更小一些的国家在联合国也有代表——并表示：“没有自己军队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国家。”这个大学生领袖声称，要为克罗地亚的完全的主权进行斗争，他并且还谈到了一种“肮脏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想把克罗地亚党内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持始终不渝态度的战士——特里帕罗、“萨伏卡”（人民

① 引文摘自《克罗地亚大学生的革新》，萨格勒布，1971年，第175页。

在口头上对党的女首脑的称呼），皮克尔（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党的书记），西伯尔（游击队员联谊会主席）——和“民族的群众运动”分隔开来。①

这样一来，布蒂沙——不管他愿意与否——就向克罗地亚领导内部的民族自由主义集团表明了自己根本的态度：因为现在已经清楚，民族主义的大学生玩弄了使克罗地亚共产党中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把戏。但是这样做也必定在共产党的机构中引起不平静的后果。

除了大学生以外，首先是“克罗地亚蜂王”发展成了党的对立面，并成了克罗地亚民族群众运动的中心。在“克罗地亚蜂王”这个文化组织的周围出现了一个“反对派的新闻界”，它的活动在1971年初出版《克罗地亚周报》时达到了高潮。这家报纸在主编伏拉陀·戈多伐奇——一个著名的作家和抒情诗人——领导下代表了这样一些观点：只有在克罗地亚共产党代表了进步的民族倾向和克罗地亚的利益时，群众运动才能对克罗地亚的共产党加以支持。在这家发行量不久就超过了十万份的周报里，表露了“塞尔维亚侵略”克罗地亚的观点。原来的游击队将军法朗热·杜加曼也在周报里声称：克罗地亚人对联邦国家不能再感到满意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倒是只有通过一种“邦联或者一种国家联盟”才能得到解决。②

对于克罗地亚共产党的“进步”力量来说，和民族的群众

---

① 《政治报》，1971年11月18日。参看兹登科·安提奇“1971年——南斯拉夫政治中戏剧性的一年”一文，载于《东欧评论》，1972年3月号。

② 《克罗地亚周报》，1971年第9期。

运动的合作越来越成为一种骑虎难下的事了。首先是“政治”范围内的急进化活动引起了克罗地亚党的主席团的分裂，这个主席团在1970年1月的第十次会议上已经通过了对“联合主义”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同样进行谴责的决议。但在1971年年初，党的特里帕罗-萨伏卡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没有什么实力了：原来曾经促进改革方针的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开始疏远这方面的活动了。这个曾提出过“实行联邦”要求的大人物，已经不再能够在“克罗地亚不可分割的主权”的道路上一起走下去了。

但是，克罗地亚领导接着在同南斯拉夫其他共和国进行的协商中——在1969年的宪法改革规定的共同协商的联邦制度的范围内——越来越陷于孤立。巴卡里奇在他担任克罗地亚民族的领导期间曾经抱怨过：在贝尔格莱德，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的投票比例是五比一——这就是说，别的所有共和国都反对克罗地亚。

就这样，克罗地亚改革者陷入了困境，处于贝尔格莱德和本地的“群众运动”之间。命中注定了这样的进展情况：他们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越是陷于孤立，特里帕罗和萨伏卡·达普切维奇就越是不得不支持群众运动——这就是说，支持大学生和“马蒂卡”的知识分子，而就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又处于这样一种兴奋状态之中：他们已经不再能够放弃他们激进的要求了。

聪明的观察家曾经徒劳地警告过：要求克罗地亚有自己军队或是人们必须“强迫”党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前进的观点，会完全无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实际权力。在这中间，不

管民族共产主义领袖们怎样丧失了他们立足的现实基地，事实是：女党魁萨伏卡·达普切维奇-库采尔在“克罗地亚之春”失败前几个月曾尝试把克罗地亚民族的所有高级军官，从贝尔格莱德军队和国防部里召集起来开一个会议。这就使得南斯拉夫的人民军有了这样的想法：南斯拉夫的武装力量是否会在这里受到摧毁。

只要特里帕罗提出克罗地亚“完全的平等”、废除特权和一个“可以接受的”政策等要求，他就一定能够得到南斯拉夫其他民族和各共和国的同情。只要女党魁“萨伏卡”谴责“集权主义者”，后者在单独地使用“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和“克罗地亚语”这些词汇时就会有一种“难堪的恐慌感”——而在贝尔格莱德的最固执的官僚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也就很难利用这些东西了。达普切维奇女士在她被废黜以前几个月曾经这样表示：“集权主义者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并不存在一个南斯拉夫的民族。”

她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克罗地亚“群众运动”的民族主义者在 1971 年的过程中想要承认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固然不存在一个南斯拉夫民族，但却存在着一个南斯拉夫国家和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行为表现得政权好象已经是属于他们的了。1971 年 12 月 24 日前后，大学生领袖宣布所有克罗地亚高等学校实行总罢课，当布蒂沙和他的朋友们宣布：罢课要进行到“外汇问题”——也就是向克罗地亚共和国合理地分配财政手段的问题——解决时为止，女党魁的苦苦哀求也不能使他们加以改变，当时改革派和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已经使出了他们的全部力量。在达普切维奇女士

和特里帕罗倒台以前实际上已经对发生的事件失去了控制。大学生们罢课用的口号已经远远超出了"萨伏卡"和特里帕罗——他们绝不是分裂主义者——所能够同意的范围。在克罗地亚的少数塞尔维亚人——占居民的百分之十五——开始武装自己了，因为在他们的队伍中已经流行着这样的看法：不久又会出现象1941年在乌斯塔沙统治下那样的情况，即对塞尔维亚人进行迫害。军队的领导人员全身武装——在萨格勒布已经流行着谣言：萨格勒布武装部门的指挥官热瓦尼奇将军不久就要逮捕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者。老兵伊凡·西柏尔还徒然地向大学生们和急进的民族主义者发出了警告。这位游击队将军以后报道说，在宣布大学生罢课的时候，他已经在民族克罗地亚路线的"对手们"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掩饰不住的胜利的表情。

在这种情况下铁托进行了干预。南斯拉夫党的头子长期来对克罗地亚的发展任其自然。他曾多次提出警告：在1971年4月党的主席团会议上，同年初夏在萨格勒布同克罗地亚领导的一次碰头会上，以及1971年9月他在萨格勒布进行的"国事访问"上——在这次访问时，他受到了仪仗队和奏克罗地亚国歌的欢迎，真好象他是一个外国的国家首脑似的。但是总起来说，他对克罗地亚的领导至少在外表上还是维护的。"萨伏卡"和特里帕罗还一直是他所信任的人——特里帕罗甚至还是作为铁托的宠儿而开始他的官场生涯的。铁托究竟是由于闹得不可开交的内政事件或外交政策而开始进行干预的，这一点直到今天还很难判断。也许是由于两方面的情况加在一起的缘故——因为苏联的党魁勃列日涅夫1971年9

月到过南斯拉夫并在这种场合下作过一个稀有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在苏联，所有不同的民族彼此都很好地，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暗示受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争端震动的南斯拉夫，最好是马上接受苏联的制度吗？如果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控制不住，勃列日涅夫不是可以尽可能地用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来威胁铁托吗？1971年12月当民族主义者的战役被打败以后，铁托说了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军队在国家里维护秩序，总比一个外国军队要好一些。"苏联人是否曾经用他们的制度所具有的权力进行过威胁——或者是：南斯拉夫党的首脑是想用这样一些启发人的远景来促使有反抗性的南斯拉夫人接受纪律？

无论如何铁托已经认识到：在克罗地亚的民族共产主义或多或少地自愿参与的情况下，克罗地亚的群众运动必定瓦解党的统治基础。"老头子"不仅看到他的列宁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的方案受到了威胁，而且他也预测到内战的危险。但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的越轨行为，就得考虑到外国的干预问题——主要是从东方集团来的干预。

于是他自己就进行了干预。1971年11月30日，他把全部克罗地亚的领导人召集到贝尔格莱德北面的打猎行宫卡拉乔尔杰伏开会。会议进行了两天。铁托同克罗地亚人讨论的一部分记录落到了西方人手里，并被一份克罗地亚人在美国的报纸发表了①。没有理由对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加以怀疑。

按照这份材料，当平时这样自觉的女党魁"萨伏卡"在会上出现时，她已经受到了挫折。她以软弱无力的辩护的言词

① 参看芝加哥《晨星报》，1974年1月16日。

进行了自我批评——她承认：人们对民族主义者没有进行足够的斗争，但是说她"萨伏卡"曾经阻碍过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却是不真实的——她又一次试图取得铁托的宽恕。但是，她在批评者的打击下，首先是她的继承者米尔卡·帕朗妮奇同志对她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评，这个过去曾经在人民口头上被称为"克罗地亚的无冕女王"失势了。大学生的罢课才使得她明白：她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对于现在这种局势她是这样来理解的：两个世界强国把它们的情报工作的线索已经公然挂到克罗地亚的发展上来了。但是米尔卡·帕朗妮奇却说：在克罗地亚党的领导人中，并没有相互的信任，甚至彼此没有来往。民族主义使得党受到了伤害，民族主义也渗透到了共产主义的队伍里去了。"萨伏卡"—特里帕罗事件的批评者谈到了"南斯拉夫的破坏"，谈到了民族主义的过火行为，谈到了"萨伏卡"—特里帕罗—皮克尔这"三个人"在没有正式的党的领导的参与下订立的秘密协定。铁托愤怒地谴责说，要是这一次人们又各自东西，作不出一致的决定，对此他将不能容忍。参加会议的人必须清楚：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已经被人"憎恨"了，而他作为国家的首脑，必须听一听这样的批评意见：为什么他使事情发展到了这步田地。

在整个会议期间，"民族主义派"的追随者处于守势。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他们的战役已经失败了。特里帕罗试图谈一谈有关信用贷款方面克罗地亚所受的损害和党的领导反对斯大林主义斗争不够的问题——但是当他提到"群众运动"的时候，铁托打断了他的话。当某人在口头上提到"群众运动"这个词的时候，南斯拉夫党的头子就会有敏感的反应——对

于铁托来说，群众运动就是一些"没有定形的群众"，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联盟(共产主义群众组织)不能监督他们，党也不能监督他们。

最后，铁托谈到了他的下级领导人过去提出来的"腐朽了的自由主义"和对阶级敌人斗争不够的问题。铁托对着民族共产主义者斥责说："在你们看来，占第一位是克罗地亚国家和主权"。"我现在要听一听你们的说法：你们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主权和什么样的国家？难道是一个国王托米斯拉夫的阶级国家吗……？"① "如果你们终是把克罗地亚民族放在第一位，而把别的民族都当作这个民族的附庸，那末你们就是对事情作了很不好的修正……如果你们总是想把单一制度与民族沙文主义提到一个新的阶段，你们将什么目的也不能达到……"最后铁托还谈到：在克罗地亚，沙文主义有"最肥沃的土壤"——并警告，群众的精神状态可能会引起一场内战。但最重要的是：他对克罗地亚民族共产主义的领导失去了信任。这样一来，"萨伏卡"—特里帕罗集团的命运也就被确定了下来。他们二人回到萨格勒布也只有下台而已。

接着在克罗地亚出现了一场"清洗"，1971 年 12 月和1972年头几个月，大量党员被捕。从克罗地亚政府的首脑到萨格勒布铁道部门的负责人，从克罗地亚沙布尔(议会)的副主席到"第纳摩"足球俱乐部的干部，从电视台的总经理到杜布罗夫尼克联欢节的负责人等几百名曾经吹捧过"民族兴奋状态"的干部，都不得不丢掉他们的乌纱帽。"克罗地亚蜂王"也

---

① 托米斯拉夫是第一次独立的克罗地亚王国的第一个国王，公元 925 年加冕。

被关闭了，它的报刊杂志也停办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被捕了。连大学生领袖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包括“大学代理校长”奇泽克在内。

罢课的大学生极其愤怒地走上了大街并有节奏地高喊“‘萨伏卡’—特里帕罗！‘萨伏卡’—特里帕罗！”——对这些人来说，大学生的罢课行为使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了生命。但是骚动不久就平息了。警察被调来包围了大学生宿舍。一个新的党的领导在米尔卡·帕朗妮奇的领导下掌握了权力——他们是被推翻的掌过舵的“民族主义者”的对手。没有人再谈论克罗地亚的主权了。达普切维奇夫人和米科·特里帕罗从政治上消失了，并在萨格勒布过着隐退的生活。

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回光返照的结果表现了两种情形：第一，一个共产主义国的国家——即使它是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上——也不能忍受自发的政治活动和多元论。第二，这一次又表明了斯塔尔切维奇曾经抱怨过的克罗地亚的分裂状态。除了民族的集团以外，党内还有一个持“南斯拉夫”思想的派别。这并不是说：特里帕罗和其他人不拥护南斯拉夫——但是，象实际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是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南斯拉夫：一个所有克罗地亚要求独立的愿望都能实现的南斯拉夫。但这必定是一个梦想。一个联邦国家就意味着放弃民族的主权。一个共产主义一党制国家意味着：权力必定属于党和它的领导。民族共产主义者把自治（它是完全应该有的）和独立（绝对不应该有的）混淆起来了。如果人们可以对“克罗地亚之春”的领导提出指责，那就是指责他们对形势缺乏现实主义的估计，他们既没有掌握住也没有利用可能做得

到的事情。

在“回光返照”以后的垂手丧失的时刻，克罗地亚的天主教会表明自己是一支民族的力量。令人难忘的是萨格勒布主教库哈里奇在“克罗地亚之春”垮台后不久表述出来的传道词，他在这中间强调：上帝赐给了每个人一个祖国，也赐给了每个人对这个祖国的爱。这样也就再一次表明了：克罗地亚的天主教正是克罗地亚民族意识的中坚力量——它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越了信仰和做礼拜的范围。正因为克罗地亚人在他们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许多不幸和失望。牧师的慰藉就发生了它的作用。这一点共产党的政权也是尊重的，当然有时候也得咬牙强忍着。

这样当然也就出现了一种倒退现象，这特别是在“卡拉乔尔杰伏”会议以后的头一年里，表现得很明显，直到今天还可以感觉得到的是：在克罗地亚的政权中有着一种尖锐的对立——但不仅仅是在政权里面。与此同时，被撤换的民族共产党人在经济上的愿望大部分得到了满足。克罗地亚共和国今天明显地掌握了更多的外汇，在投资政策方面，也处于比七年前更为有利的形势中。克罗地亚人曾经激烈地抗议过的贝尔格莱德银行的权力也大大地缩小了。

克罗地亚民族意识是否象今天所表现的那样，可以通过排挤而加以控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克罗地亚之春”不仅没有表达出民族的和民族主义的毒素——在它的正面和反面的意义上来说。克罗地亚在外国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积极性（包括谋杀和劫持飞机）表明：克罗地亚民族至少有一部分人抱着一种梦想。难道这是一个在一千年内不能实现的国家

独立的梦想吗？难道这是从 1941 年到 1945 年发生的、现在还在流亡中进行的残酷的内战吗？

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共产主义政权的障碍在于：根据意识形态的和实际的原因去实行一种政治上的妥协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一来，克罗地亚的地下斗争部分会在南斯拉夫以外，有时候也会在南斯拉夫的内部继续进行下去。自然，对于极端分子来说，"克罗地亚之春"的失败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合适的解决，不可能符合宣称其目标是消除作为国家的南斯拉夫的那些人。但是这个南斯拉夫是否能够生活下来，这将会在"克罗地亚的问题上"得到证实。希望有成效地、从向前看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失败了，并且又被铁托亲自取消了。如果铁托的继承人有朝一日掌握大权，克罗地亚问题又会摆到桌面上来。

马其顿的争议和科索沃问题

存在着没有被其他国家承认的国界。也存在着相互拒绝外交承认和政治承认的国家。就象美国，直到今天还不承认1940年被苏联吞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的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外国，因此在两个政府之间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也就是说没有大使，而只有“常驻代表”。共产党中国一再不承认台湾和设立在那里的国民党中国政府，而且这种不承认甚至到了如此地步，中国人每一次都力图阻挠“另一个”中国参加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

虽然如此——这些事件多半只是对国家或国界而言，只是对特定的政府和政治制度而言。但是，至少在欧洲有着一个民族，它的整体存在不被它最重要的邻国之一所承认，而且简直不想知道有这么回事。这个民族就是马其顿人——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小民族。绝大多数马其顿人居住在南斯拉夫，他们在那里拥有一个自己的名曰“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共同体，它属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六个成员国之一。这个马其顿共和国只包括了马其顿的一部分土地，虽然这是马其顿地区最大和最重要的部分。这里居住着它全部居民中的一百六十万人。马其顿的另外两个部分，今天是保加利亚和希腊的领土。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根据流经它中心地区的河流，也称为“瓦达河-马其顿”，它在战略上和交通位置上都位于不寻常的重要地区。

但是，那个不愿意知道马其顿民族的邻国就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苏联在巴尔干半岛上最亲密的盟国。一方面是不承认，另一方面是保加利亚受莫斯科的约束，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就构成了“马其顿争议”的重要性，而且也可能构成了这个问题的爆炸性——一种远远超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双边关系的爆炸性。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谁控制了横贯马其顿向南流向希腊爱琴海的瓦达河河谷，谁就控制了通往希腊北部地区的通道。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东与保加利亚毗邻，南与希腊接壤，西部连接阿尔巴尼亚，北部紧靠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共和国，象一只转盘一样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区。从前的侵略者就已经知道，瓦达（希腊人称作阿克西奥斯）河谷不仅是贯穿南北的通道——向北直达贝尔格莱德，向南则通到希腊的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更进一步说，还存在着一条历史上的征服和控制的东西向轴线：谁掌握了马其顿的西部边境，就只需轻而易举地跃过不到一百公里而横贯阿尔巴尼亚，并到达奥特朗托海峡的地中海海岸——这就要再谈到一个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重要的地点：亚得里亚海与爱奥尼亚海的交界处。谁要是控制了这一条海岸线并且拥有必要的军事手段，他就掌握了东地中海最有吸引力的一条海岸的控制权。

当人们现在来观察这些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以及在索非亚和马其顿的首府斯科普里之间关于马其顿的语言

和文化及其存在与否的问题所进行的成年累月的论战的时候，必须把这一切都考虑进去。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各式各样的语言矛盾和民族矛盾，而且今天仍然有着这类矛盾。如果一个大国——今天应当说是一个超级大国——卷进这些矛盾之中，事情就变得危险了。

对于那些不明底细的观察家，他们在最初的一瞬间所看成的那种无谓的争论和穿凿附会的现象——举例而言，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学者在国际会议上对于是否存在马其顿语言的问题所引起的争吵——由于"苏联老大哥"出席时的沉默不语而可以了解其意义。这位老大哥感到兴趣的并不是生活在南斯拉夫的一百六十万马其顿人，也不是保加利亚国家在历史上对马其顿据称是有理的或是无理的要求。苏联感兴趣的是权力、战略地位和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它还感兴趣的是对两个伙伴之一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是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

巴尔干半岛上那些小的斯拉夫民族无例外地都经历过艰辛的命运，并且为本民族的生存进行过痛苦的斗争。可是在欧洲的东南部，没有任何别的民族象马其顿民族那样，不得不如此长期地为了承认、存在、一致和民族的统一而进行斗争。马其顿的命运之所以对德国人富有教益，因为自从半个多世纪以来——自从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以来——这个民族就不得不在分裂的状态中生存。当时，马其顿的极大部分归属于塞尔维亚王国，即今天南斯拉夫的前身。南部马其顿并入希腊的版图。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在希腊的领域以内禁止使用马其顿语言。斯拉夫的马其顿民族特征在希腊

的马其顿已被完全消除干净，或者说已被全部同化。在那里约有二十万斯拉夫的马其顿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居住在"爱琴海的马其顿"，如今只残留下些微的痕迹。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流亡者，都被迁移定居在希腊北部的许多斯拉夫民族的城市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希腊当局就以难以想象的彻底性和残酷性，对从事农业的斯拉夫人推行了"希腊化"。

导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4—1950年的希腊内战，就这方面的意义来说，并非只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的争端。它也是斯拉夫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冲突。马其顿民族团体的残存分子追随希腊共产党，因为他们期望有一个自治的马其顿国家，或者希望至少尊重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有些人甚至梦想应该把这个地区的南斯拉夫、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疆域重新统一成一个"大马其顿"。但是，在共产党人的起义失败之后，斯拉夫的爱琴海马其顿人不得不逃出希腊——有几千人抵达南斯拉夫，他们移居到了在自己的同乡之中的马其顿共和国。另一部分到了保加利亚，他们在那里必须"保加利亚化"。再一部分人则分散遍及整个东欧。

在1945年和1950年期间对希腊马其顿的斯拉夫马其顿人进行清算之后，除了南斯拉夫领域之外，仅有另一个地区还保存着马其顿的居民，那就是：皮林马其顿，这是索非亚以南的一块地方——在布拉戈耶夫格勒（丘斯滕迪耳）和佩特里奇之间，在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三个国家的三角地带。在1944—1945年共产党接收政权之后不久，这儿大约有二十六万人算作"马其顿人"。在1956年官方公布的保加利

亚的人口统计中，也就是在还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在保加利亚的五个地区——布拉戈耶夫格勒、戈策—德尔契夫、桑丹斯基和拉兹洛克——总共还有十七万八千八百六十二人被称为不属于保加利亚民族，而属于马其顿民族。这总算还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七——虽然保加利亚政府对马其顿问题的态度已经变得极端，而且有许多事情看来也因之不值得介绍，但总算还承认这个民族。而在1965年保加利亚的人口统计中，皮林地区的马其顿人的数字突然减少到了八千人(1)。在索非亚新政策的标志下，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全部被“指定”成了保加利亚人。在1971年最近的一次人口统计中，突然已经不再有马其顿人了。从这个时候起，在南斯拉夫马其顿地区的首府斯科普里，就有人说对皮林地区马其顿人的做法是“统计学上的民族屠杀”。因为保加利亚政府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此期间完全回到了一种“大保加利亚”的立场，就象1944年以前曾经在索非亚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立场：不存在马其顿民族，马其顿不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马其顿人原来就是保加利亚人——就象在保加利亚的出版物上所出现的那样，如果这对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居民适用的话，那么对保加利亚的皮林地区也适用。那里不存在马其顿的人民，不存在马其顿少数民族。

就象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在二十年内，一个民族群体由二十五万锐减到了零，而且是在没有战争和外界灾难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欧洲现代史上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被周围世界注意到的一个篇章。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在语言上和种族上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民族。他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经历

过几个历史时期，在这些历史时期中，他们之间未曾有过或者只有微小的区别。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上的形成都可追溯到公元六、七世纪。当时，斯拉夫人侵入了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并且定居了下来。今天在保加利亚的学者和南斯拉夫马其顿的学者(和政治家)之间爆发的争论，也就是巴尔干半岛上南部斯拉夫人是否算作保加利亚人，或是算作马其顿人的争论，它给人以类似奇怪的印象，就好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西姆布赖人[1]和条顿人是否感到自己是德意志人，或者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是否感到自己是英国人。民族形成为今天的样子，要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在巴尔干半岛，由于土耳其人统治达五百年之久，这个过程就拖延得特别长。"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从保加利亚人那里，从都兰蒙古人种族那里，得到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来自俄罗斯，由北方渗入，并给自己建立了国家的组织。保加利亚的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保加利亚的历史学家强调马其顿人是保加利亚民族的一部分。马其顿人则否认这一点：从公元七世纪一直到1912年，也就是在十一个世纪期间，马其顿人只有一个世纪稍多一点的时间，处于保加利亚的统治之下。斯拉夫的传道始祖吉列尔和梅托迪乌斯(公元九世纪)也不象索非亚所强调的那样是"古代保加利亚"的奠基者，而是"古代斯拉夫"或"古代马其顿"的奠基者。斯拉夫传道始祖的门徒圣克利门特和圣瑙姆大约在公元九百年从奥赫里德湖出来朝圣，并在教堂里传播斯拉夫的语言和文字，他们也同样是"马其顿斯拉夫人"。克利门特应该

---

[1] 西姆布赖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支系。——译注

是在当时保加利亚帝国的拜占庭主教中被任命为主教的第一个马其顿斯拉夫人，马其顿在当时属于保加利亚帝国，所以马其顿首府斯科普里在叙述历史时所提出的那些事件，都应该是为拒绝“大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要求服务的。[1]

这些经过了一千年之久的状况和事件，由于以下情况而具有戏剧性的特征，即保加利亚教会把这两位朝圣者和传教的大师看成是保加利亚的民族圣人，并把他们在奥赫里德地区活动的地方看成是保加利亚的民族圣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结盟的沙皇鲍里斯的保加利亚，以“保加利亚的民族圣迹”必须归还给保加利亚这种明显的侵吞理由，得到了直至奥赫里德湖的马其顿。只是乍看起来使人吃惊的是，现今的共产主义的和无神论的保加利亚居然以迂回的方式接过了这种要求。在东方集团的其他地方，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都转而反对苏联，在保加利亚却出于各种原因而采取了相反的方向：它转而对准西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准着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斯拉夫的马其顿人有着从一个在他们诞生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帝国接受过来的名望，那就是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同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头几次的解放活动相一致，在十九世纪，这些马其顿斯拉夫人的“民族觉醒”在反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土耳其异族的统治中发展起来。在此期间，当时拥有萨洛尼卡的马其顿陷入了新成立的巴尔干半岛诸国的相互斗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都企

---

① 斯拉夫科·迪梅夫斯基：《奥赫里德大教区“往昔的光明”》，斯科普里1968年版，第6—8页。

图对马其顿提出主权要求。俄国、奥匈帝国以及那时的其他大国都卷了进去。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阻扰建立一个包括马其顿在内的大保加利亚——这样，直到1912年，直到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马其顿仍保留在土耳其手中，而在保加利亚人第二次徒劳地谋求把这一地区归为己有之后，马其顿被并入塞尔维亚王国。因此，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马其顿是欧洲处于土耳其奥斯曼统治之下为时最长的地区。

马其顿人在一系列的起义中谋求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大概在十九世纪末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在萨洛尼卡的一个民族主义的秘密团体。在这个反对土耳其人的抵抗组织里夹杂着"自治的"大保加利亚影响。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进行暗杀活动并准备武装暴动。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是名叫戈泽·戴尔切夫的小学教员，他成为反对土耳其人的起义运动的领袖，并且成了第一个具有马其顿民族思想的人。1896年，戴尔切夫写信给俄国将军尼古拉耶夫："我们不容许把马其顿当作侈谈政治的话题，我们也决不容许别人这样做。我们在将来也不会允许别人来决定我们马其顿人是否应该生或死的问题。人民的血是宝贵的，我们要解放的不是尸体，而是要解放一个生存着的、繁荣兴旺而又生气勃勃的民族。"

戴尔切夫在1903年被土耳其军队枪杀。他未能再经历本民族的民族自决。但是在马其顿，人们至今仍熟悉七十年前产生在他家乡的那首民歌：

"土耳其的毛瑟枪
杀死了戴尔切夫，

英雄和新娘马其顿
同这被奴役的黑暗的家园
缔结了良缘。”

戴尔切夫死后不久，1903 年 8 月 2 日爆发了伊利亚节（伊林节）起义[1]，起义遭到土耳其人的血腥镇压，奥斯曼军队采取的报复手段烧掉二百多个村子，四千六百九十四人被杀，七万人无家可归。十年之后，土耳其的统治结束了。但是在 1913 年兼并了这块土地的塞尔维亚人没有带来民族的自由。在贝尔格莱德王朝的统治之下，马其顿人被当作南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为争夺马其顿的斗争在继续。塞尔维亚的武装的恐怖笼罩着这块土地。巨大的政治事件起着作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都曾经决定反对塞尔维亚即反对南斯拉夫，因为它想夺回马其顿。但是，马其顿人（这场斗争是在他们的脊背上开展的）从对他们各个时期的“解放者”的失望中，开始意识到了这样的事实：马其顿人是独特的。早在 1903 年的伊利亚节起义之后，就曾出现过一篇文章，马其顿人克尔斯特·米西尔科夫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特殊的马其顿民族”的主张。二十年之后，当马其顿已经处于贝尔格莱德的统治之下时，就是这个米西尔科夫声明：“不论是拜占庭还是保加利亚，不论是塞尔维亚，也不论是土耳其，都不能改变马其顿的性质……马其顿的文化和马其顿民族的历史都有别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文化和历

[1] 8月2日（俄历7月20日）为东正教伊利亚节，即伊林节。马其顿人民在这一天举行了反对土耳其的起义，这次起义被称为伊利亚节起义或伊林节起义。——译注

史……。"[1]

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当时被贝尔格莱德的王室政府称为"南部塞尔维亚"，并处于持续的塞尔维亚化的压力之下——仍然是一个不太平的地区，在那里相互交替地进行着地下活动和惩罚性的讨伐。1934年，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和克罗地亚安特·帕维里奇的乌斯塔沙一起参加了暗杀国王亚历山大。许多马其顿人感到自己为保加利亚所吸引——如果说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曾经有过一个机会的话，那就是在1941年，当他们同德国人一起占领了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在许多地方都被当作解放者来欢迎。但是，马其顿的兴奋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期：现在是保加利亚人步着塞尔维亚人的后尘，扮演了统治者的角色。保加利亚当局丝毫没有从南斯拉夫一尔维塞亚的错误中吸取教益：他们把这个地方看成是流放地，并且为了把这些据称是"道德败坏的保加利亚人"重新转变成为"真正"隶属于保加利亚的民族，派出了一批最无能和最愚蠢的官吏和军官到这个"被解放的地区"去。但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的驻防军好象不是置身于兄弟之中，而却象逗留在一个敌性的国家。然而保加利亚的影响遍及许许多多个共产党的地下小组，这些组织当时始终没有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影响而归向索非亚，然而它们却隶属于同样处于地下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对贝尔格莱德的大塞尔维亚路线作了批判，并且同地下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左派缔结了

① 布拉热·里斯托夫斯基：《马其顿人民》，斯科普里1968年版，第19—20页。

联盟。共产国际和左派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莫斯科这种反南斯拉夫的态度至少间接地给保加利亚带来了好处。

这就是铁托为什么在1943年把自己的亲信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派到马其顿去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这块地方，游击战争并没有象从前的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那样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也因为在这里，与克罗地亚相似，多数居民的境况毕竟不象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那样难以忍受。马其顿比起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在这方面要稍好一些。保加利亚军队的干涉，总的来说不能同乌斯塔沙的恐怖统治相比拟。

更为明显的是，1942年在这一地区的崇山峻岭间终于成立了第一支游击队的联合部队。发生了同保加利亚和德国军队的战斗，对于德军来说，马其顿是他们从北方到希腊的重要补给枢纽。此时在马其顿成立的游击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并忠于铁托，但是他们却仍旧沿用过去抵抗土耳其人而组织起来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革命者的名字——如："格鲁耶夫女士"或"娅奈·桑丹斯基"等。为此需要表明，抵抗并不是以恢复大塞尔维亚影响的名义进行的。铁托立即觉察到了，塞尔维亚的地位在马其顿是毫无希望的。对于南斯拉夫来说，如果马其顿能够被拯救，由于各个游击队所持的第三种立场，因此它就既不是保加利亚的立场，也不是塞尔维亚的立场，它只能是在南斯拉夫联邦范围里的一个独立的马其顿。在这个问题上，铁托以其行动证明了他是这块不大的、然而是重要的马其顿土地上的大师，甚至在以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铁托也成为"不偏不倚"的大师之一，他不断地探索着第三条道

路。铁托支持马其顿共产党人要从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那儿获得独立的要求，他又接受了旧有的民族主义的口号："马其顿属于马其顿人！"他在共产党员的思想里注入了民族主义。他不只是消除了通过学校、教堂、行政机关和文化倾注在这个地区的严重的、一时还没有失效的保加利亚官方的政治宣传和文化宣传；为了在马其顿建立自己的地位，他还强使乐于利用起源于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的吞并政策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承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要求。如果铁托的这个政策没有成功，那么在1944年，也就是在苏联向保加利亚进军的时刻，南斯拉夫的马其顿恐怕就有可能留在索非亚的控制之下。欧洲东南部的力量对比也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苏联在今天就可能占有这块在黑海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通行无阻的重要地区，阿尔巴尼亚就决不可能同莫斯科断绝关系，而一个没有马其顿的"铁托主义的"残缺不全的南斯拉夫是否能够存在，看来也是问题。

但是可以说铁托的政策得到了成功，因为他的政策建立在马其顿居民一定的感情基础上。马其顿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在1943年10月的布告，不仅号召为反对大保加利亚和大塞尔维亚而斗争，而且在这份布告里充满自豪地宣告："兄弟姐妹们，马其顿的男女老少！在我们的光荣历史上，今天第一次有了我们自己的年轻的民族军队！"布告同"伊林节（伊利亚节）这个光荣的日子"和克鲁舍沃共和国联系在一起——这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两次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但在同时，它宣布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兄弟般的联盟的团结"以及"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其中

也应该包括保加利亚的人民。①

1944年8月2日——1903年马其顿伊林节起义纪念日——“马其顿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在普罗霍尔·普钦斯基修道院开会。情况完全同1943年11月29日（自此以后就是南斯拉夫的国庆节）在联合的基础上成立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一样，马其顿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在马其顿这个地区的政府核心。共产党人再一次提到了前几十年的民族起义——主要是“伊利亚节”起义。马其顿重新被称作南斯拉夫联邦里面的“联邦的国家”。但主要的是：委员会决议使用马其顿的民族语言作为马其顿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正是这一步清楚地表明了，马其顿的共产党人想同所有的邻近民族划清界限。在宣言中称，为争取承认马其顿人民的民族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也永远是为争取承认马其顿的民族语言而进行的一种斗争。马其顿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在宣言中控诉道：“……四邻的巴尔干国家的政府无一不是在对马其顿的独立进行帝国主义般地侵略中，否定马其顿的民族语言并且用禁止使用马其顿的民族语言来推行对马其顿用族的同化。”

对于欧洲东南部的那些弱小民族来说，语言问题同时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也就没有了民族的同一性。如果后来象保加利亚方面所说的那样，马其顿的语言根本不是一种语言，而只是一种经过高度“人为”发展的

① 米哈伊洛·阿波斯托尔斯基：《人民解放军和马其顿游击队总司令部的布告》，斯科普里1968年。

方言;这样就将引起一种后果: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随时准备为了这种语言以及为了马其顿的独立而拿起武器。而且马其顿语言也不可能是铁托的"发明"。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了马其顿文学——然而西利尔字母[①]的马其顿变体和正字法到了 1945 年 5 月才被官方采用。

即使我们应该承认保加利亚对以往历史的论据,但这些论据在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就是说在此期间有了用马其顿语言创作的大量马其顿文学。好几代年轻人都在这种语言中成长起来。到底是马其顿的语言造成了马其顿的民族意识,还是马其顿的民族意识造成了马其顿的语言,这个问题同鸡与鸡蛋的问题相似——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实际上,马其顿人形成当今这样一个民族显示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语言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可能是唯一的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如果语言的一致也必须意味是民族意识的同一性,那么就会使原本不是一个民族的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瑞士人变成一个民族,或者使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变成一个民族了——两者并不是一个民族。历史上的共同形态是变幻无常的。有可能马其顿人在某个时期曾一度认为自己是保加利亚人——就象荷兰人曾一度感到自己是德意志人一样。但是,在外部事件的压力之下,民族的感情和民族的自我承认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在最近的历史上就经历过奥地利的例子:也是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对老大哥的失望而导致对自己同一性的觉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如果许多奥

① 西利尔在公元九世纪为希腊教斯拉夫民族所创的文字,为现行俄文字母的本源。——译注

地利人表示怀疑，他们是否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了。

当然，马其顿的独立不会发生在真空之中。一个象马其顿那样的小民族，在实现民族愿望的时候总要依赖合适的政治形势和政治处境。德国的失败，使保加利亚由此而陷入困境，铁托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成功，以及在战争后期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之间出现的密切关系、在铁托和盖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之间出现的密切关系（他们两人还是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时期认识的），以上这些原因都不应该忽视。1944年秋，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以或多或少的暴力方式，在索非亚清算了旧政权中的代表人物。在同本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和反共分子的斗争中，马其顿问题正合他们的心意。此外，铁托和季米特洛夫曾有过创建一个包括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巴尔干联邦的计划。在这样一个联邦的范围里，似乎有可能建立一个大马其顿，它不仅包括了自从1913年以来属于希腊的部分，而且也把保加利亚的皮林马其顿置于斯科普里的马其顿共和国的主权控制之下。希腊的内战就是在这些计划的背景下展开的，但这也是斯大林对铁托的第一次不信任。特别是在1945年以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首脑显得非常自负。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创建一个巴尔干联邦的企图被斯大林评价为反苏的阴谋。莫斯科不需要足以在巴尔干半岛上发展成为一股更大的和更为独立的势力的大型联邦。这样，在铁托和斯大林之间就产生了矛盾，马其顿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起了作用。

自从1948年以来，随着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的破

裂，创建巴尔干联邦的全部计划告吹，希腊共产党人胜利的希望以及希腊的马其顿和马其顿其余部分的重新统一的全部希望也告破灭。同时，保加利亚的态度也起了变化：1944年和1945年，在保加利亚部分的皮林马其顿建立了一个新的、置于共产党影响之下的自治形式的索非亚政府——以作为以后同斯科普里的共和国联合的第一步。但是，这些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也很快失掉了对这一步骤的兴趣。在巩固共产党在保加利亚的统治和清除反对派的情况下，共产党的干部们也被告知，现在所涉及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把保加利亚的国土转让给另一个国家的问题。保加利亚人起初解释道，他们只能在一揽子解决的方案中交出皮林马其顿，也就是只有在建立包括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大联邦的情况下，或者至少是在建立南斯拉夫共和国与保加利亚的联邦的情况下，他们才能交出皮林马其顿。因为这件事遭到了苏联的否决而未能实现，皮林地区的马其顿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失却了巩固的基础。虽然如此，那里还为占压倒多数的自认为马其顿民族的居民提供了一个马其顿剧院和文化生活。马其顿民族也被保加利亚官方所承认。但是，政治结论姗姗来迟，而当斯大林宣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有罪的时候，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声称，南斯拉夫——从而也包括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是“法西斯主义的”，人们不能要求把住在皮林地区的马其顿人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交给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联盟。

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逐步地收敛了他们对“马其顿”的自白和承诺。但是，当赫鲁晓夫和铁托在1955年言归于好的时候，在马其顿问题上的季米特洛夫政策才真正加以放弃。自

从1958年以来，保加利亚官方的历史学家提出论点说，象马其顿的语言一样，马其顿之为民族也很少有根据。保加利亚的党魁托多尔·日夫科夫把马其顿的伊利亚节(伊林节)起义说成是"保加利亚一千三百年历史的源泉之一"，马其顿从前的革命者都被称为保加利亚人。保共的历史学家公开恢复了过去大保加利亚的倾向——首先恢复了圣斯特凡诺和平的看法，保加利亚原应该在土耳其人失败以后，通过这次和平获得整个马其顿(这在1878年遭到阻碍)，并且还恢复了十九世纪东正教保加利亚教区的活动。教区的保加利亚化政策，在1945年曾被索非亚的共产党人谴责为反动的和民族主义的——而今却被他们描绘成进步的业绩。

虽然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政策，直至今日在各个方面都把伟大苏联作为榜样来紧跟，怎么会发生保加利亚的马其顿政策明显地不注意到苏南关系的改善呢？特别是在苏联入侵布拉格之后，人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布拉格事件之后不久，索非亚科学院好象是偶然地在1968年11月出版了一份《关于马其顿问题的政治历史情况》，文章对南斯拉夫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且确认："对历史事实的严肃分析表明，马其顿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种族的单位，也不是独立的民族单位。马其顿是一块地理上的地区，象色雷斯、麦西亚和多布罗加等地区一样。马其顿的名称是一个地理概念……"。①

这是迄今为止最尖锐的挑战。然而更有甚者：在这份《情况》中声称：马其顿的解放运动被盖上了"保加利亚民族意识"的印记。之后还谈到了马其顿共和国中的保加利亚人所受的

① 摘引自《从承认到否认》，斯科普里1970年出版，第447页。

压迫——而在最后，保加利亚科学院号召"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向苏联靠拢"，以"阻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国际帝国主义对巴尔干半岛的计划"。

毫无疑问，没有保共最高领导的同意，保加利亚科学院不可能出版这样高度政治性的文章——而且可以肯定，永远强调要使自己整个都适应苏联路线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同意，也不可能对马其顿，从而也是对贝尔格莱德的立场进行如此广泛的攻击。在苏联入侵布拉格之后的几个月，在欧洲的东南部不言自喻充满了恐惧和神经过敏。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不得不认为布拉格发生的事件是对他们本身的直接警告。这时，保加利亚——以科学院论文的形式为装饰——把一份等于是几乎不加掩饰的民族要求的文件放到了桌面上。因为如果马其顿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马其顿的语言只是保加利亚的一种方言，马其顿人统统都是保加利亚人——除了要求把马其顿合并给保加利亚之外，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呢？这种主张必然给马其顿带来动荡不安，并从而危及南斯拉夫的国家统一。

乍看之下也许会使人惊异，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围绕马其顿问题的冲突也在宗教领域展开了争论，虽然有关的双方是两个共产党国家，它们都绝对信奉"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忠于无神论。但是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改变不了如下事实，即在历史上，南部斯拉夫人的解放斗争，多半就是东正教基督徒反对伊斯兰教政权的斗争。在土耳其统治时期，在保加利亚，同样地也在塞尔维亚、希腊和马其顿，教会——而且是东正教会——是这些民族仍然存在的唯一的民族机构。谁要是去参

观在院子里停放着马其顿的民族革命者戈泽·戴尔切夫的石棺的斯科普里的救世主教堂，就可以发现在异常漂亮的木雕圣像屏上描绘着圣经的故事：正面的圣经上的人物穿戴着马其顿的民族服装，就象这个国家信奉基督教的农民在不多几年以前还保持的穿着一样。背面的人物和恶棍则都是土耳其人的装束。

但是，宗教的冲突不仅发生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基督教内部。保加利亚的东正教辖区、塞尔维亚的教会和希腊的教会，在土耳其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刻，都曾谋求把马其顿的教会和主教辖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13年以后，与塞尔维亚政权的稳定有关，马其顿的东正教也隶属于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保加利亚的统治，保加利亚的教会也就来到了马其顿，但是在1945年以后，首先又重建了塞尔维亚的教会，虽然马其顿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已经不再隶属于塞尔维亚了。

游击队业已建立了一个“马其顿最高司令部宗教委员会”，并在解放区——就是在被游击队控制的那一部分地区——组织了宗教界人士的集会。战后，马其顿的共产党领导支持东正教教会所作的努力，从贝尔格莱德的大主教辖区解脱开来，并重新建立了历史上的奥赫里德大主教辖区。1958年，第一个大主教举行了隆重的主教就职仪式。他同时获得了马其顿大主教的称号。塞尔维亚教会谋求阻挠马其顿教会“民族化”的努力失败了。对于贝尔格莱德大主教辖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进展——因为狭隘的宗教纠纷和民族纠纷也牵涉到了塞尔维亚的教会。放弃塞尔维亚在瓦达河-马其顿的

教会统治权，就意味着“南塞尔维亚”美梦的结束，意味着由塞尔维亚的民族、教会和国家来统治贝尔格莱德—萨洛尼卡的路线的结束。1967年7月17日，马其顿的东正教会宣告“独立”。因此，它在形式上也不再隶属于其他东正教会。马其顿的东正教当然不会感到轻松——而就是同一个鼓励独立自主倾向的共产党国家，在宣告这个消息时就为自己设置了许多困难。象马其顿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列为他们祖先的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有斯拉夫的传道始祖吉列尔和梅托迪乌斯，还有两位圣者克利门特和瑙姆，这样的国家将永不可能把教会取消。被人们标志为斯拉夫基督教和东正教发源地的奥赫里德湖畔的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对马其顿共产党人来说，也可以作为民族的正统。不应忘记：马其顿国家的历史是1944年在一座修道院中开始的。就象当时反对土耳其人的马其顿的自由战士一样，“马其顿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的共产党委员们也在距离极为偏僻的普罗霍尔·普钦斯基修道院不远的地方找到了隐蔽所。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比马其顿更清楚地象征表现出东正教、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合成体了。

保加利亚在马其顿问题上的路线在1968年到1976年期间仍然没有变化。虽然保加利亚党和国家的领导公开宣称，他们对南斯拉夫没有领土要求。但是当要签订一份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协定，而贝尔格莱德方面拿出了协定的马其顿文本时，索非亚的政府代表却拒绝签字。他们要求一份塞尔维亚的文本。理由是：对他们来说不存在马其顿的语言。保加利亚当局还在普鲁夫迪夫的博览会上阻扰展出马其顿的书

籍——其中有一本马其顿语法和一本马其顿历史。

如果这种发展并不一定预示一种非常严重的形势，人们也就可以把这一切都当作巴尔干半岛的纠纷来解决。保加利亚绝不可能单独采取反对马其顿的行动，也绝不会单独由于马其顿而采取行动。但是保加利亚同苏联联合在一起就可能积极提出自己的要求。纵然这绝不会成为现实——然而单就经常提起这一话题来说，则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南斯拉夫肉中的一根刺。

举例而言，如果德国统一社会党或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在科学论文中强调德国在西里西亚和现今波兰西部地区的其他地方的往事（这种事情的尝试曾经快速而坚决地在东柏林被煞住了），苏联将绝不会允许这样做，然而它却容忍了保加利亚在马其顿问题上的做法。

同时，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也玩弄着两面手法。因为正当他们唆使保加利亚人否认马其顿语言的存在之际，在苏联的大学里却有马其顿语言的课程。苏联的学者出现在马其顿的首府斯科普里，并学习马其顿的历史。那么苏联究竟有些什么打算呢？看来是这样的，莫斯科除了想把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引向马其顿的方向之外，在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满足保加利亚希望的意图。无庸多说，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只不过是苏联棋盘上的卒子，他们应当在南斯拉夫引起动荡。莫斯科的最后目的则在于，把现今南斯拉夫的全部领土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以温和的强权还是以粗暴的方式。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胃口只是这场赌博中的一张牌，然而却从不是最有

兴趣的一张牌。

因为也可以设想，有朝一日莫斯科可能创造出一种大马其顿的自治形式，完全象保加利亚一样直接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甚至于直接归附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假定以这种政策来解决南斯拉夫，并且从而也将结束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地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莫斯科将因此而获得一块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冲，而且不仅是在军事方面。从中欧和西欧到希腊，到爱琴海以及进入近东的经济纽带和交通枢纽就会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而且如今从亚得里亚海直到黑海这一地区的民族共产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大门就会被打开。

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居民对于这种发展将不会感到一点儿鼓舞。马其顿人是活跃而有适应能力的民族，他们的精神状态与其说同他们在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的斯拉夫兄弟相似，还不如说更同希腊人相象。甚至在共产主义的制度下面，他们也懂得要创造具有个性的活动场所。南斯拉夫国家最高领导中的最著名的经济专家之一就是马其顿人基罗·格利戈罗夫。马其顿的政治家克尔斯特·契尔文科夫斯基——在此期间失宠于铁托——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宣称，党必须考虑别人的意见，并且不只是发号施令，而且还要耐心地倾听意见。马其顿人对世界的开放和自我意识——虽然这乍看起来好象显得矛盾——通过1962年斯科普里的地震得到了证实。接踵而来的国际救援活动推进了马其顿共和国对世界的看法，并且使马其顿的干部有机会去建立许多国际间的联系。就是在今天，当马其顿人提到自己的共和国时，还总是说“我们的国

家"。在这个时候，他们想起了自己被分隔在希腊和保加利亚的那两个部分。在斯科普里安装了一座功率强大的广播电台，它的着眼点对着那些"外部的"马其顿人。但是严肃地说，任何人都几乎不能因此而认为将产生一个大马其顿。也许有可能，苏联要实现这个梦想——但是，自从大家看清楚了莫斯科和索非亚是怎样分别扮演他们的角色以来，在马其顿赞同苏联这个政策的人已为数不多。也许在南斯拉夫，除斯洛文尼亚人以外，马其顿人就是那种对整个国家的生存最少有成见的民族。人们总是津津乐道有关铁托的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那种东西，就是马其顿人民在这个国家中找到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形式，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当然，这是一种在共产主义范围里的自我实现，而不是在多元化社会中的自我实现，但是这种自我实现，在共产主义时期以前的巴尔干半岛上，就西方的观点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

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今天固然就是这样实现了民族团结。这是由领导层带来的结果，他们与克罗地亚不一样，没有内部的分裂，马其顿的分裂主义是一种次要的现象，就是在流亡者之中也是如此——自从马其顿人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以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端于马其顿的地下活动也停止了。但是，如果马其顿的主要危险来自外部，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和保加利亚的小霸权主义，那么也就存在着一种激起民族事端的因素：因为一百六十万马其顿人并不是单独居住在自己的共和国中。他们看到，特别在西部地区，面对着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密集在一起的少数民族——阿尔巴尼亚人。由于这些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靠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边境

地区，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会影响到国内，而且已经引起了许多次意外事件和示威行动。

除了马其顿的三十万阿尔巴尼亚人之外，还有九十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同样地处于离开阿尔巴尼亚边境不远的地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塞尔维亚的西南部构成了一个密集的居民多数。科索沃地区（阿姆塞尔费尔德）和多山的"梅托希亚"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因此而在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后来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成为一个自治省——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和自己的共产党。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称之为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关系，不论在过去或是现在都是复杂的，而且至少在最近这段时期仍然具有流血斗争和敌对行为的特征。阿尔巴尼亚人不同于他们周围的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马其顿人，他们不是斯拉夫人，而可能是古代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的后裔，也就是公元六世纪在斯拉夫人移居到巴尔干半岛以前就已经居住在那里的原始居民。同塞尔维亚人一样，阿尔巴尼亚人也曾抵抗过土耳其人的入侵。他们世代相传的、至今为共产党员和反共分子所共同崇敬的民族英雄，就是在十五世纪组织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的斯坎德培。今天，地拉那霍查的亲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同科索沃地区的铁托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干部，最后还有反共的阿尔巴尼亚流亡者，他们都一样地称颂斯坎德培——他的基督教名是乔治·卡斯特略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有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党卫队师团以斯坎德培命名。

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如下事实，即阿尔巴尼亚人现今部分信奉东正教，部分(在斯库台地区)信奉天主教，而其多数则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在土耳其人占领巴尔干半岛之后渗入到了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的一些主要地区，而这个帝国则是在阿姆塞尔费尔德(科索沃)战役之后遭到覆灭的。古代塞尔维亚的民族圣迹和宗教遗址，诸如佩奇的大主教辖区、格拉查尼察和德查尼的修道院，如今都被阿尔巴尼亚的移民区所包围。如果人们按照多数的原则来处理问题，那么今天科索沃的大部分地区应该属于阿尔巴尼亚，而不属于南斯拉夫。从前的门的内哥罗王国和塞尔维亚王国在 1913 年出于大多数“历史上的”理由取得了这块阿尔巴尼亚人的土地，或者至少是取得了这块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居住地区——而且完全象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首领安特·帕维里奇那样，此人在 1941 年曾想通过消灭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暴力方法重建克罗地亚人在历史上的居住区，而有人也想在科索沃——梅托希亚、马其顿西部地区和门的内哥罗南部地区剥夺阿尔巴尼亚居民的居住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之间的桑德夏克[①]行政区的穆斯林居民中间(他们当然不是说阿尔巴尼亚语，而是说塞尔维亚语)——发生了一场由塞尔维亚基督教民族主义分子酿成的屠杀。塞尔维亚的总理尼古拉·帕西奇——在 1914 年至 1918 年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个”南斯拉夫的奠基者之一——就曾说过，塞尔维亚能够在二十至二十五年以内，把自从 1913 年所取得的地区的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文化

① 桑德夏克，旧时土耳其省级行政区。——译注

方面和民族方面完全同化”。

贝尔格莱德这种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的政策，导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1941年欢迎建立一个归附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大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主要地区及其首都地拉那，在1913年的大规模内乱和大国的干涉之后变成了“独立的”地区。一名德国的维德亲王曾短期客串地担任了国王，但随后就在发生内乱和突然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逃走了。在1918年以后，一直到1939年被墨索里尼归并进意大利帝国以前，这个国家——欧洲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有过二十年独立。第一次开始现代化、开始普及学校教育、开始建筑现代公路等等都是在意大利统治下进行的。当然，意大利人想把阿尔巴尼亚人改造成意大利的殖民地民族。这样就产生了如下结果，墨索里尼想把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主要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大阿尔巴尼亚解决办法”，并不能使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感到满足。1943年，意大利的投降把德国人送到了阿尔巴尼亚战场。在德国，到现在为止，这个地区主要是通过卡尔·迈(《在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度里》和《在巴尔干半岛的峡谷中》)而出名的。

当时已经卷入了巴尔干半岛游击战争的德国国防军，指定大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组成政府，并宣布这个国家独立。在科索沃地区成立了民族主义的“普里兹伦第二联盟”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的“科索沃团”。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反共的和亲西方的组织“民族阵线”。所有这些力量都把希望寄托在西方联盟身上。德国的部队不受他们的干扰，而当德国军队在同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以及同组织

起来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战斗的时候，则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地下组成时受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强烈影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两名干部杜尚·莫戈沙和米拉丁·波波维奇把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组织引上了南斯拉夫的路线。但是，当两名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党员在1943年8月背着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商谈有关合作，并宣告旨在建立一个包括南斯拉夫领土在内的"民族的阿尔巴尼亚"的时候，铁托就强迫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首脑恩维尔·霍查宣布这份所谓的"穆卡伊协定"无效。铁托不愿意从南斯拉夫的领土中交出任何东西——连阿尔巴尼亚人聚集的地区也不愿意交出。1943年的这场屈辱使得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干部永远忘不了他们的南斯拉夫同志——阿尔巴尼亚和铁托的裂痕首先就这样地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对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员，科索沃的兄弟都一样是自己的同乡。

在德国军队撤退以后，被德军部分武装起来的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还继续进行过反抗。结束敌对行动以后的较长时间里，铁托仍不得不在这里保持一个军事机构和紧急状态。暗杀和反抗活动接踵而来。许多科索沃的居民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统治看成是塞尔维亚霸权主义的新版本。塞尔维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米拉丁·波波维奇就是在1945年被暗杀的。一直到进入五十年代，科索沃对于年轻的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颗不保险的丸药。虽然有阿尔巴尼亚人参加的自治，但是地方的管理仍要通过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的秘密警察来执

行。兰科维奇是塞尔维亚人，他对自己警察机构中的塞尔维亚族干部格外钟爱。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大部分仍然生活在传统的民族和部族关系中。他们在新的南斯拉夫仍构成了一个基本上受压迫的阶层。他们的力量表现在他们的团结一致和人丁兴旺。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每人平均收入约为四百五十美元（同南斯拉夫的平均收入一千四百美元以及同最高的斯洛文尼亚的平均收入二千三百美元相比），他们是南斯拉夫最贫困的居民。贝尔格莱德试图给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提供自己的学校、一所大学、一家报纸和一种自己的文化生活，但是至今还只有分裂的结果。有些年轻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把自己当作是“南斯拉夫人”——虽然从法律观点来看，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本来并不是斯拉夫人，为此也不可能是南斯拉夫人。另外有些人得到了南斯拉夫国家的深造培养，他们这才明白了自己民族的混杂存在。1966 年兰科维奇垮台以后，发生了阿尔巴尼亚民族感情的真正爆发。阿尔巴尼亚的旗帜允许重新悬挂了——处于南斯拉夫中间的个别村子竟因此而淹没在阿尔巴尼亚的旗海之中。人们突然间听到兰科维奇的警察——在这个地区正好把它看成是塞尔维亚的警察——长年来对阿尔巴尼亚居民的殴打和压迫。在这个野蛮的科索沃地区，每一个农民都在什么地方隐藏着自己的武器，他们对游击队员的斗争——同样也对共产党员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斗争记忆犹新，1968 年在这里发生了严重的民族主义的骚动。某些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的县级机构提出了要求，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自治区必须获得一个部分共和国的充分地位。但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感到怀疑，这种做法将会造成科

索沃共和国同阿尔巴尼亚联合的可能。部分同毛主义的口号相结合的民族主义的起义，在萌芽状态就被南斯拉夫人扼杀了。许多阿尔巴尼亚人被逮捕，并被判刑监禁。南斯拉夫的装甲部队在当时示威性地开进了科索沃。恩维尔·霍査的共产党员们在地拉那声称，这是在贝尔格莱德大塞尔维亚思想支配下的一种“修正主义的压迫政策”。

自此以后，贝尔格莱德就试图尽可能地迎合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但是，人们能否通过经济方面的让步“扭转”民族感情，问题还难以决断。1968 年科索沃的政治动乱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情况在于，有些阿尔巴尼亚人宁愿赞成一种苦行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而生活于恩维尔·霍査式的贫困之中，却对铁托南斯拉夫的相对的活动自由不甚感兴趣。贝尔格莱德的打算是：经济发展、现代化以及同时对塞尔维亚的和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保持中立。可是却没有说，这种打算是否兑现。因此在马其顿的争议之外，科索沃的问题是铁托之后的时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未知数。总之，马其顿问题主要是从外面加在南斯拉夫身上的；而在此同时，对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则是内部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两个问题都卷进了南斯拉夫的国家事务之中，对铁托的继承者来说将不会是轻松的冒险行动。

模范国家斯洛文尼亚
或有个人家园的共产主义

斯洛文尼亚人有一百八十万人口，按数字的比例是南斯拉夫第三个大民族，但是由于在经济上的辉煌成就，他们在所有的共和国中单独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斯洛文尼亚人在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领导地位甚至突出地表现在：当按照比例分配给他们应得的席位时，他们在贝尔格莱德也取得了较多的领导位置。在铁托身旁的两名最重要的党的领袖人都是斯洛文尼亚人：南斯拉夫自治理论之“父”爱德华·卡德尔，还有节制有度的党的书记斯塔奈·多兰茨，他是一个在1918年归属给南斯拉夫的那个下施蒂里亚的斯洛文尼亚施蒂里亚人。但是还不止于此，还有以外交专家闻名的南斯拉夫副总理安东·弗拉图沙、财政专家扬科·斯莫莱以及其他许多斯洛文尼亚的专家在贝尔格莱德中央的重要位置上供职。甚至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的首脑机关，斯洛文尼亚人也担任着军事要职：总参谋长斯塔奈·波托查尔将军和国防部长(塞尔维亚人尼古拉·留比契奇)的副手斯洛文尼亚的伊万·多尔尼查尔将军。

如果人们把铁托本人的母系是斯洛文尼亚人（父亲是克罗地亚人)这一点计算在内，就可以理解，那些贝尔格莱德在

野的塞尔维亚人总是怀着不满和敬畏，谈论当今统治着南斯拉夫的“克赖因的黑手党”。这当然是一种夸张——因为斯洛文尼亚人，即使是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人，完全不想“统治”南斯拉夫。与两个潜在的足够强大的民族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相反，为参加在南斯拉夫的争取霸主的斗争（这种争夺不论是在共产主义的标记下，还是在反共的标记下全都一样，他们参加竞争可以稍许掩盖住争夺中的消耗和破坏）斯洛文尼亚人有意识地规定了他们自己的界限和可能性。他们在其他的有时具有幻想和充满梦想的南部斯拉夫人中间，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居住在南斯拉夫国境以外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总数不到二百万，他们分布在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戈里齐亚和奥地利的克恩滕，如果没有强大的日耳曼邻居和意大利邻居的哺育，斯洛文尼亚的民族性就不可能单独存在。

因此，不论是在铁托的共产主义政权下，还是在塞尔维亚的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统治下，斯洛文尼亚人都一样是天生的“南斯拉夫人”。但是他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如果说斯洛文尼亚人不愿意被他们北方和西方的强大邻居剥夺自己的民族性（看来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面临这种命运——最后一次是 1941 至 1945 年），那么，在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受到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压迫，或是使自己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受到限制。斯洛文尼亚人需要南斯拉夫作为靠山，作为自己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他们愿意在贝尔格莱德参加决策，但他们希望在他们的小斯洛文尼亚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这种生活方式与其他南斯拉夫人有着显著的

区别。先从语言开始:完全同马其顿人一样,斯洛文尼亚人有着与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根本不同的自己的交际语言和文学语言。保卫自己的语言是斯洛文尼亚人的天性:他们不象塞尔维亚人,也不象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从来未曾有过自己的现代的国家。所以斯洛文尼亚的民族感情首先就是"语言的感情"。长时期来,语言就是斯洛文尼亚民族唯一的共同的东西。在奥匈君主政体时就曾是这样,当时的斯洛文尼亚人被分割在三个王室领地(克赖因、施蒂里亚和克恩滕)以及伯爵领地戈里齐亚和的里雅斯特。这也适用于第一个南斯拉夫王国,当时大部分斯洛文尼亚民族都居住在国境线以外。今天也是如此,在铁托的政权之下,斯洛文尼亚人治理着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的语言被当作是斯洛文尼亚民族存在的保证。围绕奥地利克恩滕的斯洛文尼亚人的激烈争论也表明了这一点。如果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有十万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更改自己的语言,这类情况对于这些民族的继续存在并无重要意义。但是,如果在什么地方即使只有十个或二十个斯洛文尼亚人失掉了自己的语言,这个民族的整个存在似乎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只要牵涉到他们语言的存在,通常非常理智和通情达理的斯洛文尼亚人往往会变得没有理性。看来几乎是这样,斯洛文尼亚人的这种非理性的东西,恰巧就象是他们原本非常讲究实际的市民、农民生活方式的反面。如同出现非理性的任何形式一样,斯洛文尼亚人的这种态度也时常被这种政治力量或那种政治力量所利用。看起来,似乎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领袖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袖,有时完全有意识地在动员某些斯洛文尼亚人的

"反日耳曼的"愤怒情绪，以便用这种方法达到南斯拉夫内部合成整体的目的，创造一个"敌人的形象"，把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引向对贝尔格莱德无害的方向，并且把它从南斯拉夫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其他民族问题上转移开。

虽然并且由于斯洛文尼亚人在内部防止日耳曼人和德意志人，他们仍然是斯拉夫人中"最日耳曼化"的民族，他们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的特殊地位，完全依仗于他们的高度文化、他们有条不紊的思想和甚至超过了德意志人的勤劳。

斯洛文尼亚就这样毫不夸张地成了铁托的典范地区，它在任何方面都有别于巴尔干半岛，有别于巴尔干的粗野习俗。长期担任《法兰克福汇报》驻贝尔格莱德通讯记者的约翰·格奥尔格·赖斯米勒，有一次恰当地报道了斯洛文尼亚地区及其居民："城市和街道都显得整齐干净。草原上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带屋檐的干草堆，只有在这个地区才见得到的 Kosolci（科索齐人），总打扫得乾淨整齐令人感到象在家过星期天那样。当此时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专制制度。斯洛文尼亚人具有宽宏大量的思想，没有这种思想也就没有人性。赚钱和节约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本能。在巴尔干半岛，人们总是喜欢在背后议论他们的悭吝，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大手大脚地花钱是难以想象的。节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家室。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没有别的地方营造起如此众多的独门独户的房舍，没有任何地方把房屋建筑得象这里那样的坚固结实。"①

按居民人口计算，斯洛文尼亚人的文盲（百分之一）少于

---

① 约·格·赖斯米勒：《斯洛文尼亚温柔的姐妹》，《梅里安》第十三卷第三期，第21页。

法国或意大利，更不用说在他们南边和东边的相邻的共和国了。按人口比例计算，他们占有全世界最高的购书额；斯洛文尼亚具备一个出色的、传统的乡村图书馆网。而且它的平均收入按人口计算在南斯拉夫最高，每人达二千三百美元，在此同时，南斯拉夫按人口平均收入则为一千四百美元，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共和国，平均每人约为一千六百美元，马其顿和门的内哥罗则为九百美元，贫困的科索沃地区只达到四百五十美元。

斯洛文尼亚的工业以交货准时、信用可靠和工人的技术熟练而赢利。"卢布尔雅斯卡银行"——莱巴赫[1]最重要的银行——变成了整个南斯拉夫的概念，以致一个西方的观察家有一次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如果人们希望不出危险，能够有所发展，就应该把整个南斯拉夫交托给这家银行。斯洛文尼亚甚至有自己的外籍工人：因为当许多斯洛文尼亚人到德国和奥地利去挣取外汇的同时，大约有十万名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受斯洛文尼亚工业的雇用，因为这里的工资基本上要比南斯拉夫其他几个共和国高一些。这些南斯拉夫内部的外籍工人自然也有怨言，他们在斯洛文尼亚有身处异乡之感，并且感到自己的地位象在联邦共和国谋求职业的土耳其人一样低微……

在某种意义上说，斯洛文尼亚就是西方在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即使在今天，同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的联系仍然是密切的——虽然存在着克恩滕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的现实争执。这不单是因为好几个世纪都在同样的政治制度中生

① 莱巴赫，即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译注

活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奥地利人在过去的历史上是相同的。斯洛文尼亚人对德意志民族的爱憎心理，没有人比斯洛文尼亚的天主教哲学家爱德华·柯奇比克分析得更透彻了，柯奇比克是虔诚的基督徒，并是罗马诺·古尔迪尼的学生，他在1941年参加了游击队。他在《关于民族性的思想》一文中写道："这种全面检验和全面负责的关系是介于否定和证实之间的一种关系，就象我们斯洛文尼亚人在同德国占领者和压迫者的斗争中所经历的关系一样，也象我们在参加了德意志意识的内在的戏剧事件的同时所承认的关系一样。一方面，巴伐利亚人、弗兰肯人、萨尔斯堡人、巴本贝格人和哈布斯堡人夺去了我们外在的自由；但在另一方面，德意志精神的发展过程也帮助我们写下了关于我们的存在的第一批文献，从弗赖辛的关于公爵爵位授予仪式的纪念碑到特鲁巴尔的教义问答，以及斯洛文尼亚文学的起源。他们使我们实现了巴罗克的文明和生活的欢乐，实现了创建民族文化的浪漫主义，还实现了作为使斯洛文尼亚的文化第一次强有力地出现在世界上的起点的普及教育。这两个过程是激情的力量和超人的力量的直接表现，这些力量使德意志人本身感到痛苦，他们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了阴暗和光明，而且还制造了悲剧性的矛盾，这些力量也是每一个欧洲的民族所熟悉的。没有这种德国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能有斯洛文尼亚的命运；而没有这种好斗的德意志精神，或许也不会有斯洛文尼亚的精神。德国的疯狂是我们的不幸，而他们的灾难则是我们的幸福。德意志精神的闪光也照亮了我们的天空。他们唤醒了我们的基本精神，唤醒了反抗异族统治和非人待遇的精神。在二十年前，一种危

险的德意志民族的强烈兴奋把我们判处了死刑，但在同时，它也给了我们在我们历史上迄今最持久的和最有成效的解放的机会。在德意志的歌利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卫[1]之间，形成了一种异常危险的同时又纳福呈祥的密切的历史的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一种憎恨和爱戴的辩证关系，它始终左右着我们的邻居情谊……”[2]

斯洛文尼亚人同克罗地亚人一样都信奉天主教，但是同克罗地亚人相反，他们时常被人当作宗教的改革者，而且他们的普里莫日·特鲁巴尔是宗教改革时期最著名的福音派新教的传道者之一，他还撰写了一部斯洛文尼亚的教义问答，因此他成了斯洛文尼亚的经典语言之父。自从反对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的教义在这个民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位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政治家和干部曾对我说过，他是农村的代表，他只有在星期日上午当人们走出教堂来到小饭馆的时候，才能在村子里召集农民开会。他接着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人们可以补充说：如果斯洛文尼亚在1945年没有成为共产主义，那么今天在那里也许会有一个具有奥地利人民党或基督教社会联盟风格的天主教人民党，而且会占有绝对的多数，甚至完全有可能引起巴伐利亚人[3]的妒忌。

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斯洛文尼亚的天主教政治家在贝尔格莱德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安东·

---

① 歌利亚和大卫都是《圣经》上记载的人物，歌利亚是非利士勇士，被牧羊人大卫所杀。——译注

② 摘引自《评论》，1968年，第170页。

③ 指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因该党仅限于在巴伐利亚州进行活动。——译注

科罗舍茨神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发生分裂：左翼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另一部分在反共的阵营中组织起来——参加了所谓的“多莫布兰齐”（保卫家乡团）。在游击队和保卫家乡团之间发生了流血斗争，相互间进行极其残酷的清算。斗争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共产党员援引俄国国内战争的先例，也把他们称为“白卫分子”。英国人曾把这支队伍的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人交给了铁托。几乎全部人员都被枪杀了。

从这种血腥的插曲中，人们可以认识到，恰巧就在一个小民族中间能够发生巨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天主教右翼的民族主义阵营在战争结束之际还曾试图扭转命运。莱巴赫的主教罗日曼和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曾在1945年5月3日声明斯洛文尼亚是南斯拉夫王国的一个联邦成员，并要求西方盟国占领这个地区。他们还同样地请求流亡在国外的国王彼得回到莱巴赫（卢布尔雅那），并象征性地在那儿接收政府的权力。他们曾希冀斯洛文尼亚能够建成一个西方的南斯拉夫的残余部分。如果在今天，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治家们仍然对“五十比五十”这个公式——也就是说对南斯拉夫可能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分成两半的传闻——反应为高度神经衰弱的话，那么其中也具有对1945年经验的反应，当时在斯洛文尼亚确实有过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主要是来自天主教阵营的政治势力，而这些人又曾为上述的那种解决办法作过努力。

这在今天早就成为历史陈迹。西方盟国没有到达卢布尔雅那。铁托仍是胜利者——同他在一起的是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人。即使如此，在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体系中仍然保留着

一种斯洛文尼亚的特殊性：在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没有一个象斯洛文尼亚一样，有如此强大的非共产党力量参加了铁托的游击队运动。在斯洛文尼亚的“解放阵线”中，共产党员同斯洛文尼亚的索科尔运动——民族自由运动——以及同左翼天主教人团结在一起抵抗德、意占领军。然而共产党人摒弃了同他们联合过的左翼团体和民族团体——斯洛文尼亚左翼天主教徒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爱德华·柯奇比克，曾在铁托领导下的第一届南斯拉夫政府中就任文化部长，一直到1950年，他失掉了一切职务。就是在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也不要别人参加政权——最低限度的天主教政治团体也完全一样，不管这些团体是站在“右边”还是站在“左边”。但是，即使是共产党员也改变不了斯洛文尼亚精神状态的特殊性——控制着卢布尔雅那(莱巴赫)的气候，并不是从昨天开始才与贝尔格莱德，或者与相邻的萨格勒布有所不同的。

在经济利益方面，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仍然显得比克罗地亚要强大一些。铁托的这个小而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共和国，在六十年代曾反对贝尔格莱德中央想把在斯洛文尼亚经营所得的剩余价值投资到南部发展落后的那些共和国去的倾向。斯洛文尼亚人在当时得到印象，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辛勤所得为抱有奢望的经济实验投资，或者坦率地说，为别人的懒惰付钱。斯洛文尼亚人就是这样地参加了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和联邦化，而同时也是一种试验，使在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内本国人民的生活基础得到保证。

首先，当时斯洛文尼亚地方政府的首脑斯塔奈·卡弗契

奇充当了为自己的共和国的利益而奋斗的坚定的先锋战士。卡弗契奇说过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也需要举行一次“第十次中央全会”——象克罗地亚的党在1970年召开的击败了“中央集权主义分子”的第十次中央全会一样。卡弗契奇集合了一批高级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他的目标是使斯洛文尼亚变成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小国。在某些方面，他追随的是克罗地亚民族共产主义者的路线，当然没有犯他们策略上的错误。

卡弗契奇不仅很快地陷进了同中央政府的剧烈冲突，而且甚至同铁托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关于建筑一条高速公路的问题引起了轰动。问题的特征在于，这位斯洛文尼亚的总理认为南斯拉夫内部联结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的高速公路并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最重要的联结是同北方和西方的联系，即同奥地利的联系，并进一步同欧洲共同体的联系。这完全符合当时在斯洛文尼亚政治圈子里广为流传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贝尔格莱德的同志们应该沉着地执行同美国、苏联和亚、非第三世界的外交关系——卢布尔雅那则相反地希望扩展同的里雅斯特、慕尼黑、格拉茨和维也纳的关系。斯塔奈·卡弗契奇的这种尝试是要按照西方邻国的经济状况创建一个斯洛文尼亚的福利共和国；但是，即使在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这也立即遭到了强大势力的反对。这儿的人们担心，卡弗契奇集团的“技术主义的”和面向西方的经济政策将会持续地导致在政治上也去依赖西方，导致斯洛文尼亚从南斯拉夫的联邦国家中分割出去，而一切看法中最严重的看法则是，将会导致一种随着斯洛文尼亚的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多元的民主结构。

当卡弗契奇谋求同一度是共产主义者内部的政治敌人达成和解的时候，就出现了剧烈的内部争论。从1945年起就流亡居住在美国、并在后来撰写了一部受到多方面重视的著作《斯洛文尼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斯洛文尼亚天主教民族主义者齐里尔·热博特，在1969年被卡弗契奇邀请前往卢布尔雅那，并得到"安全的保证"，虽然他曾被当作国事犯缺席审判，而且他的名字还一直登记在南斯拉夫警察局的全部通缉名册上。但是热博特——大概是1945年以来唯一被准许重新去看看自己的南斯拉夫故乡的政治流亡者，而且不必留在那儿或屈从于那个政权——不得不中断他的逗留，并尽快地重新越过奥地利的边境往回走。莱巴赫的政治上掌权者相互之间为了是否要象贵宾那样对待他，或是将他逮捕而起了内讧。

但是这个事件只是产生深刻意见分歧的外因——第一次是在斯洛文尼亚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第二次是在斯洛文尼亚党内。在这方面，相当一部分卡弗契奇的对手也是他的同乡：那些"贝尔格莱德的"斯洛文尼亚人，如卡德尔和斯塔奈·多兰茨，他们以同样的斯洛文尼亚的倔强来反对斯洛文尼亚的怪癖，而卡弗契奇则以那种怪癖来保卫这种倔强。但是，在卢布尔雅那党中央，卡弗契奇也有自己的敌手（从老游击队员们诸如塞尔盖·克拉伊盖尔等人开始，一直到斯洛文尼亚的党的主席波皮特）在地区政府的首脑（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里，政府首脑要比党的首脑略逊一筹）惯于窃取党的主席的地位时，后者是不会愿意看到这一事实的。

在1971—72年的恢复中央集权化和恢复意识形态化的

进程中，以萨伏卡·达普切维奇为首的克罗地亚领导首先被撤职，而一年以后，在1972年秋，塞尔维亚党的首脑马尔科·尼凯集奇也被撤职的时候，卡弗契奇的政治结局也来到了。卡弗契奇也不得不同上面那些自负的共产党君主一起走开——1972年10月对他提出的种种谴责是令人吃惊的：当时斯洛文尼亚的报纸竟说，他要使斯洛文尼亚“同巴伐利亚人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联结在一起。一名克罗地亚的党员干部公开声称，卡弗契奇曾想把斯洛文尼亚变成“第二个以色列”。爱德华·卡德尔甚至对此事提出警告说，如果卡弗契奇得以继续贯彻他同西方接近的政策，就有可能引起苏联进行干涉。

间隔四年之后，看来这些责难都是荒唐的。因为对于卡弗契奇——一个老共产党员——来说，完全谈不上“联结”的问题，尤其是同巴伐利亚人联结的问题。他所希望的，是一种有节制的符合斯洛文尼亚利益的政策。他可能在这方面，亦即典型地属于某些共产党的技术治国论者方面，贬低了意识形态的成分和政治干部机构的特殊合法性。也有可能他超越了党的首脑，在斯洛文尼亚变得过于众望所归了——情况就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总是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铁托，别无他人。还有“克罗地亚之春”的蔓延发展也肯定起了使他垮台的作用——因为当铁托在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进行清洗的时候，卢布尔雅那自然也不可能被放过。

虽然如此——并不是斯塔奈·卡弗契奇的全部想法都因此而被束之高阁了。有些想法被他的继承者和对手接了过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想法符合斯洛文尼亚的利益，而且因为任何一届斯洛文尼亚的政府，无论它是由共产党员或是

由非共产党员组成的，无论它是被教条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是由专家治国论者所控制的，却都是由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的，他们都按照斯洛文尼亚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卡弗契奇深受牵连的同巴伐利亚人“黑色的”共和国的联系，在此期间又被谨慎地采纳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斯洛文尼亚同整个南斯拉夫一样，没有同西欧的紧密的经济联系就不可能生存。1976年5月，巴伐利亚州的总理阿尔方斯·戈佩尔访问斯洛文尼亚，这次访问在共同的经济利益的目标下，也为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之间带来了和解。

在卡弗契奇垮台以后，对“下层”手工业和小饮食商店的生产手段的私人财产的宽容态度，也没有中断过。这儿的情况确实矛盾重重，因为国家一方面容忍私人的首创精神，而另一方面，当私人商贩过于能干并取得了过多的成果的时候，却通过专横的税收法律对他们进行无情打击。

但是总的说来，在南斯拉夫内部，斯洛文尼亚的道路是甚见成效的，已经可以听到一些耐人寻思的声音：斯洛文尼亚人民沉缅在纯粹的消费主义和福利主义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挂着红旗的表象背后——只有汽车、私人别墅、外汇支票和其他现金票证还起作用。而人们在奥地利和联邦共和国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和阿尔卑斯山南部地区可以观察到的情况：过时的农民社会连同它的社会概念的衰亡以及消费社会和经济社会的突然出现，对斯洛文尼亚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影响。面临着这样的发展，斯洛文尼亚的民族意识还能残留一

些什么呢？

斯洛文尼亚人在所有外界成就的影响之下，就这样地被某种自我怀疑所烦恼。在铁托时代行将结束之际附带出现了放纵主义，这种与共产党有关的思潮表现在放任和禁止的混合情况之中——特别是表现在不愿意听取反对派的意见和谨慎的自我批评的精神生活之中。柯奇比克事件——就是党对这个国家最有名的一位哲学家和诗人进行打击的事件，只是因为这位著名人物敢于对过去提出一些不合适的问题——透露出了在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某种不稳。人们总是不断地听到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官样文章，教权主义和天主教的政治危险是难以排除的。然后又重新保证：只要教会不卷入政治生活，人们就会对教会表示尊重和容忍。但是，在二十世纪能有完全不问政治的教会吗？

不论南斯拉夫发生什么情况，斯洛文尼亚将永远是这个联邦的“西方橱窗”。但是，这个国家不只是一片田园风光和美景，而且还由于它的边境状况而充满了矛盾。斯洛文尼亚人无疑不愿意同奥地利或意大利联结在一起。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因此是最忠实的南斯拉夫人——只要南斯拉夫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并尊重他们独特的生活，这就是先决条件，更进一步的还有：贸易的基础。一个按照苏联模式的斯大林主义的南斯拉夫，对斯洛文尼亚人的精神状态来说，是根本不相适应的，军事独裁或任何暴政也同样地格格不入。然而，如果发生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相互剧烈争吵和指责的情况，而且他们把所有的旁人——包括斯洛文尼亚在内——都忘记了，那么兴许就不可能排除斯洛文尼亚会作出出

其不意的反应。莱巴赫的领导就这样地在走钢丝——因为它是一个小国，而且大家都彼此了解，斯洛文尼亚的内政争端有时就象是一出家庭的戏剧。然而恰巧就是这种戏剧，时常受到激烈而固执的诽谤。

如果铁托的继承者把这一切都估计在内并推行一种理智的政策，他们就可能在斯洛文尼亚获得最大的和最可靠的支持。如果他们企图无视斯洛文尼亚存在的基本事实，那么恰巧就是这个小共和国能够使他们陷于巨大的困境。要想把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引向北方邻国的企图，只能带来暂时的轻松。解决问题的办法完全在斯洛文尼亚本身，在斯洛文尼亚同南斯拉夫其余部分的关系。不要忘记：由于斯洛文尼亚直接同西方世界的边境接壤，西方的影响不单单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强大的，而且还存在着超越国界的许多密切的个人联系。自从 1945 年以来，这种情况毫无改变——而且到公元 2000 年的时候也不会有所改变，因为有可能出现人们有时候所描绘的那种灾难：苏联将接管对整个南斯拉夫的控制，俄国人将在武尔岑隘口和的里雅斯特之前摆下阵势。但是有一个目标可以防止发生这样的事，那就是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应该在这个目标中一致联合起来，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和整个西方应该在这个目标中一致联合起来。

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穆斯林

如果有一个地方直到现在还不断发生着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的冲突，那就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任何一个南斯拉夫的政权，不管是共产党的还是非共产党的，也不管是受铁托指导的还是受莫斯科指导的，都无法回避波斯尼亚问题。许多在历史上相互排斥的要求在这儿交叉冲突。这个地区属于谁，这儿的人属于谁的争论，不止一次地在这块地方被制造成流血事件。但是，波斯尼亚不仅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争吵的导火线——它也是南斯拉夫地理上和战略上的枢纽。在战时，这儿曾有过铁托游击队的隐蔽所。他们曾在这儿给予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集团以决定性的打击。铁托的南斯拉夫的历史，就是这样地同波斯尼亚城市的名字和波斯尼亚战场的名字永久联系在一起：1942年在比哈奇举行了"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采举行了"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一天被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看成是国家成立的日子，并自此作为国庆节。1944年5月，在德国伞兵部队几乎把铁托俘虏之前，铁托曾在德尔瓦尔设立了司令部，这同样也是在波斯尼亚。1943年的苏捷斯卡河

突围战役还是在波斯尼亚，这次战斗被当作历史的转折点：从那时起，铁托的游击队为自己夺得了行动的主动权。

今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它同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①"永久性地"相互联结起来相似——对于共产党的南斯拉夫来说，由于它们拥有原料储藏而在经济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在战略上和政治上有着极大的重要性。那些在1972年武装侵入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曾把他们的军事行动引向波斯尼亚的布戈伊诺地区，这不是偶然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就已经在那些无路可通的地方获得了很大好处。假使南斯拉夫遭到军事进攻，波斯尼亚在将来也可能是内地的堡垒，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也许一定会撤退到那里去。南斯拉夫最重要的武器军需工厂和飞机工厂，也大致由于这个原因而设置在波斯尼亚地区，这儿应该还有着广泛的地下防御系统。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怎样能够使这个内地堡垒的"永久性基地"保持可靠的问题也就有着特殊的分量了。入侵者有无可能成功地把这个地区的混杂居住的民族相互煽动起来呢？

在南斯拉夫这个复杂的多民族国家中，波斯尼亚更具有一种特别复杂的和多层次的民族结构。占百分之三十七的塞尔维亚人的居民群同占百分之二十点六的克罗地亚人和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二的"穆斯林"相互对峙着。从而就开始有了一个波斯尼亚的特点：在今天的南斯拉夫，这些穆斯林也被看成是民族，而不只是宗教派别。就这种意义来说存在着"无神论的穆斯林"——大致是在党的干部之中。在将近四百万的波

① 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西德州名。——译注

斯尼亚居民之中，这些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构成了相对的多数。这些现在的或从前的伊斯兰教信徒，他们已经不再是土耳其人，而是象他们的同乡一样说同一种克罗地亚语或塞尔维亚语，现在他们是否算是真正的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的问题，在最近十多年中不断地展开了剧烈的争论，而且有时还报以了流血的和暴力的行为。

对于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分子来说，波斯尼亚是最古老的克罗地亚土地。根据这一点，克罗地亚的"历史边界"位于德里纳河畔——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就在那儿相互交界。根据这一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就是克罗地亚人。当代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之父安特·斯塔尔切维奇曾把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说成是"克罗地亚人民最优秀的民族精华"。塞尔维亚人再次断言，波斯尼亚应该同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尼满雅帝国联系起来，因此它应该是塞尔维亚的民族定居地区。

但是，倒底谁有理呢？早在中世纪，约在十二世纪，当克罗地亚王国同怀有扩张野心的匈牙利王国处于合一君主制的时候，也就是在塞尔维亚的尼满雅王朝兴起之前，当时同现在一样，在难以通行的波斯尼亚的高山密林之间，就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侯国，它在后来甚至发展成为王国。我们在今天以波斯尼亚这个名字综括的那个国家，时时遭受到领域被严重改变的屈辱。它的部分领土时而被克罗地亚兼并，时而被塞尔维亚侵吞。

然而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波斯尼亚王国是在罗马和拜占庭之间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西罗马"和"东罗马"之间的基督教派分裂的阴影中发展起来的。波

斯尼亚的基督徒——伊斯兰教一直到后来才伴随土耳其人带到这个国家——就曾认为，塞尔维亚的每一次进攻都是拜占庭帝国和拜占庭教会进行征服的尝试，而同时，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在波斯尼亚的军事行动，也都被理解为罗马对这块领土精神控制的要求。

在这两个基督教庞然大物斗争的阴影中，基督教的第三种形式或“第三条道路”首先在波斯尼亚不引人注目地发展了起来——这就是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波斯尼亚的鲍古米尔运动”的帕塔伦清洁教派①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信徒简单地标榜自己是“基督徒”和“波斯尼亚教派”。他们曾遭受到拜占庭的血腥迫害，也遭受到罗马的血腥镇压。这个鲍古米尔运动给波斯尼亚的命运盖上了决定性的印记——虽然这种教义的信徒早已绝迹或早已被消灭，现在已经部分伊斯兰化了的波斯尼亚（甚至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波斯尼亚）也只是能够理解大家所知道的同“波斯尼亚教派”有关的意义。

鲍古米尔派是摩尼教教义的一个分支——它是公元三世纪由摩尼在波斯创建的教派，基督教和佛教的因素同萨拉苏什特拉②的教义在这个教派中结合在一起。公元十世纪，这种教义在保加利亚出现。它从那儿——要不是通过陆路，那就象最近假设的那样，通过海路经由达尔马提亚的亚得里亚海港口——传至波斯尼亚。这种教义在当地得以极为迅速地传播。波斯尼亚的基督教徒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同西欧和南欧

---

① 中古时期崇尚品行高洁而主张苦行的教派。——译注

② 萨拉苏什特拉，约公元前七世纪古波斯的宗教家，为拜火教的始祖。——译注

的类似的"异端"运动有联系——也许同法国南部的阿尔俾教派[1]有联系，但也可能同莱茵河下游和意大利的清洁教派有联系。

"波斯尼亚的基督徒"都是二元论的信徒。他们相信，整个现实世界是被善和恶这两个不可调和的根本要素所控制的。善体现在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之中，恶则存在于物质世界之中。波斯人摩尼[2]曾对此下了明确的定义：全部善的基础是上帝，是精神或是光明——恶的基础是魔鬼，是物质或是黑暗。本书并无任务去研究鲍古米尔运动精神上和神学上的意义。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能是政治历史方面的问题和心理方面的问题。鲍古米尔派曾谴责拜占庭帝国是"巴比伦的娼妓"，而罗马教廷则是"黑暗的化身"。他们转而反对奴隶制和奴隶的买卖。他们宣扬个性自由、个人负责和民族独立。一直到中世纪波斯尼亚国家的终结，"波斯尼亚教会"成了追求自己国家政治独立的精神支柱。

因此，波斯尼亚科特罗马尼奇各个朝代的利益和那些并不倾向于承认外国的国王和皇帝的国内君侯们的利益，是与狂热地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同拜占庭和罗马进行斗争的"波斯尼亚教会"联系在一起的。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波斯尼亚的鲍古米尔派以如此剧烈的行动领导了反对这两个基督教大国的斗争，波斯尼亚的君侯和国王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呼吁土耳其人的援助来反对罗马。（在五百年以后，"异端的"共产党员铁托以相似的方式向表示怀疑的西方要求援助来反对"正

---

① 十三世纪起源于法国南部的宗教改革派。——译注

② 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摩尼教。——译注

统的”共产主义大国苏联——当然他要比自己鲍古米尔派的先驱者要幸福得多。)而当波斯尼亚最后在1463年沦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时，贵族和鲍古米尔派居民中的一部分就自愿改奉伊斯兰教，“波斯尼亚的基督徒”觉得伊斯兰教要比其他基督教派要更亲密一些——首先比天主教的罗马要亲密一些①。

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伊斯兰教和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贵族就构成了坚强的负有国家使命的因素。与土耳其帝国的社会结构相反，在波斯尼亚存在的封建社会形态受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尊重。皈依伊斯兰教的贵族得以保存自己的财产和某种政治权力。波斯尼亚甚至拥有一种在当时土耳其统治的状况下令人惊异的内部自治，而且由本国的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以苏丹的名义来管理。

这样，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已经瓦解了的封建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在波斯尼亚由于伊斯兰宗教的社会教义而得以复兴，并且还被保存了四个多世纪，几乎一直被保存到现代。就在土耳其人四百多年的统治时期，形成了一个出身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负责国家使命的穆斯林阶层。一种卓越的建筑术、文学和独特的精神生活在波斯尼亚发展起来。伊沃·安德里奇在他的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梁》和《土耳其大臣与罗马执政官》中，曾出色地描述了斯拉夫文化和伊斯兰教在波斯尼亚结合的情况。

---

① 参阅弗兰约·尚耶克:《中世纪波斯尼亚—胡姆基督教和卡塔伦教派两教合一运动》载于:《克罗地亚基督教文集》，1975年6月。(胡姆即黑塞哥维那，在中世纪称为胡姆公国。——译注)

1878年，土耳其在波斯尼亚的统治宣告结束。自从塞尔维亚独立、土耳其人丢失了保加利亚以及在巴尔干半岛上到处都激起了过去一直处于土耳其统治之下的各族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来，奥斯曼帝国在萨瓦河畔和萨格勒布附近几公里的疆界变得难以保持了。柏林会议规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久前还维持着苏丹形式的主权——应该归奥匈帝国占领。因此在塞尔维亚的野心尚未实现之前，哈布斯堡帝国[①]就占领了这块土地。但是，当奥匈帝国的军队多半是在克罗地亚军官的号令下率领克罗地亚的士兵占领这个地区的时候，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志愿军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新的奥地利帝国当局并没有使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境遇有所好转。虽然它尽了一切努力想表明自己在萨拉热窝实行"东方化"的政策；但是，非基督教的臣民仍明显地感到，哈布斯堡的君主政体依然是欧洲基督教的政权。在1880年和1910年之间，亦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多几年，直到1908年"合并"波斯尼亚之时，大概有十五万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而移居土耳其，因为他们不愿意奉承一个"异端的皇帝"——异教的统治者。同时，波斯尼亚的基督教居民则得以较好地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和宗教愿望，而奥地利人却按照"分而治之"的原则起先宠幸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后来则相反地偏爱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信奉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由于民族运动而变得强大起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些民族运动不仅在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展开，而且也在归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克罗地亚地区（克

① 即奥地利帝国。——译注

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展开。

但是，他们并不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而是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1914年，他们在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帝国的大公爵兼皇储弗兰茨·斐迪南，由此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使哈布斯堡帝国趋于没落。

1918年，随着奥地利统治的结束，波斯尼亚置于塞尔维亚统治之下，并被划归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也就是被划归到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的将军和总督，也就是土耳其统治时期的贵族和地主，他们失掉了自己特权中很大的一部分。在南斯拉夫王国统治下，波斯尼亚变成了泛塞尔维亚和泛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追求霸权的角逐场所。塞尔维亚人在这中间得到了好处，掌握了国家权力，这也许就是——除了几百年来所获得的维护生存的适应能力之外——为什么1941年有大批穆斯林首先宣布自己是克罗地亚人的原因，也是有一些波斯尼亚伊斯兰教的代表人物在克罗地亚的帕维里奇政府担任要职的原因。

虽然如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从来不明确地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到底更多地感觉自己是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在最近一百年间，他们之中有一大批人坚信自己是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甚至声称自己是狂热的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而且还甚至为塞尔维亚的事业或克罗地亚的事业奋斗过。虽然穆斯林的居民群众有其本身的机会主义的传统思想——波斯尼亚有句谚语说：“你不能砍掉的那只手，你就应该去吻它”，——但是他们仍对塞尔维亚的事业和克罗地亚的事业都同样保持着距离。这些穆斯林暗地里回忆自己以

往在土耳其的波斯尼亚有过的、而如今已经丢失了的地位，并且由此而维护着自己的“波斯尼亚人的民族精神”。

当德国军队在1941年击溃了南斯拉夫的时候，波斯尼亚的整个历史边界都被归并到克罗地亚的国土之中。这时候，克罗地亚人拥有了“德里纳河的疆界”，这是许多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梦寐以求的事——但是这条疆界仍然是虚设的，因为恰巧就是波斯尼亚从来没有完全被克罗地亚的政府所控制。而且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很快就体会到了对帕维里奇政府的巨大失望。一个现今流亡在西方的反共的、亲克罗地亚的波斯尼亚穆斯林，穆罕默德·凯梅尔·穆夫蒂奇，最近在题为《一百年间克罗地亚民族政策中的错误》一书中写道：“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从来没有承认信奉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是自己的兄弟和享有同等权利的人。安·斯塔尔切维奇虽然承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是克罗地亚人，但他却原谅他们成了穆斯林，因为他们想在土耳其占领之后保存自己的财产。他忘记了，早在土耳其人到达克罗地亚边境以前，(波斯尼亚)居民并不是天主教徒，而是帕塔伦的(鲍古米尔派)，而且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迁居到了土耳其，他们早在土耳其人占领波斯尼亚以前，就在那里变成了穆斯林。就是这一些克罗地亚人成了奥斯曼军队的将领，他们随后就侵入了波斯尼亚。早在土耳其军队到达欧洲以前很久的时候，波斯尼亚人就是反天主教的，所以他们很快地同各种反天主教的力量联合在一起，这是不足为奇的。任何克罗地亚的作家或政论家都从来没有试图为信奉另一种宗教的同乡表示过积极的感情，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赞扬过这些同乡，也没有任何人给予他们以任何尊

重或同情的表示……”。

穆夫蒂奇在提到有关穆斯林同“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的经验时写道：“甚至在今天，他们(克罗地亚人)不愿意同穆斯林合作，虽然事实上他们(为克罗地亚)所要求的领土上居住着穆斯林的多数……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克罗地亚的穆斯林是克罗地亚国家的整体组成部分，而他们并不承认这些穆斯林享有他们在土耳其管辖之下的权利，或是至少享有他们在奥匈帝国统治之下的残存权利。更有甚者，他们竟这样来处理事情，凡是对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徒有利的事，也一定对克罗地亚的穆斯林有利。但这是错误的。所有负责的领导岗位都在天主教徒的手里，穆斯林不得参与政治决定。克罗地亚的政府……认为有权随意对待穆斯林的命运，有权以他们的名义说话，有权牺牲他们的生命财产，而这一切常常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有时还担着可以想象的风险。”

一个名叫萨希贝戈维奇的党卫队志愿人员——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组成的“弯刀”党卫师的一名成员——曾在1943年9月25日的一份报告里叙述了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在帕维里奇政府控制之下的状况：“在波斯尼亚，新时代的标志是成百人的杀人坑，是抢劫和这些国家曾经领教过的最无情的暴力统治。塞尔维亚的居民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他们对盟国怀有同情，轻而易举地成为了英国和布尔什维克煽动者的战利品，并逃进了森林。现今的(乌斯塔沙)政权至少没有尽力争取穆斯林居民的同情，相反地也使穆斯林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大家认为应在这方面采取灵活的做法。而官方——从波格拉夫尼克(安特·帕维里奇)开始——却总是对

穆斯林说最好听的话，但是在实际上，人们却宣称全体穆斯林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团体是亲共产党的，并把他们关进监狱或送往集中营。穆斯林的种种不同意见并不符合实际，因为立场是思想的正确表现——对于东线来说，穆斯林在克罗地亚志愿军中占着最大的百分比——，人们却不问情由地拒绝他们的异议，而且继续推行暴力措施。如今，全体波斯尼亚的非天主教居民，都看到了他们在新的克罗地亚国家里面临着覆灭的命运，有些从来没有同情过游击队的人，也都逃进了森林。”①

这两个持反共立场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以其自己的方式阐明了，为什么游击队恰巧能在波斯尼亚取得成功，而且恰巧是在那里的穆斯林中间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推行一种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在南斯拉夫被击溃以后向波斯尼亚渗透的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不能原谅穆斯林曾短暂地站在克罗地亚一边，而就是这些穆斯林却又被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荒诞不经地怀疑为共产党的支助者。切特尼克由此而作出决定，要把穆斯林当作塞尔维亚人民的“叛徒”和民族败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样就发生了切特尼克部队在波斯尼亚东北部的福查地区消灭整批穆斯林村庄的事件。

这是在历史上罕见的相似事件：象他们中世纪的先辈帕塔伦—鲍古米尔派一样，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陷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民

① 引自赫尼利茨卡的《1944—45年巴尔干半岛的结局，德国国防军在南斯拉夫的军事撤退》，哥廷根1970年出版，第274页。

族主义之间受到蹂躏，也就是在“罗马”和“拜占庭”的当代形式之间再次受到夹攻。而且他们也象中世纪的鲍古米尔派一样，再一次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这一次这条道路的表现形式是铁托的共产党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允诺在新的联邦国家里给予波斯尼亚穆罕默德的宗教以充分的尊重。[①] 铁托希望用所罗门的聪明方式来解决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的争端：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拥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42年在比哈奇举行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共产党员们作出了决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其“历史的疆界”内建立南斯拉夫的一个共和国。从这个时候起，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民族”的论点终于发展起来了。许多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把他们宗教的这种“民族化”看成是一个机会，一个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生死存亡的对抗中最后解脱出来的机会，在此同时，他们内心的隐情一定也寄托着希望，希望能够重新同土耳其时代的波斯尼亚伊

① 有一些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把自己寻找“第三条道路”看成是特殊的辅助策略。在总的战争形势和他们本身的经验把他们当中许多人驱赶到铁托的军队和游击队里去以前，有些波斯尼亚人曾试图直接同希特勒挂钩。1943年，在与从英国人的面前逃到柏林去的大穆夫蒂（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译注）的合作下，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组成了“弯刀”党卫师。党卫队员们头戴缀有希特勒帝国鹰徽的无沿土耳其帽，以此衬托党卫队的灰色制服。人们因此就同奥匈帝国的四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步兵团”（还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猎骑兵营”）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兵团里，全体士兵、下级军官乃至军官都把信仰穆罕默德作为义务，他们也都戴无沿土耳其帽。参加党卫队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很少是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就象那些拥护铁托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员一样。这一边的人同那一边的人一样，都逃避着他们所不愿承担责任的那种选择。凡是参加了波斯尼亚党卫队的人，既不隶属于克罗地亚人，也不隶属于塞尔维亚人，而是直接归德国这个大国管辖。“弯刀”党卫师当然从来没有发展成为太大的战斗部队。伊斯兰教同希特勒的调情卖俏只维持了一个短时期。

斯兰教的传统联系在一起。下面的事实在这方面帮助了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南斯拉夫由于其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同许多伊斯兰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铁托本人也同穆斯林维持着亲密的友情，例如同埃及总统纳赛尔和他的继承者萨达特都建立了这样的友谊。这也就在无神论的共产党国家里为波斯尼亚的伊斯兰教创造了活动的场所。没有再比南斯拉夫共产党1971年在萨拉热窝召开"自治会议"时更为明显的了：在政府的建筑物上垂挂着党的红旗的同时，在清真寺的尖塔上也飘扬着带有新月的先知者的绿旗——那时正值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节日。

在这个期间，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在贝尔格莱德安插了一些重要的领导干部：南斯拉夫总理杰马尔·比耶迪奇就是穆斯林，人民军的党书记杰米尔·沙拉奇将军或联邦情报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贝尔贝罗维奇也同样是穆斯林。阿夫多·胡莫属于杰出的穆斯林老共产党员，长时期来一直是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同时，有一件事应该注意：这些"穆斯林"不在任何清真寺里祈祷。他们是无神论者，就象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但是他们的祖先都曾是穆罕默德的信徒，他们本身虽然缺乏作为穆斯林的信仰，却仍然具有民族意识的特点。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就这样奇特地在欧洲的东南部纠缠不休。

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是否能够成功地阻止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呢？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萨拉热窝共和国的领导——当然不只是由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组成的，而且也包括了这个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似乎变

成了坚定不移的南斯拉夫整体的先锋战士。直到最近这一段时间以前，波斯尼亚人不仅出面反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而且也反对所谓的“自由主义”。当克罗地亚从前的民族主义的共产党领导，在 1971 年开始对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人的命运表示忧虑的时候，又当萨格勒布的党报《信使报》发表了两篇关于克罗地亚语在相邻的共和国受到歧视的文章的时候，萨拉热窝就以激烈的论战进行回击。不久以前，波斯尼亚人甚至谋求在语言方面既同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语，又同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语“划分界线”，并推广一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76 年，当以米尔卡·帕朗妮奇为首的在此期间早已按照铁托路线行事的克罗地亚新领导提出建议，人们应当重新批准科尔丘拉的夏令哲学学校——一座拥有世界声誉的为“实践”集团新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们设立的活动场所，在此期间被禁止——的时候，萨拉热窝表示反对。此外，最近有许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居民，而且还有塞尔维亚居民受到审讯，并被判处多年徒刑，因为他们敢于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受到的优待”提出抗议，并散布“其他敌对的宣传”。

对于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民族来说，事实上也存在着种种困难：在这个国家的个别地区还有着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巩固阵地。黑塞哥维那就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的一个传统的根据地。无数极端的克罗地亚人都来自这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罗基·布里耶格修道院的圣芳济修道士就在那里拿起武器对抗游击队；1971 年在萨格勒布大学组织罢课的大多数克罗地亚的学生领袖也都

出身于那个地区。早在那个时候，被铁托撤了职的女党魁萨伏卡·达普切维奇-库采尔就曾对萨格勒布的大学生中设置的“黑塞哥维那围墙”表示抱怨，所有要求克制的号召都在这道围墙上被顶了回来。

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能够在重新爆发的民族主义的后果面前，拯救和保卫南斯拉夫吗？无论如何，萨拉热窝的穆斯林在南斯拉夫应该列于有理由特别担心国家崩溃的那一部分人。有一位穆斯林曾经对我说过，因为经验教育了他们，如果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相互打架，穆斯林必须永远为之承担责任。穆斯林就这样地有可能作为在南斯拉夫起平衡作用的因素发挥作用——铁托无疑地怀有这种意向，即当他突然想起来的时候，就会给予穆斯林以民族的地位。至于这位南斯拉夫的总统兼元帅是否在这个时候想到了鲍古米尔派和帕塔伦派，是否还想到了“波斯尼亚教会”的清洁教派和二元论者，我们还不得知之。当在波斯尼亚展开游击战的时候，这位元帅一定在这个地区冲击过那些奇异的鲍古米尔派的墓碑。无论如何，看来铁托是出于本能来这样处理问题的，使时机和形势怎样能对自己有利。

然而，终究有一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天才“旁观者”、作家和铁托的朋友，米洛斯拉夫·基尔莱扎，他把波斯尼亚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提高为铁托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基础。对于基尔莱扎来说，中世纪的鲍古米尔派和帕塔伦派，这些“波斯尼亚教会”的信徒恰巧就是铁托主义的先驱者，因为他们也是同样地既拒绝西方又拒绝东方。基尔莱扎认为，1948年在铁托和斯大林之间爆发冲突的时候，就此种意义而言，南斯拉夫

的态度是“鲍古米尔派的”、“摩尼教的”和“帕塔尔派的”——因为在这一次也涉及到了既对西方的“罗马教权”表示拒绝，又对东方的“罗马教权”表示否定。甚至连那些说要同传统决裂的革命者，即使他们本身并不愿承认，他们依然是以奇特的方式置身于传统之中。

当然，波斯尼亚人连同他们那些宁可说是粗野的习俗，同样地在贝尔格莱德保持着一种传统：在有些官方的机构里，已经流传着许多有关以残忍闻名的萨拉热窝的“土耳其人”的半轻视、半胆怯的笑话。经常不断发生的情况是——在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运动或自由化运动的领袖中间几乎难以容许有一个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塞尔维亚人或软弱的领导力量

塞尔维亚人不是南斯拉夫统一的创始人，但他们曾经是南斯拉夫统一的国家的不倦的先锋战士。对塞尔维亚人来说，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结合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但塞尔维亚人本身对于那些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其他人说来，有时是成问题的。塞尔维亚人有八百五十万，是南斯拉夫人数最多的民族，他们把铁托的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国家。铁托本人不是塞尔维亚人，而半是克罗地亚人，半是斯洛文尼亚人。“如果克罗地亚人说‘我们’，他们指的只是克罗地亚人，如果我们塞尔维亚人说‘我们’，那么，我们指的是全国——从阿尔卑斯山脉到希腊的边境。”这是前几年一个塞尔维亚人很自觉地向我们介绍塞尔维亚人同其他民族的关系时这么说的。

实际情况是：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过去和现在都是塞尔维亚人的首都。因此，塞尔维亚人在中央政府中有一定的优势，从联邦官员大多数是塞尔维亚人这一事实（因为许多克罗地亚人或斯洛文尼亚人不愿去贝尔格莱德），到许多非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人（如果他们在这个城里生活和工作）在“贝尔格莱德的前途”看，就是如此。因为贝尔格莱德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城市。虽然这个城市没有伟大的传统——一百年前，倒不如说它是土耳其要塞卡莱梅格登周围的一个小小的巴尔干移民点——虽然今天还有人抱苦说，贝尔格莱德现

在也不是城市，而是多瑙河和萨瓦河汇流处高楼大厦和政府建筑物的集中地，然而，它却很富有魅力和同化力。

但居住在这个城市和邻近共和国的塞尔维亚人，是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也是重视实际的民族。它的历史觉悟，它和农民相关联的感情和基督正教使得塞尔维亚人民经受住了几百年土耳其人的压迫——从1389年在科索沃的战役起，当时的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被奥斯曼军队灭亡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在塞尔维亚的舒马迪亚核心地带和贝尔格莱德周围重又建立了一个塞尔维亚国家——，起先是一个侯国，后来从农民中产生了拥有几个君主的王国。

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双君主国崩溃时，塞尔维亚王国——当时是在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统治下（“黑色的乔治”的后裔统治时期，他在十九世纪初，领导了反对土耳其人的第一次起义）——是后来南斯拉夫中间唯一具有强大的国家传统和完整的国家组织的地区。在奥匈统治下活着的斯拉夫人和克罗地亚人部分地追求“奥地利一斯拉夫的”解决，部分追求“南斯拉夫”的解决，因之内部是分裂的；然而在塞尔维亚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必须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为了阻止奥地利—斯拉夫的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对塞尔维亚说来必然是致命的危险，年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府塞拉热窝刺杀了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从而爆发了大战。凶手们所属的秘密组织明显地为自己提出“不联合，就死亡”的口号——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即波斯尼亚的以及奥地利其他地区的塞尔维亚人首先被认为是赞成这种联合的。

但是那些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认为建立“大塞尔维亚”的计划是成问题的，这些人作为奥匈的公民在1914年战争爆发以后站到了协约国方面，并在伦敦成立了“南斯拉夫委员会”，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那边的”塞尔维亚人——指移居在奥匈领域内多瑙河与萨瓦河彼岸的那部分塞尔维亚居民——中的一些很有名望的政治家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因此，塞尔维亚总理和激进党领袖尼古拉·帕西奇决定承认“南斯拉夫的”解决方式，一定程度地使塞尔维亚同南斯拉夫观念结合起来。同时，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提出对克罗地亚亚得里亚海岸的要求，这一事实也起着不小的作用。

1918年以后，塞尔维亚政府没有遵守1917年在希腊地中海科福岛同南斯拉夫委员会所达成的以及规定建立一个准联邦的国家机构的各项协定。塞尔维亚人对联邦制度并不感兴趣，他们想尽可能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而克罗地亚人大概习惯于以各色各样国家法的保留条款来对付优势的异国暴力——这来自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混乱不宁之际，塞尔维亚王国的久经考验的、虽然是巴尔干式的国家组织，塞尔维亚军队和塞尔维亚政府是整个南斯拉夫领域的唯一的统治因素。因为塞尔维亚是战胜国，而克罗地亚人和斯拉夫人是战败国，他们的政府瓦解了。因此，政治形势使塞尔维亚君主政体的力量，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新王国”占有那种霸权地位，这种地位后来在第一个南斯拉夫国家中成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平等共处的最大障碍。塞尔维亚的这一霸权地位当然不仅仅是象许多克罗地亚

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拜占庭没落的产物，而部分地却是由于客观原因和南斯拉夫其他各民族政治被削弱所造成的。然而这一霸权地位导致连续不断的厄运和可怕的过错，最终导致南斯拉夫的崩溃和南斯拉夫国家观念在最危险时刻的崩溃。1941年4月6日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入侵这个国家，当时除了塞尔维亚人外，没有人真正准备为这个南斯拉夫而战斗。虽然1941年3月27日为反对与第三帝国签订条约，贝尔格莱德举行过示威游行，以及为反对茨维特科维奇—马契克亲德政府，军官举行过暴动，这些举动曾经闪射过光芒，但塞尔维亚人这样的保卫南斯拉夫的斗争很快失败了。

现在还存在着的是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南斯拉夫被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同盟者击溃和瓜分了。克罗地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塞尔维亚缩小到巴尔干战争前所占有的版图。塞尔维亚人不仅在保加利亚占领区而且也在匈牙利所占领的伏伊伏丁那——位于贝尔格莱德以北——特别在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受到血腥迫害。数十万塞尔维亚人从这些地区逃到塞尔维亚的国家中心地带。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农民与克罗地亚人几百年来共同生活着，本来只是在正教这一点上与克罗地亚人有所不同，他们现在不得不无辜地为贝尔格莱德君主政体的没有良心的霸权政策付出代价。

在这种形势下，切特尼克运动，即塞尔维亚农民卫乡军——其历史可追溯到反土耳其压迫的年代——的领袖德拉扎·米哈洛维奇上校，后来升为将军，以保卫塞尔维亚民族生存的名义发出了抗战的口号。当米哈洛维奇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组织抵抗德国占领军和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时，

那时铁托在共产党人中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

米哈洛维奇尽管有塞尔维亚的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广泛的支持，为什么还会失败，为什么他比原来在塞尔维亚社会中处于孤立境地的共产党人更软弱，这些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叙述过了。切特尼克运动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纲领，基本上局限于塞尔维亚及塞尔维亚民族。米哈洛维奇只是在很久以后，即1944年，才半心半意地为实现南斯拉夫联邦和争取一度是南斯拉夫国家的其他民族而努力。当他这么做的时候，铁托的"团结和统一"这一适宜的民族政策使他的威望远远超出那些切特尼克分子。最后，米哈洛维奇并不清楚，自己应该先反德国人，还是先反铁托的共产党人——由于害怕出现一个共产党的南斯拉夫或塞尔维亚，他最终决定反对铁托。他的运动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组织。因此，它在反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铁托的游击队时，同解决民族问题一样必定毫无成效。1945年战争结束时，切特尼克分子部分随着德军去西北，朝着英国人的方向返回意大利，但大部分人留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的森林地区继续抵抗，他们不仅在军事上而且也已经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1945年5月在泽伦戈拉，切特尼克主力实际上被共产党特别部队消灭了。后来德拉扎·米哈洛维奇被捕，在贝尔格莱德被判处死刑。他在1946年的死亡标志着他的旧式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终结。

下列情况属于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政治中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在铁托领导下对消灭切特尼克运动作出较大贡献的那两个共产党领袖和干部，本身也是塞尔维亚人，他们是亚历山

夫·兰科维奇和斯洛波丹·佩奈集奇-克尔聪，前者是地下战士和秘密警察后来的组织者，1966年由于反叛活动而下台，并被清除出党，后者是兰科维奇在安全和公安问题上的天才顾问和助手，他在他的主人倒台前不久因事故丧身。（有些人说，兰科维奇之所以会如此仓促倒台，是因为他失去了他的"忠实的智囊"佩奈集奇。）

这两个人都是塞尔维亚人和集权主义者——对南斯拉夫来说，他们的结合值得注意。此外，他们当然是可以信赖的共产党人，具有地下工作的一切知识。有一次，佩奈集奇无所疑惧地谈到铁托，说"老头子"是对头的，他只有一个错误，即他不是塞尔维亚人。兰科维奇在倒台的时刻，突然又被那些在他任期内为他所迫害和压制的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人士和民族主义者推崇为英雄。这个过去的秘密警察头子兰科维奇，贝尔格莱德曾在他面前发抖，一时间变得如此孚有众望，现在他作为被迫领取养老金的人，只要一进入南斯拉夫首都的酒店，咖啡厅里就会有节奏地奏起《德里纳河进行曲》——这个曲子塞尔维亚人似乎觉得有爱国感，正如德菲利尔进行曲对巴伐利亚人的感觉一样。

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和农民的塞尔维亚，把一个已经被撤职和毁灭的人作为英雄来敬仰，这一事实表明，新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民族的情况是多么复杂。当然，同在1918年的情形一样，这个民族又是胜利者。但是，现在成立的这个国家已远远超过了塞尔维亚的范围，——而这一次没有塞尔维亚的王宫，不再有严密的塞尔维亚的管理和政府机构。一度在贝尔格莱德看来是"南塞尔维亚"的马其顿，脱离了塞尔维

亚。科索沃地区有许多塞尔维亚历史上著称的教堂，塞尔维亚王公和士兵们鲜血灌溉的神话般的科索沃波列(1389年的战场)就在科索沃地区，在那里塞尔维亚人不得不与阿尔巴尼亚人分享权力——虽然这种分享首先宁可说是形式上的。住有塞尔维亚居民的门的内哥罗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伏伊伏丁那自治有少数匈牙利人参加。为了获得波斯尼亚，几代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作过斗争，波斯尼亚在铁托的共产主义统治下同样不是塞尔维亚的，却是一个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和睦共处的自己的共和国。最后，在乌斯塔沙统治下经历了艰难困苦岁月的那些住在克罗地亚的少数塞尔维亚人，留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之外，不得不以克罗地亚政治联盟形式组织起来。

如果过去是这样，那么后来怎么会那样呢：不仅克罗地亚人，而且还有斯洛文尼亚人，甚至连这些共和国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抱怨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实行新的塞尔维亚统治。这有几方面的原因：1945年新成立的铁托的南斯拉夫是根据苏联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即按斯大林的原则"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把一切权力都归首都——过去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曾经是这样，萨格勒布或卢布尔雅那却并不如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即使他们不是塞尔维亚人，并且头脑里没有一点塞尔维亚的传统，但他们从贝尔格莱德出发，通过传统惯例和地理布局，某种程度上说是通过"地方法律"，推行着一种贝尔格莱德的政策。不管你是不是土生土长的贝尔格莱德人，只要能进入贝尔格莱德的达官贵人区——德迪涅区，你就成了这个国家(如果不是世界的话)的权

贯。因此，在新南斯拉夫政治机构的内部，包括在军队里，特别在外交界有着许多政治家、官员和军官，他们——象一个达尔马提亚来的克罗地亚人有一次所说的那样——坚信，“贝尔格莱德的统治比斯普利特强些”。尤利乌斯·凯撒的名言说，宁可在乡村里当第一号人物，也不愿意在罗马当第二号人物，话又说回来：宁可在大贝尔格莱德舞台上当第十号人物，也不愿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这种为乡村所包围的可爱的小城邦里当第一号人物。南斯拉夫共产党干部在政治上也总是按照他们赞成“罗马”还是赞成“乡村”来划分的。此外，不言而喻，官职的“更迭”保证了地方各级的变化——以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这样的人为例，六十年代有人在背后说他不愿离开克罗地亚，后来却投奔了贝尔格莱德——但是，也有一些南斯拉夫的高级干部却反其道而行之。

只有塞尔维亚人——他们在地方或联邦各级工作都一样——不需要离开首都，总之是永久性的，正如他们在自己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工作一样，当然，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是特殊情况。在克罗地亚，我们听到过当时民族共产主义的领导的抱怨，说少数塞尔维亚人在党内、在公安机关、在军队里超过了代表比例。巴卡里奇——一个无可非议的证人——说南斯拉夫军队的军官团里，有百分之七十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的将军数字比例比下级和参谋军官的数字比例高一些）。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在战争期间，在克罗地亚的少数塞尔维亚人由于特别受帕维里奇集团的威胁，所以比较多的塞尔维亚人参加了克罗地亚游击队，因此有较多的塞尔维亚人成为克罗地亚的党干部。就军官职业而

论，极度追求经济利益的斯洛文尼亚人以及部分地还有克罗地亚人，比塞尔维亚的年轻男子更不倾向于长期服兵役。此外，这种职业倾向和赚钱倾向在塞尔维亚民族不同部分和阶层中也是存在的。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长期嘲弄首都为数众多的门的内哥罗警察，对这个山区的贫困居民来说，当警官是一条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道路。

就中央集权来说，塞尔维亚的地理界限也是造成下列情况的原因之一，塞尔维亚地方各级党和国家机器的领导权长期操在有功绩的、但大多数是徒有虚名的、也没有什么政治业绩的人手里。这一点在1966年以后即兰科维奇党羽被清洗后就变得特别明显了。在塞尔维亚党内对经济改革表示有着一种强加压抑的不满情绪，因为联邦化和权力下放意味着塞尔维亚影响的减弱。如果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当时就开始驳斥"集权主义"和"一元化领导"，那么即使不点塞尔维亚人的名，塞尔维亚人也会自动地觉得这是针对他们的。

在这种形势下，下述事实帮了塞尔维亚人的忙：铁托总统同他的外交部长，塞尔维亚人马尔科·尼凯集奇的关系破裂了。尼凯集奇是从战前共产主义青年团起家的，具有知识分子风度。这位犹太和法国血统的塞尔维亚人当过驻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及大使。1965年他接管了贝尔格莱德外交政策工作。尼凯集奇在两个问题上不同于铁托，想转移重点，不久事态就明朗化了。第一，外交部长着重指出，南斯拉夫尽管有不结盟的，因此主要面向亚非的外交政策，但南斯拉夫更有必要接近欧洲。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本身是"负债者"，因而不能解决南斯拉夫的经济问题。第二，尼凯集奇在1967年以

色列阿拉伯六天战争期间，为南斯拉夫采取“中立”态度进行辩护，这就是说：不要积极支持阿拉伯人。因而他当然陷入同铁托对抗的境地，铁托在1967年无保留地站在阿拉伯的方面，以致南斯拉夫党最高领导成员本身也感到不快，尤其是在铁托同莫斯科合演表示对阿拉伯的同情，苏联支持埃及的军用飞机出现在南斯拉夫天空的时候。尼凯集奇评价南斯拉夫同西方的关系显然比他的最高首脑更为谨慎。作为政治外交舞台多年的专家对阿拉伯世界持一定的怀疑态度。首先是，尼凯集奇很不信任苏联，他不具有铁托的那种乐观主义，铁托相信，他的威望一定能保证南斯拉夫不会失去平衡。

总而言之：六天战争损害了两人之间的信任基础。尼凯集奇一年以后被撤掉外交部长职务，任命为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这似乎是一个一眼看来就觉得颇为惊愕的、然而却为全体与会者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铁托失去了一位外交部长，这位部长在外交政策上过于独立了，外交政策是总统最原始的领地。尼凯集奇找到了一个新的岗位，同以前情况一样，他在那里不是天天非同“老头子”接触不可。但是塞尔维亚党的最高位置上，总要有一个具有才干的人，这个人能够提高其他共和国的受损害的自觉性，在共产党人的“地方君侯”中着重代表塞尔维亚。首先，具有政治智慧光辉的尼凯集奇是对付贝尔格莱德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骚乱的合适的人物，当时事态已经扩大，在1968年初夏大学生叛乱之际，达到了高潮。

尼凯集奇提出讨论“现代塞尔维亚”的问题。与那些受兰科维奇影响、头脑僵化的党的老干部相反，他接受经济改

革和权力下放。他认为经济改革和权力下放，不会削弱联邦中塞尔维亚这一特殊重点，而只会加强。塞尔维亚党新的首脑想把由国家和贝尔格莱德联邦政府管理的在六十年代经过经济改革、自治的大银行和外贸公司继续扩大变为塞尔维亚领导的经济政治工具。1971年尼凯集奇在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前宣布，南斯拉夫自治社会的现代人道主义必需"有技术装备和技术方面的觉悟"。换一句话说：不仅政治理论家，而且经济实践家和专家都必需参与重大的决策。尼凯集奇理解的社会主义不是"退回到相似的不发达经济的小单位去，而是使用现代化生产手段的人的统一纲领"。[①]

这是一个明智的、现代化的纲领，它是由得到党的女书记拉廷卡·佩罗维奇支持的尼凯集奇向塞尔维亚人提出来的。生活意味着变化、创新、差别和矛盾，他向那些不惯于听这种话的党干部大声疾呼。今天不仅存在着世界经济和世界科学，而且存在着"世界社会"，这种概念在共产党的首脑听来至少是不习惯的。尼凯集奇警告共产党人，不要把党和国家混淆起来，相互融合。他说，"共产主义者联盟对政权过问得太多了"，他同时要求，共产党人必须扩大自治。但是自治完全是同经济集中结合在一起的。普遍地反对集中的倾向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尼凯集奇的用意很清楚：他打算通过经济成就和贝尔格莱德在联邦中的"优越地位"来维护塞尔维亚的势力。为此他需要放手利用专家，特别是利用现代的干部队伍。与老的共产党干部相反，他们在公众舆论前面不应害怕。尼凯集奇又

① 《政治报》，1971年11月27日。

说:"在没有公众民主监督的、严密的集团中,特权利益和小资产阶级习气必定盛行。"但是小资产阶级习气对共产党人说来是一个骂人的字眼。

早在1971年尼凯集奇就警告说,没有民主法规的"任何党和任何领导"必定要崩溃。这个警告是针对那些当时由于存在离心倾向而玩弄"来自上面"这一手腕的人的。尼凯集奇的悲剧在于,他刚从外交政策领域同铁托发生冲突中摆脱出来,所谓换了一个剧场,而现在又在内政舞台上同这位元帅发生了矛盾。

尼凯集奇所属的塞尔维亚政治领导同克罗地亚民族共产主义的班子发生了强烈的争论,这并不奇怪。萨格勒布历次声明对塞尔维亚的旁敲侧击是太明显了。克罗地亚的少数塞尔维亚人的闹事和恐惧并非故意配合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领导。最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情绪增长也引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反应:两种民族主义情绪增长,开始相互角逐。

尼凯集奇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没有插手。他反对用塞尔维亚的反谴责去回答克罗地亚的谴责,或用一种塞尔维亚的历史性的浪漫主义去制胜克罗地亚民族的浪漫主义。他清醒地坚信,"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把这一马克思主义术语译作明确的语言应该是:塞尔维亚领导阶层)根本不用去注意在南斯拉夫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或去关心一个特殊的使命。塞尔维亚人"靠自己劳动生活,只需关心在南斯拉夫市场上平等地以自己的劳动同别人的劳动相交换,通过发展和进一步的分工来改善自己的状况"。这是一个对南斯拉夫开放市场的号召,塞尔维亚人在这个市场里劳动,是可以保证他们一份利

益。也许有人会说，尼凯集奇希望通过经济来恢复失去的政治地位。

克罗地亚人所要求的是中央的权力转移到部分共和国去，尼凯集奇认为，可能导致，"由一个专制政府变成六个或八个专制政府"。(这里他显然是指六个部分共和国加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尽管尼凯集奇对克罗地亚人作了种种批评，但他仍否认反萨格勒布是"上面的行为"。1971年12月初当铁托在卡拉乔杰沃解散领导萨格勒布民族主义领导集团的核心机构时，唯有塞尔维亚党首脑马尔科·尼凯集奇和塞尔维亚的党的女书记拉廷卡·佩罗维奇为克罗地亚人辩护，他们说，不应把特里帕罗和"萨伏卡"调离，而应当鼓励他们自己安排自己的事务。尼凯集奇知道，克罗地亚联邦自治的结束，必定意味着塞尔维亚对党中央领导而言的自治的结束。尽管存在着种种敌意，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过去和现在彼此仍然过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以致一方消极的发展必定立即会在对方发生作用。尼凯集奇并没有如愿以偿，"萨伏卡"—特里帕罗集团垮台了。

克罗地亚共产党领导人和被推翻的"萨伏卡"—特里帕罗集团中的反对者之一尤雷·比利奇，后来于1974年2月10日在贝尔格莱德《政治报》上——书面声称："大塞尔维亚自由主义者（指尼凯集奇及其追随者）捍卫从前存在于克罗地亚党的领导之中的这一派别，并且提出不许将它解散的要求。"克罗地亚民族共产党人把塞尔维亚自由共产党人拉入灾难的深渊，这在南斯拉夫是少有的，而后果是严重的历史发展的事件之一。

当然，首先是尼凯集奇活了下来。1972年9月，在他垮台之前几个星期，这位塞尔维亚党首脑提出防止为反对克罗地亚分裂主义而产生的“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如果南斯拉夫任何地方（尼凯集奇在这里显然是指，在全力以赴驱逐民族共产党人的克罗地亚）恢复“行政”政策，这就是说从上面来的旨意，那么这也必然会对塞尔维亚发生作用。他似乎意识到他的政治前途的结束，这位党的首脑说，共产党落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党内有一些人，他们“想再把这些事情直接抓在手中”（指铁托），而不放弃自治。原话是：“党的政治建设中的民主制度是统一的前提。”①

铁托想必是把这些话看作挑衅——并且在三个星期之后发展到这样地步：在一次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家”（即中央委员会和其他政治团体）会议上，尼凯集奇根据铁托的要求引退了。南斯拉夫总统和党的元首对他们塞尔维亚副手所作的谴责是：尼凯集奇是塞尔维亚“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派别的领袖。

在1972年10月“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者”尼凯集奇为自己辩护之前，情节确实变得明朗了。在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三次秘密会议上，撤换马尔科·尼凯集奇的提议没有获得多数。铁托——1938年以来南斯拉夫党史上大概是第一次——在表决中处于劣势。当总统看到他在塞尔维亚人中通不过时，他便将尼凯集奇召唤到自己身边。1972年10月20日的一次历时六小时的讲话中，铁托责成塞尔维亚共产党主席第二天宣布引退。塞尔维亚共产党的女书记拉延卡·佩罗

① 宁恩，贝尔格莱德，1972年9月10日。

维奇同他一起下野了。此外，来自塞尔维亚党组织的尼凯集奇的后继者，外交部长米尔科·特帕瓦茨也下台了。负责对外事务的尼凯集奇的前驱者科查·波波维奇，曾经是南斯拉夫军总参谋长和游击战中无产阶级第一师的传奇式的师长，此后从政治生活中引退了。南斯拉夫首都党的首脑波拉·帕夫洛维奇同尼凯集奇一起倒台，此外还有塞尔维亚邦政府的首脑米连科·波亚尼奇和伏伊伏丁那省共产党主席米尔科·查纳达诺维奇等人。这次大规模清洗非常类似十个月前克罗地亚的清洗，只是这次这些事件远远超出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范围。事件涉及斯洛文尼亚地方政府的首脑斯塔奈·卡弗契奇，他只得辞退，其影响一直到达马其顿，那里的党书记斯拉夫科·米洛斯拉夫莱夫斯基（《共产主义和民主》一书的著名作者）不得不辞职告退。

当然，对塞尔维亚"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者"的清洗表明，铁托在贝尔格莱德需要克服比克罗地亚人更为强烈的、特别是有组织的反抗。这说明铁托在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中表决的失败，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尼凯集奇和他的党的女书记1974年4月最终被开除出党需要十八个月时间。克罗地亚最高领导集团中的党的领导人，立即出来占据空缺；在塞尔维亚至今则是一些完全不知名的人，象经济学家蒂霍米尔·弗拉什卡利奇等人被安插在最高岗位上。弗拉什卡利奇以前几乎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现在接管了党的领导。

铁托在塞尔维亚反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者"的动机是什么？首先肯定的是"老头子"主观上厌恶尼凯集奇在党内进行的、在他看来是无政府主义的实验。其次还有客观原因：

由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存在不安的民族政治关系，铁托不能给予克罗地亚领导迎头痛击，让塞尔维亚人获得安宁。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流亡者的纲领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个纲领称，“卡拉乔杰沃”是反对克罗地亚人的一个大塞尔维亚的政变。因此，这笔帐是必定要清算的，这也是由于塞尔维亚人的失宠。此外，铁托在许多场合都是实行这种“民族平衡”的。它是铁托推行的内外平衡政策的一部分。

但是决定性的一点是，尼凯集奇集团不准备放弃自治和经济政治的权力工具。铁托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深谋远虑：他要贝尔格莱德的银行和对外贸易公司向克罗地亚人作出一定程度的牺牲，他剥夺了这些企业的权力，从而满足克罗地亚的一部分要求。这完全是用来对付尼凯集奇的。可是归根到底尼凯集奇是个塞尔维亚人，但不是中央集权主义者。他以塞尔维亚党的名义，反对党的最高领导再行集权的作法，特别反对建立党的常务书记处，它的作用无非是限制共和国党首脑的权力。在尼凯集奇集团垮台以后，铁托在这个问题上就可以放手干了。

总之，尼凯集奇事件说明二点：第一，铁托在他权力进入最后阶段时，怀疑有分化趋势和自发行为——不论它以民族的或自由的动机表现出来，都是完全一样的（“自由的”这词在这里不是指世界观的含义——因为尼凯集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共产主义者，绝对不是世界观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追随者）。因此，铁托本人导致在自己周围出现了继承的危机。他首先排除离心的和多元主义的力量，以消除这种危机，当然代价是逐出许多派别，需要解决许多问题。

第二点表明，如果人们把塞尔维亚即使是今天的塞尔维亚领导阶层看作是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可能是苏联影响的特殊再现，那就弄颠倒了。因为在塞尔维亚党内除了肯定存在着教条主义力量以外，也还有一个强大的派别，它准备支持象尼凯集奇这样的人来对付铁托——这在南斯拉夫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恰恰在塞尔维亚，除了“拜占庭”政治传统之外，也还有自由主义的强大传统，不要忘记，还有产生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塞尔维亚共产主义不仅产生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而且还产生了米洛凡·德热拉斯，他是门的内哥罗出生的塞尔维亚人，在东方的那些不同政见者统治下，他是迄今唯一的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德热拉斯的民主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的思想——从共产党人的游击战的严酷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1954年使他同党发生了冲突，因而铁托的这位唯一代表、朋友和战友被投入监狱达数年之久。现在德热拉斯隐居在贝尔格莱德，早年的意志伦理学在他身上变成了答辩伦理学。他一再对共产主义制度持根本性的怀疑态度，他不再是共产党人了，但是他赞成铁托的对外政策，南斯拉夫的不结盟立场，甚至赞成南斯拉夫党对抗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策略。德热拉斯看到南斯拉夫制度的缺陷，在铁托时代的末期，知识分子缺乏自由，铁托时代内部隐藏着思想僵化的危险。他也看到了南斯拉夫党领导内部的分歧。在他看来危险在于，南斯拉夫统治集团内继承铁托的一个集团可能会依据下列原则行事：“宁可要俄国人统治下的共产主义，而不要没有共产主义的民主化！”但是德热拉斯同时又认为，如果苏联人给予严重威胁，那些准备相互吵架的人，对当今这个南

斯拉夫是会感到满足的。这种截然不同的观察是有道理的，因为即使人们怀疑，德热拉斯自己那时在南斯拉夫是否还能起作用，但他的协调思想，向欧洲和民主开放的思想，在铁托之后的时代将一定会影响南斯拉夫社会。从某种意义说，人们会看到"德热拉斯"思想存在于党的队伍中。因为德热拉斯思想与德热拉斯本人一样，是这个党的产物。

当德热拉斯说，尽管南斯拉夫有政权，有政权的"独断"行使，但不是集团，那么他的话便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南斯拉夫尽管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距苏联的模式是很远的，因此把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作比较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德热拉斯思想"对塞尔维亚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和经济界的影响有多大，今天还不能确切地认识。除了"德热拉斯思想"之外，贝尔格莱德还是由所谓"实践"集团组成的南斯拉夫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重要的据点。哲学杂志《实践》在1974年被禁以前，一直是萨格勒布地区哲学协会的机关刊物，那些最有吸引力的"实践家"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执教。南斯拉夫这一新左派的形成，在大学生中有其群众基础。与西欧和德国的新左派相反，他们竭力抨击苏联的政治，没有任何受人利用作为"有益的呆子"为莫斯科服务的倾向。

这一教授集团的功绩，不仅在于在南斯拉夫和东方集团之间，包括在思想领域，划分了一条明显的界线，而且激励南斯拉夫党在组织机构和意识形态上彻底的非斯大林化。在这一点，"实践家们"和德热拉斯之间是相似的：双方都指出南斯拉夫制度的矛盾和不彻底性。贝尔格莱德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给苏联共产主义套上资产阶级极权主义倾向的枷锁时，也就是对南斯拉夫缺乏政治自由的批评，他们非常准确地击中了靶心，而同时他们又攻击南斯拉夫党领导实行市场经济，赞同消费社会，他们的论证是多么成问题，某种程度上是教条主义的。这里表明，新马克思主义恰恰始终是自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他们在寻找迄今还不曾有过的"真正的"社会。

贝尔格莱德新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们，如据报道所说，在马尔科·尼凯集奇倒台以后便被大学免职了。值得注意，他们没有被抛到街头，仍可以继续进行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是他们至少在南斯拉夫是不可能再发表作品了，教学活动也不再可能了。八个"实践家"被贝尔格莱德大学免职，对党说来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但是这是形势的标志。在这些批评家沉默之前，铁托不得不亲自出面，几次进行干预。

批评家中的斯韦托扎·斯托亚诺维奇，在当时被禁的《实践》杂志上对"神赐的领袖"①的问题作了敏锐的分析。文章刊登在1972年5月《实践》杂志上，即在铁托干预克罗地亚的事态发展之前不久。这位贝尔格莱德教授并未提及南斯拉夫总统的名字，只是公开谈论斯大林。然而，这并不妨碍读者立即想到铁托，铁托自己明显地感到指的就是他。因为南斯拉夫的总统无疑是一个"神赐的领袖"。

斯托亚诺维奇阐述道，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都未曾很好地"把革命的领袖只作为人的本性来对待"。一切共产

① 原文为"Charisma"，在古希腊文中是指神的恩赐。在政治生活中，这词的意思是指对党羽的感召和作用。

党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已经失灵了，因为它们允许自己的领袖"过分无拘无束和有过大的权力"。共产党人——斯托亚诺维奇在这里显然不仅指苏联的党，而且也指南斯拉夫的党——甚至已经着手将"至高无上的颂词"献给还活着的领袖们，甚至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建立纪念碑。

斯托亚诺维奇认为，从"神赐的时期向神赐以后的时期"过渡是特别脆弱而艰难的。在苏联，当斯大林去世之际，在政治统治集团中发生了意料中的地震。

现在的问题是，一旦神赐的领袖铁托退出舞台，斯托亚诺维奇是否也期待南斯拉夫发生这样一次"地震"。斯托亚诺维奇提出的关于神的恩赐和自由化之间的关系的考虑很耐人寻味，这是一个在南斯拉夫发展中显得很清楚的问题。

斯托亚诺维奇确信，"如果认为自由化终将不可避免埋葬神赐的权力，这话是正确的"，他继续说，"然而，只要神赐的领袖们作为自由化的发起者、设计者和先驱者登台，他们能够弥补这种损失，这话同样是正确的(虽然初看起来象是矛盾的)。当然，一个神赐的领袖只能有限度地行事。因为民主制度越强，神的恩赐就越弱。反之，神的恩赐越强，民主制度就越弱。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化的高潮通常会被神赐的领袖以独断原则进行的反击所取代的原因。为了维护神赐的统治，人们总是使用'左的'宣传：虽然神赐的领袖享有特权地位，他们通常还是把自己放在平等的政治运动的首位"。

但是铁托确实是这么干过，在斯托亚诺维奇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不久，在反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行动中以及此前在平息贝尔格莱德左派大学生运动的——非常成功的——尝试

中，南斯拉夫总统以"平等的"理由进行(反对结盟、反对专家治国论者，反对社会差别)论证，同时重新建立党和社会的独断原则(拒绝多元主义，拒绝并非由党监督的群众运动)。

但是斯托亚诺维奇继续对铁托进行批评。他说，神赐的领袖们应对危机的形成负责，因为他们"系统地阻止"自由化的过程，而同时他们又认为，必须继续实行自由化。通过这一似乎矛盾的态度，神赐的领袖们实际上加强了他们的地位，因为他们的作为"救世者"的角色唯有在这样的危机时期才可能扮演。斯托亚诺维奇指出，人们担心未来，担心这位"救世的"神赐领袖去世的这一天。斯托亚诺维奇甚至认为，这位神赐的领袖企图亲自挑起危机，以便登台，通过"动大手术"解决危机。这位贝尔格莱德教授原话写道："神赐的领袖这么做，通常他就可以避免只打击一方。他也打击了另外一方，这就是说，他并不贪图激进地解决危机 他这么做为了给下次危机留下种子。"

所以斯托亚诺维奇在五月就曾预言，半年以后即将发生的事情：即在克罗地亚民族共产党人倒台以后，塞尔维亚的尼凯集奇班子将被免职。认为这种关键性的事态发展的结果会加强铁托的神赐，这种看法是中肯的，甚至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中间，都广泛地担心铁托去世和随后会开始的不安定局面，这是事实。

新马克思主义者斯托亚诺维奇所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是：如果南斯拉夫没有铁托的神赐，它怎能在对抗强大的斯大林的神赐中坚持下来？因此象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怎能谈得上巩固的民主制度呢？在古老的塞尔维亚王国，在两次大战

间歇时期以及特别是1945年以后，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南斯拉夫，都谈不上象这样的或即使只是接近于这样的发展。不仅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而且还有他们内政上的和处在流亡中的对手，这些对手来自各个民族，是各式各样的，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还一直印记着1941至1945年解放战争的经历——这次常常为人所遗忘的战争，是欧洲曾经发生过的流血最多和最可怕的战争之一。几乎就在战争结束之时，由于与苏联爆发冲突，这个国家重又面临危险的境地。持久的非常形势本来只能由神的恩赐来解决，不能由别的什么。总之在早期，神的恩赐帮助掩盖了民族矛盾。然而——这一点，斯托亚诺维奇是无可非议的——个人统治的任何形式，即使得到充分发挥，也有其消极的方面。人不仅有其伟大的品德和理智，而且有其渺小和自负性，固执和急躁，它们给历史烙上标记。所有这些个性都可能紧密地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

斯托亚诺维奇事例。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朕兆，这些人表明，在贝尔格莱德以及在塞尔维亚的知识界和政界，存在着颇为耐人寻味的思想，它们远远超出塞尔维亚民族的范围。假定在南斯拉夫再次出现一个民主化的时代，我们一定会在将来又遇到这些倾向。

只要存在着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总会在那里起突出的作用。然而，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贝尔格莱德——这里不仅仅指政府、党的最高层或经济，而且指塞尔维亚的整个领导层——今天是否比过去更能够理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意义？他们是否准备，即使在那些显得不舒畅的地方，对克罗地亚人，但也包括斯洛文尼亚人和马其顿人实行让步？南斯

拉夫要没有塞尔维亚人或反对塞尔维亚人都是无法存在的。但是，它没有克罗地亚人或反对克罗地亚人也是无法存在的。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两个最大的民族"和平地分道扬镳"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人们怎么解决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犬牙交错的居住地呢？人们怎么解决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问题呢？不管一个民族的几十万成员不得不生活在另一民族的统治之下，这解决得了吗？

克罗地亚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从塞尔维亚的城市贝尔格莱德出发，统治着整个南斯拉夫，他的"神赐"过去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虽然并非一个完善的办法。但是，根据推测，这样解决的时代渐渐结束了。因此，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更多地要落在塞尔维亚人身上，而不是克罗地亚人身上。塞尔维亚人是南斯拉夫人数最多的民族，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塞尔维亚人的命运是这样——对这个民族说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尽的责任比享受的权利更多。

坦克和游击队之间："全民防御"

南斯拉夫的战争理论和防御理论是贝尔格莱德领导在1968年8月21日，也就是苏联袭击捷克斯洛伐克那一天所受到的震惊的产物。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苏联势力范围之外唯一从华沙条约侵袭捷克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的欧洲人。其结果便是"总体防御"或者叫"全民防御"。这个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南斯拉夫随时都可能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侵袭，而"正规的"军事斗争手段又不足以抵御这种侵略。于是南斯拉夫人发展出了一种防御概念，它以在常备正规军和通过军队的游击部队来加强的地方武装之间划分任务为基础。

"捷克的经验"甚至立即在南斯拉夫的联邦宪法中得到了反映。宪法写道："任何人都无权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名义签署或承认这个国家的投降或被占领。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这类行为应受到惩罚。叛国构成了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必须作为严重罪行予以惩处。"克罗地亚共和国关于国防的法律又往前走了一步：那上边甚至规定，任何人不得招引外国军队到国内来。这就使得从国家法律和国际公法上说，都不可能建立一个胡萨克政权。

所以说，建立过一个胡萨克政权的苏联，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想起了往日的游击传统。因为，在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以前，游击战争固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许多纪念活动

和阅兵游行的项目，但在具体的军事规划上游击队简直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最后是在与斯大林冲突期间，也就是在1953年以前，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就准备万一苏联进军便开展一场可能的游击战。但是，随着铁托与赫鲁晓夫的和解，这个战争好象就被遗忘了。南斯拉夫人民军喜欢打正规仗而不喜欢打非正规仗。在铁托与斯大林冲突期间南斯拉夫有一支五十万人的常备军处于戒备状态。当时，在1952年，南斯拉夫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都用于防卫的目的。光是美国的军援在五十年代就计达七亿五千万美元。但是，到1968年防卫支出的数额只占南斯拉夫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军队的人员也压缩到了二十万人。

南斯拉夫的军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基本上是准备打一场"正规的"常规的战争。当时的军事演习都是着眼于在公开的野战中保卫全部领土，而且首先是保卫相对地说没有设防的大城市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但是，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得出的最初认识之一就是，对大量的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侵袭者是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惯例的防卫的。苏联人不仅在对布拉格的奇袭中，而且也在华沙条约为数众多的演习中都表明，他们是如何把占优势的空降部队闪电般地投到对方的背后的。针对这种火力上占极大优势的军事行动，南斯拉夫的军队必须留作后卫。首先很明显的是，敌人的侵袭使得自己只有几个小时，也可能只有几分钟来动员自己常备的兵员。苏联空降部队在布拉格降落的那个夜晚，人们在南斯拉夫匆匆忙忙地往飞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以防类似的突然袭击行动。

但是鉴于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南斯拉夫的军事领导现在不再认为，在遭到某个超级大国进行突然侵袭的情况下——从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态看这只可能是苏联——必须从自己国家领土的主要部分撤出来，并至少要暂时交给敌人去控制。如果敌人的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太大，如果敌人投入了大量的直升飞机、坦克车并进行更大规模的登陆。那么，根据南斯拉夫新的战争理论，自己常备军的数量就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关于这一点，南斯拉夫陆军上将萨沃·德尔耶维奇写道："这就是说，我们能否比如说拥有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战士，五百或一千架飞机，五个或九个坦克旅，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决定性的了。之所以这样，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一方占有很大优势的条件下，素质相同或近似的两支军队交战时，较弱的一方鉴于自己的实力是不能得到适当的表现的。"①

贝尔格莱德的军事家们认为对南斯拉夫可能进行的侵略形式有两种侵袭：一种是"较轻便的"形式，只有一个或几个邻国进攻，显然是得到了某个自己并不动手的超级大国的指令或支持。不妨把这种情况称为"保加利亚式"。对这种变相的形式，在贝尔格莱德人们公开认为，可以主要用常备军队进行抵抗，这时游击部队和地方部队都只能起一种辅助作用。但是，如果一个大国，很可能还有它的同盟体系参加来直接侵袭，那么，常备军就在边界上进行拦阻性的抵抗，以便在这期间能够把"全民防御"动员起来，使冲过来的敌人进入准备妥当的游击区。

---

① 《南斯拉夫总体防御设想》，贝尔格莱德，1970年版，第252页。

南斯拉夫军队的“A—梯队”将承受侵略者的第一次打击。关于这一点，南斯拉夫陆军中校约万·拉多万诺维奇说：“常备军在战略的边界地带只能进行有限的抵抗。因此，第一战略梯队不宜太大。它在平原地区要作的只是拦阻侵袭者出人意外的迅猛冲击，以争取时间动员兵力和国防的其他因素。”[1]常备军的主力要与地方武装共同保卫“国家的中心部分”。中心部分可理解为主要是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以及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腹地的各一部分。所以说，大体上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的游击队特别活跃的那个地区。

在贝尔格莱德人们预计，遇到侵略时，部分常备军也将出现于敌人背后，因为这些常备军将不是被切割开就是被有意地留在那里。南斯拉夫的战略家们还认为“最严重”的变相形式也是可能的：那就是在全国只有游击队还坚持着抵抗。对此拉多万诺维奇陆军中校说：“如果侵略者在兵力上和装备上都达到了很大优势，而且占领了大部分领土，那么，常备军就要逐步化为较轻便的部队，与其他游击部队和地方部队一起主要打游击战争，进行最大限度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和后方将融合为一体。全国到处都会成为前线，所以常备军与地方武装就要结合在一起。”

此外，防卫要建立在对侵略者进行“全民抵抗”的基础上。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能够进行反对侵袭者的斗争。南斯拉夫的战争理论就是这样说的。因此，全部居民，男人、妇女，必要时甚至连儿童都将卷入对侵略者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抵

[1] 《南斯拉夫总体防御设想》，贝尔格莱德，1970年版，第325页。

抗。这种"武装起来的人民"的理想景象是：敌人诚然能够占据某些较大的城市和交通线，但是敌人将不断地遇到破坏活动和游击活动。特别是敌人找不到一个当地居民愿意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不管是开火车也好，使发电厂开工生产也好，或者那怕是只给敌人通递消息也好。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防御就要在各共和国一级、行政区一级或者也在企业一级由小股部队独立进行。《人民防御指南》中说："各共和国和各省的防御系统，融合成一个由行政区、城市、村镇、居民点、行业及其他组织的无数焦点组成的南斯拉夫统一的地方防御。"

南斯拉夫的战略家们颇象中国共产党人的战争理论那样，也把"人的因素"视为关键。伦敦战略研究所曾经预计南斯拉夫能够在最短期间召集起三百万武装人员。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南斯拉夫属于全欧洲防卫力量最强的国家之列。今天南斯拉夫的将军们，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山野森林中，作为年轻的游击队少尉而取得他们最初的（因而或许是决定性的）军事经验的士兵。他们的出发点是：必须粉碎侵袭者的闪电战计划。谁也不能"迅速地而且无痛苦地"占领南斯拉夫。因此也就能经受得住敌人在技术上除原子武器以外的第一次毁灭性打击。因此，这些军人们的出发点是：侵略者为了打破人民的抵抗，必须在南斯拉夫集中十分强大的部队，以致到后来无论从那方面看，对他们说代价都是太高了。最近一位南斯拉夫将军宣称说："谁也没有强大到能够进行一场持久的侵略战争。"所以计划就是：在敌人的一场突然侵袭之后，立即开展游击战斗活动，阻止敌人补充给养，阻止敌人必定用来运送弹药和武器的、在南斯拉夫的地域里恰又十分刺眼的辎

重车队。

南斯拉夫人展出了他们在国内自己研制、自己生产的新反坦克火箭和一种防空火箭。一个人就可以用这两种武器准确地既打坦克，又打飞行高度在两千米以下的飞机，而且这两种武器都很便宜。反坦克火箭只用三千美元，而一辆坦克几乎价值一百万美元。此外，南斯拉夫的军人还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当时差不多单纯的农民游击队"消灭了"国防军的高质量士兵（飞行员或坦克驾驶员），就这样给敌人造成远远不只是数量上严重损失的伤害。

所有这些考虑的目的，都是把南斯拉夫设想为对敌人说是一个"刺猬"。它浑身是刺，对它侵袭是捞不到好处的。所以南斯拉夫的军事专家杜桑·多采特解释说，根据贝尔格莱德的估计，侵略者必须在南斯拉夫占领的每平方公里领土上投入八个半士兵，才能保持这个国家平静无事并进行控制。在现代军事力量的状况下，谁也不能在一个国家里使军队密集到这种程度。

南斯拉夫的地方武装目前约有九十万人，主要是在地方一级组织起来的连队规模的部队。这些部队应在敌人进行空降时投入战斗。地方战斗人员的武器保存在军械库里，这支部队所属人员的其他装备则放在各人自己家的柜子里。据说，遇到严重情况，半数地方部队可以在三至六个小时里动员起来，另外一半可以在二十四到四十八个小时里动员起来。

只要南斯拉夫的这种"刺猬"阵势令人信服地、确实可靠地对潜在的侵袭者发生影响，那么，这种"刺猬"阵势是能保护这个国家免遭突然袭击的。南斯拉夫人一再讲到的一个命题

是："我们不是捷克人。"意思是说："我们将要自卫。"对这一点，可能的侵略者，肯定还有苏联的军事策划人员，都必定是有印象的。只要苏联人不能不估计到，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可能有不可预测的后果，而且不可能象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布拉格那样，在几天之内取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解决"。那么，莫斯科便会对这样的行动，事前作彻底的考虑。

但是，苏联对南斯拉夫抵抗力量的评价也取决于其他因素。没有任何外部援助，是不能长期坚持进行游击斗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从英国和美国得到了武器和给养。西方国家会不会第二次愿意而且能够给南斯拉夫人提供这种援助呢？或者，会不会象匈牙利和捷克遇到过的那样，西方国家干脆使这个国家听天由命呢？（尽管匈、捷两次事件的政治情况不同——那两个国家都是华沙条约成员国，而南斯拉夫则是不结盟的。）

没把握的第二个因素，可能在于南斯拉夫的国内情况。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会真的象一个人似的奋起抵抗侵略者吗？或者，会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就没有"合作者"吗？如果南斯拉夫的国家到了存亡关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居民会持什么态度？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会扮演什么角色？在必须遵照"各自逃命"的口号行事的居民中，西方的消费意识形态渗入到了什么程度？数十万兵役年龄的精壮男子在国外当客籍工人这个事实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数以万计的这些客籍工人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匆匆忙忙应征入伍，那么，奥地利边界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如果南斯拉夫政权对某些政治组织、宗教组织，或者某些个人实行禁令、压制或逮捕的话，

还能不能指望这些人的亲属和朋友在危急的情况下表现忠诚？所以，民族的、全国性的、必须远远超出共产党人圈子的意见一致，也是卓有成效的防卫政策的组成部分。铁托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是这样作的。在反对德国人的战争中以及在与苏联的决裂中，他都对本来与党并不同心同德的各民族各阶层居民的忠诚确有把握。只有这样，他才取得了胜利。他的继承人都理解这一点吗？

因此，"南斯拉夫的总体防御"也是一种不得与政治发展分开的可能的选择。当然，——苏联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对我说过：如果苏联进行侵袭，南斯拉夫只要能争取到固守八天之久，那么，整个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就可能开始动荡。这可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卫与歌利亚分裂[①]的最后一个结果。但是，——这一点无论对南斯拉夫的防御者还是对可能的苏联侵袭者来说，都是一个问题——苏联这么进行侵袭的时候，究竟还会不会有共产主义？这将是一场这样的战斗，就是双方部队的帽子上都戴着一枚红星。那么，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经过这样的冲突会如何向前发展呢？因此，南斯拉夫的防御是一个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极大爆炸性的问题。

① 故事见于《圣经》。大卫是以色列人，童年时牧过羊。歌利亚是腓力斯人的巨人勇士。腓力斯人发起了对第一任以色列王扫罗的战争。大卫在这次战争中以投石器和石块打死了歌利亚，后为以色列与犹太联合王国的创建人，成了以色列救世希望的象征。——译注

谁是后来人?

谁将是铁托的继承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简明的:没有人。因为,在铁托之后,不会有哪一个人胜任得了铁托以其人格及其政治光辉的力量所控制的一切工作。正如同戴高乐、阿登纳、约瑟夫·斯大林一样,铁托也不会有继承人,甚至不会有摹仿者。如果有哪一个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在铁托死后穿上“老头子”的礼服,提出类似的要求,出现在本国各民族的面前,那么,他肯定会引起哄然大笑和愤慨:距离太大了。

因此,没有铁托的南斯拉夫将注定是一个减少了铁托的南斯拉夫。——这一点将势必对这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发生影响。此外,铁托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或者最后几年里是否实际上还有活动,或者权力是否事实上早已不是由他自己,而是由别人假借他的名义行使,这全都无关紧要。在这方面中国的例子是很有特色的:显然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有人窃用了他的权威。到了他安息的时刻,一切都变了样子。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南斯拉夫也会有许多东西要改变样子。

为了对那么一天预作准备,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机构现在已经拉紧了缰绳。看起来南斯拉夫刚好站在多元论的门槛前的自由主义阶段已经过去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都混杂着活跃地进行争论和发表公告的自由主义阶段也已过去了。内政的气候已经变得更加严峻了——

而且越是临近那么一天，内政的气候也就会变得越是严峻。今天，在这个国家里过多地讲话，对苏联的朋友，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对西方议会制的拥护者来说，都是不可取的。

铁托死后，在继承人危机的过程中可能发生骚动，继承人危机可能转变成为民族危机，可能象佛朗哥死后人们在西班牙所看到的那样，出现罢工和游行示威。但是由于南斯拉夫暴露在外的战略地理位置（不可与西班牙的相对封闭和孤立相提并论），出现这种情况就足以引起苏联很可能进行"兄弟的援助"，——喊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遇到了危险，铁托的遗产必须靠莫斯科来"拯救"。

即使南斯拉夫官方的政治家和干部们不肯承认，——这样的思考可确实成了他们巨大的忧虑。因此，千方百计要使铁托主义不受气候影响，就是没有了铁托，铁托主义也要能继续存在下去。现在已经看到，铁托被尊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位"经典作家"的高度。热情的宣传工作者已经在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照壁上绘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铁托"的画象。这样一来，以不结盟和工人自治为核心的南斯拉夫制度，从思想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说就被列入圣经了，就被定为规范了。

铁托的遗产在意识形态及党的工作方面看起来是不差的。如果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在1948年是单枪匹马地对抗苏联的话，那么，现在在东方集团中至少有了一个官方的铁托同情者——罗马尼亚，而且肯定还有无数"非官方的"铁托同情者，只是在等待新的时机好步南斯拉夫人的后尘。西欧的共产党，首先是意共和西班牙的党，但也有法共，在1948

年(法国人甚至直到近几年之前)都是作为莫斯科的工具反对铁托主义的,如今也都同情起"南斯拉夫道路"来了。最后,还有南斯拉夫从非洲人和亚洲人那里得到的支持——也就是"不结盟"——也是不可低估的优点。

但是,尽管环境因素和政治因素这么重要,就军事的以及就政治的战略来说,南斯拉夫仍然是一个很受威胁的潜在的受害国。通过"全民防御"的理论,游击战争在应付入侵时就会获得新的生命。在"社会性的自卫"的口号下,全民都要挺身反对敌对国家或政治组织的政治攻势和宣传活动。但是,1941年的史诗是否会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重演,这还难以确定。南斯拉夫的正规军根本抵挡不了苏联的正面攻击——而地方民兵在这种情况下会是怎样的状态,也还有待分晓。从巴尔干农民简单的生活方式一下子进到消费社会,至少在城市里引起了觉悟的变化。今天的贝尔格莱德人是否还会象他们的先辈那样,高呼着"宁要战争,不要协定;宁要坟墓,不要奴役!"在大街上游行,至少是没有把握的。另一方面,民族性格不会很迅速地发生变化。骄傲、固执、准备自卫,对什么都不能容忍,都还象历来那样对许多南斯拉夫人来说是有典型性的。"与捷克斯洛伐克相反,我们这里总会有人准备搏斗。"米洛凡·德热拉斯不久前这样说。不过根据经验,人们为小汽车和消费而搏斗,可没有为他们想象中的政治自由和民族自由而搏斗那么激烈。如果南斯拉夫人有一种印象,认为他们的自由——如果已经不是个人的自由,倒确实是国家的自由或民族的自由——在他们"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中比在任何别的地方得到了更好的保存;如果他们还会得到一种印象,即

苏联威胁的正是这种制度，那么，他们现在马上就能表现为很好的战士。苏联人如果进行干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望会象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不受损伤。

因此，铁托的继承人必须也估计到这种可能性，即使眼下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严重。首要的是到那么一天能顺利地过渡权力，这样就不致产生合法性和正统性上的漏洞，使国内外的各种势力有机可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铁托的继承人已由1974年生效的联邦新宪法预先确定了。铁托被确定为终身总统，但是有一个八名成员组成的国家主席团协助他。现在这个主席团已经接过了部分职权，并且正在以这种方式担负起新的任务。这个集团的主席是铁托。如果铁托受到阻碍，副主席自动担负起国家首脑和军队最高统帅的职务。这个副主席的职位是轮流担任的，所以没有一个成员担任这个职位会超过一年。现在担任这个职务的是门的内哥罗人维多杰·扎尔科维奇，在他以前是克罗地亚人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

在共产主义的寡头政治中，难以预言一个"神赐的领袖"死后哪一个人物会走到前边来。情况常常是象斯大林死后阶段那样，幕后边的人物走到了前边来。——这是因为经常为人们说到的受宠者在相互斗争，这一个封死了另一个。所以在1953年讨论斯大林的继承人时，简直没有人想到赫鲁晓夫。——接周恩来班的中国总理华国锋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或许后来提名委任他的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他。

对于一个象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也不能排除这种演变。铁托死的时候，将会出现许多被铁托免职的，现在作为强制退

休者养起来的领导备用人员，演变就是伴随这种现象开始的。那里边有垮了台的以兰科维奇为中心的秘密警察一派，有以萨伏卡·达普切维奇-库采尔和米科·特里帕罗为中心的克罗地亚民族共产主义的一派——政治上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共同以塞尔维亚党魁马尔科·尼凯集奇为首的一批人的大集团。此外，还有被撤职的斯洛文尼亚政府首脑斯坦纳·卡乌其奇以及受到冷遇的马其顿首位政治家克尔斯特·契尔文科夫斯基。这些人全都与铁托有重大的实质性分歧以及个人间的分歧。但是如果铁托不再居于首位，至少能勾消个人间的分歧。——至于实质性分歧，也可由这一方或另一方表示迁就，或者互相磋商达成妥协而平息下来。重新起用被清洗的、被革免的、甚至被投入监狱的异派人物，在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有几个当初被整垮的人的行为表明，他们自己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转折完全被排除了。

就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米洛凡·德热拉斯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在一种关键性的形势下，他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与民族共产主义者之间和解的象征，也可能是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和解的象征。德热拉斯本人看来很聪明，他没有向前冲，所以他还没有丧失这种可能性。尽管他完全拒绝以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但他一向谨防采取会使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与共产主义者争论的军事上反共的立场。他对待铁托这个人物和铁托的著作的有区别的肯定态度，就是这种表现。因为德热拉斯公开认为，铁托时代以后的南斯拉夫不应否定铁托，而应在铁托开创的基础上继续建设。

这一切在目前都还只是沙滩上玩沙的游戏。但是，如果铁

托时代以后的领导人想要，或者干脆说是必须取得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一致意见的支持以了结这些问题，那么，这一切就可能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上变为现实。因为，人们不可忘记，铁托以他个人的权威平衡了许多事情。他能为自己作出很多对他的继承人是大为困难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是：铁托的继承人会愿意更多地借助于社会的一致意见进行统治吗？——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迁就现在的各反对派——或者继承人会更多地选择强硬路线吗？在后一种情况下，军队就要起一种重大的内政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军队是南斯拉夫唯一"完整的"，而且至今没有明显受到民族冲突影响的组织。当然——经验说明，军事专政或者在军队强力支持下的党派统治，永远都只不过是过渡状态。

如今，在这1976年与1977年之交，有四个人在南斯拉夫的统治阶层里作为特别的决策人物，并作为铁托以后的时代可能的"四人小组"确定下来了。这四个人就是斯洛文尼亚人爱德华·卡德尔、克罗地亚人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塞尔维亚人尼古拉·留比契奇和斯洛文尼亚人斯坦奈·多兰茨。在这四个今天显然能对铁托施加最大影响的人中间，有两个属于游击战争中过来的老年领导人，他们和总统个人间也有十年以上的密切联系了。这两人是巴卡里奇和卡德尔。

斯洛文尼亚人爱德华·卡德尔生于1910年，是这个四人小组中的长者。他是个意识形态专家和理论家，具有丰富的内政经验和外交经验。卡德尔是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与斯大林破裂以后走上使"南斯拉夫道路"彻底制度化从而也是与莫斯科彻底分道扬镳的那些南斯拉夫共产主

义者的领导人之一。铁托喜欢进行实用的政治活动，他的亲密朋友卡德尔则一贯很系统地从事社会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据说工作中炫耀学问、富有教训意味而且擅长演说的卡德尔(他最初曾当过教师)对书面的渊博学识有一种爱好。今天有这么一个在宪法上和法律条文中明文规定的法典化了的南斯拉夫自治制度，就应归功于他对书面的渊博学识的这种爱好。卡德尔只有一个缺点：他的健康不正常。不久前他又作了一次胃部手术。而他能否有朝一日继承大位，就取决于他的健康状况了。

克罗地亚人符拉迪米尔·巴卡里奇生于1912年，也是个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养的共产主义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作为法学博士属于那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在共产党中活跃的为数很少的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他父亲是南斯拉夫王国的高级法官，并且当时领导着对共产主义者约瑟普·布罗兹的诉讼——而他的儿子也在这样的曲折道路上成了共产主义者。从1944年到1969年，巴卡里奇是克罗地亚党的首脑，还是南斯拉夫党的最高领导成员，至今他还是党的最高领导成员。他作为政治家，尽管有惊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却比卡德尔富有弹性。巴卡里奇是南斯拉夫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人之一。主要由于他的参与，在南斯拉夫农业中才废除了集体农庄制度，并重建起了私有的农民阶级。巴卡里奇对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的态度也一向很温和，并且郑重地废止了从开始特别是自逮捕和判决了斯特皮纳茨红衣主教起形成的对审。巴卡里奇还保证加强克罗地亚的自治。当然，当他看到本来从他的“流动贫棚”

中成长起来的克罗地亚民族共产主义者们的旅程目的是他所不能同意的时候，他便很快与他们疏远了。

目前巴卡里奇是"南斯拉夫宪法秩序保护委员会"的主席。在这个职位上他管辖着警察和情报机关。除此之外，从思想上和生活态度上说，巴卡里奇都和警察格格不入，倒是一个有政治才学的人，一个沉静的老谋深算的高级政治战略家。当铁托把"克罗地亚之春"的代表人物从各种职务上赶走的时候，原则上赞同铁托对萨格勒布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判决的巴卡里奇担心达不到无穷尽的清算。现在巴卡里奇主要是在克罗地亚享有巨大的威望和无限的信任。克罗地亚居民把他看作为卫护克罗地亚人利益的保证人。但是巴卡里奇在塞尔维亚的共产党内也得到赞同——所以他主要与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米洛什·米尼奇关系良好。萨格勒布流行一种说法：1972年初整个克罗地亚为清洗、起诉和自首而动乱不安的时候，满头白发、身材矮胖、经常生病的巴卡里奇在医院里对给他治病的医生说："大夫，你一定得给我把病治好，我好为克罗地亚人拯救还能够拯救的东西。"

居第三位的是塞尔维亚人国防部长陆军上将尼古拉·卢比契奇。现在在南斯拉夫人民军中铁托元帅之下级别最高的军官留比契奇到1941年才成为共产主义者和游击队员。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是"第二无产阶级师"的参谋长。六十年代里他才发挥出了政治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他作为第一军区（贝尔格莱德)的司令，在1966年当时的秘密警察头子亚力山大·兰科维奇垮了台而人们暂时还害怕这个强有力人物的骚动时，命令他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铁托极为重视他的这次忠

诚。显然留比契奇升到铁托之下能够达到的最高军事职位也应归功于这次忠诚。

确实很明显，当前在南斯拉夫的统治阶层中"最高的塞尔维亚人"是一位军官。近来流行一种谣传说留比契奇要停止军职，脱下军服，以便外表上在国务和党务的最高集团中表现为平民。这样就使他能以在礼仪上也起到重要的政治作用，而不致招来对他和军队的谴责，说他追求某种军事专政。当然，可以肯定，"平民"留比契奇在国家主席团里或者在党的执行局里，都能使用与他的积极军官的直通电话线，这是别的政治家所不能使用的。

最严密的领导集团中的第二个斯洛文尼亚人是1925年生的斯塔奈·多兰茨。与其他三人不同，多兰茨不是"老游击队员"。第一因为他年纪不够大；第二，因为他到1944年才参加"人民解放运动"。在这以前他住在当时被德意志帝国吞并的下士的里亚。但是此后他便在斯洛文尼亚的党组织内和军队政治部里开始了他青云直上的生涯，最后进入了贝尔格莱德党的领导执行局。对他来说重大突破是在1971年之后。那时多兰茨在克罗地亚的清洗过程中和加强党中央机构的过程中是以党的书记和铁托助手的身分出现的。现在可以说他是南斯拉夫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的职务本来——主要由于有独立意识的尼凯集奇组织的抗议——只应担任一年之久，但现在他已经担任四年了。此外，他不只是助手和"书记"，而且还越来越经常地定独立的政治音调。以评论判断著名，因而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是一贯喜欢的贝尔格莱德FAZ的记者安德烈阿斯·格拉夫·拉初莫夫斯基关于多兰茨写道："掌握

多种语言，也掌握德语的多兰茨，作为一个对哲学问题进行深邃思考的固执怀疑，眼光远大而又宽容大度的人接待着外国来访者。当通常把黑色成衣看作党的官僚的假面具时，他的穿着是很考究的。这位不倦地号召对'内部敌人'进行斗争的人，正如在底下他为几个作家和艺术家进行调解所表现的那样，比他的号召更少一些偏见。他那毫无幻想的外交见解使他今天与其说在东方集团中不如说在西欧找到了伙伴。”

因此，多兰茨不是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外貌与其说象个共产主义的高级干部不如说更象士的里亚木材厂主的实践家和“掌权人”。

铁托最严密的圈子里的这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苏联的好朋友。卡德尔对莫斯科的深刻怀疑还可追溯到四十年代。当时面临着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头几次进攻，他的原话这样说：“现在我们没有后退的道路……我很了解俄国人，我懂得他们思考问题的逻辑。他们把我们说成是法西斯分子，为的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他们对我们进行战斗是符合道义的，政治上是正当的。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他们会把我们消灭掉。”① 对于苏联人来说，卡德尔现在是，而且将继续是在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间划出了原则性的意识形态分界线的人。但这一点比起他好象只因拒绝莫斯科而奉行一项实用主义政策来，要更有分量。

巴卡里奇的情况相似：一个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以协调，从而在某些方面比捷克人奥塔·西克和布拉格的改革家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一个解散了集体农庄而且成

① 《大陆文摘》，1975年3月号，俄文版，第216页。

为没有偏见的、温和的、向世界开放的政策的人物的象征，是不可能成为莫斯科试图把南斯拉夫重新拉入苏联集团的有益伙伴的。

这一点显然也适用于陆军上将留比契奇——尽管一再提出南斯拉夫军队里是否确实没有亲苏势力的问题。假如亲苏势力会以设想的某种形式存在，那么，任何形式也不能说明留比契奇属于亲苏势力。

最后，多兰茨对苏联人的态度则远不只是早已明确的，有时甚至是严峻的。他曾经用眼盯着莫斯科宣称："关于工人运动谁也没有专利权。"在一次南斯拉夫电视广播台中有人问他是否相信苏联解决了自己的民族问题时，他十分含蓄地回答说："按照宪法来说——是的。"（细心的听众马上作出这样的解释：似乎苏联顶多是在书面上而不是在现实中解决了这个问题。）1976年苏联党魁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苏共的二十五大上试图把他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团长接待，这个诡计对改善多兰茨和苏联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苏联人请他到勃列日涅夫那里赴茶会。多兰茨到场时，他一定弄明白了，不是他一个人到了，而是所有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东方集团领导人都到齐了。这样勃列日涅夫就把这个南斯拉夫人诱到了东方集团的首脑会议上。此外，《苏联大百科全书》已经把多兰茨出席的非正式的茶会宣称为"共产党领导人的" 正式"会晤"。南斯拉夫就这样通过走后门并借助于茶会受到了与东方集团其他国家的"相同待遇"。这是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至今一直不断指出的。

南斯拉夫怎样经受继承铁托的艰难时期最后不是取决于

卡德尔—巴卡里奇—留比契奇—多兰茨四驾马车的集体表演；除了这几个人，在大一点的范围里还可以再举出几个人来：大概有外交部长米洛什·米尼奇——一个塞尔维亚人——和两个马其顿人，就是联邦议会主席又是经济专家的基罗·格利戈罗夫和在党的最高领导中负责国际共产主义关系的亚力山大·格尔利奇科夫。在铁托的助手和假想的继承人中，对哪一个都不能只远远地标为"神赐的领袖"。但是或许制度首先经受得住的某种保证就在这里。南斯拉夫的集体领导是否能发挥作用，以及能发挥多久的作用而不发生内部竞争和路线斗争，现在还不能确定。历史经验的教导是，这样的集体领导是不会持久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要生存的约束和对外来干涉的惧怕，可能使继承人们团结一致，并把可能产生的意见分歧挤到幕后。

没有铁托的铁托主义

铁托时代结束以后南斯拉夫能不能存在下去，这个问题在有些地方是怀着忧虑提出来的，但常常也有怀着幸灾乐祸的期待提出来的。近年来南斯拉夫领导在与西方记者和医生的交往中流露出值得注意的神经过敏和愤慨，他们不乐意听到这些思虑。他们反应出来的愤慨露出了某种无把握性。因为，毫无疑问，想要破坏南斯拉夫的力量，或者想把南斯拉夫引向完全不同方向的力量都在进行活动。

想从“内部”翻转南斯拉夫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都是过激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自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之春”失败以后，他们便宣称克罗地亚要受塞尔维亚人的奴役，号召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不仅进行反对贝尔格莱德政权的斗争，而且进行反对南斯拉夫国家的斗争。此外，各种过激的团体都勇于进行恐怖打击、谋杀南斯拉夫外交人员以及最近的劫持飞机活动。1971 年对南斯拉夫驻斯德哥尔摩大使罗洛维奇的谋杀，对南斯拉夫驻法兰克福副领事埃尔文·茨道夫克的暗杀，以及由于克罗地亚过激派的刺客把乌拉圭驻巴拉圭的大使“误认为”南斯拉夫的大使枪杀了，这些还只是一系列刺杀中的几起事件。劫持飞往巴黎的美国民航机是一种扩大的行动，是一个自称“争取自由克罗地亚的斗士”的组织进行的。在南斯拉夫国内也发生过多起爆炸事件。最后一次是在萨格

勒布，当时铁托正停留在那个城市里。1972年有一股十九个武装的克罗地亚人从澳大利亚越过奥地利边界进入南斯拉夫，他们在被消灭之前与保安部队进行了长达几星期的战斗。

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强了南斯拉夫领导的神经过敏。即使过激分子只是一批数量相当小的流亡者——当然他们会不断从故乡的年轻人中得到生力军——果敢的小股人员在严重的形势中也能造成巨大灾害。不是预言家也会预料到铁托元帅去世的消息会使各种过激派开展活动。就算这些活动造成的只不过是炸弹爆炸和行刺暗杀的心理效果，那也是够糟糕的了。

第二种内部力量诚然不要搞垮南斯拉夫，但却要清除掉现存的制度，这是所谓"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即亲苏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他们一部分是住在东欧集团几个国家里的流亡者，所以在基辅和布拉格都有强大的"共产党情报局"小组。在莫斯科苏共的二十五大上"南斯拉夫共产党"、也就是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铁托的党叫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们不受阻碍地亮了相，而且散发了反对铁托主义的宣传材料。甚至据说，这次代表大会上除了官方的贝尔格莱德代表团之外还有个非官方的忠于莫斯科的南共代表团。

这个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1974年还在门的内哥罗的港口城市巴尔举行过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的参加者当然无例外地都被南斯拉夫警察局逮捕了。反对铁托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之一前上校弗拉多·达普切维奇在那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就逃到了布加勒斯特，他是用比利时护照从布鲁塞尔到达那里的，于是落到了南斯拉夫国家保安机关的手中。

1976年他被起诉并被判处死刑，最后宽大处理改为二十年徒刑。南斯拉夫另一个著名的莫斯科共产党人米勒塔·佩罗维奇1975年才从苏联到西欧旅行，在法兰克福没有得到居留许可，于是住到以色列。1976年夏，他试图与切特尼克的几个受过审判的流亡中的塞尔维亚的追随者组成一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反铁托统一战线。不久他便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在他失踪之前，那些谈话的参加者之一，一个名叫米欧德拉克·包斯科维奇的男子被暗杀于布鲁塞尔。

忠于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1976年春在伦敦准备的"纲领"中宣称南斯拉夫是一个"法西斯国家"，说铁托建立了个人的"法西斯专政"。忠于莫斯科的南共宣布了一个由一切"爱国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力量组成的旨在推翻这种"法西斯政权"的统一战线，同时一定要在南斯拉夫"重建"民主制度。这个党的干部们显然希望，通过这种统一战线和民主口号把流亡中的克罗地亚民族或塞尔维亚民族的反对集团争取到自己一边来。

在激进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侨民与南斯拉夫秘密警察UDBA（Uprava Državne Bezbednosti）之间多年来一直暗中进行着无情的战争——可以说是国内战争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紧随着流亡者进行的炸弹袭击和手枪暗杀而来的是，对克罗地亚流亡积极分子的神秘杀害。西方保安部门推测南斯拉夫情报机关参与了策划这种事。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流亡中进行的这种地下战争，为每个对摧毁南斯拉夫制度感兴趣的外国政权，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发动项目。

人们只能推测，苏联的官方政策与反铁托的共产党人之间的结合是多么紧密。当然，这些力量的基地多年来就在苏联和东欧。违反了莫斯科的意愿，“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就不可能继续活动。最近苏联人“放出了”几个这种“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到西方来，继续进行反对贝尔格莱德的工作，而且这次人们再不能对苏联正式提出谴责。因此，这些“共产党情报局分子”便充分利用大多数西方社会的迁移自由进行他们的活动。

然而克罗地亚的过激分子和亲苏的“共产党人”——南斯拉夫其他的流亡派别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只要不从外国得到援助，或者只要南斯拉夫不发生重大的内部震动，就不可能对南斯拉夫国家造成严重损害。但是这些运动和派别能够在国内和国际上促成对南斯拉夫制度的怀疑，从而提出这样的问题：铁托遗留下的两个基本立场，即自治的社会主义和不结盟是否还有意义？是否就不需要再采用较强硬的方法？这种思虑和发展趋向都无意地但却有利于苏联和它的利益。

苏联从来没有放弃过把南斯拉夫弄成莫斯科阵营范围内的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苏联领导人所作的或者让人所作的一切，都表明了这个方针。我们要记住：铁托是第一个卓有成效地反抗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的政策在1948年把俄国人从地中海海岸排挤了出去，而且直到今天，苏联人尽管有地中海舰队——一个分舰队——这里却还没有一个港口与苏联腹地有陆路连结。所以，苏联对具有理想的天然港口的南斯拉夫亚得里亚海岸——大约就是奥匈帝国时已很出名的卡塔罗（科托尔）港很感兴趣。苏联人一再催促

南斯拉夫人给他们提供一个舰队基地。

1948 年以后，铁托的政策把铁幕从卢卑克—的里雅斯特一线①向东推移了约一百公里，一直推到罗马尼亚的多瑙河后边，直逼保加利亚边界。这对东西方力量对比具有决定性的效果。如果没有南斯拉夫挣断莫斯科的卫星腰带，奥地利今天就不可能成为西方的民主国，也不会有 1956 年的匈牙利暴动，希腊就会在北部边界上与一个强大的莫斯科帝国相对持——而阿尔巴尼亚也就不会敢于退出华沙条约并与苏联决裂。

南斯拉夫好似地中海海岸前的一道障碍，阻挡着莫斯科直接伸向亚得里亚海的强权政治魔爪。南斯拉夫为罗马尼亚的独立政策提供了背后掩护，而且也防护了与中国结盟的共产主义阿尔巴尼亚免遭莫斯科的报复手段。此外，具有“不干涉、平等和主权”这个公式的铁托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外交上也对莫斯科构成不愉快的挑衅。

由于这一切苏联对南斯拉夫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的目的是要打破贝尔格莱德的固执态度，并且可能的话，把这个国家重新变成“正规的”，就是从属于莫斯科的人民民主制度。莫斯科可用各种方法推行这种政策。苏联人能够直接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施加影响。苏南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西方国家能够与苏联在政府与政府间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时，在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中马上就会出现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

① 卢卑克是西德海港城市，位于汉堡东北；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港口城市，紧邻南斯拉夫。——译注

动或者最近关于东柏林的欧洲共产党代表会议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是在困难的处境中在意识形态上与莫斯科对立的；一方面他们属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肯属于莫斯科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种中间立场在东方和在西方都引起了误会。只要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不能明确地把自己局限于对莫斯科的礼节，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处于必须反对苏联拥抱策略的境地。

从前南斯拉夫人要求苏联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长期以来也准备这样宣布。但是这种承认现在对贝尔格莱德真是起着飞旋器①的作用——因为，如果南斯拉夫象别的国家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对这个国家就应该使用和对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的标准，而南斯拉夫正是无论如何也不肯与那些国家处于同等地位的。1956年布达佩斯与1968年布拉格的事例令人心有余悸。

除了简直象教徒似的共产党情报局组织以外，南斯拉夫有亲苏的反对派吗？大多数南斯拉夫人，无论是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是马其顿人，肯定都不愿意听从苏联的号令。他们知道，在铁托的国家里生活，即使有种种限制，比起所有共产主义邻国的甚至苏联的居民来说，也还是比较自由得多，享受着大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活动自由。

有些观察家们断言，南斯拉夫的军队是苏联人潜在的拥护者。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具体的线索说明这一点。相反，倒是可以确定近年来——自入侵捷克以后——南斯拉夫的大多数军事演习显然都是以来自东方或东北方的假想侵袭为基

① 澳洲土著的猎具，扔出去，不中目标，能飞旋回来。——译注

础的。很明显，1971年秋“自由71”大型军事演习是对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将军扬·塞基纳外逃而尽人皆知的“北极星”计划的回答。根据那个计划，在南斯拉夫国内困难的时候，苏联部队要和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穿过奥地利地区开进南斯拉夫。

当然有一点是明确的，南斯拉夫军队在公开的战场上绝对抗击不了苏联人。正因为如此，全民防御即游击战争的一种新形式就具有了重大意义。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出发点是，在国家受到根据情况看只可能是苏联进行的入侵时，国家的北部连同大城市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都会迅速失陷。那时他们就进山，往波斯尼亚去，进入塞尔维亚内地，往门的内哥罗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的部队在那里进行过斗争，适于开展新的游击战争。

即使人们认为，由于多种原因，今天不可能再度取得1941至1945年间游击队的那些辉煌战果，苏联也会看到，对南斯拉夫的这种进攻是与艰难和冒险连在一起的。如果南斯拉夫的抵抗取得成效，而且不象捷克斯洛伐克人那样局限于仅仅短暂的抗议，那么，在那时会出现的世界政治中从开始对苏联就是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说1968年苏联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军中不得不投入二十五个师共三十五万人，那么，对南斯拉夫就至少需要加一番，投入四十至五十个师共七十万人。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么大的兵力经过匈牙利投入行动，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尽人皆知，南斯拉夫到事态严重时将进行战斗反对任何干涉，也将反对任何残酷的干涉——即使需要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一位颇有影响的南斯拉夫干部在1976年春用这样的话对我描绘了形势。诚然贝尔格

莱德官方努力给外国来访者表现的是，南斯拉夫的防御意志同样是针对东方和西方的。而在实际上，南斯拉夫与华沙条约的问题显然远远超过与北大西洋公约的问题。因为，北约国家既不要南斯拉夫在意识形态上皈依，也不向它要求基地。如果能继续保持当前巴尔干的形势，西方就已经满意了。因此，如果贝尔格莱德指控：对南斯拉夫，世界上有些势力"不肯接受它的现状"，即"不结盟和以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为基础"，那么不用多打听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些势力。

在贝尔格莱德，人们对地中海的局势表现出特别的关切。这个地区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未受到理睬。南斯拉夫官方的谈话伙伴对一个人保证说，地中海是今天的"危险地带"。又说："如果要发生一场新战争，那么，就会在这里，在地中海地区爆发。"

由于这种种原因，南斯拉夫人也象罗马尼亚人那样，对所谓"索南费尔特理论"，即对由于不慎泄漏出来的美国外交官、国务院东方司司长、亨利·基辛格国务卿的顾问索南费尔特的讲话，作出了严重抗议的反应。这位美国外交官1975年在伦敦召开的美国大使会议上的那篇讲话中，为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没有"更为有机的"关系而惋惜。同时他还说，南斯拉夫人不应该这么倔强和富有刺激性，而对于匈牙利和波兰，由于它们在对苏联关系上的理性态度，则表示了赞扬。这话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中间激起了一阵愤慨的风暴。匈牙利和波兰是全部或部分地被苏军占领的国家，它们的外交政策完全从属于苏联人。索南费尔特的伦敦演说在贝尔格莱德被看作是，美国想要把独立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就不用提

了——交付给苏联的信号，而且确切地说，遵奉的格言是：如果我们在西欧可以干我们想要干的事，那么，你们在东欧就可以干你们想要干的事。在贝尔格莱德出现了一批关于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1945年在雅尔塔如何把世界划分成势力范围的回忆录。关于这个题目，南斯拉夫的一位外交负责人对我说："一方面有个索南费尔特先生；另一方面有个索南费尔特同志"——这是对美国的这次表现很受苏联人欢迎的讽示。

如果西方的领导国家在那怕只是"明确地考虑"把南斯拉夫让给苏联的可能性，就象必要时索南费尔特要作的那样，那么，对苏联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心理上的成就。因为，只要欧洲东西方的平衡保持下去，而且西方不使人怀疑东南欧地区进入了平衡状态的话，南斯拉夫目前的地位也就能保持下去。

不过，苏联向南斯拉夫穿着软底轻便鞋悄悄的渗透看来比苏联的军事入侵可能性更大。这种"通过后门入侵"的出发点是铁托之死。到那时苏联将努力使南斯拉夫在国际上信誉扫地。现在已经作到了一部分：例如1976年夏天在不结盟会议上苏联鼓动的方面提出口号说，南斯拉夫人是"白种人"和"欧洲人"，因此无需在有色人的第三世界筹备会上费心。此外，苏联还能用间接的方法使南斯拉夫内政里的危机温床发挥作用。苏联的情报机关克格勃懂得什么是挑衅技术。——例如克罗地亚的过激分子受到鼓动采取暴力行动以及"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得到激励去开展新活动。这一切都能半明半暗地进行，使人们根本看不到真正的首谋者。这种策略的目的是使铁托的继承人——在内政方面和世界事物中必然都不会

再有“老头子”的权威——不安全。继承人们突然不再能解决燃眉之急的问题，因而显然表现为笨拙的人，党和居民对他们都会感到不满意。

此外，客观因素也会使铁托以后的贝尔格莱德的领导陷入困境。可以想象，铁托死后的“继承危机”将与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现象的增多、到西方的客籍工人回流以及亲苏的力量与或许是民族分裂力量(大约在克罗地亚和科索沃地区)联合而又同时的行动交织在一起。

这一切因素,特别当这些因素在时间上碰到一起的时候,可能使得铁托的继承人不得不重新审度形势。党内可能兴起一些势力,认为铁托遗留下来的自治管理是危险的,因为自治管理会放纵自发的不可控制的势力;还认为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将是各民族间紧张关系的尖锐化,而且反过来,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民族冲突也必将对经济发生消极影响。贝尔格莱德的国际声望将会陷于令人怜悯的境地。

结果是:党的领导中怀疑在铁托主义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一派将得到增强。说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实只有借助于苏联的样板这个命题也会提出来。——也许领导中甚至会有多数人开始仿效苏联的榜样统治南斯拉夫。在这里也应防止简单化:这些亲苏力量在正常的情况下(即在不发生战争冲突的情况下)决不会公开把从属于莫斯科定为目标。他们倒可能大谈加强运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许会充分利用铁托死后可能有的“非铁托化的情绪”。死去的每个坚强的人身后留下的都不仅有崇拜者和朋友，而且也留下了

一大批他踏倒在脚下的人。这些人不能正确地评价他，这些人对人们普遍的敬仰感到不快。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以战争和国内战争为基础的南斯拉夫还有足够"坦率的估计"。苏联为了达到目的，肯定不会放松利用包括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流亡者在内的各种力量。但是，莫斯科的目的不是瓜分南斯拉夫，而是要包括贝尔格莱德领导的整个南斯拉夫在意识形态上和外交上都重新从属于莫斯科。

这种唯莫斯科是从的南斯拉夫领导，在居民中的基础很狭小，因此很象莫斯科操纵的东欧国家的领导，就更为需要依靠苏联的后援和支持。

果真到了这个程度，苏联就达到了全部目的：铁托主义的竞争社会主义消灭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个"干扰因素"清除了；欧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莫斯科的变化；得到了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的海岸；内部情况不稳定的意大利就会与东方集团为邻，既如此，则会如果不是破坏掉也会明显地制止住意共首脑贝林格争取独立的斗争；奥地利就会象个支撑得很不好的阳台，深深地悬在封闭的东方集团帝国之中——而叛逃出来的东欧人得到的教训是：长此以往谁也躲不开苏联的强权。

这只是铁托之死可能引起的后果中的几点。问题是：必定会这样吗？回答是：可能会这样，但不是必定。假如西方要在困难的问题面前坚守得住南斯拉夫，那么，西方就必须致力于维护一种自己不信服的，有时候还很粗暴地处理西方利益的制度。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西尔伯曼用简略的外交语言把南斯拉夫描述为"世界政治中最伟大的半强者"。可是在这

种说法里就有某种矛盾：谁要是认为贝尔格莱德反抗苏联人是理所当然的，他就不能同时期望贝尔格莱德对待西方会亲切温雅。这后一种倔强正是来自那前一种倔强。此外，南斯拉夫的抗拒还有一种证明作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自己证实，而主要是向共产主义世界证实，他们确实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雇佣兵，因为他们是被苏联人诬陷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雇佣兵的。就这种意义上说，在将来西方的政策也必须估计到小的冲突、分歧，甚至真正发脾气的南斯拉夫实践家。在巴尔干半岛上至今还有着与斯堪的那维亚或者荷、比、卢国家不同的社交礼节。此外，西方政治家在贝尔格莱德行事不可鬼鬼祟祟，也不可很顺从。面对惯于坦率地代表自己利益的领导集团，西方和联邦共和国也应讲清楚自己的利益。还要令人毫不怀疑，西方舆论如同对其他国家发生损害人权一样，对南斯拉夫发生的损害人权表示同样的抗议。

但是，切不可忘记最重要之点：稳定的南斯拉夫符合西方的利益，西方准备接受这个国家的现状。这不意味着赞同那里的共产主义制度，但却意味着赞同任何形式的民族独立，即使它挂有共产主义的牌号。对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会危害西方的恐惧，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德国几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赞同"南斯拉夫的样板"是以对南斯拉夫现实的误解和完全误认为基础的。南斯拉夫的样板不适用于联邦共和国，这一点，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已经说明白了。根据那种意识形态，每个国家都必须走自己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对于德国来说，南斯拉夫的样板是荒谬的。1976年秋，一位南斯拉夫政治评论家在萨格勒布的《信使报》上甚至说，一个国家走

自己的通往资本主义的路也比走外国的大概还是受强制的进入社会主义的路要好些。德国几个社会主义理论家的遥远现实，长时期内不会危害到德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就象德国的毛派分子小集团不能决定德中关系那样。

从明智的考虑出发，西方必须保持南斯拉夫的形势，就是说，西方必须对这个国家继续独立下去深感兴趣。如果实现了这个前提，那么就会与铁托的继承人建立起合作甚至也许是信任的关系。此外，人们也就能够希望，这个国家在预料得到的过渡时期里强化路线之后回到完全的政治自由化路上来。南斯拉夫的制度将存在下去，并必定会有所发展。也许"自治管理"的思想里包含有主谋人和现在党的干部们还没有意识到的走向民主化的某种倾向。

当然，南斯拉夫会象它的人民所愿望的那样稳定，那样安全。如果离心力表现得较强，那么，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能使南斯拉夫团结起来。而如果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愿意要联邦的话，也不大可能有什么人能够破坏掉南斯拉夫联邦。西方不可对这样的南斯拉夫抱幻想。据人们估计，这样的南斯拉夫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不会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不会有自由的民主制度，也不会是没有偏见的权威国家。铁托死后，这个国家或许短时间里将象一个被包围的堡垒，但如果它能保持独立——即使在形式上比铁托生前有所节制——那么，它就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个考验还在面前。西方世界肯定不能决定或规定在南斯拉夫从铁托时代到铁托之后时代的更替如何顺利进行。但是西方可以通过政治的和经济的措施使这个过渡容易些，从

而有助于南斯拉夫的稳定——确切地说这是出自明智的政治考虑。在未来的年代里，摆在全欧洲面前的是苏联的霸权问题。只要南斯拉夫是独立的，那就是给苏联在南欧的霸权设置了一道政治的和军事的障碍。因此，如果铁托死后南斯拉夫仍然存在，那是符合欧洲的和整个西方的利益的。

